

東 海 大 學
中國文學系研究所
博士論文

晚清《女子世界》(1904-1907)中婦女知識
與典範之建構

指導教授：陳俊啟教授

研 究 生：李曉萍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摘要

本論文以丁初我主編的《女子世界》十七期（1904-1906），與陳志群在 1907 年所續出的《續辦女子世界》，一共十八期為研究對象。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面對內容駁雜的《女子世界》，筆者以知識與典範的建構為主要關懷，根據不同欄目的屬性，依其知識之類別，分為婦女思潮、居家知識、女性文學、女性傳記四個部分，來討論《女子世界》所傳遞的女性新知與典範的建立。

《女子世界》是集合眾人的刊物，丁初我等人為主要編輯群，並加上其他人的投稿之作。「論說」欄是丁初我等人的發表園地，也主導著期刊的婦女論述。在十八期的刊物中，可以發現其知識分子依循著「先破後立」的準則，一方面嚴詞批評當時女性的種種缺失，另一方則提出德智體三育並進的方式，讓女性由家庭進入國家的論述中，變為救國的國民母。

《女子世界》在第五期開始，增設了一些新的欄目，例如教育、實業、科學與衛生等，主要是針對女性讀者所開闢的，講述的內容以居家知識為主。編輯群企圖藉由引進西方與日本的知識，來改造傳統家庭母親的知識內容，更希望在傳播後將新知識變為居家常識，讓中國的母親們開始用科學與衛生的方式處理家務與養育小孩，使傳統家庭一變為現代家庭。

《女子世界》開闢「因花集」與「女學文叢」兩個欄目，鼓勵女性將詩詞與文章投稿。由女性的作品中，可以發現其內涵已不同於明清的才女文學，凡此種種，不論在晚清婦女解放思潮中，或在文學的價值上，《女子世界》都有其重要的地位。

《女子世界》常藉由對當時歐美與日本女性的介紹，希望中國女子能以她們為學習的榜樣。其次，《女子世界》則著力於建立漢族女傑的系譜，認為以中國悠久的歷史，決不可能無女軍人與女遊俠廁身其中，在民族主義的立場下，柳亞子等人努力讓中國的女軍人與女遊俠浮出歷史地表。

關鍵詞：《女子世界》、婦女報刊、居家知識、女權論述、婦女典範

晚清《女子世界》(1904-1907)中婦女知識與典範之建構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一、緣起.....	1
二、《女子世界》之相關研究.....	4
三、《女子世界》及其知識群體與編輯.....	7
四、論文架構.....	17
第二章 家國之間：《女子世界》的婦女論述.....	19
一、前言.....	19
二、女界革命：改造受害者與寄生蟲.....	21
三、鑄造之法：女力、女智、女德.....	35
四、完美的母親：國民母的訴求.....	62
五、為妻？為母？抑為人：女性角色的眾聲喧嘩.....	75
六、小結.....	81
第三章 打造新家庭：婦女居家知識的更新.....	83
一、前言.....	83

二、 認識身體保健：「衛生」觀念的引進.....	84
三、 日常居家的知識：飲食、穿衣與居住的科學.....	96
四、 新式母親：兒童教養知識的譯介.....	106
五、 小結.....	121
第四章 出走閨閣：婦女詩文創作的轉向.....	123
一、 前言：批風抹月誠可罪.....	123
二、 眾聲喧嘩：對話群體的擴大.....	125
三、 閨中論爭存：婦女詩歌內容的轉變.....	139
四、 新格調運新理想：歌體詩的寫作.....	153
五、 從閨媛才女到女學生：女作家的世代交替.....	162
六、 小結.....	168
第五章 拋棄文弱：婦女典範的建立.....	169
一、 前言.....	169
二、 遠紹歐美：西方美人圖.....	171
三、 近追日本：扶桑奇女子.....	181
四、 典範在夙昔：漢族女傑的系譜.....	188
五、 女界明星：中國女界的希望.....	205
六、 小結.....	211

第六章 結論.....212

參考書目.....216

第一章 緒論

《女子世界》創刊於 1904 年 1 月，由丁初我（1871-1930）¹主辦，做為中國第一份男性編輯的婦女報刊，內容以啟蒙與改良婦女為最主要的訴求，其婦女論述雖以男性視角出之。但其出刊的同時，中國並無其它女報可與之並駕齊驅，直至 1907 年《續辦女子世界》出刊之時，晚清的女性報刊方才如雨後春筍出現。

《女子世界》在晚清女性報刊史上，正代表著由發軔到蓬勃的階段，也代表著晚清婦女論述的過渡時期，故要徹底了解晚清婦女論述的脈絡，則非藉由《女子世界》不可。在以啟蒙女界的宗旨下，《女子世界》中的男性知識群體企圖藉由報刊的影響力推動新知識，建立一個新的女性典範，希望讓當時的中國女子，能由舊女性變為新女性，開啟了五四新一代女權思想，並奠定了女子新的社會角色及位置。任何想對中國女權運動之發展有充分理解掌握，任何想更深刻理解中國思想在晚清至民國的發展，《女子世界》都是一份舉足輕重，不能忽視的刊物。本論文即從知識建構和典範建立的架構上，對《女子世界》作全面的探索討論。

一、緣起

1904 年 4 月甫出版三期《女子世界》的常熟女子世界社，收到了來自周紅梅女士的六元捐款，並在隨後出版的第四期裡，特別刊登了「收捐致謝」。這位周紅梅女士，其實就是後來南社創社元老之一高旭（1877-1925）²的妻子。高旭受妻子囑託，將其遺款六元捐贈女子世界社，以贊助期刊的出版。高旭的詩作也常見於《女子世界》的文苑欄中，在第七期中刊登了他的〈題《女子世界》〉，高旭藉詩讚揚了《女子世界》這一期刊對女界的貢獻：

¹ 丁初我（1871-1930），江蘇常熟人，後名丁祖蔭，字之孫、芝孫，號初我、初園、一行，室名湘素樓、密娛小閣。參見陳玉堂：《中國近代人物名號大辭典》（杭州：浙江古籍，1996），頁 7。

² 高旭（1877-1925），江蘇金山人，字天梅，號劍公，別號鈍劍，又署漢劍、慧云、哀蟬。關於高旭的生平，可參考郭長海：〈高旭〉，收入柳無忌、殷安如編：《南社人物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頁 568-576。

國稱半教太淹淹，大倡平權膽識兼。如是我聞真實語，生花筆下淨莊嚴。
裙釵從此一翻新，美妙風光到處春。舌祭蓮花宣佛法，鬚眉現出女郎身。
鼓吹文明造化工，雌風變做大王雄。願將三昧（昧）神通力，遍布圓音女
界中。³

他以佛法來比喻《女子世界》的文章，認為其中所宣揚的平權思想，即如同女界之佛法，要讓女界從此進入文明世界。高旭認為當時的中國女界，尚處於一個有待啟蒙的狀態，《女子世界》藉由生花妙筆的文章，使女界翻新由「雌風」變為「大王雄」。這「文明」是「變」的關鍵，晚清中國知識界不斷思索的議題之一，即是如何脫離野蠻進入文明，而「西學」是文明的鑰匙，故知識份子紛紛譯介新知，企圖讓中國脫離野蠻的狀態。同樣的思維運用在女界裡，《女子世界》也是企圖藉文章傳遞文明新知識，讓中國女子能夠「一翻新」與「變」，而這「新變」之間便隱含著新舊典範的交替。

金松岑（1873-1947）⁴在《女子世界》第一期的〈《女子世界》發刊詞〉中便說：「欲新中國，必新女子；欲強中國，必強女子；欲文明中國，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國，必先普救我女子，無可疑也。」⁵金松岑將女子的處境與國家富強連結在一起，認為唯有中國的女子文明了，中國才有文明與富強的可能。丁初我也接著在〈《女子世界》頌詞〉提出，醫治中國女人的方針：

於是以教育之根底，揚其芬、吐其葩、培其根，而瘳其實。軍人的體格，實救療脆弱病之方針；游俠之意氣，實施治恆怯病之良藥；文學美術之發育，實開通暗昧病不二之治法，合此三者，去舊質鑄新魂。而後二萬萬女子，乃得出入於軍人世界、游俠世界、學術世界。包含夫萬有，覆育我同

³ 天梅（高旭）：〈題《女子世界》〉，《女子世界》第七期（1904.7），頁 65（頁 641）。關於本論文所引之《女子世界》版本，以北京線裝書局 2006 年之景印本為主，引用時先標明原刊本之頁碼，後面括號中則標線裝書店重印本所提供的連續頁碼，以供覆核方便，特於此處說明。

⁴ 金松岑（1873-1947），江蘇吳江人，又名天羽，初名懋基，字松岑，又字和岑，又作松琴、鶴舫、天放，別署金城、金一、麒麟、愛自由者、K.A、東齋，室名紅鶴山房、天放樓，自號天放樓主人，著有《女界鐘》、《皖志列傳稿》。參見陳玉堂：《中國近代人物名號大辭典》，頁 793。金松岑另又一名「金天翻」，柳亞子〈五十七年〉中言：「同邑金松岑先生，他名一，原名懋基，又改天翻，天羽，別號天放，花樣頗多。」見柳無忌、柳無非編：《柳亞子文集（自傳·年譜·日記）》（上海：上海人民，1983），頁 140。

⁵ 金一（金松岑）：〈《女子世界》發刊詞〉，《女子世界》第一期（1904.1），頁 1（頁 9）。

胞，以再造二十世紀，花團錦簇，麗天漫地，無量無邊，光明萬古之女子世界。⁶

丁初我以種植花卉的語彙來譬喻，希望藉由期刊的文字啟蒙，埋下女界文明的種子。他期許《女子世界》透過教育新知，合「軍人體格」、「游俠意氣」與「文學美術」三者，以達到替女界「去舊質鑄新魂」的日地。

《女子世界》是一份以男性知識群體為主的婦女期刊，丁初我及核心的作者／編者群體的婦女思想，主導著期刊婦女論述的走向。筆者感興趣的是，這群以丁初我為首的男性知識份子們，不斷在強調要革新女界，其背後的動機與女界的現況為何？而這些晚清知識份子對於女界的期許，似乎又大量集中在《女子世界》刊物中，《女子世界》到底在晚清女界變革中，甚或在中國婦女運動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呢？當他們想要「革新」、「富強」與「文明」女界時，欲以「教育」為根柢，要達到合「軍人體格」、「游俠意氣」與「文學美術」三者，其內涵為何？又如何傳遞呢？

晚清中國知識界，引進的許多西方的知識內容，梁啟超的《西學書目表》中即將西學分為：算學、重學、電學、化學、聲學、光學、汽學、天學、地學、全體學、動植物學、醫學、圖學、史志、官制、學制、法律、農政、礦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遊記、報章與格致等。⁷《女子世界》針對的是知識水準並不一致的女性讀者，在面對新學的龐大體系，通常會加以取捨。女性知識取捨的標準又為何？這在些知識內涵之下，如何更新與建構中國的女性新知識系統？

再者，《女子世界》為了傳遞知識建立新典範，開闢了許多欄目，有「論說」、「演壇」、「譯林」、「科學」、「實業」、「教育」、「文藝」、「記事」與「女學文叢」等，丁初我等人企圖以不同的面向教育女性，讓中國婦女能成為新時代的新女性。在這「去舊鑄新」的過程中，知識份子又採用了何種方式啟蒙？何種方式言說？在這一套「去舊鑄新」的論述底下，哪些舊價值被揚棄了？哪些新典範被建構起來？凡此種種，皆是本論文欲釐清之議題。

⁶ 初我（丁初我）：〈女子世界頌詞〉，《女子世界》第一期（1904.1），頁7（頁15）。

⁷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9），頁122-126。

二、《女子世界》之相關研究

以《女子世界》為專題的研究，就筆者所見其實並不多，僅夏曉虹〈晚清女報的性別關照——《女子世界》研究〉、⁸董智穎〈中國近代史上的兩種《女子世界》〉⁹兩篇文章，以及 Eavan Cully 所撰寫之 *Nationalism, Feminism, and Martial Valor: Rewriting Biographies of Women in Nüzi shijie (1904-1907)* ¹⁰、周婷《辛亥革命時期婦女報刊《女子世界》中女性體育研究》¹¹與趙立軍《20世紀初女性報刊——《女子世界》研究》¹²三篇碩士論文。《女子世界》的研究成果並不豐碩的原因，筆者以為可以由學術發展的進程加以觀察。

晚清文學直到最近二十幾年方才受到重視，1988年林明德編《晚清小說研究》時，在其序言中便自言其目地乃為了「彌補中國文學史的一頁空白」。¹³1997年王德威仍認為晚清文學是被壓抑的，故喊出「沒有晚清，何來五四」，欲重新找回晚清文學在中國文學系譜的位置。¹⁴晚清文學，特別是小說，在接下來的十幾年裡，不斷有學者投入研究，從四大譴責小說到其他內容的小說，都漸漸受到學者的關注。而其中以女性為主的小說，則被關注的時間又稍晚，黃錦珠《晚清小說中的新女性研究》一書，即由晚清反映婦女問題的小說著手，分析其中對於新女性的描寫，例如外在形象、學識能力、婚戀道德觀與美惡典範的形塑等，勾勒出晚清小說中新女性的多元樣貌。¹⁵

⁸ 夏曉虹：《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頁 67-107。夏曉虹《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一書，一共收錄了十篇與晚清女性議題相關的文章，一共可以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女性社會」，討論了中國女學堂中西合璧的辦學理念、杜成淑之事件、《女子世界》的內涵以及晚晴「男降女不降」的意義；第二部分則由晚清對班昭、批茶與羅蘭夫人的撰述，來討論晚清女性典範的建立；第三部分藉由晚清新聞中對於惠興自殺、胡仿蘭服毒身亡與秋瑾被殺之事件，討論晚清報刊中對「女性之死」的報導。

⁹ 董智穎：〈中國近代史上的兩種《女子世界》〉（《華東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8卷3期，2006.5），頁 33-34。

¹⁰ Eavan Cully, *Nationalism, Feminism, and Martial Valor: Rewriting Biographies of Women in Nüzi shijie (1903-1907)*. (M.A, Montreal: McGill University, 2008).

¹¹ 周婷：《辛亥革命時期婦女報刊《女子世界》中女性體育研究》（上海：上海體育學院體育賽事運作與新聞碩士論文，2009）。

¹² 趙立軍：《20世紀初女性報刊——《女子世界》研究》（吉林：東北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碩士論文，2010）。

¹³ 林明德編：《晚清小說研究》（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

¹⁴ 王德威著；宋偉杰譯：《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台北：麥田出版社，2003），頁 15-19。

¹⁵ 黃錦珠：《晚清小說中的新女性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2005）。

晚清報刊則因文獻並不普及，故在研究上較晚清小說來得更晚。再加上報刊容納的內容龐雜，有論說文、小說、詩歌與戲曲等，故在文學的分類上難以單純歸類，而且作者身分複雜或不明，也造成研究的障礙。以文學而言，晚清報刊中又以小說報刊為人研究較早，也有較顯著的研究成果。¹⁶婦女報刊的部分，因其內容介於思潮與文學之間，故史學家常藉其研究晚清時期的婦女思潮或婦女運動。¹⁷對於其中文學的部分，則未加重視。直至羅秀美〈從閨閣女詩人到公共啟蒙者——以近代女性報刊中的論說文為主要視域〉一文，方才針對晚清女性報刊中的女性撰稿人加以研究，以《女學報》、《中國女報》、《中國新女界雜誌》、《天義》與《神州女報》中幾位重要的女性作家為研究對象，分析閨閣女作家藉由報刊逐漸走出私密空間，進入公眾領域的現象。¹⁸

夏曉虹最早關注到《女子世界》的價值，認為和其他晚清女性報刊相比，《女子世界》在內容上的豐富性有過之而無不及，是了解清末婦女思潮與文化必備之文本。¹⁹其〈晚清女報的性別關照——《女子世界》研究〉一文，是最早針對《女子世界》進行分析的文章，並對《女子世界》的編輯情形、創作群體，以及其中女權的議題做了討論，為讀者提供了《女子世界》的基礎資料。

由於晚清民初報刊十分龐雜，有時同名的報刊容易為人所誤植，中國近代有兩份《女子世界》，一份是 1904 年丁初我創辦的《女子世界》，另一則是 1914 年陳蝶仙所辦之《女子世界》，董智穎為讓學者有所分辨，故寫了〈中國近代史上的兩種《女子世界》〉一文，將兩種期刊分別介紹，以期望能夠確立文獻引用的

¹⁶ 關於晚清四大小說期刊之研究成果，考參見紀俊龍：《晚清「四大小說雜誌」研究》（台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9），頁 14-16。

¹⁷ 呂美頤較早對中國婦女運動進行研究，其《中國婦女運動（1840-1921）》一書以線性的時間順序，講述由太平天國至中國共產黨建立期間的婦女解放運動。以通論的方式，對太平天國、維新運動、辛亥革命期間乃至民國以後的各種女性運動家以介紹，其中對鮮為人知曉的女子團體與前衛女性，詳細考證其生平經歷或是由經過，能促進讀者對中國婦女運動的認識。見呂美頤：《中國婦女運動（1840-1921）》（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周春燕《女體與國族：強國強種與近代中國的婦女衛生（1895-1949）》一書，以強國強種的思考之脈絡，分析晚清至民國的期刊，如何建構出女性月經與孕產等醫療觀念，並對現代的婦女醫療衛生體系，與專業助產士取代穩婆的過程加以分梳。見周春燕：《女體與國族：強國強種與近代中國的婦女衛生（1895-1949）》（台北：政大歷史系，2010）。

¹⁸ 羅秀美：《從秋瑾到蔡珠兒——近現代知識女性的文學表現》（台灣：臺灣學生書局，2010），頁 35-96。

¹⁹ 根據夏曉虹的研究，《女子世界》「在目前已知的近三十種清末女報，除去校刊與日報，歷時最久、冊數最多、內容最豐者，當屬《女子世界》。無論是研究晚清報刊史，還是考察晚清女性的生活與思想，該誌都是不可繞過的文本。」參見夏曉虹：〈晚清女報的性別關照——《女子世界》研究〉，《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頁 67。

正確性。²⁰丁初我主辦之《女子世界》，主要旨在啟蒙與改良女界，故以男性知識份子的立場，向中國女性讀者宣揚新知識與新典範。陳蝶仙於 1914 年所創辦之《女子世界》，兩期刊雖同名卻各不相關，1914 年的《女子世界》主要收錄當時女作家的創作，包含散文、詩歌與小說，其期刊之關注點與丁初我之《女子世界》大不相同，實不能相混不清。

《女子世界》在夏曉虹研究之前未受到關注，除了文獻之不易取得之外，還在於其對於創作群體的茫然不知，自夏曉虹對創作群體加以考證之後，《女子世界》漸為學界所引用，通常成為辯證晚清婦女思潮時的輔助資料。此外，僅 Eavan Cullynn 之 *Nationalism, Feminism, and Martial Valor: Rewriting Biographies of Women in Nüzi shijie (1904-1907)* 以碩論的篇幅，針對《女子世界》中柳亞子所撰寫之傳記加以分析，但僅分析了花木蘭、聶隱娘與紅線的部分。可惜的是，《女子世界》中柳亞子並不是唯一的傳記作家，而且《女子世界》中除了這三位女傑之外，還有西方、日本以及中國其他女傑的部分，但 Eavan Cullynn 卻略而不論，實無法全面關照《女子世界》女性傳記之面貌，也無法梳理出《女子世界》作者／編者對於女傑的敘述視角與脈絡。周婷《辛亥革命時期婦女報刊《女子世界》中女性體育研究》之碩士論文，則僅側重對於《女子世界》中的體育內涵加以分析，趙立軍《20 世紀初女性報刊——《女子世界》研究》則泛論《女子世界》中女權的言論，皆未體現出《女子世界》其他面向的豐富內涵。

筆者在夏曉虹對於《女子世界》的研究之上，企圖以知識與典範的角度，來關照《女子世界》在思想與文學上的貢獻。《女子世界》以傳遞知識，啟蒙女性為主要目的，故開闢了許多欄目來介紹多元的知識面貌。傳統中國女性並無進入學堂公開受教育的機會，幸運擁有識字能力的女性，或能創作詩歌與閱讀女訓書籍，無法讀書識字的女性，則藉由女性親長的口授及經驗傳承，建立自我的知識內容，而這些內容通常與家務相關。

但由《女子世界》的多樣性欄目，可以發現《女子世界》中的核心作者／編者群欲擴展女性知識內涵的企圖。其「社說」欄，自第十三期以後改為「論說」欄，是正式的論說文，撰稿者以丁初我及其他的男性知識份子為主，以闡述期刊主要的婦女主張與思想。「演壇」則是收錄演講稿，以白話口語的方式記錄，其

²⁰ 董智穎：〈中國近代史上的兩種《女子世界》〉，頁 33-34。

內容亦與「社說」之女性思潮相關，只是以通俗淺顯易懂的方式呈述。「傳記」欄則是收錄知識份子所撰寫的女性傳記，包括西方、日本與中國的女性；「譯林」欄則是以翻譯外國文章為主，其內容相當多元，有時翻譯外國女性的生活現況，有時則是介紹外國的女性團體；「記事」欄則分為國內與國外兩個部分，專門報導與女界相關的新聞；「文苑」欄則是收錄文學作品，有小說的創作，也有歌曲；男性文人的作品，則歸入「攻玉集」，女性創作的詩歌，則列入「因花集」。女性投稿的論說文作品，則另闢「女學文叢」以收納之。另外，自第五期以後，《女子世界》又增設了「教育」、「實業」、「科學」、「衛生」等欄目，以傳遞女子生活相關的知識，這些新增的欄目為《女子世界》之前的女報所新創。

《女子世界》所呈現的多元知識內涵，以及思想、文學的價值，一直未為人所重視。本論文企圖以婦女思潮、居家知識、文學思想與女性典範四個角度，對《女子世界》內涵加以分析，企圖梳理出《女子世界》的知識份子，如何藉由寫作文章來傳遞新知，並進一步建構起女性典範的脈絡，並對《女子世界》在從晚清進入民國的歷史進程中，在女性權利義務、知識行為，以及整體思想發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作一全面的評估及定位。

三、《女子世界》及其知識群體與編輯

晚清在內憂外患的衝擊之下，知識份子苦思救亡圖存之道，從「從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洋務學習，到改良政體的維新提倡，但面臨國恥從不間斷，知識份子越來越迫切的向西方與日本學習。西方的船堅砲利，讓中國不僅僅割讓國土，也讓中國知識分子對傳統文化與知識體系進行檢討。從鴉片戰爭開始，中國知識界就不斷思索著，如何能夠救亡圖存，讓中國繼續生存下去，不會遭致亡國滅種的命運。

在西方列強的侵略之下，知識份子明顯察覺到中國人之體弱多病，昏昧無知，才是國家衰弱的主因。在強國強種的急切下，知識份子開始關注負責孕育中國下一代的女性，才赫然發現生為母親的中國女子，不僅在智識上缺乏，而且纏足的習俗，使得女子大多也是體弱多病的狀態；再加上女子大多不出閨門，仰賴

他人供給衣食，梁啟超（1873-1929）認為中國的積弱是由婦學不興開始，他認為要強國必先興女學，並云：「今之美國，殆將近之矣，是故女學最盛者，其國最強，不戰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學次盛者，其國次強，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學衰，母教失，無業眾，智民少，國之所存者幸矣，印度、波斯、土耳其是也。」²¹在這樣思維下，梁啟超與經元善（1841-1903）等人便開始籌辦第一個中國人自辦女子學堂——中國女學堂（經正女學），²²並鼓勵他們的女眷，成立中國近代第一個女子團體——中國女學會，發行中國近代的第一份女性報刊——《女學報》（1898年），設有新聞、論說、徵文、告白等欄目，初期為旬刊，後改為五日刊，至1898年10月29日出版第十二期後停刊。²³《女學報》主要以裘梅侶（1871-1904）、康同薇（1878-1974）、李蕙仙（1869-1924）等人擔任主筆。這些女性通常是因為家中丈夫或父輩為維新派知識份子，較早接受了婦女啟蒙的思潮，成為中國最早在公共報刊上發言的女性。²⁴

接著在1899年有陳範之女陳擷芬（1883-1923）所創辦的《女報》，因當時隨著《蘇報》發行，故又稱《女蘇報》，至1903年改稱《女學報》，設有「論說」、「演說」、「女界近史」、「譯件」、「尺素」、「詞翰」、「諧譯」等欄目。陳擷芬以本名或楚南女子的筆名，發表了多篇文章與演說稿，有〈論女子宜講體育〉、〈盡力〉、〈姑娘要平等〉、〈中國女子之前途〉、〈群〉與〈做學生的快樂〉等文，鼓勵女子解放纏足，進學堂受教育，藉由體操之法讓身體強健；並重視女子在家庭中的處境，呼籲婆婆要待媳婦如女兒，正妻要對待侍妾如姐妹，家庭之內女子切不可相互攻擊。與《女子世界》相比，《女學報》的欄目較為簡單，而且投稿的女性作家數量上也比《女子世界》少。

《女子世界》由丁初我主辦，於光緒二十九年（1904）出刊，如加入陳志群（1889-1962）²⁵接辦之《續辦女子世界》（1907），則一共有十八期，其中十六與十七期合刊一冊。關於丁初我與《女子世界》編輯的資料，蔣維喬（1873-1958）

²¹ 梁啟超：〈變法通議·論女學〉，梁啟超著；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33。

²² 關於中國女學堂的研究，可參考夏曉虹：〈中西合璧的教育理想——上海「中國女學堂」考述〉，《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頁3-30。

²³ 史和、姚福申：《中國近代報刊名錄》（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頁57-58。

²⁴ 羅秀美：《從秋瑾到蔡珠兒——近現代知識女性的文學表現》，頁42-50。

²⁵ 陳志群（1889-1962），江蘇南潯人，又名陳勤、陳以益、陳如瑾，筆名志群、如瑾。1907年接辦《女子世界》，僅出一期。後在1909年於上海創辦《女報》，自任主編。

²⁶的日記提供了許多重要的線索。蔣維喬與丁初我相識於辛丑年（1901）的南菁書院：

辛丑之歲，余識常熟丁君初我於江陰南菁講舍。相見之始，有如宿契，晨夕聚首，相與討論學問，縱談天下事，而知初我為績學之士也。初我為人慷慨任俠，痛中國之不振、社會之腐敗，於戊戌年間，即集合同志，創建藏書社，購置新書新報，任人觀賞，以開通風氣。又立常昭小學堂，以教邑中子弟。其公德之美若是。余又信初我為豪傑之士也。²⁷

南菁書院由江蘇學政黃體芳（1832-1899）於1882年創辦，主張以經史詞章培養優秀人才，而不以八股制藝為教授內容。書院設有院長一人，首任院長為張文虎（1808-1885），僅在職數月便因病離職，繼任者為經學大師黃以周（1828-1899）；另設講席數人，李慈銘（1830-1895）、繆荃孫（1844-1919）、朱一新（1846-1894）、沈曾植（1850-1922）等人都擔任過南菁書院的講席。能夠進入書院就讀的課生，由江蘇學政親自甄選，或將府州科考成績優秀者調入書院。南菁書院是一個學風自由的環境，課生不分年齡、身分與地域均可入學，入學後將課生以其興趣分為「訓、詁、詞、章、禮、樂、詩、書」八齋，每齋選拔一課生為齋長，撰寫《女界鐘》與《女子世界》發刊詞的金松岑就曾擔任過齋長。²⁸蔣維喬初識丁初我於南菁書院，書院之內人才濟濟論學之風氣很盛，蔣維喬所說的「晨夕聚首，相與討論學問，縱談天下事」，正是南菁書院課生日常生活的狀態。

1902年三月蔣維喬又和丁初我同赴上海，參加中國教育會。²⁹1902年十月又

²⁶ 蔣維喬（1873-1958），江蘇常州人，字竹莊，號因是子，著有《因是子靜坐法》、《中國近三百年哲學史》、《中國佛教史》與《佛學概論》等書。早年入南菁書院就讀，後來參加中國教育會與愛國學社。曾擔任商務印書館教科書的編輯工作，民國後曾任教育部秘書、東南大學校長與光華大學教授等職。

²⁷ 樂委評選注：〈蔣維喬日記中的小說林社史料〉（《清末小說》29號，2006.12），頁136。

²⁸ 關於南菁書院的研究，參見趙統：〈試述江陰南菁書院的治學特點〉（《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1卷2期，2005.3），頁111-115。

²⁹ 蔣維喬在〈中國教育會之回憶〉一文中，便記載其入會的經過：「當民元前十年壬寅，正值義和團亂後，清廷亦知興學之不容緩，明令各省開辦學堂，而國中志士，鑒於清廷之辱國喪師，非先從事革命不可。但清廷禁網嚴密，革命二字，志士不敢出諸口，從事進行，更難著手。是年三月上，上海新黨蔡子民（元培）、蔣觀雲（智由）、林少泉（獬）、葉浩吾（瀚）、王小徐（季同）、王允宗（德淵）、烏目山僧宗仰等集議發起中國教育會，表面辦理教育，暗中鼓吹革命。議既定，即馳函各地同志赴滬，開成立大會。時鍾憲鬯先生在江陰南菁高等學堂為理化教員，於課外密談

一同前往虞山拜訪金井秋蘋（1864-1905），³⁰當時金井秋蘋正擔任埃質學堂東文學社總教席，虞山的知識份子多就其學習日文。³¹在蔣維喬癸卯年十二月十一日（1904.1.27）中記載：「午後遣人至大同印書〔局〕，取《女子世界》第一期。一捐入閱報所，一捐入圖書館。《女子世界》，為常熟丁君芝孫等所創。余每月擔任論說一篇。」³²四天後他又捐了一本《女子世界》給愛國女學校，並寫信給丁初我建議應增設「教育」與「雜錄」兩個欄目。

蔣維喬與丁初我是《女子世界》編輯群的核心人物，在作為期刊主要論述的「社說」（十三期後改為「論說」）中，丁初我發表了九篇，蔣維喬三篇，其它則有金松岑、柳亞子與陳志群等人。要考察《女子世界》之核心作者／編者群的組成，可以由此五人入手。夏曉虹認為「《女子世界》依靠親朋關係建立基本的作者隊伍，尚有古代文人結社的餘風。只是由於各人均以雜誌做為聯繫中樞，相互之間倒不一定有私下的交往，這已經有些『近代化』的意味」。³³夏曉虹的話雖能解釋《女子世界》出刊時作者群之間的關係，卻沒有進一步說明這種「親朋關係」建立的內在結構。晚清文人的私誼網絡，可以分為學緣、血緣與地緣關係三種，學緣指的是同學校、書院，所建立之同學或師生關係；血緣則指以家族為單位所連繫的血親或姻親關係；地緣則指所謂的同鄉情誼。³⁴丁初我與蔣維喬最初

革命意義。某日，鍾師接蔡蔣諸公電，囑某赴會，並介紹會員。鍾師接信後，赴會與否，意尚未決。而余與常熟丁芝孫，無錫黃子年，皆意氣甚盛，慫恿鍾師，願隨之赴會。即日渡江趁輪船，值江中大風，浪高丈餘，舟小幾覆。然諸人皆整襟劇談，殊不為意。及抵江北，適是夕無輪船。屈計赴會之期，已趕不及，乃發電覆蔡蔣諸君，同時入會。」見蔣維喬：〈中國教育會之回憶〉，收入上海通社編輯：《上海研究資料續集》（上海：上海書店，1992），頁84。後來中國教育會在南洋公學風潮後，接受其退學的學生，而成立愛國學社，後又創辦愛國女學校。中國教育會在當時江南地區頗有名聲，金松岑與陳去病在江蘇同里成立中國教育會同里支會，柳亞子因受金、陳二人的影響，也加入了中國教育會，後來也進愛國學社就讀。參見柳無忌、柳無非編：《柳亞子文集（自傳·年譜·日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頁149-150。

³⁰ 金井秋蘋，名雄，字飛卿，號秋蘋，別號畫眉嬌客，為日本上野國島村人（今群馬縣）。祖父烏洲與父親金洞為著名的書法家，金井秋蘋自幼聰慧，由慶應義塾畢業後，便前往德國柏林留學。留德期間結識廣州詞人潘蘭史，兩人常藉詩詞以唱和。1893年由德國回日本，1902年受聘於常熟的埃質學堂，擔任東文學舍的總教席，並遍遊虞山風光，由錢謙益墓時曾做詩以憑弔。1905年因腦溢血，病逝於東京，享年四十二歲。其友人大野洒竹、國府犀東、岸上質軒與結城蓄堂四人在他逝世以後，將其詩詞作品結集為《秋蘋遺稿》出版。參見神田喜一郎著；程郁綴、高野雪譯：《日本填詞史話》（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頁419-433。

³¹ 樂委評選注：〈蔣維喬日記中的小說林社史料〉，頁135。

³² 樂委評選注：〈蔣維喬日記中的小說林社史料〉，頁137。

³³ 夏曉虹：〈晚清女報的性別觀照——《女子世界》研究〉，《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頁74。

³⁴ 關於晚清知識份子私誼網路的研究，可參考瞿駿：〈入上海居上海——論清末士人在城市私誼網路（1895-1911）〉（《史林》2007.3卷），頁100-113；章清：〈省界、業界與階級：近代中國集團力量的興起及其難局〉（《中國社會科學》2003.2期），頁189-203；顧德曼（Bryna Goodman）著；宋鑽友譯：《家鄉、城市和國家——上海的地緣網絡與認同，1853-1937》（上海：上海古籍

的認識，即是因為同在南菁書院所連繫的學緣關係；金松岑與蔣維喬也是同為南菁書院的同學，雖無直接證據顯示丁初我與金松岑相識，但是蔣維喬在日記中曾多次提及與金松岑見面，或與其書信往來，可知蔣維喬與金松岑之交情甚篤。丁初我與金松岑同為蔣維喬之朋友，又同為南菁書院之課生，再加上後來丁初我等人辦《女子世界》，金松岑還曾寫發刊詞以應和，其相互認識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柳亞子與金松岑的結識，則是透過姻親姑丈蔡冶民，而認識金松岑與陳去病。後來受金松岑影響，柳亞子進入中國教育會以及愛國學社，開始拓展其的學緣人際網絡。³⁵丁初我、蔣維喬與柳亞子同為中國教育會之成員，柳亞子肯定是知道丁初我的，因他曾在自傳中提及和殷次伊「同邑丁祖蔭號初我的也都是『中國教育會』會員」。³⁶當時柳亞子深受革命與女權思潮之影響，會投稿《女子世界》應不意外。

陳志群的情況就較為特別，他的文章在第十四期時才出現，但在第十四期之後，乃至後來的《續辦女子世界》，他都占據報刊非常重要的位置。《女子世界》從第十期以後便開始延後出刊，關於《女子世界》後來的脫刊，大慈〈恭賀新年〉中提到：

恭喜看我們《女子世界》的姐妹們，我們報館裡人，因有了別項的執事，所以甲辰的一年，僅出了十期的報，如今尚出第十一期，很辜負各位的熱心，我們慙愧得了不得。³⁷

這裡並不曉得大慈所指的「別項的執事」是何事，但丁初我似乎在此之後，就慢慢淡出《女子世界》的撰稿，雖在後來的期刊中還能零星見到他的文章，但「論說」欄的主力已由陳志群接手，從十三期以後每期都可看到他的文章。至第十六、十七期後，女子世界社刊登的〈警告一〉或可見脫刊與停刊的端倪：「本社同人羈留學務，以致本誌出版愆期，曷勝歉□。茲特趕出合刊本，並將附贈之《白玫

出版社，2004）一書。

³⁵ 柳無忌、柳無非編：《柳亞子文集（自傳·年譜·日記）》，頁 147。

³⁶ 柳無忌、柳無非編：《柳亞子文集（自傳·年譜·日記）》，頁 158。

³⁷ 大慈：〈恭賀新年〉，《女子世界》第十一期（1905.2），頁 19-20（頁 961）。

魂》從速付印，以宴饗讀者之望。」此處的「羈留學務」，應指丁初我將重心轉移至教育界與政壇有關。³⁸而隨著丁初我在後期淡出期刊運作，陳志群則開始進入《女子世界》的言論場。

陳志群的生平經歷，筆者所知有限。目前的資料可知，陳志群為江蘇南潯人，也曾以「陳以益」、「陳勤」與「陳如瑾」等名，在期刊上發表文章。³⁹《續辦女子世界》由陳志群擔任編輯，由現存的新女子世界社的股友名單，可以得知他與柳亞子各占二十五股，兩人同為最大股東，或可推敲兩人也許相識，一起出資來續辦《女子世界》。

此處必須說明《女子世界》與《續辦女子世界》之間的關聯性，其爭議之處來自於陳志群在《續辦女子世界》之前的一份〈本誌緊要告白〉：

- (一) 本誌係新女子世界社續出，一切與前此女子世界社無涉。
- (一) 本誌續辦係記者諸君所發起，故仍原名。
- (一) 前女子世界社股友及閱者等，與新社無涉，惟調查員則仍一概承認。凡前充本誌調查員諸君，及下期起願盡義務之諸君，如蒙按月惠稿，當按期贈本誌一份。
- (一) 女學調查部專約，今仍舊貫。
- (一) 各處惠稿、惠函、惠書，均乞寄發行所轉交。⁴⁰

陳志群於此處雖有意劃清與之前《女子世界》的關係，但其確對其期刊名稱、記

³⁸ 根據鄧若華所考察之丁初我生平事蹟，後來丁初我確實轉而投向教育界與政壇，而逐漸遠離出版業：「清末開始兼任縣教育款產處的總董，籌措地方教育經費。光緒三十二年，常昭兩縣根據朝廷新令實行地方自治，成立地方自治研究會，丁參與其中。光緒三十三年縣內設立常昭勸學所，又被推選為總董。光緒三十四年，出任禁煙總局總董。宣統元年成立城自治會，丁被推選為首任總。還被推選為省議員。辛亥革命時，常昭兩縣宣佈獨立，丁被缺席推選為常熟縣民政長。任期中，他舉辦防務、革除陋習、賑濟災民、清淤修堤，開設貧民習藝所、農事試驗場、師範講習所等新式機構。後因本鄉人不得在本鄉任職的禁令，調任吳江縣，去職前將所得俸祿捐作常熟縣沿街裝設路燈之用。後袁世凱稱帝，丁祖蔭辭職回鄉，鄉居數十年『遇事仍不少休』，地方長官遇有棘手事務仍與之商量。他還擔任納稅人公會、水利研究會等團體的主席，參與討論縣中事務。1924-1925 年間，因崇明、浦東的米商經常來常熟採運米糧，米價隨之上漲，引起百姓的不滿，丁會同其他地方人士向縣裡呈請停止其採米。丁祖蔭在地方上聲望極高，普通鄉民對他也推崇備至，『有爭端得君一言立解』。在他去世的前三年還被聘為地方款產處主任，經手地方公款。」見鄧若華：〈現代化過程中的地方精英轉型——以 20 世紀前半期江蘇常熟為個案的考察〉，收入許紀霖主編：《公共空間中的知識份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頁 162-163。

³⁹ 陳玉堂：《中國近代人物名號大辭典》，頁 683。

⁴⁰ 〈本誌緊要告白〉，《續辦女子世界》（1907.？），頁 2（頁 1600）。

者與調查員等加以繼承，僅將之前的股友與訂閱者劃分出去。這可以由兩個面向來看，一是新女子世界社的資金，由期刊後面的股友名單可以知道，主要是由柳亞子與陳志群為最大股東，其資金組成結構已與之前的女子世界社不同，自然不承認其舊有的股友；其二，之前的《女子世界》拖刊與停刊，想必影響之前訂閱者的權益，陳志群發起此啟示自有宣告的意味，藉已告知舊有的訂閱者，勿向其催討拖欠的刊物。如果有這個角度來看，陳志群告白中的第一條，即是一種為避免糾紛所寫的宣告，並沒有欲徹底要與之前《女子世界》切割的意思。首先，在期刊的卷期方面，陳志群還是以「續辦」二字名之，另外又自動加上「第二年第六期」（即「第十八期」之意）的字樣，等於是承認接續著之前的第二年第五期的意思；其二，新女子世界社對於之前的《女子世界》的記者、調查員以及舊有的稿件都一律承認，並刊登其報導與文章，就期刊的內容來看，與之前的《女子世界》是可以有所銜接的，有的稿件還會特別加註「續十六期」與「續十七期」。雖然陳志群的告白第一條即宣示與之前的《女子世界》無涉，但從《續辦女子世界》的期刊內容來看，它基本上承繼之前《女子世界》的，連欄目的安排也同出一轍，故本論文亦將《續辦女子世界》一併納入討論的對象。

由以上的作者／編者群體可以得知，《女子世界》的發言群體主要是男性，故以《女子世界》為分析對象時，則必須先理解其中的論述主要是以男性知識份子視角出之，即使在理解女性作家的作品時，也必須先知曉這些能被發表的作品，某一種程度上是經過這群男性作者／編者群體的篩選，方能獲得刊登的機會，這是《女子世界》做為一份男性編輯的婦女期刊所有的現象之一。另外在期刊的作者與投稿者的性別上，除了明確知曉作者身份的部份之外，其他以筆名投稿，或已知是男性作家以女子身分投稿的情況，例如柳亞子以「松陵女子潘小璜」名義投稿，周作人以「吳萍雲」的筆名發表，都造成《女子世界》中男女混聲的情況，這也是在分析《女子世界》時要留意的部分。⁴¹

⁴¹ 夏曉虹發現晚清男性託名女性的情況相當普遍，「在《女子世界》發表翻譯小說《俠女奴》的萍雲女士，乃是周作人的化名；同刊《黎里不纏足會緣起》一文，雖署名“吳江女士倪壽芝慕歐”作，實為柳亞子的手筆；柳氏更以“松陵女子潘小璜”之名在《女子世界》刊出詩文多篇；寫作小說《東歐女豪傑》而出名的羅普，也因托名“嶺南羽衣女士”，而使人莫辨雌雄。而無論是假托女性還是代女子撰文，都證明女報並非完全排除男子。恰恰相反，正是男子與女性作者的共同努力，才使得晚清的女報界生氣勃勃。只是我們在引用材料時，必須格外謹慎。」見夏曉虹：《晚清社會與文化》（武漢：湖北教育，2000），頁 279。也正因為《女子世界》中作者性別相混的情況，故要分辯其個別性別主體的聲音，有一定的困難。不過，《女子世界》的編輯群主要是以男

而在地緣關係上，目前所知道的《女子世界》的核心作者／編者群體中，幾乎大為江蘇人。除了丁初我、蔣維喬、金松岑、柳亞子與陳志群等人以外，之後在文苑欄中，發表詩作的男女作家，如高旭、高燮、高增與趙愛華等，也都為江蘇人。由此便可理解，九思在〈敬告同胞姊妹〉中使用蘇州土白的原因：

第個是用蘇州土話，句子來得疙裡疙瘩個。然而唔篤原諒原諒，因為我要個個人看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所以弗得弗實咁說個。⁴²

九思雖不詳其生平事蹟，但由他使用蘇州土白的情況，大約可以猜測他的省籍。

《女子世界》雖是一個公開的刊物，但仍要注意的是，它的撰稿人與流通的範圍，最初是以江蘇為主，由第一期中所羅列之各省的分售處來看，江蘇省內有 17 處，浙江次之有 4 處，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各有 2 處，安徽、廣東、北京、山東則各有 1 處。《女子世界》的編輯所常熟女子世界社雖為於常熟寺前街的海虞圖書館，但其發行所則上海，在第八期以前由上海棋盤街的大同書局負責發行，第九期後由上海四馬路望平街之小說林發行，常熟與上海在地理位置上相近，況且當時江蘇的知識份子，特別是上海附近的城鎮，如常熟、蘇州、吳江、松江與嘉定等地，在上海與家鄉之間往返是相當頻繁的。⁴³《女子世界》的編輯所雖在常熟，但它常熟僅只有兩處分售處，上海則五處，其主要販售的地點還是以上海為主。這是因為當時的上海聚集的全中國各地的人，會更有利於報刊的流通與銷售。

《女子世界》在創刊之初，同時並無其他的女報，不過等到 1907 年陳志群《續辦女子世界》出版時，中國已出現了《中國新女界雜誌》與《中國女報》等婦女期刊。根據陳志群在《續辦女子世界》中對於當時女報出版的調查：

性為主，其期刊的走向自然也以男性的角度為主，這是在研讀《女子世界》時需有的基本認識。其次，《女子世界》中的核心作者／編者群體的性別意識，因其時代的拘限，自然無法與現在之性別理論相較，在原文中常將「婦人」、「女子」混用無分，故本論文亦無以現今性別理論的角度觀之，文中的「女性」、「女子」與「婦女」在使用上亦無嚴格加以區別，先於此處說明之。

⁴² 九思：〈敬告同胞姊妹〉，《女子世界》第四期（1904.4），頁 20（頁 294）。

⁴³ 李仁淵以包天笑為對象，研究近代出版事業時發現：「1900 年左右開啟的留學風潮，留學生與歸國留學生激起此時新學事業的開頭，而在 1905 年之後，大量從科舉解放出來，具有操縱出版傳播所需之文化符號的士人，正接上來補充文化事業的需要。這些居住在松江、青浦、嘉定、蘇州、吳江、常熟等上海近郊鄰縣的士人，或者經過同鄉關係一個帶一個，進入上海成為各式新式出版機構校對、編輯、記者等工作的生力軍。」見李仁淵：〈新式出版與知識份子：以包天笑的早期生涯為例〉（《思與言》43 卷 3 期，2005.9），頁 90-91。

自上海《女學報》停辦後，數年以來，吾國除本報外，殆無女報。而今二大雜誌，相繼出現，亦女界之可喜之事也。二大雜誌維何？一曰《中國女報》，秋瑾女士所發起，在上海印刷發行者。一曰《中國新女界雜誌》，係燕斌女士發起。二女士皆東京留學生，品學兼優。而此二大雜誌，亦各有所長。以外觀論，後者在東京印刷，故勝於前者；以內容論，則後者遜於前者。現第二期均已出版，記者閱既竟，書此以介紹讀者。此外，《天義報》係東京新出，尤為完善，詳見卷首，首期已出。⁴⁴

此處的「本報」當然即指《女子世界》，陳志群企圖梳理一個中國女報的系譜，由《女學報》、《女子世界》、《中國新女界雜誌》與《中國女報》，而在其後〈女報界新調查〉中則又增加了張展雲《北京女報》以及北京中國婦人會所編輯的《中國婦人小雜誌》。⁴⁵由這個系譜中可以發現，陳志群認為不論期刊的編輯者為男性或女性，只要期刊以女性讀者為訴求，即可歸為女報的系譜當中。《女子世界》雖為男性所編輯的刊物，但以啟蒙與改良女界為務，自然也被歸為女報的系譜當中。

《女子世界》在晚清女報中其編排的欄目名稱與編輯方式，也為後來的女報所採用。下表為《女學報》、《女子世界》、《中國新女界雜誌》與《中國女報》的欄目名稱：

表 1-1 晚清婦女報刊欄目配置表

期刊名	女子世界 (丁初我) 1904	女學報 (陳擷芬) 1903	中國新女界 雜誌 (燕斌) 1906	中國女報 (秋瑾) 1907	女報 (陳志群) 1909
欄	圖畫	圖畫	圖畫	圖畫	插圖
	社說(論說)	論說	論著	社說	論著

⁴⁴ 陳如瑾(陳志群):〈女界二大雜誌出現〉,《續辦女子世界》(1907.?),頁113(頁1725)。

⁴⁵ 〈女報界新調查〉,見《續辦女子世界》(1907.?),頁115(頁1127)。

中國知識分子紛紛發起抗俄運動，1905 年到 1906 則因美國的禁華工約，而發起抵制美貨運動，這兩事件將許多的青年志士更推向革命的思潮裡。而《女子世界》的出版時間，正好是抗俄運動的高潮，而停刊時正好又為抵制美貨運動的階段，後來幾期的《女子世界》甚至定位成拒約運動的機關報，則《女子世界》提供了婦女在拒俄與抗美運動中親身參與的第一手史料。再者，《女子世界》的撰稿人如柳亞子、高燮、高旭、高增，在後來均成為南社的重要人物，而周作人及魯迅也曾在《女子世界》中發表小說與翻譯小說。除了男性作家以外，《女子世界》還開闢了「因花集」與「女學文叢」等欄目，提供女性投書發聲，這其中有呂碧城、呂逸初與張昭漢等人的作品，《女子世界》提供了這些作家早期的發表園地，也可窺見其早期之思想歷程。凡此種種，不論在晚清婦女解放思潮中，或在文學的價值上，《女子世界》都有其重要的地位，故對其內涵進行分析成為筆者關切的要點。

四、論文架構

本論文以丁初我主編的《女子世界》十七期（1904-1906），與陳志群在 1907 年所續出的《續辦女子世界》，一共十八期為研究對象。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面對內容駁雜的《女子世界》，筆者以知識與典範的建構為主要關懷，根據不同欄目的屬性，依其知識之類別，分為婦女思潮、居家知識、女性文學、女性傳記四個部分，來討論《女子世界》所傳遞的女性新知與典範的建立。

論文第一部分，主要處理《女子世界》的婦女論述。《女子世界》是集合眾人的刊物，丁初我等人為主要編輯群，並加上其他人的投稿之作。「論說」欄是丁初我等人的發表園地，也主導著期刊的婦女論述。在十八期的刊物中，可以發現其知識分子依循著「先破後立」的準則，一方面嚴詞批評當時女性的種種缺失，另一方則提出德智體三育並進的方式，讓女性由家庭進入國家的論述中，由國家的寄生蟲變為救國的國民母，本章即在剖析其新婦女論述的形成。

《女子世界》在第五期開始，增設了一些新的欄目，例如教育、實業、科學與衛生等，主要是針對女性讀者所開闢的，講述的內容以居家知識為主。編輯群

企圖藉由引進西方與日本的知識，來改造傳統家庭母親的知識內容，更希望在傳播後將新知識變為居家常識，讓中國的母親們開始用科學與衛生的方式處理家務與養育小孩，使傳統家庭一變為現代家庭。論文第二部分，即是針對這些欄目，分析女性居家知識內涵的轉變及其建構的過程。

《女子世界》還開闢了「因花集」與「女學文叢」兩欄目，提供女作家投書發聲，這其中有呂碧城、呂逸初與張昭漢等人的作品，雖說《女子世界》是男性創辦的刊物，闡述的內容也難脫男性觀點，不過藉由女子的投稿我們還是可以聽見一些知識女性的聲音。《女子世界》開闢「因花集」與「女學文叢」兩個欄目，鼓勵女性將詩詞與文章投稿。由女性的作品中，可以發現其內涵已不同於明清的才女文學，凡此種種，不論在晚清婦女解放思潮中，或在文學的價值上，《女子世界》都有其重要的地位，故論文第三部分則是針對女性文學的內涵進行討論，想要尋繹女性文學在晚清民初過渡時期的轉變。

第四部分則由《女子世界》對西方與日本女性的介紹，以及對漢族女傑傳記的書寫，梳理其獨特女性典範的建立。《女子世界》常藉由對當時歐美與日本女性的介紹，希望中國女子能以她們為學習的榜樣，依循既然同為女子，歐美日本女子能，中國女子為何不能的理路。其次，相較於其他期刊對於西方古女傑的介紹，《女子世界》則著力於建立漢族女傑的系譜，認為以中國悠久的歷史，決不可能無女軍人與女遊俠廁身其中，在民族主義的立場下，柳亞子等人努力讓中國的女軍人與女遊俠浮出歷史地表。本論文即企圖由婦女思潮、居家知識、女性文學與女性傳記四個面向，勾勒出《女子世界》中女性知識與典範的建構。

第二章 家國之間：《女子世界》的婦女論述

一、前言

晚清的婦女運動與救亡圖存常是糾纏在一起的，知識份子倡導女性解放的主要目的，便是為了使中國強盛，在與西方列強的競爭下，努力脫離野蠻進入文明。¹中國晚清的婦女運動，最初的發起者是男子，在女權論述的話語中，男性的聲音是顯而易見的。男子站在教育者與啟蒙者的位置，教導著女性如何因應這危急存亡之時刻，應該變換何種身分，方是對國家有利的。《女子世界》以男性為編輯群體，「社說」與「論說」欄為主要發表其婦女思想的園地，而這欄位的撰稿者也都是男性。第一期刊登的首篇文章，即是被譽為「中國女界之盧騷」的金松岑所寫的〈女子世界發刊詞〉，其言：

雖然二十世紀之中國，亡矣！弱矣！半部份之男子，如眠如醉，又如死矣。吾何望女子哉？是不然，女子者，國民之母也。欲新中國，必新女子；欲強中國，必強女子；欲文明中國，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國，必先普救我女子，無可疑也。²

金松岑在 1903 年出版了《女界鐘》，便獲得極高的讚譽。³在他這一段發刊詞中，

¹ 梅嘉樂認為晚清中國的婦女解放，除了強國強種的務實利益之外，更包含了一種民族自尊心的追求。中國認為當時先進文明的歐美國家，女權漸次開展，「為了讓外國人停止繼續把中國當成是『蠻邦』，纏足、女性文盲、納妾這些都應該被廢止。這種解放首先不是為了女人；解放女人是為了榮耀中國」。參見梅嘉樂 (Barbara Mittler)：〈挑戰 / 定義現代性：上海早期新聞媒體中的女性 (1872-1915)〉，收入游鑑明、羅梅君、史明主編：《共和時代的中國婦女》(台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07) 頁 284。

² 金一 (金松岑)：〈女子世界發刊詞〉，《女子世界》第一期 (1904.1)，頁 1 (頁 9)。

³ 關於《女界鐘》劃時代的價值，李又寧曾言：「就全書來說，《女界鐘》的超前啟後。它是有史以來，第一部全面重新評估中華女性傳統的書，也是第一部關於中華女性現代化的全面建議書。它呼籲女性投入社會、參加革命、爭取人權、追求幸福。如此，它結合了國家的需要與個人的權益。它鼓勵女性突破舊俗，做『完全天賦』的人，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做自己，而不是聽天由命，任人擺佈。這樣的自我創造精神，是一種 individualism，在中國，是超前的，而且預示五四時期的潮流。」見李又寧：〈《女界鐘》與中華女性的現代化〉一文，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可以明顯看到強盛中國與革新女性之間的重要聯繫，對於晚清的文人而言，提倡女權背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拯救中國，也惟有改造中國這泰半的分利者為生利者，教育文明的母親，方有文明的兒子，先要有新的國民母，才能有新的國民產生，「國民母」的訴求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

在金松岑的發刊詞之後，緊接的是《女子世界》的創辦人丁初我寫的〈女子世界頌詞〉，其中重申「然則欲再造吾中國，必自改造新世界始；改造新世界，必自改造女子世界始。」⁴認為改造中國必自女子始，而《女子世界》的宗旨即為「去舊質鑄新魂」。⁵而改造舊女性成為符合時代的新女性，這新女性的標準恰又與金松岑所提倡的「國民母」身分相合，丁初我曾言：

世界一日不開明，國家危亡將無日。嗟嗟同胞，昏昏長夢，國家興亡，匹夫何與？是顧非吾國亡國滅種之一大原因乎？而女子直居其半部份焉。嗚呼！國民者，國家之分子。女子者，國民之公母也。長棄其母，胡育其子。吾謂三千年之中國，直亡於女子之一身，非亡於女子之一身，直亡於男子殘賊女子而自召其亡之一手。⁶

這段文字中的「亡國滅種」正是晚清文人普遍的焦慮，《女子世界》的出刊正是因應這種焦慮，試圖提出解決之道，欲教育女性成為「國民母」，以期強國強種，使中國擺脫衰弱走入強盛之途。

本文即藉此梳理《女子世界》中的婦女論述，探析《女子世界》的知識群體對女性問題的討論與身份的定位。首先，要釐清的是他們對當時女性的評價，在男性的話語中，對女性的殷殷企盼，女性開始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並賦予救國的重責大任。按理來說，女性的地位應當是十分崇高的，但在《女子世界》中我們卻看到兩種矛盾的論述，一種是將女性的重要性，不斷的向上提升，認為唯有

所：《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頁 1078。Rebecca E. Karl 認為《女界鐘》「集合了與女性有關的社會惡俗的清單，不僅在中國歷史上首見，他所使用的語言，很大程度上也奠定了日後在討論相關問題時的基調和範圍。」參見柯瑞佳（Rebecca E. Karl）著；苗延威譯：〈清末中國的日常暴力〉（《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3 期，2005.12），頁 218。

⁴ 初我（丁初我）：〈女子世界頌詞〉，《女子世界》第一期（1904.1），頁 6（頁 14）。

⁵ 初我（丁初我）：〈女子世界頌詞〉，《女子世界》第一期（1904.1），頁 7（頁 15）。

⁶ 初我（丁初我）：〈女子世界頌詞〉，《女子世界》第一期（1904.1），頁 5（頁 13）。

女子方能拯救中國；另一種則是對女性的責備與怪罪，認為女子的身上有著許許多多的劣根性與不完美，前者是未來的理想新女性，後者則是晚清當時的舊女性。當時的女子被視為受害者與寄生蟲，卻又被賦予救國的重責大任，這種正反矛盾的雙重形象，成為晚清婦女論述中常見的現象。其次，則是要分析當時的男性文人，提出了哪些的改造女性之法？最後，則是要將女性改造成什麼身分？除了「國民母」之外，女性還被期待以何種姿態出現在國家社會之中？而當女性進入國族論述，成為救國之利器之後，則女性在家庭中的身分與認同是否也同樣發生轉變呢？女性又是如何看待自己在家庭與國家之間的位置？晚清作為中國女性角色變換的重要轉捩點，女子開始合理的走出閨房，進入學堂與社會，這一場寧靜革命就此拉開序幕。

二、女界革命：改造受害者與寄生蟲

晚清在救亡圖存的壓力底下，開始對古往今來的女性處境進行檢討，並希望藉由文章的力量，喚起女性進入救國的行列中。當時女子不論在家庭與社會之中，普遍地位低落，其卑微的程度，丁初我冠之以「第二重奴隸」的名號：

吾愛今世界，吾尤愛尤惜，今二十世紀如花如錦之女子世界。女子世界，奚自今日始？二十世界前之中國，固男子世界也。惡有男子世界，固奴隸世界也。男子為世界第一重奴隸，女子為世界第二重奴隸，奴種相傳，奴風相煽，奴根永永不一拔，遂造成今日亞雲如墨、漢水不波、憔悴名花、啼紅泣血之黑闇女世界。⁷

金松岑《女界鐘》即言，「女子者，奴之奴也」，丁初我的「第二重奴隸」即等同其義。奴隸之說，盛行於晚清，是一個與「國民」相對應的概念，原指國際關係中喪失主權的一種臣屬身份，晚清知識份子將其概念推廣至文化層面，奴隸一詞不僅指中國被列強殖民的情況，更用來指稱一般中國人性格中奴性。男子為君權

⁷ 初我（丁初我）：〈女子世界頌詞〉，《女子世界》第一期（1904.1），頁5（頁13）。

下的奴隸，女子為男（夫）權下之奴隸，即為奴隸之奴隸，女子乃為「第二重奴隸」、「三等奴隸」、「四等奴隸」，這些詞彙都是用來指稱女子為層層奴隸之最下等。淪為奴隸，是晚清知識份子至深的恐懼，⁸每每以印度與黑人為例，警惕中國人身為奴隸的可悲，奴隸與國民相對，奴隸象徵著野蠻、不自由，國民則代表著文明、自由等正面的意義。⁹改良國民性，擺脫奴隸的性質，成了知識份子思想的議題，在男子如此，面臨女性的改造，自然也是如此。

為了擺脫雙重奴隸的位置，論者提出了「女界革命」的口號。一自稱湯雪珍的常熟女子，即發表了一篇〈女界革命〉的演講稿，以白話的語氣，針對女性的聽眾高喊女界革命的口號：

我想我們女子，也是安眉帶眼，有知識的人，總就不能夠追到歐美女子的地步，怎麼就奴顏婢膝，笑逐顏開的承受起認仇作父、亡國奴來。我的同胞姐妹，再想想看，我們女子總就不能夠關地萬里、立業將來，為一轟轟烈烈、威震環球的女英雄、女豪傑，怎麼竟連一生的衣服、飲食，一切化費，都都要靠在那一般不識羞、不識恥、狗彘不食、萬國順民的身上。……我們也再不能夠像從前的婦女，伏地任他舞弄了。現在我們自立的方法，總宜勉力學問的裡頭，細細追求，獨立自強、擴充權利的道理。他們若是還要用這般壓制的手段荼毒我們，則我們也不妨坐在桃花馬上，張著革命的旗號，合我二百兆女同胞的無量熱血，濺殺此一般畜類。¹⁰

這篇以激烈的語辭，勸說女子應當群起革命。現今男子成為萬國奴隸，還壓制著女子，女子不應再柔順聽從，安於寄生蟲的角色，而是要自我振作，獨立自強的

⁸ 三等奴隸與四等奴隸，乃天醉生用來稱呼女子被奴役的狀態，如果將西方列強也加入權力結構中，則女子實為第四等奴隸。其文〈敬告一般女子〉中言：「把這一半拖妻帶女的病夫，去當那四面的楚歌，豈不是癩蛤蟆想吃天鵝肉麼？況且現在中國的男子，平日睡在家中，哼痰喝唾驕妻凌妾，比天神還要尊貴，一走入亡八官場中，便奴顏婢膝，做出許多不登大雅之堂的醜態。倘然碰著了外國人，便是百般奉承，磕頭屈膝，恨不得把自己的妻妾雙手奉獻，買洋大人的歡心，便是孝順兒孫，也沒有這般千依百順的。咳！朝廷做洋人的奴隸，男子做朝廷的奴隸，將來中國瓜分，做男子的尚不免埃及猶太的慘酷。做女子的又將如何是好呢！三等奴隸、四等奴隸，還有安享太平的日子嗎？」引自《女子世界》第一期（1904.1），頁12（頁20）。

⁹ 關於國民與奴隸之定義與區別，參見沈松橋：〈國權與民權：晚清的「國民」論述 1895-1911〉（《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3本4分，2002.12），頁694-700。

¹⁰ 湯雪珍：〈女界革命〉，《女子世界》第四期（1904.4），頁13-17（頁287-291）。

爭取屬於自己的權利。湯雪珍以女界革命為號召，要中國女性為自己的性別處境不公平而戰，以「性別」作為一個集結的表徵，要「女界」成為一個團體，成為一股抗爭的力量。

「界」在晚清的語境中，是團體與集團的同義詞，¹¹晚清出現大量的「界」，被認為是一種社會力量在重新組織的表徵。¹²「女界」一詞，即是指以女性為集結的團體，女界相對應的即是男界，以性別作為區別的方式，其跨越種族與國界，晚清「女界」一詞使用的相當普遍，例如《女界鐘》與《新女界雜誌》等，都是以女界做為書名或刊名，更突顯其所訴求的內容。晚清上海「女界」一詞，也如同「商界」、「學界」等詞一樣相當流行：

在清末上海租界，“女界”既是指一個性別群體，也被視為租界華人社會的組成部分之一。當然，它不像商界那樣有全市統一的商會組織，還只是風氣漸變、觀念更新的產物。女界的出現被視為是都市開啟女智的最初成果，它為都市女性營造了一個共有的性別空間，是女性拓展社會生活空間的重要通道。¹³

「女界」一詞的廣泛流行，「促進了女性的性別認同、都市認同，也表明華人社會接納女界，視其與商界、紳學界同為民眾群體」。¹⁴「女界」的訴求，與當代女性主義運動中提倡的姐妹情誼（Sisterhood）相似，都是主張女子應當團結起來，共同對抗男性與社會的壓迫，而不應自相殘殺相互攻訐。後來 1907 年，何震在《天義》更進一步號召「女子復仇」，其云：「吾女界同胞，亦知男子為女子之大敵乎？亦知女子受制於男，已歷數千載之久乎？古人言：虐我則仇。今男子之於女子也，既無一而非虐，則女子之于男子也，亦無一而非仇。」¹⁵更加明確

¹¹ 章清認為，「通常被翻譯成集團或團體的漢語新辭彙『界』，如『政界』、『學界』、『商界』等等，是在清末民初的報刊和其他事務性報導中出現的，這成為一種徵象，表明一個易於識別但外表相當鬆散的多中心的『亞文化圈世界（界）』的形成。這也說明所謂『界』，主要是指相當某一社會階層通過一定的關係『網絡』組織起來」。引自章清：〈晚清中國「思想界」的形成與知識份子新的角色探求〉，收入許紀霖主編：《公共空間中的知識份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頁 205。

¹² 章清：〈晚清中國「思想界」的形成與知識份子新的角色探求〉，頁 211。

¹³ 羅蘇文：《近代上海：都市社會與生活》（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 154。

¹⁴ 羅蘇文：《近代上海：都市社會與生活》，頁 155。

¹⁵ 何震：〈女子復仇論〉，《天義》第二期，頁 1。

的將性別對立起來，何震受無政府主義的影響，認為在民族國家存在的情況下，男女雙方是不可能平等的，故主張毀國、毀家之後，方能使男女達到真正平等的境地。

如要達成女界革命，擺脫女子寄生的地位，在振作之前，先要了解中國女權不振的原因，方能對症下藥。女權不振，是當時知識分子關懷的議題，反覆提出論說，論證女子今日之地位低落，其原因究竟歸咎於誰。有些論者以為是一種「歷史共業」，《女子世界》第一期刊載了署名「天醉生」的〈敬告一般女子〉，述說中國從古至今女權不振的原因：

中國自從三皇五帝以後，那些不通的聖賢，扭了許多歪經，說什麼男比天，女比地，天尊地卑，便是男尊女卑的意思。自此等學說一出，那一班的男子，更加裝威作勢，張牙舞爪起來，那些女子，聽了三從四德的瞎話，也就不知不覺低心下氣，仰承男子的顏色，把男子當作天皇神聖一般，所有天賦的權利，剝削精光。還有那一輩食古不化的道學先生，捏造了許多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無違夫子，以順為正的議論，母教其女，兄詔其妹，夫戒其妻，從此女權越壓越低，二萬萬可憐可敬的女子，遂無再見天日的日子了。還怕壓制的不彀，又想出許多牢籠誘騙的法子來，把曹大姑的女誡，劉向的列女傳，必敬必戒的迂談，無才無德的謬論，拼命的灌在女子腦筋中，後海先河，根深蒂固。……更有那許多不知天理的男子，還怕閭內牝雞、河東獅子，有重樹旂鼓的日子，便想出許多的方法，把好好的耳朵穿了兩個窟窿，好好的一雙天足裹成了三寸金蓮，把女子的行動自由削掉了；外言不入於閭中，內言不出於閭，把女子的言論自由削掉了；非有大故，不出中門，把女子出入自由削掉了。¹⁶

按照天醉生的分析，當時中國女子女權不振的原因，主要是因為中國儒家文化中對於男尊女卑的提倡，女子在長期的馴化之下，將三從四德以及無才是德等教條，當作自身生活的的行為準則，故導致女子越來越卑弱，女權漸消亡不見。對於遵守三從四德的貞節女子，給予貞節牌坊以示鼓勵，讓女子甘願捨自身的幸

¹⁶ 天醉生：〈敬告一般女子〉，《女子世界》第一期（1904.1），頁 10-12（頁 18-20）。

福，以追求朝廷對家族的榮耀與旌表。再加上宋代以後纏足等對女性身體的殘害，女性被迫淪為無知識、不自由的處境。這與丁初我所言，中國男子為皇權下的奴隸，而女子則為奴隸之奴隸——「第二重奴隸」之說相呼應。

知識份子在分析女性處境的同時，也開始對傳統進行批判。他們以歷史共業的角度來看，中國女子實為文化教育下的受害者，中國社會中男女處於不平等的地位，因其重男輕女、男尊女卑，方才衍生出後續的問題。中國的倫理制度，是以家庭為基礎，向外推展至社會與國家，故要完成女界革命，改善女子的屈從地位，要先由家庭革命開始。丁初我〈女子家庭革命說〉一文，認為婦女在家庭當中，不論是面對父母、兄弟、公婆，還是丈夫，都是處於卑下與被壓迫的角色。女子未嫁為女之時，親生父母以三從四德、無才便是德等女誡加以規訓，並強加纏足以戕害女子的肢體，女子在家庭之中，自然成為一個無知無識，又體弱多病的囚徒；即使是面對同輩的兄弟，女子也是處於卑下的地位，兄弟通常擁有類似父親的權利，對於女子的婚姻與資產，掌握發言與支配的力量；當女子出嫁之後，丁初我認為女子時落入第二重的地獄。身為媳婦，洗手作羹湯，服侍公婆為基本的義務，而公婆稍有不滿，則輒加責罵與虐待，其對女子的壓迫較其原生家庭，有過之而無不及。作為丈夫的妻子，其一生之幸福都掌握在此男子手中。丁初我認為，男子在閨房之中「儼然具有第二君主之威權，殺人無死刑，役人如犬馬」。¹⁷女子不論在其娘家或婆家，都是處於卑下的地位，而這些對女性施行壓迫的人，通常是女子生命當中關係最為密切的人。

在傳統家庭中的強力壓迫下，女子不得不柔順，接受屈從的地位，無法接受教育，女子自然成為一個無知無識的狀態，造成「女魂」的淪喪。自立所指的「女魂」，主要是受「國魂」二字的啟發：

吾聞文明之國，有物焉，具有無上之能力，非常之特權，化合於國民腦質中，得之，則昌；不得，則亡者，名曰國魂。然國也者，合無數之民而成者也。今國民既若夢若顛，若飲迷藥，若攝於魔術，雖有大力者未從而摧廓之，警醒之，則民實無魂矣，何論於國。轉而觀於女子社會，其熱誠鬱而未發，其敏腕袖而莫展，其慧眼垂而不啟，苟非舉數千年之

¹⁷ 丁初我：〈女子家庭革命說〉，《女子世界》第四期（1904.4），頁5（頁279）。

積習謬種遺傳之惡現象一掃而空之，如湯之沃雪，水之滅火，欲其孕育文明，以復天賦人權，不亦難乎，是女子實無魂矣，何論於國民。¹⁸

「魂」在晚清的語境中，魂象徵著一種戰鬥精神，¹⁹而國魂更代表著「本國自尊、自信、自強至可寶貴的民族精神；健全的國魂，又是保持民族間強永不枯竭的力量源泉」。²⁰國魂的振興，是國家富強的希望，國民需要一股對國家的共識，方能有向心力，一起為國事努力。這種邏輯運用在女子身上，亦是同理可證。由古至今，在傳統儒家的性別教育下，自立以為女魂已淪喪至無以復加的地步，故「二萬萬之女魂，不可不先組織而陶鑄之也」，²¹即附和丁初我的「去舊質鑄新魂」之主張。

丁初我認為女魂的淪喪，直接的造成了女性墮落的情況。儒家傳統的束縛，造成女性地位的低落，使女子成為制度下的受害者；身為受害者的女子，自身又無謀生自活的能力，只能成為社會中的分利者，處於寄生的位置。這兩種形象，使《女子世界》中在譴責傳統對女性壓迫的同時，也開始責怪女子的不思振作。周作人（1885-1967）化名「吳萍雲」，²²撰文指出女子淪為男子玩物的現象：

¹⁸ 自立：〈女魂篇〉，《女子世界》第二期（1904.4），頁8（頁94）。

¹⁹ 梁啟超使用了許多不同的名詞，例如「精神」、「氣」、「魂」與「烟土披里純」等，來翻譯西文中『spirit』與『inspiration』的概念。他在〈論尚武〉一文中認為，中國之所以從事軍事改革無法成功的原因，即為「無精神而徒有形式」，中國人缺乏一種日本人的武士道——即「日本魂」。所謂的「魂」，亦指一種尚武戰鬥的精神，日本之所以能立國維新，全靠日本魂，中國惟擁有中國魂，成為有魂之民族，方有強盛之日。參見浦嘉珉（James Reeve Pussy）著；鍾永強譯：《中國與達爾文》（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頁266-267。

²⁰ 鄭師渠：《國粹、國學、國魂：晚清國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頁123。

²¹ 自立：〈女魂篇〉，《女子世界》第二期（1904.2），頁8（頁94）。

²² 周作人（1885-1967），浙江紹興人，在《女子世界》中以「會稽女士吳萍雲」（有〈偶作〉一首，第五期；《女獵人》小說，第十三期）、「會稽萍雲」（譯〈荒磯〉，第十四期）、「會稽十六齡女子吳萍雲」（撰〈說死生〉，第五期）、「吳萍雲」（撰〈論不宜以花字為女子之代名詞〉一文，第五期）、「萍雲女士」（譯《俠女奴》，第八期）、「萍雲」（〈好花枝〉，第十三期）、「會稽碧羅女士」（〈題俠女奴原本〉，第十二期）等名發表文章。周作人日記從甲辰年（1904）十二月，到乙巳年（1905）三月，陸續記載他將〈俠女奴〉與〈女獵人〉等作，寄往《女子世界》社給丁初我的內容。見周作人：《周作人日記》上冊（鄭州：大象，1996），頁403-412。周作人在其《知堂回憶錄》「我的筆名」中，曾對自己使用女性筆名的現象加以說明：「這萍雲的號也只是那時的別號之一，如日記上見著的什麼不柯、天歙、頑石一樣，不久也就廢棄了吧。但因為給《女子世界》做文章的關係，所以加上女士字樣，至于萍雲的文字大抵也取其漂泊無定的意思罷了。碧羅是怎麼來的呀，那已經忘記是什麼用意，或者是『秋雲如羅』的典故吧，或者只是臨時想起，以後隨即放下了也未可知。萍雲的名字在《女子世界》還是用著，記得有一回抄撮《舊約》裡的夏娃故事，給它寫了一篇《女禍傳》，給女性發過一大通牢騷呢。少年的男子常有一個時期喜歡假冒女性，向雜誌通信投稿，這也未必是看輕編輯先生會得重女輕男，也無非是某種初戀的形式，是慕少艾的一種表示吧。自己有過這種經驗，便不會對於後輩青年同樣的行為感到詫異與非難了。」

「卅六鴛鴦同命鳥，一雙蝴蝶可憐蟲」，此殆我中華女子之代表也，情如小鳥，弱不經風，多病多愁，工啼善怨。四千餘年我女子之不出現於世界也久矣，委身於脂粉生涯，閉置於無形牢獄，騷人逸士形之歌咏，不曰艷如桃李，則曰閉月羞花，一似女子惟色足稱，止以供男子之玩弄，為生殖器具也者。而我女子，亦遂自認為玩具，日馳情於粉黛羅紈，斷送其有用之光陰，造成一種不可思議之惡狀，以博男子之歡笑，耗矣哀哉，泣蟲歟？弱蟲歟？胡為而至此。然此乃十九世紀之女子，而非二十世紀之女子也。

23

在《女子士界》中不僅男性知識份子對此玩物現象加以指責，女性投稿人也以一種「愛之深責之切」的立場，來斥責那些不思振作的婦女。²⁴劉瑞莪以十四歲女子的身份，斥責中國女性地位的低落，不能全歸咎於男子的壓制，婦女的自我輕賤也是最主要的原因：

中國今日之女子，亦云：「賤矣。供人玩弄，為人役使，如奴隸焉、如牛馬焉。」問何故？莫不曰：「男子之罪、男子之罪矣！」不知物先腐，而後蟲生之；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自然之理也。吾見近日之婦女，問以世界之事，語以國家之道，則皆搖頭掉手，曰：「此等事有男人為之，我輩不必理也。」噫！曾亦知女子者，固天下最尊最貴之人乎！天賦權利，女同乎男，腦質之聰穎，比男子或且過之。至製造國民，則更女子之大功德大事業，責任既比之男子為更重，報酬自當比之男子為更優。我輩女子不知自尊，不知自立，使彼等賤男子更妄施壓制，視為玩物，果誰之咎乎？

見周作人：《知堂回憶錄》（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頁 167-168。

²³ 吳萍雲（周作人）：〈論不宜以花字為女子之代名詞〉，《女子世界》第五期（1904.5），頁 88（頁 462）。

²⁴ 在黃菱舫替《女界鐘》所寫的序中，即有此種女子呼籲女子勿為玩物的聲音，其言：「近士夫所謂物競主義，上九天下九淵、前千年后萬祀，神聖豪強、顛蒙衰弱所莫或犯、莫或異者也。為今日女界卑賤、鄙汗、奴隸、玩物種種慘惡之現象，豈男子舉手投足區區壓制之能為力哉？毋亦我二萬萬同胞不學無術，自放棄其權利也。……縱有不甘于奴隸、玩物，大聲疾呼，起而抗之，則舉世之人莫不戮之辱之摧之桎之，非獨男子然也，女子亦目為怪物。悍者肆口詆毀，弱者腹誹遠走，相戒不敢信。豈竟土木之形骸、囚虜之根性然哉？嗟乎！吾女子且莫自輕視也。」見金天翮（金松岑）：《女界鐘》，頁 1。

劉瑞莪認為中國女子現今之處境，男子自有其應負之責任，但女子也甘於處於卑弱無之地位，亦難脫自甘墮落的罪名。女子不努力爭取自身權利，也不積極參與社會風潮之流行，不知自尊亦不想自立，而甘為男子之玩物，只想如何裝扮自身，取悅男子以獲得衣食，喪失的自身的主體性，故女子之處境低下，女子自己亦難辭其咎。

丁初我則將女性依賴男子的寄生現象，稱之為「女魔」的崛起。所謂的「魔」指的是「思想之結晶，遊魂之變體，損傷知覺迷惑心性之無上能力也。魔力愈大，其進化發達也必愈阻而愈遲。」²⁶中國女性在長期不平等的條件下生存，受到許多的壓抑與壓迫，長期處於受害者的位置，久而久之，性格與視野也容易受到環境的影響而產生異化，女魔遂成為女子不知不覺耽溺其中難以擺脫的寄生處境。中國女子難以擺脫的魔障，主要有「情魔」、「病魔」、「神鬼魔」與「金錢魔」。丁初我的「女魔說」，大體總結了晚清知識份子批評當時女性的幾個面向：為情所困、體弱多病、迷信鬼神與拜金主義等。

中國女子禁錮深閨，無法擁有行動的自由，其一生的幸福僅繫於丈夫身上，絕少擁有追求婚姻的權利，故在現存的詩作中，常見女子對自身的情感的嗟嘆。丁初我認為情感乃人之本性，但中國女子實只知個人之男女愛情，而不知推而廣之於社會國家之大愛，故常耗費心力陷溺其中而不可自拔：

情者，天賦之良苗，幸福之佳果也。人類之情種，惟女子佔其優，世界之情魔，亦惟女子不能脫其絆。吾中國無情種久矣！無愛國情，而不知有國家；無交際情，而不知有社會；無家族情，而不知有民種，惟一脈之男女愛情，則為五洲同倫，千古不變。……吾國之愛情，孤單而獨行。陌頭楊柳、夢裡刀鐮，兒女情長使消沮英雄氣壯者；且由愛而生愁，由愁而生恨，秋風紈扇，夜雨空牀，未免有情，誰能遣此；且由愛生瞋，由瞋而生妬，我女子一脈之真情，何地不可用，乃出入於溫柔鄉裡，黑閻獄中，終

²⁵ 劉瑞莪：〈女子宜自尊論〉，《女子世界》第七期（1904.7），頁 89-90（頁 665-666）。

²⁶ 初我（丁初我）：〈說女魔〉，《女子世界》第二期（1904.2），頁 1（頁 87）。

身偕老，是捨此無他圖。²⁷

丁初我認為「中國女子最善言愛，而最不能用」，²⁸主要是女子常常受限於個人的私情，將一切心力放在爭奪一男人之愛，用盡一切手段只為鞏固一男人之寵。原由愛心發動的行為，在遭逢挫折以後，「轉為貪、為嗔、為痴、為戀，再變為妒、為忌、為恨、為愁，為一切陰險惡毒之思想」。²⁹過份執著於個人情愛，將畢生心力投注於一人身上，而無法發揮出對國家社會的大愛，而這種小情小愛則會妨礙女子的進步，如果能變小愛為大愛，則中國女子之前途方有可期。

中國女子大多缺乏獨立自主能力，面臨挫折與困境無法有效的解決，常逃入宗教的世界以尋求慰藉。中國女子受到鬼神之說與輪迴觀念的影響，將生活中的恐懼與願望寄託渺渺不可證的神秘世界，而曠日費時的將大好光陰消磨在求神拜佛當中，丁初我以為：

中國實有鬼神，而無宗教。佛教不明，以輪迴之說概之；道教不識，以降魔之說了之；儒家無教，以孔子文昌附會而崇拜之，以希望為祈禱，以過往為懺悔，於是及身命運，來世福田，種種支裔，比附以行，遂為切身之莫大問題焉。……女子以現實之慾望，仰給於男子；以虛空之慾望，仰給於鬼神，其迷信深淺之程度，則仍視智識之高下以為差。……女子之迷信，常過於男子。迦經朝夕膜拜，香花佛市春秋，僧門如市，至因殖產而為望氣之占，因情障而願叢林之捨，因疾疢而招巫陽之魂，諸魔憧憧，迭相往來，終日營營，幾窮因應，更有何餘日，有何餘力，有何餘財，以經營世界之事業。³⁰

丁初我認為中國女子沒有獨立生活的能力，將一生之幸福寄託於丈夫的身上，如遇人不淑則幸福的生活就成為一種空想。自身沒有改變命運的可能，便將希望寄託於神秘世界鬼神的庇祐，藉求神拜佛祈願幸福的來臨。而中國的女學不昌，使

²⁷ 初我（丁初我）：〈說女魔〉，《女子世界》第二期（1904.2），頁2（頁88）。

²⁸ 初我（丁初我）：〈哀女種〉，《女子世界》第六期（1904.6），頁2（頁476）。

²⁹ 初我（丁初我）：〈哀女種〉，《女子世界》第六期（1904.6），頁2（頁476）。

³⁰ 初我（丁初我）：〈說女魔〉，《女子世界》第二期（1904.2），頁4-5（頁90-91）。

女子無法獨立自主，必須仰賴他人給與幸福，無法自己去追求幸福，故只有以虔誠膜拜來逃脫現實生活的困厄，故唯有提倡女學使女性愚昧無知的狀態解救出來，讓女子知道鬼神知虛妄，唯有自身奮鬥才能達成願望，如此才能有根本上改善女子迷信的陋習。

在中國傳統的制度中，女子並不被期望賺錢養家，甚或有些具有謀生能力的女子，例如三姑六婆³¹、閨塾師³²等，還須承受社會上異樣的眼光。在此種情況下，金錢為維持生活所必須，女子又無法如男子般自賺衣食，故一旦有餘錢在手，則相當重視，乃至於斤斤計較。丁初我認為這種對金錢短少的恐懼，造成中國女子普遍具有拜金主義：

拜金性質，自初人而具，合五洲而同，何獨責於吾國之女子哉？雖然，謀公共之經濟焉，則為美德。殖一己之私產焉，不失為利己，而獨有委以終身，殉以生命，耗以精神者，是為吾國女子之特別性質，其魔力直足以左右女界焉。蓋崇拜之心深，因緣之念起，待聘而懸價，相攸而擇富。一朝失足，誤以終身，破鏡離魂，動由金權之畸重，操而致之。又至米鹽家政，則較及於錙銖；對泣牛衣，或自經於溝瀆。錦衣翡翠，富者爭炫其奇；買笑求錢，貧者甘辱其節。嗚呼！金權之弊害日重。³³

丁初我肯定「趨利」為人之本性，但中國女子過分耽溺於一己之私利，而不知謀求國家社會的大利，他認為此種心態阻礙了家庭與社會，乃至於國家的發展。而這種拜金的習性，還會影響到下一代，則中國之良人種，則無法「革新而發達」

³¹ 「三姑六婆」在明清小說與文人的紀錄中，普遍被賦予負面的形象——貪財而無道德，是一種敗德的象徵。衣若蘭則認為，「三姑六婆」是中國傳統社會中「女性職業」的代表，所謂的「女性職業」主要是指「婦女利用本身的技能換取經濟報酬的營生之計」，三姑六婆主要從事宗教、醫療與商業三種職業性質（頁 33）。明代知識分子對三姑六婆的負面評價，一部份由於其掌握的某些專業知識，是男性所無法介入的；另一部份乃因三姑六婆的走街串巷行為，衝擊著儒家男女有別防閑的社會秩序，故三姑六婆在文獻中，常有被妖魔化的現象。參見衣若蘭：《「三姑六婆」：明代婦女與社會的探討》（台北：稻鄉出版社，2002），頁 176。

³² 閨塾師的社會地位，比一般的三姑六婆高，特別是在知識份子群體當中。閨塾師主要的工作，是教導士紳階級家庭中的女性，例如女兒或妾，教授她們基本的識字、繪畫或詩歌能力等。隨著短期的約聘，塾師通常需要不停的移動。以黃媛介為例，她以塾師的職業，帶著丈夫和孩子，有時自己一人，巡遊於江南各地，以擔任塾師的工作來養家活口。她的家庭生活，顛倒了儒家「男主外、女主內」的律例，也曾引起同時代一些保守文人的質疑與非難。見高彥頤（Dorothy Ko）著；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頁 129。

³³ 初我（丁初我）：〈說女魔〉，《女子世界》第二期（1904.2），頁 5-6（頁 91-92）。

之。這種對私產的的斥責，在抗議美國禁華工禁令的拒美貨運動中，可以更明顯的看出，當時的知識份子認為以最簡單的鼓吹女子貢獻金錢，或拒絕購買美國的貨品，以購買土貨來表達女子的愛國心，一方面也鼓舞女子能以一己之財力對國家有所貢獻。

傳統中國婦女的身體受到家族制的管控，被限定「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猶如囚徒毫無行動自由。肢體無法伸展，健康亦受影響，再加上纏足的戕害，中國婦女若不禁風的病弱形象深植人心，成為對中國女子的刻板印象：

今中國國淪矣，種夷矣，一息奄奄，陳尸牖下，群盲夢夢昏嚙宵中。同胞，女同胞，其病院之標本，博物館之模型，人類館之惡劇，種種不可名狀，不可思議之美疾奇疾，多萃於汝之一身，跬步域閭閻，起居失常度，米鹽耗神思，奴婢役形骸，受病之原何一，非是而已。多愁多恨之女子處之又焉得一日而不病，況纏足之大刑，更從而加厲，先喪其形骸焉，嗚呼！以弱不禁風之質，工啼善怨之身，曾不足操家庭之井臼，顧欲語以國民運動之事業，恐腦筋未動而一索而暝矣。³⁴

日本在 1903 年 3 月於大阪舉行的第五屆內國勸業博覽會，原計劃將中國人的纏足與鴉片，列入人類館的展覽項目，而引起中國輿論譁然。³⁵「纏足」這一流傳幾百年的傳統，到了晚清時期，開始受到新式知識份子的質疑與譴責，認為這是一個戕賊中國女子最嚴重的陋習，也是國家恥辱的象徵，應當要加以廢除才行：

三千年禁錮女子之方法，未有若纏足之巧、纏足之酷者。西國保衛其種之

³⁴ 初我（丁初我）：〈說女魔〉，《女子世界》第二期（1904.2），頁 3（頁 89）。

³⁵ 1903 年在大阪舉行的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由民間團體出資的人類館由計畫將中國人列入展覽的內容，引起中國留日學生的強烈抗議，雖然在博覽會正式開幕之時，人類館已經將支那人的部分剔除，不過，其欲將「纏足女」與「鴉片男」列入展覽的意圖，對中國人來言，是貽笑大方的奇恥大辱。在 1903 年後的幾年間，中國的知識份子不斷在報章媒體中提及此事，藉以提振中國人的民族自尊心。中國知識份子有意將博覽會的內容加以扭曲，讓中國讀者以為「纏足女」確曾在博覽會中展出，藉此與反纏足運動相應和，不僅加強了纏足做為國恥的象徵，也進一步挑戰中國對小腳隱蔽的禁忌。在中國人的認知中，小腳是屬於女性最私密的部位，如今這隱密的地方，卻在博覽會中向世界呈列，供全世界的觀賞，對於當時的中國人而言，是最難堪的視覺暴力。參見楊瑞松：〈近代中國國族意識中的「野蠻情結」——以 1903 年日本大阪人類館事件為核心的探討〉（《新史學》21 卷 2 期，2010.6），頁 136-137。

不遑，我國摧殘其種之恐不力，以慈母最愛之身，而忍之若仇敵；以良人可憐之體，而攫之為玩好；以天賦完全之軀幹，而矯揉造作至不成人，弱蟲歟？脆蟲歟？「敵彈未破先流血，大好嬌兒作嫁奴」，嗚呼！弱種之大禍因、亡國之大妖孽，國之滅未有不由於種之衰者，生理家之言曰：身體羸弱之女子，其孕育也必不強。今吾國兒女之生，其出自纏足母之稟賦者過大半數，血腐肉爛纍纍疾病之身，所生子女亦皆痿痺瘠弱半不成人，其不生而夭者，幸矣。病種遺傳，舉國皆是，以致東方病夫國之號，遂為初胎肇錫之普通一名詞。吾聞斯巴達之育兒也，棄其弱而留其強。吾中國之育兒也，殺其強而胥變為弱，顧亦知種戰之公例，由下等動物而為高等動物者，戰而敗則將復反優而為劣，而女種實先當其危也，亡種之慘其過於亡國之痛者，不知又若何也。³⁶

對纏足的撻伐，幾乎是當時知識份子的共識，不論是政治立場上，主張維新或革命的知識份子，對於廢除纏足的立場卻是相當一致的。³⁷這小腳為美的審美觀，在晚清強國強種的論述下，被斥為妨礙國家強盛的原因，自然也成為被揚棄的對象之一。由丁初我的文章中，可勾勒出當時中國女子在男性知識分子眼中的普遍形象：迷信、無知、體弱多病、纏足與自私自利，並且依賴成性而無獨立自主的能力。

女魂淪喪與女魔崛起，最可怕的結果就是導致女種的消亡。丁初我在第六期的〈哀女種〉一文中，則更仔細的說明了，女種的消亡則國之前途亦堪慮：

吾哀一切病種之原因，而得一最終之判斷曰：我女子能保存我種也，再言女學與女權。否則，皆為媵亡之贈嫁物。吾不欲吾女子再罹此煩惱禍也，時乎！時乎！不再來，優勝劣敗在此一間。女種者，體魄之基也。體魄者，

³⁶ 初我（丁初我）：〈哀女種〉，《女子世界》第六期（1904.6），頁6-7（頁480-481）。

³⁷ 林維紅在研究晚清不纏足運動時發現，當時的男性知識份子不論其政治主張為維新或革命，即使其基本的關懷有異，但對於女子解放的內容，幾乎都一致認為應從放足開始。見林維紅：〈清季的婦女不纏足運動 1894-1911〉，收入李貞德等編：《婦女與社會》（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頁375。而也正因為晚清以來，對於廢纏足主張的一致歌詠，引發高彥頤的質疑，她將關注的對象放在女放足會員、教師、蓮癖者、女學生、掙扎於解纏之間的小腳婦人與查腳員上，企圖書寫另一視角的纏足史，想找尋在巨型歷史論述下的另一種聲音。見高彥頤：《纏足：「金蓮崇拜」盛極而衰的演變》（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頁7。

德慧術智之母，而人種競爭之大利器也。女種既敗，一切競爭皆不利，抑又聞女子者，所以生國民，非以死國民，何以國民未盡死，而已先毒自殺之無噍類也。嗟乎痛哉！吾黃帝四千年來之神明貴胄大好兒孫，禍此種者，女子；救此種者，亦女子；賣此種者，女子；愛此種者，亦女子。種弱而強之，種劣而優之，種之被蹂躪凌虐無餘地者，自振拔自光復之，盡我人事抗彼天行，於以壽家庭之福命，光大漢之天聲，出立於民族競爭之新舞台、新世界。³⁸

而女種之不振的原因，則「遺傳不良者有三」與「後天戕賊者亦有三」。³⁹關於先天弱種的原因，他認為乃因「非愛種」、「非俠種」與「非軍人種」。其中「非愛種」的指內容與「情魔」雷同，主要認為中國女子只知小情小愛，而不知擴大為對社會與國家的愛，將利己的思想進而發揮成慈善與愛群的行動。而「非俠種」則指中國文化上對俠的揚棄，重儒輕俠的結果，使中國女子成為奴隸之流。為改正文弱的習氣，丁初我標舉了中外的俠女，認為中國女子當要像古代俠女與近代日本與西方學習，一改女子柔弱為美的觀念，當興起俠魂以救中國。⁴⁰他更進一步鼓吹尚武精神，認為中國女子就是因為非為軍人種才甘心淪為奴隸而不為苦。⁴¹這種「愛種」、「俠種」與「軍人種」，被丁初我稱之為「良女種」，而這良女種是以西方女性為出發而說出的，丁初我以為西方之所以會強盛，乃因其擁有「良女種」，西方日日培養，而中國女子則日日摧殘，「國安得不亡，種安得不滅」。

除先天無良女種外，中國文化中的弊端，更讓原本先天不足的女種，更加飽受戕害。就丁初我的觀察，主要有三點：「不知養育之弱種」、「不運動之病種」與「纏足之害種」。首先，以西方人與中國人在體格與外表上的差異，指出中國女子不知如何養育優秀的下一代；其次，中國女種的衰弱，也是因為中國女子普遍「大門不出，二門不邁」，更遑論去運動強身。最後，則是纏足的陋習，讓女子的身體孱弱，行動受限制，母體的不健康，孩子的健康也被認為受影響，故言「纏足之害種」。

³⁸ 初我（丁初我）：〈哀女種〉，《女子世界》第六期（1904.6），頁 7-8（頁 481-482）。

³⁹ 初我（丁初我）：〈哀女種〉，《女子世界》第六期（1904.6），頁 1（頁 475）。

⁴⁰ 初我（丁初我）：〈哀女種〉，《女子世界》第六期（1904.6），頁 2-3（頁 476-477）。

⁴¹ 初我（丁初我）：〈哀女種〉，《女子世界》第六期（1904.6），頁 3-4（頁 477-478）。

女種之所以得到重視，因其關係著中國的種族進化與國家生存。嚴復認為中國富強有三保：保種、保國與保教。⁴²其中保種的部份，與女性的振興關係密切。丁初我的「哀女種」，其思想脈絡即來自於嚴復「蓋母健兒後兒肥，培其先天而種乃進」⁴³。此種「母健而後兒肥」的種族進化思想，後來用一中國化的語彙——「胎教」來取代。梁啟超認為改造女性為國家富強的根本：

西人言種族之學者，以胎教為第一義，其思所以自進其種者，不一而足，而各國之以強兵為意者，亦令國中婦人，一律習體操，以為必如是，然後所生之子，膚革充盈，筋力強壯也。此亦女學堂中一大矣也。今之前識之士，憂天下者，則有三大事：曰保國，曰保種，曰保教，國烏乎保？必使其國強，而後能保也。種烏乎保？必使其種進，而後能保也，進詐而為忠，進私而為公，進渙而為群，進愚而為智，進野而為文，此其道也。教男子居其半，教婦人居其半，而男子之半，其導源亦出於婦人，故婦學為保種之權輿也，今與人言此義，鮮不謂以耕救飢，掘井消渴，迂遠而無當也。

44

中國胎教文化，早在漢初便以出現，也一直為後人所重視，甚或在現今的華人社會，亦仍見其影響。⁴⁵所謂的胎教，黃石定義為「就是教子始自懷胎。詳細說來，便是婦人教養子女，不必待子女出生以後，在妊娠的時期，就要開始用積極和消極的手段，養成胎兒的善良品格」。⁴⁶即「子在腹中，隨母聽聞」，女子在懷孕期間的行為，會直接影響到胎兒的發展，故女子在懷孕期間，無論是口說、眼觀與耳聞都要注意。⁴⁷不過，梁啟超等人的胎教理論，並不是注重孕婦懷孕期間的禁

⁴² 嚴復：〈有如三保〉，《嚴幾道文鈔》（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頁 85。

⁴³ 嚴復：〈原強〉，《嚴幾道文鈔》，頁 55。

⁴⁴ 梁啟超：〈變法通議·論女學〉，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 32。

⁴⁵ 長谷部英一：〈中国における胎教の思想〉（《技術マネジメント研究》四，2004.12），頁 37-44

⁴⁶ 黃石著；高洪興編：《黃石民俗學論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頁 71。

⁴⁷ 《醫心方·求子第二十一》中即言：「凡女子懷孕之後，須善事，勿視惡色，勿聽惡語，省淫欲，勿咒咀，勿罵詈，勿驚恐，勿勞倦，勿妄語，勿憂愁，勿食生冷醋滑熱食，勿乘車馬，勿登高，勿臨深，勿下阪，勿急行，勿服餌，勿針灸。皆須端心正念，常聽經書，遂令男女如是聰明智慧（慧），忠貞真良，所謂教胎者也。」轉引自李零主編：《中國方術概觀：房中卷》（北京：人民中國出版社，1993），頁 127。

忌，而是站在優生學的角度，認為母親不健康，必不然生產出健康的下一代。丁初我的「哀女種」，與其說是哀悼女種，不如說哀悼中國種，女性之所以重要，因其主要的任務就在繁衍健康的中國兒子；為了有健康的下一代，女性不思振作是不行的。

《女子世界》的男性作者／編者群體，對女性淪亡的歷程，做出了一個惡性循環的三部曲：女魂淪喪—女魔崛起—女種消亡。他們認為當時中國婦女的處境十分不堪，處於雙重奴隸的被迫害角色；又不思振作，甘為男性的玩物，是社會中的寄生蟲。面臨國家存亡的關鍵時刻，要「保種」以確保種族的生生不息，婦女的角色又至關重要，是整個國家的救贖者——國民母。婦女在國族論述的話語底下，身處矛盾的複雜位置，在晚清的政論中，常見「犧牲者」（雙重奴隸）和「女神」（國民母），兩種矛盾的言論並置。⁴⁸婦女解放在國族存亡的強勢話語下，其形象與身份的定位，就在這正反的矛盾中擺盪。

三、鑄造之法：女力、女智、女德

在追本溯源之後，瞭解中國女子的處境，是一個「女魂淪喪—女魔崛起—女種消亡」的惡性循環，方導致中國女子成為社會寄生者，故如何消解這個惡性循環，或如何將其轉化為良性循環——「去舊質鑄新魂」，成為《女子世界》中核心作者／編者群體集思廣益欲達成的目標。面對如此不堪的中國女子，知識份子提出了何種解決之道呢？自立在講述女魂淪喪之由後，確切的提出了「鑄造女魂」之法，要從兩個方面入手：「一由於內界之能力，一由於外界之教育」。⁴⁹內界之能力，指的是婦女本身的稟賦，而這稟賦又需由外在的教育來驅動。如要婦女由

⁴⁸ 劉人鵬認為，這種將女性視為犧牲者與女神的矛盾，是晚清知識分子在國族主義與女權主義中常見的矛盾隱喻，其言：「國族主義無法為自己的內在認同生產出符合自己的歷史（因為，總是早已經接受了所謂外在的、西方的、所謂理性啟蒙進步的世界觀或認知方式，生產出的歷史，又成為外在西方凝視下的非歷史）；於是，女人成為這種歷史的失敗的一種比喻：國族主義會同時把女人當做犧牲者，以及女神。這種現象，我們晚清以來的國族主義的婦女解放論述也可以看見，一方面中國二萬萬婦女都是封建社會奴隸般的存在，一方面二萬萬女子又是國民母，是救國強種的活水源頭。」參劉人鵬：〈「中國的」女權、翻譯的慾望與馬君武女權說譯介〉，收入《近代中國女權論述——國族、翻譯與性別政治》（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0），頁90-91。

⁴⁹ 自立：〈女魂篇〉，《女子世界》第三期（1904.3），頁9（頁183）。

內而外的改造，則教育實為當務之急。

婦女的改造教育，可由三方面入手：智育、德育與體育。這並不是婦女運動中創新論述，而是借用了嚴復在〈原強〉中的主張，而嚴復的思想又是受到斯賓塞的影響。⁵⁰嚴復在〈原強〉中言：

蓋生民之大要三，而強弱存亡，莫不視此。一曰血氣體力之強，二曰聰明智慮之強，三曰德行仁義之強，是以西洋觀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斷民種之高下。未有三者備，而民生不優；未有三者備，而國威不奮者也。⁵¹

嚴復強調民力、民智、民德三要素，是為當時的中國尋求富強之道。在《女子世界》中則將嚴復的改造之法，施行於婦女身上，故自立在言「去舊質鑄新魂」時，乃至於其他的知識份子講述改造婦女的方法時，大抵都是從這三面開展：鼓女力、開女智與新女德。

（一）鼓女力：健美觀的建立

在「母健而兒肥」的思維底下，晚清的知識份子思索著如何改善中國孱弱的女性，認為想要誕育強壯的子女，必要先有強壯的母親，才能使中國的後代擺脫成為博物館陳列品的深切恐懼：

東方病夫國，女子但居其半部分，而吾謂病種皆根於女子也。氣體羸弱之女子，必無以孕育偉大強壯之國民，今日欲再造國民，必先造女子；欲造女子，必先祛病魔；欲祛病魔，必先強體魄。古代斯巴達之女魂，今世蘇格蘭之體育，美哉！誕育效果何如？⁵²

⁵⁰ 斯賓塞認為社會的富強，在於體力、智力與道德三方面的結合。嚴復在譯介斯賓塞學說的同時，也將此種想法融鑄進自己的國家富強論述。關於斯賓塞對嚴復思想的影響，可參史華慈著；葉鳳美譯：《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頁 36-39。

⁵¹ 嚴復：〈原強〉，《嚴幾道文鈔》，頁 31。

⁵² 初我（丁初我）：〈說女魔〉，《女子世界》第二期（1904.2），頁 3（頁 89）。

唯有先改造女性的身體，使其擁有健康的身體，所誕育的子女方能健康，這是晚清知識分子在提倡女子健康最主要的思維，女子體育亦是在強國強兵的前提下建立的主張。

丁初我以為，中國女子身體的孱弱，主要來因其普遍不運動，每日困坐閨房好靜不好動，他並以西方的女子為例：

吾嘗見夕陽西下，攜手同行樂意與春風相送迎者，春秋佳日，公園淺草間，拋球、蹴鞠、競走、秋千為戲樂者，其盎然之生趣，得日吸新鮮之空氣，濡染於一身，故歐美婦女之健康無有出於男子下者。我中國則以囚禁為女子養尊地也，舉步域於閨闈，咫尺比肩輿，其自視有若帝王之處境，不啻囚虜，晦冥風雨、暑鬱濕蒸，空氣不通，美疢浸作，而且起居失其常度，飲食恣其嗜欲，呼奴叱婢傷其肺氣，量柴數米耗其精神，種種不覺之原因皆足釀成一切不可思議之惡疾。夫藥鑪終古、經卷殘生則亦以耳。苟大限臨頭，鎗彈壓境，恐纖纖蓮步舉足而顛矣！嗚呼！誰非人情不思自活，欲求自活，還先自治。夫今日急救拘囚散懶痺癱麻木之身體，莫如運動之一法，多運動而後血脈通，血脈通而後精神旺，以體操為強立之本，以遊戲為活動之助，出游以吸空氣，唱歌以養性情，體育強而后德智交通之事乃因之而次第起，非然者，病院博物院之標本，野蠻人類館之模型，吾無從知之，吾又烏忍觀之。⁵³

丁初我營造了西方世界的健康女子的美麗圖像，在公園裡拋球、蹴鞠、競走遊戲玩樂，這種自由自在的行動，相較於限制於閨房中的中國女子，其天壤之別立見。晚清的革新志士不再以女性獨守閨房當成美德，而開始崇尚西方式的女性，勇敢走出房門運動，伸展筋骨，來維持身體的健康，其目的自然不脫強國強種的思想，相較於閨訓的美德，如何能讓女子生養出健康的下一代才是當務之急。

與智育和德育相比，有論者以為體育才是兩者的根本，三育之中如要以先後論，則應以體育為優先。⁵⁴在《女子世界》在第六期特別辦了一個「急救甲辰年

⁵³ 初我（丁初我）：〈哀女種〉，《女子世界》第六期（1904.6），頁 5-6（頁 479-480）。

⁵⁴ 陳擷芬〈論女子宜講體育〉中言：「且夫體育非特與智育德育並重也，實為二者之本。體育既

女子之方法」的徵文，其中廣東女學堂學生張肩任寫了一篇文章云：

夫德育、智育、體育三者，皆不能或缺。且德育為重，智育次，體育又次矣。豈知處今日競爭角逐之世界，累卵危亡之國家，則大反是。我國之女子，不出閨門一步，外界習俗無從而薰染之，其道德心固未盡缺乏也。其心思較細，詩歌美術之風，且不輸歐美，故智識亦足以上人也。唯一觀其體魄，則病夫耳，死尸耳。纏足之毒，中之終身，害及全國，軀體之不完，遑言學問，纖微之不舉矣，奚論戈矛。即使今日女子具有斯巴達女子之尚武精神，其奈無斯巴達女子之尚武體魄何。⁵⁵

張肩任認為德、智、體三者，均為改造中國婦女所不可缺之教育，但若從急救中國婦女的角度觀之，則體育應為當務之急，智育與德育次之。她認為在體育方面，因中國女子纏足的關係，故使中國女子在生理上擁有後天的缺陷，不能恣意在運動上場活動，導致運動不足血液循環不足，在體魄上柔弱多病，故較西方女子遜色頗多，若體魄不能強健，則無法追求學問，遑論其他知識的提升。不僅張肩任認為體育為三育之首，另一香山女子劉瑞莪亦認為體操乃是當務之急：

論曰：體操誠急務矣！可以活筋骨，可以怡性情，可以強種族，且國民皆有當兵之義務，學生在塾時，能習兵式體操，日後當兵，可以保家，可以衛國，故體操者，學堂必不可缺者也。吾謂女學之體操為尤要，蓋女子者，國民之母也，一國之中，其女子之體魄強者，則男子的體魄亦必強。我國人種之不及歐美者，亦以女子之體弱耳。今省中女學堂，能知體操之要而添設之，將來造成新國民，養成優民族，皆此輩女子之責矣，豈不美哉！

56

劉瑞莪由軍國民主義的角度，認為國家要富強則國民必須健康之身體，平時學習體操不僅有助鍛鍊筋骨，也可以怡養性情；而女子學習體操更有助於身體健康，

廢，德育與智育亦隨之矣。」見《女學報》二年二期，頁3。

⁵⁵ 張肩任：〈急救甲辰年女子之方法〉，《女子世界》第六期（1904.6），頁85-86（頁559）。

⁵⁶ 劉瑞莪：〈記女學體操〉，《女子世界》第七期（1904.7），頁90（頁666）。

來日更能誕育健康之國民。她認為當時中國女學堂中，開始增設體操課程，實有助於未來國民健康之養成。

但與西方的體育經驗不同的是，中國女子多有纏足的習慣，故在進行中國女子身體健康的改造，主要分為兩個部份進行：一是廢纏足運動，一是學校體育的提倡。在當時的報章中，不斷反覆陳說纏足之害與放足之益，而鼓勵女子多多運動，伸展筋骨，以收強身之效：

漢種之弱已臻極點，考其原因，全在母體。我國陋俗，以女子之花枝孌娜、弱柳苗條者，為唯一之佳人。為今之計，唯有先去陋俗。纏足、穿耳皆耗人心血，傷人身體，故宜改革。……。陋俗既除，然後研究衛生，注重體操。高等女學校中復設家庭衛生、柔軟體操諸科，而處家之女子亦宜常為戶外之運動，不可蟄居閨中，因循坐誤，務使人人精神愉快，身體健康。西儒有言：「生命在強健，而不在活。」蓋強健誠極樂世界也。苟二萬萬女同胞，同臻壽考，同登極樂世界，則生子自佳，漢種自強矣。⁵⁷

唯有放足與運動雙管齊下，方能收到「女健」（即「母健」）的效果。廢纏足最初的目地亦是由健體強身的角度出發，新式女學堂入學的規則之一，通常會有放足的規定。

當時的女校的課程中，將體操一門作為新興的學科，⁵⁸甚至還因為過於新奇，曾在地方上引起不少的騷動。⁵⁹當時體操課所教授的內容，大致可以分為三

⁵⁷ 志群（陳志群）：〈女子教育〉，《續辦女子世界》（1907.？），頁5（頁1617）。

⁵⁸ 游鑑明認為「由於『體育』一詞初期並不流行，而實際教學又以體操為主，『體操』一詞遂涵括當時的體育，學校也以體操概稱。」引自游鑑明：〈近代中國女子體育初探〉，收錄於鮑家麟編：《中國婦女史論集五集》（台北：稻鄉出版社，2001），頁262。

⁵⁹ 在《女子世界》第七期中的記者在報導國內事件時，講述的一條〈女學惡潮〉的新聞，其內容云：「本社調查員通信云，先是廣東省城之女學堂，就近聘時敏學堂之體操教習小山氏（日本人）兼授體操。此間女學向無此科，居民創見紛紛來閱，不堪其擾，該校董事乃擬非學生父兄不得到學堂參觀。日前乃有時敏學生某某數人，欲私謁女生，掉一小艇，向該校臨河之後門撞進，該校董事欲斥逐之，而以為時敏之學生也，姑延之入，招其上樓。小山氏不欲令己所教之學生，犯人規則，乃於黑板上書「時敏學生不許看」數字。數人不得已，怏怏而歸，毀壞該校之後門以洩忿。回堂之後，老羞成怒，集眾演說，欲激動公忿，以對小山氏，後卒為時敏之總理所斥退云。」與其他省份相比，廣東尚為接受西方事物與思潮較早的地區，在當時的女學堂教授體育竟也引起不少的騷動，記者最後甚至痛罵觀看的民眾與學生：「怪哉！時敏之學生！醜哉！時敏之學生！爾亦知學生之名詞，固最高尚、最尊貴之名詞乎！奈何道德墮落至如斯之甚也，我學生社會當鳴鼓攻之。……我中國而有此學生，波蘭印度其不遠乎！」引自《女子世界》第七期（1904.7），頁

類，分為兵式體操、普通體操與遊戲。⁶⁰晚清對體操的分類，常是受到西方與日本的影響。⁶¹最主要提倡女子體育的場所為女學堂，在課程中將體育列為必要的項目，並且舉行游藝會與運動會來驗收其教學的成果，此種活動也成為記者報導的對象。在《女子世界》第十四期的「記事欄」中記錄了上海城東女學校的游藝會，其中「王女士保珩跳高三尺五寸，秦女士韻琴舉十八磅鐵桿八十次，觀者咋舌歎羨」。⁶²此外，《續辦女子世界》中還記錄了上海務本女學校運動會的流程，可知道當時運動會行進的內容：

丙午九月十九日下午一時，上海西門外務本女塾，舉行運動大會。男女賓到者約一千數百人。運動順序凡二十節，正式體操居其七，跳舞類居其四，團體競爭居其六，個人競爭居其三。茲將順序單列左：

(一)開會(二)運動會歌(三)方障競爭(四)木槌操(五)矯正術(六)執勺競爭(七)圓舞(八)瑞典式操(九)提燈競走(十)徒手操(十一)拋球競爭(十二)歌舞(十三)通信競爭(十四)連球操(十五)紮花競爭(十六)木環操(十七)進行(十八)瑞典式操(十九)競算(二十)豆囊競爭(二一)星形(二二)羯鼓催花(二三)唱校歌(二四)閉會⁶³

85 (頁 661)。

⁶⁰ 參見游鑑明：〈近代中國女子體育初探〉，收入鮑家麟編：《中國婦女史論集五集》，頁 263。

⁶¹ 《江蘇》中曾譯介下田歌子參觀英國女校體育的文章，其中言：「行於歐米諸國女子之體育方法，有柔輒、有嚴肅，可先分三種。一純然從於「ヂムナスチック」一種體操之名之正式，類似於男子兵式體操者。二「ヂムナスチック」交手舞蹈者。三屬於遊戲，而注意於筋骨之發達，使適度於四肢之運動者。而蘇邦之女學校，其所注重者，如所揭於第一項，其體操所著之服裝，優勝於男子，其技術類似於兵式，動作活潑，膂力強健，巡行於諸邦，殆所罕見。蘇人之體格，男女皆美觀著，即為體操獎勵之結果，此種之體操與瑞典國相同，其體操程度，疑男子有所不及。余向於校長叩其所課，過度於男子，似於女子衛生上恐有妨害。彼女答曰：「否！不然！此即為蘇邦之特色，女子身體強健，精神活潑，所以冠於大英國者以此。」且運動之遊戲，以苦利支開託拍球一種為最盛，此遊戲法，男子中須有膂力者能為此焉。德國之女學校，所注重者為第二方法，殊喜遠足長行。其第三之法，無論歐米各國，用以教幼稚之生徒為常法。總之彼國之女子，骨格之健康，肌膚之肥滿，色澤之光麗，皆以勉力於體育為結果，所以能隨其男子航渡遠洋，移任於蕃地，毫無所畏懼，性質堅忍不為所撓，何莫體操之效力也。」引自江蘇同鄉會：《江蘇》第一期，頁 90-91。譯者並感嘆的說：「今日欲強中國，當先破壞守舊者之心，務為女子脫去束縛其身及束縛其足，則可與言泰西日本之種種遊戲法。」相似的文字也出現在金松岑《女界鐘》中，他並感嘆中國人對體育得不重視，應當要急起直追才行：「嗚呼！亦可以知其體育運動之要矣（書至此，偶記一事。昔有中國人見外國婦之打球者，私問其御者曰：『此女人打球，工金若干，而每日孜孜若是？』不覺失笑）。今中國女子急宜先求運動之法，夫運動而後身體強，身體強而後精神愉快，乃辦事而有餘。」引自金天翻（金松岑）：《女界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頁 32。

⁶² 〈運動會兩誌〉，《女子世界》第十四期（1905.？），頁 98（頁 1350）。

⁶³ 〈秋季運動〉，《續辦女子世界》（1907.？），頁 90-91（頁 1702-1703）。原文第八項與第十八

晚清的運動會主要以學校為主，至民國以後，方才從學校推及到區域性，乃至全國比賽與國際賽事。務本女學校的運動會形式，是一種「仿日的體操運動會」，運動會的項目以團體式的體操與舞蹈為主。⁶⁴

可是並不是所有的女子，都能上學堂讀書學習體育，為了普及體操強身的常識，《女子世界》第十期刊登了亞華以白話形式，所寫的一篇〈女子簡易的體育〉文章，⁶⁵來教導女子如何在家庭當中進行體操來鍛鍊身體，矯正女子的體態，並希望女子能以正確的方式教育下一代，使體育的觀念能向下扎根。他針對女子身體上的弊病，分為下肢、尻部、胸部、脊柱、頭部、衣服與鞋履來述說。

下肢的部份，主要針對的是女子的腳步。他認為中國女子的腳步是歪斜不正的，導致腳步的肌肉柔軟而沒有力氣，再加上纏足的影響，其病弱自不用說，他以為要改正這種下肢的毛病，要穿寬大的鞋子，時時競走，最好是能從小做起：

自後兒童到學步的時候，切不可著尖頭的小鞋，時時要扶著他行走。年紀稍大必要刻刻運動他下肢，到休息的時間，又須教他遊戲的法子，做種種的運動。或是教他進行競走，或是教它踏球角力，把訓練筋肉的意趣，不知不覺感入兒童行樂的性情，使他血脈自然活動，那下肢的種種弊害，自一掃而空了。⁶⁶

其次，中國女子常以尻部膨大為醜態，而常常緊裹下體，亞華認為應當要讓身體自然發育：

今要講矯正的方法，先要力去習慣的迷信，時時為腰部的運動，反覆演習、左旋右轉、前身後屈的種種方法。并寬去腰部的束縛（懷孕的女子每有將

項的「瑞典式操」重複出現，不解何故，或為筆誤，筆者不擅加更動，還是依原文加以引用。

⁶⁴ 晚清民初的運動會，主要可以分為兩種類型：一是「仿日的體操運動會」，一是「仿美的田徑運動會」。清末癸卯學制主要仿效日本的體操運動會的形式，以團體體操與舞蹈為主；民國以後的壬子學制，則加入田徑與球類競賽，成為美式的運動會型態。參見許義雄、徐元民：《中國近代學校體育（下）——思想之演進》（台北：師大書苑，1999），頁 522-528。

⁶⁵ 亞華：〈女子簡易的體育〉，《女子世界》第十期（1904.？），頁 19-26（頁 875-882）。

⁶⁶ 亞華：〈女子簡易的體育〉，《女子世界》第十期（1904.？），頁 23（頁 879）。

布纏腰，使之易產的，最有礙於發育)，使遂他十分的發達，內部機關漸漸得達到強度，就是改造體格的基點了。⁶⁷

關於胸部的弊病，他認為中國女子的胸部非常狹小，再加上筋骨下垂，壓縮到肺與心臟的活動範圍，故最好要常做一些擴胸的運動：

矯正的方法，先要注意肩部筋骨的運動，更檢擇旋轉上肢，反身呼吸等要法，在體操遊戲上演習起來，養成筋骨扛舉，胸腔擴張，筋肉肥滿的程度，胸部自然漸漸展舒了。⁶⁸

而脊椎部分的矯正，乃因女子坐姿不良彎腰駝背，再加上鎮日做針指功夫，使得脊椎不正，導正的方法為：

須逐漸講究正直身體的柔術，一切几椅要配身材的。做工要有一定時限的休息的時候，又要時時運動筋骨，坐定要正，立定要直。女子姿勢既正，真是天然的美麗不可及哩！⁶⁹

而關於頭部，即指顏面。亞華認為中國女子大多面黃削瘦，充滿病容，又似睡非睡，看起來毫無生氣，一見可知為體魄衰弱的人種。除此之外，還塗脂抹粉以獻媚，一派奴隸的面貌，故應改去此種惡習慣。而在衣服鞋履部份，則應穿著適宜運動的寬鬆衣服，勿穿尖頭鞋，應著圓頭鞋，如此「行走自然便利」、「舉動更加輕便些」。⁷⁰而這種簡易的體育，其功效自不能一蹴可及，「但使天天做去，不要一天間斷，事事當心，不要一事大意，久之又久，身體自然會強健起來，精神也就活潑，智識也就開通，嬌惰疏懶的性情也可以十去八九」⁷¹，如此女子的身體久可強壯起來，達到強國強種的目的。

⁶⁷ 亞華：〈女子簡易的體育〉，《女子世界》第十期（1904.？），頁 23-24（頁 879-880）。

⁶⁸ 亞華：〈女子簡易的體育〉，《女子世界》第十期（1904.？），頁 24（頁 880）。

⁶⁹ 亞華：〈女子簡易的體育〉，《女子世界》第十期（1904.？），頁 24-25（頁 880-881）。

⁷⁰ 亞華：〈女子簡易的體育〉，《女子世界》第十期（1904.？），頁 25-26（頁 881-882）。

⁷¹ 亞華：〈女子簡易的體育〉，《女子世界》第十期（1904.？），頁 26（頁 882）。

伴隨著對體育的重視，對女子體態的審美觀也在轉變中，由晚清對於女子運動的提倡，在在表達一種意念：擺脫柔弱之美。中國女子古以柔弱為美，但至此時期開始產生轉變，逐漸以一種健美的體態，來取代林黛玉似的病西施的形象：

盈盈弱質，經風欲吹，此吾國美人之攝影也。而吾以為莫大之醜相，扶婢而行跬步遲緩，苟非奄奄床褥多愁多病，胡常如此之柔輓而疲弱乎？蘇格蘭女學校女學生，身體強健，精神活潑，為英國冠，曰：體操之效果。血液清淨，肌膚潔白，西歐人壽歲率日增，曰：是衛生之明驗。夫人誰不欲其身體之發達與健康者，女子而猶是人情也，則請速去戕賊摧殘之端，而從事體育運動，庶拂袖生風、蹇裳逐馬以出現於二十世紀之新中國，吾知至心誠服拍掌歡迎，東西洋碩彥不再蔑視吾黃色人種矣。⁷²

西方女性的健美形象，成為中國女性的學習典範，游鑑明認為所謂的健康美是指「體格健康、肌肉發達、身材適度、輪廓均勻和舉動活潑」。⁷³從此時開始以柔弱為主的女性審美主義，逐漸走入歷史，取而代之的是以健康、朝氣的健美女性審美觀點。⁷⁴

（二）開女智：新智識的學習

晚清對於「無才是德」的批評，主要是在興女學過程中，常遭逢「才德相妨」的質疑，興學者便對此觀念提出反駁。由於明清以來，盛行女子「才德相妨」⁷⁵

⁷² 自立：〈女魂篇〉，《女子世界》第三期（1904.3），頁12-13（頁186-187）。

⁷³ 游鑑明認為不論是病態美，還是健康美，都仍使女性淪入「美貌神話」的漩渦裡，因為美貌的標準仍然是掌握在男性的手中。見游鑑明：〈近代中國女子體育觀初探〉，《中國婦女史論集五集》，頁284。

⁷⁴ 包天笑在讚揚其妻子時，便言其妻「身體健全，不似人家所說的工愁多病的林黛玉型那樣人物，因為她在家裏也是操作慣了的。雖然她是纏了小腳的人（那時蘇州風氣，凡上、中等人家，如果討了一位大腳的新娘子，便將引以為恥，而為親朋所嘩笑），可是行走極便利。」見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 上》（台北：龍文出版社，1990），頁239。

⁷⁵ 劉詠聰認為，自唐宋以後，中國社會就把女性的才思與淫行聯繫在一起，女子若擁有文學書寫的能力，便被認為是一種不守婦道的行為，故產生「才德相妨」的觀念。參見劉詠聰：《女性與歷史：中國傳統觀念新探》（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頁94-95。

與「無才是德」的說法，故晚清知識分子在推廣智育與德育的同時，必須要先解決傳統女才與女德的聯繫。才德相妨與無才是德，在概念上基本是一樣的，同樣認為女子有才即容易無德，對於「無才是德」的討論，雖然在清朝初期就有學者撰文討論，⁷⁶但至晚清眾多的知識份子開始投入討論，希望藉由觀念的轉變，讓中國社會逐漸接受婦女進學堂受教育，以促使新知識的傳佈。例如湖南淑慎女學開校演說中，胡國祥便對「無才是德」的說法加以批判：

現在中國之所以弱，在乎學業不振，外國之所以強，在乎教育普及，由茲以談，國之強盛，惟在興學而已。中國女學之廢已久，國中號稱四百兆人，無女學則祇有二百兆人矣。何也？女子不講文字，謹守繡閨，足不出戶庭，目不識之無，何能知天下的事。古人云：女子無才便是德。此語更謬，豈知學不廣，則才德俱不足言。是故欲致強盛，必興女學，教育人才，能達萬化，斯是強國之基也。⁷⁷

胡國祥認為女子無才方容易無德，無知識便不知天下事，容易被人矇騙，而做出敗德的事情。此種「無才易無德」，將無才與無德相繫在一起的言說策略，是晚清知識分子慣常採用的論述方式。

蔣維喬在講述女學不興之害時，以古往今來許多女禍的例子，來說明其為禍甚烈，就是因為古時女子不曾受教育的緣故：

往古陋儒鑑於哲婦傾城之禍，不探其本源，輒倡為警說，一則曰為酒食是議，再則曰無才便是德。是猶獨夫民賊，為其民犯上作亂，日以愚民為事也。民智終不可遏，改革之慘禍隨之。今中國女子皆無學，宜乎傾城之禍，可危矣。然而牝后王國之活劇，不絕於我國之歷史。蓋天然之智識，無學問以濟之，則橫決潰溢無所不至，其下者則蠢如鹿豕，慮不出衣服金錢，足不出戶庭，愚陋暗昧僅為男子之附屬物，至為可憫也。……人之天

⁷⁶ 有關清朝前期對於女性才德觀的討論，可參考劉詠聰：〈中國傳統才德觀及清代前期女性才德論〉與〈清代前期關於女性應否有「才」之討論〉二文，收入《德·才·色·權：論中國古代女性》（台北：麥田出版社，1998）一書。

⁷⁷ 〈開校演說〉，《女子世界》第六期（1904.6），頁83（頁557）。

性未必不善，輔之以學，則如春雨潤花，順其天然而培植之，養成一身之道德，而人格於以完。女子既不學，則天性本馴者，日以順從為事，依賴之外，一無所稱；否則乖戾謬誤，婦姑勃谿，擾亂家庭，執吾國人而問之，蓋含忍太息而莫能明言者，殆十家八九也，豈女子之性皆不善哉，逆其性、喪其德，有以致之耳。⁷⁸

蔣維喬認為中國古代頑固的禮教份子，為防止女性干政，採用了愚民的方式，提倡「無才是德」的美德，使女子無法藉由後天的教育自我修正，個性柔弱的，依賴成性，隨人擺佈；個性強悍的，則依隨自我的劣根性，在家興風作浪，好惹是非。女子不論本性善或不善，都需要經過後天的教育，方能成就其完整的人格。古代文人對女子不施教育，對於女性閱讀與接受知識，採取防堵的方式，就擔心女性擁有知識會為禍國家，並將歷史上有權力的女子，都歸為女禍，來訓誡後代的女性。⁷⁹

肯定了教育對女德有所裨益，欲使興女學的正當性漸為時人所認知。那麼女性智識教育的內容為何呢？明清才女的教育，著重文學上的詩歌訓練，不過晚清興辦女學的知識份子認為文才並非實學，應當予以揚棄，女性的知識內容要有所更新：

⁷⁸ 竹莊（蔣維喬）：〈論中國女學不興之害〉，《女子世界》第三期（1904.3），頁2（頁176）。

⁷⁹ 《女子世界》十六、十七期中，有一「病雲」之〈女禍傳〉。文章開始，重申女學與女德的關連性，並認為男子自亡其國，與女子有何關係。其云：「四千年來，女學不昌，女子不讀書，不知大義，得志用事，愆尤隨之，亦自然之理，於此而詬病之曰禍，此我女子所不任受者也。……獨夫錦衣玉食，又日沉酣於醇酒、婦人，如是之家國更有何者？乃以覆亡之首禍，獨被諸弱婦人之身，此壯夫之所不為，亦史家之所深恥者矣。吾是以排斥昔日之是非，而尤惡言豎儒之所謂女禍者也。」（頁40）。他既厭惡陋儒的女禍之言，卻又為何要寫此〈女禍傳〉呢？他自我訴說，古中國沒有國，只有家；只有一姓之朝代，而沒有現代國家的概念，故女子就算有為禍的本事，其影響不過一家之朝代而已。他蒐羅古今中外，認為西方的夏娃，因一人的錯誤，而導致人類被趕出樂園，影響至大，可算是西方女禍的代表；在中國，以明末的陳圓圓為代表，她「生當國家多事之秋，前不能激勸夫子，光復中原。洎陷於闖，復不能如方芷之一死，以堅其志。卒使雄關不守，鐵騎縱橫，而四千年餘年之古國，遂永淪矣。」（頁45）因陳圓圓一人的行為，使中國面臨亡種的危機。筆者以為病雲對女禍的討論，主要是站在其影響力之大小來決定，陳圓圓之所以擔負女禍的罪名，乃因其使漢人被異族統治，讓中國面臨亡種的危機。就此種角度來看，他還是承認女禍的存在，而怪罪陳圓圓，其實他自己也陷入古代陋儒的「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框架中。病雲應原擬續作此文，但後來隨著《女子世界》的停刊，無法見到其完整的陳圓圓傳記，故筆者僅能從所見的言論中，引論他對女禍的評價。而這「病雲」其實就是「周作人」，周作人在他的《知堂回憶錄》中曾記錄，以「萍雲」的筆名，寫了一篇取材自《聖經》夏娃故事的〈女禍傳〉，寄至《女子世界》出版，見周作人：《知堂回憶錄》，頁167。但我們現在所見的《女子世界》〈女禍傳〉的作者標為「病雲」，不知是周作人的回憶有誤，亦或是《女子世界》的排版錯誤，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女禍傳〉的實際作者確為周作人無疑。

諺亦有之，「女子無才，便是德」。夫無才，則何德之有？然而習為是言者，則可謂才者之非其才也。日誦文史而未知其義，又其甚者，習為風雲月露之詞，則侈然自詫為奇才矣。夫徒習為文辭，則其去實用亦遠矣。今之所謂女學者，則不然。教之以家政，授之以科學，凡厥所習，皆尋常日用之所必須。而又陶淑其德性，啟發其智能，俾獲自立於社會，上之可以補國家自強之至計，下之可以樹社會公益之遠圖。民無失學，群無棄民，國旗猶有豸也。⁸⁰

這篇〈粹化女學募捐啟〉在推動鼓吹女學的主張下，認為現今婦女應當學習一套新的知識，以實用之學為主，近可理家，遠則強國。如果婦女能夠學習家政、科學這些居家生活所需要的實用知識，則不僅對婦女本身受益，推而及之，對於家庭與國家也是助益頗大。

而晚清的知識份子推動的女學新知識，較晚清之前有何不同？晚清女學堂中智育的內容，主要著重在西方新知識的吸收，如自立所謂的「新智識」：

種種惡因，種種謬解，種種失德，以釀成今日不可思議之中國女子。欲扶其偏而拯其溺，則新智識尚焉。研究自然之科學，一切空氣光熱之原理明，而神仙鬼怪之說除矣。講求應用之物理，一切質點功用之原理明，而蛇王鼠祖之誕怯矣。推闡人身之生理，一切胚珠腦筋之原理明，而投胎轉世之妄見矣。灌輸天演之公例，一切物競天擇之原理明，而星相運氣之謬關矣。讀史，而知民族之盛衰，與進化程度有比例；讀地理，而知山海之帶礪，與世界大勢有關係；學政治經濟，而知法律財政之足肇造國家；學繪畫唱歌，而知丹青音樂之足怡人情性，以緻密美妙之心，而鼓以堅忍強毅之氣。夕陽衰草，有揮其戈以駐羲馭，茁其芽以為陽春者，其惟二萬萬有新智識教育之女同胞乎。⁸¹

⁸⁰ 〈粹化女學募捐啟〉，《續辦女子世界》（1907.？），頁 87（頁 1699）。

⁸¹ 自立：〈女魂篇〉，《女子世界》第三期（1904.3），頁 11-12（頁 185-186）。

自立認為女性的新知識，應當包含自然科學、應用物理、衛生、歷史、地理、政治經濟與繪畫唱歌。相較於明清才女的文學訓練，⁸²晚清女性不僅開始正式上學堂，也開始接受新的知識體系，以多樣化學科建構的學校教育。

《女子世界》對於當時女學堂的情況十分關注，收錄了不少女學堂的章程，有明華女學章程、公立杭州女學校章程、宗孟女學堂章程、廣東女學堂章程、愛國女學校章程、女子手工傳習所章程、香山女學校試辦章程、培萼初級女學校簡章、石門公立文明女塾簡章、勸導不纏足會附設第一幼女學堂章程、自立手工傳習所改良章程、實踐女學校附設清國女子師範工藝速成科規則、鎮江承志學堂附屬女學校章程、天津淑範女學堂章程等。除此之外，在「記事欄」中還時時報導各省女學界的消息，以供讀者知曉。而丁初我與其志同道合的朋友徐念慈、屈荊才等人，還創辦了常熟競化女學堂。《女子世界》中的許多投稿者，有的為女學堂的教員，如呂逸初為文明女塾教員、萬昭平為宗孟女學教員；有的為女學堂的學生，如張肩任為廣東女學堂學生、何亞希為務本女學學生。《女子世界》與當時女學的關係是相當密切的，《女子世界》雖非如維新時期的《女學報》為單一學堂之機關報，其零零總總的收錄了當時南北女學校的章程，藉由這些對女學的章程與相關報導，我們或可看到《女子世界》作者／編者群體，對於女學新智識的具體實踐與實質的內涵。

晚清女學基本上，可分為兩種類別：一是普及知識為導向的普通女學校，一是以技術訓練為主的女工傳習所。丁初我等人創辦的競化女學校，「以開通女子知識，普及女子教育為目的」，所教授的內容，則羅列了國文、修身、歷史、地理、理科、算學、家事、手工、圖畫等科。⁸³按照入學女子的程度不同，又分為初等與高等兩級，「初等級以未曾讀書，及讀而未明文義者入之，歲升一班，四年畢業。高等級以讀書有年，程度較高者入之，歲升一班，三年畢業」。⁸⁴伴隨著辦學宗旨的不同，各女學堂的授課內容也有差異，以「振興女學，俾各具普通知識，為持家之根本」為宗旨的石門公立文明女塾，依女子持家所需的知識，將

⁸² 明清才女的知識體系，主要偏重文學的訓練，其中又以詩詞的閱讀與寫作為主。明代沈宜修在葉家姐妹四五歲時，便口授《毛詩》、《楚辭》、《長恨歌》、《琵琶行》等作品，葉氏姐妹聰慧過人，不過四五遍即可成誦，見葉紹袁：〈亡室沈安人傳〉，收入《午夢堂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頁 227。

⁸³ 〈競化女學校章程〉，《女子世界》第九期（1904.9），頁 62（頁 830）。

⁸⁴ 〈競化女學校章程〉，《女子世界》第九期（1904.9），頁 62（頁 830）。

其科目的內容簡化為六類：

教授科目簡說

一修身 齊家有道，先修齊身。學貴知要，首在端本。正躬植品，是名修身，謹列第一。

二識字 姓名事物，無不有字。字能熟識，用處極多。男兒固然，女子一般，當列第二。

三文理 字義既明，可講文理。能通文理，便能讀書。受益更多，無待縷述，列為第三。

四算學 管理家務，女子之職。米鹽瑣屑，非算不可。先及淺顯，務合實用，可列第四。

五手工 裁衣製履，女工宜習。烹茶煮飯，婦事尤要，煮而習之，成人不難，因列第五。

六衛生 身體強弱，關係最大。預知保衛，疾病不生。一家健康，是曰幸福，即居第六。⁸⁵

文明女塾的辦學宗旨「以振興女學，俾各具普通知識，為持家之根本」，⁸⁶故其章程顯示出男女有別的教育目的，課程的內容依照著女性生活所需來安排。擁有基本的識字能力，使女性能夠閱讀書籍，達到啟蒙的目的；基本的計算能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家中的家計必須規劃；手工與衛生，則是婦女家居生活所必備的知識。

傳統中國婦女的讀物，以《女四書》、《女孝經》等女德方面為主，至晚清則婦女知識的內容得以擴充，除了與修身有關的書籍以外，歷史、地理、算學、格致、音樂與圖畫等知識，亦進入婦女的知識體系當中，而這些科目有些與齊家的需求相關，有些則是單純智識方面的吸收。中國婦女進入學堂，最基礎的教育要從識字開始，並配合其他學科的學習。歷史科目主要講述的是，古往今來的英雄人物事蹟，但偏向於賢婦賢母等列女傳的故事，在〈中國教育會附設第一幼女學

⁸⁵ 〈石門公立文明女塾簡章〉，《女子世界》第八期（1904.8），頁76（頁754）。

⁸⁶ 〈石門公立文明女塾簡章〉，《女子世界》第八期（1904.8），頁75（頁753）。

堂章程〉中即言，歷史科「以劉氏列女傳講解之」。⁸⁷地理科的範圍，包含地科知識、五大洲地勢、氣候、人種、物產與交通等等。算學則授以加減乘除知識，與珠算使用的方法，讓女子在日常生活的計算上，能更加便利。格致原為西方 science 的譯名，⁸⁸其內容也相當廣泛，包含礦植物的名稱、特性，物理與化學的原理，以及簡單機械構造、生理衛生的要點，都是屬於格致的內容。⁸⁹

音樂與圖畫等科的加入，除了肯定藝術陶冶性情的重要之外，亦標誌著音樂與美術正式納入正規的女子教育當中。由現存的資料，可以得知明清閨媛才女中，亦有以書法與繪畫見長的，清代女詞人黃媛介便擅長書畫，並嘗以詩畫自給維持生活。⁹⁰在《玉臺書史》與《玉臺畫史》中，羅列了中國歷史上善於書畫的女子，除了閨媛才女之外，有些侍妾與名妓也都具有書畫的能力，名妓馬湘蘭即因其善畫蘭花，故以湘蘭名之。⁹¹至於音樂訓練方面，亦可分為兩個階層來討論。閨媛才女的音樂訓練，主要是為增加其「文人化的傾向」，讓才女的生活更添雅趣。⁹²晚清以前，音樂與繪畫等藝術訓練，並不在婦女閨訓教育之中，⁹³在閨媛

⁸⁷ 〈中國教育會附設第一幼女學堂章程〉，見李又寧、張玉法主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 1842-1911》，頁 1044。

⁸⁸ 「格致」原屬儒家的辭彙，宋代朱熹藉格物致知以建構其知識系統，元末朱震亨《格致餘論》則主張儒生應將醫學納入格致的範圍之內。明代胡文煥《格致叢書》將經典、歷史、制度、技術等，都納入格致的範疇。晚清時期面臨學習西方技術的壓力，徐壽與傅蘭雅於 1875 年出版的《格致匯編》，其英文刊名為“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將西方的 Science 對應於中國的「格致」一詞。參見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著；蔣勁松譯：〈從前現代的格致學到現代的科學〉，收入劉東主編：《中國學術》第二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頁 1-43；吳鳳鳴：〈從「格致」到「科學」——淺識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性〉（《中國科技術語》2008.3 期），頁 75。後來「科學」取代「格致」成為 Science 的中文譯名，乃是受到日本翻譯的影響，日文中將 Science 翻成「科學」，甲午戰後，留日的中國學生便將「科學」一辭引進中國，而廣泛加以使用。至 1902 年起便出現一股放棄「格致」，改用「科學」的風潮，梁啟超與嚴復都開始使用「科學」一詞。參見金觀濤、劉青峰：〈從「格物致知」到「科學」、「生產力」——知識體系和文化關係的思想史研究〉，收入《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頁 339-341。

⁸⁹ 〈學部奏詳議女子師範學堂及女子小學堂章程摺〉，見李又寧、張玉法主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 1842-1911》，頁 985。

⁹⁰ 湯漱玉：《玉臺畫史》，收入徐娟主編：《中國歷代書畫藝術論著叢編》第二冊（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頁 179-180。

⁹¹ 湯漱玉：《玉臺畫史》，頁 215。

⁹² 孫康宜在討論明清才女文化時發現：「有趣的是，正當男性文人廣泛地發展女性化趣味之時，明清女詩人紛紛表現出一種『文人化』的傾向，那就是一種生活藝術化的表現及對俗世的超越：例如吟詩填詞、琴棋書畫、談禪說道、品茶養花、遊山玩水等生活情趣的培養。與男性文人相同，這些女詩人強調寫作的自發性（重自然、忌雕琢），寫作的消閒性（非功利的選擇，怡情悅性），及寫作的分享性（與二三同好酬唱）。這種寫作的價值觀原是十足男性化的，現在把它與女性連接在一起，等於創造了一種風格上的『男女雙性』（Androgyny）。」參見孫康宜：《古典與現代的女性闡釋》（台北：聯合文學，1998），頁 74。

⁹³ 有些時候，音樂與女性的婦德，甚至是有衝突的。在徐珂《清稗類鈔·音樂類》中有一〈徐映玉既嫁不操琴〉條，言：「徐映玉，字若冰。崑山人，嬪於孔。因居木瀆，幼警慧，柔嫵靜莊，

才女的部份，書畫音樂的才藝，除增添才女之生活雅趣之外，士紳家族對才女的藝術薰陶，亦有增加女子婚嫁資本的作用。⁹⁴女性優伶的技藝訓練，則因為較嚴酷的經濟需求，不得不依附男性文人的品味，以學習樂器彈唱的技巧，來謀求一身之衣食。

相較明清女性的藝術訓練，晚清女子學堂中的音樂與圖畫兩科，在目的與性質上有明顯的不同。學習藝術不再是為了仿效男性文人的品味，來增添生活雅趣，或者取悅男性，而為了婦女自身的性情陶冶與道德心的養成。《女子世界》第八期中收錄了蔣維喬在常州音樂會之演講稿，其中講述了學校音樂教育之重要：

近今東西各國於音樂一事，視之甚重。音樂名家，推遵一時。凡養成社會個人種種之道德心，類皆源本於音樂詩歌以鼓舞之，故欲觀其國之風俗人心，迹其流傳之樂歌，亦可得其大較矣。至於學堂中有唱歌一科，蒙小學用單音唱歌，小學以上用複音唱歌，其樂器適於共同唱歌者有三種，而最普通者為風琴，琴上所按之音，與我國古今之音，名異而實則同也。

遠徵之古樂歌之重既如彼，近徵之東西各國樂歌之重又如此。凡所謂愛國心、愛羣心、尚武之精神，無不以樂歌陶冶之，則欲改良今日中國人心風俗，舍樂歌末由。學校為風俗人心起原之地，則改良之著手，舍學堂速設唱歌科末由。⁹⁵

蔣維喬認為音樂具有潛移默化的教化作用，對於養成國族的向心力，有其正面的作用，故認為音樂教育應當被納入正規的學堂教育中，將正確的知識與良好的道

喜讀書吟詩。善針黹，佩服櫛珥，必修潔。初生時，母夢梅花一枝墮於庭，及長而愛梅花。花開，輒行吟其下，每風雨至，顧而泣，若甚有傷於心者，家人竊怪之。父善奕，女士旁觀，覆不失一。學琴，得虞山指法。既嫁，曰：『此非婦人事也。』遂輟不為。」見徐珂：《清稗類鈔·音樂類》（上海：商務印書館，1917），頁62。

⁹⁴ 曼素恩認為：「對女兒的教育在盛清一世變得越來越重要。在婚姻市場上，博學標誌著一個女子成為眾人爭相延聘的對象，成為一個不僅能生育子嗣還能夠為兒子們提供最優越的早期教育的未來母親。再進一步說，她在親朋戚友和整個社會的眼中還是她的“家學”傳統的繼承者。女兒的滿腹詩書是她家書香門第深厚淵源的縮影，因而也是她值得聘娶的一個關鍵標誌。」見曼素恩（Susan Mann）著；定宜莊、顏宜葳譯：《綴珍錄：十八世紀及其前後的中國婦女》（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頁75。

⁹⁵ 〈論音樂之關係（常州音樂會演說稿）〉，《女子世界》第八期（1904.8），頁4（頁682）。

德內容，編寫成為學校唱歌的歌曲，藉著傳唱歌曲，來讓這些訊息得以傳佈。

除了普通女學堂的學科之外，女性教育還有職業技能養成的部份，也是女學堂智能教育中重要的一環。當時婦女受教育之後的出路，以在女學堂中擔任女教師為最好的選擇，其次則是以手工製品等為業，或者回歸家庭中做一現代的母親。而在技能體系的教育，則以婦女擅長的女工為主，除了烹茶煮飯之外，最主要是培養婦女的一技之長，讓其能有謀生的能力，在社會中取得經濟的自主權。蔡湘就主張中國宜廣設女子手工傳習所，一方面乃因普通女學堂的教學，常使有家庭的婦女無時間就學，或者就算入學了，常因種種家庭因素乃至能畢業的不多，故蔡湘認為就現階段應當廣設短期速成的手工傳習所，讓廣大的中國婦女能在極短的時間，養成一技之長：

若於城鄉普設女工傳習所，遴有用易能之藝，專門授課，即以本地女界中之擅一長者為之師，修脯不徵之學生，亦無膏火，半日赴學，半日理家，斯研習者順勢可行，發行者事輕易舉，種如是因，不出十年，必能普及。夫手工女學校也、傳習所也，凡此皆造成女界唯一普通之技能，而非高尚之技能也。惟其技普通，故其用能普及；亦惟能普及，故能使我全國女界各能自謀生活。今之生利者，即向之分利者，一出一入，不啻驟添二萬萬營業者流，庶矣！富哉！我國民是時之愉快當奚若也。⁹⁶

蔡湘認為婦女在擁有謀生能力之後，除了從分利者變為生利者對國家有利之外，也能使女性自身在生活上比較有保障。

晚清開始成立女子的手工傳習所，例如張竹君於上海成立女子手工傳習所，⁹⁷其宗旨為「為同胞女子謀自立之基礎」，課程分為三級：手工編織、機械縫衣

⁹⁶ 蔡湘：〈論中國今日亟宜普設手工女學校及傳習所〉，《續辦女子世界》（1907.？），頁 8-9（頁 1620-1621）。

⁹⁷ 《女子世界》第六期的〈記事〉欄，曾紀錄了張竹君對於女子教育的貢獻，「廣東張竹君女士，十餘齡即精醫學，兼通外國文字，素持博愛主義，以汎愛同胞為宗旨。在粵創設南福醫院、女學堂、女子保險會、實業學堂等，所費不下十數萬。比聞極東戰事起，欲投身日本紅十字會，隨同任理看護。於三月初旬抵上海，愛國女學校開會歡迎之，女士演說女子教育之急務，滔滔數千言，由校長致答辭，並慰問女士駐滬數月，任愛國女校之舍監，女士欣然諾之。現并設手工傳習所、衛生所講習會於上海，每日分上下午教授，並於午後在講習會所贈醫，如女士之博愛利物，非特女界之仁人，抑亦中國之偉傑。」最後記者還讚美張竹君的貢獻，「女子提倡實業，熱心普渡，吾國女界大善人大救主之事業，世人可以風矣」。見〈女界明星〉，《女子世界》第六期（1904.6），

與機械扣法。為求速成，其修業的時間三個月，每天上午十點到十一點半為傳習時間。⁹⁸另外，還有俞樹萱成立自立女工傳習所，⁹⁹「以扶助女子自立為宗旨」，於 1904 年 9 月 16 日開學，設計十二禮拜的課程，教授手套、絨襪、衛生衣、絨帽、雲肩與中西式衣褲的製作方法。¹⁰⁰半年後在第一屆學生畢業後，余樹萱以「滬上傳習女工已有數處，桑梓之鄉，尚付缺如，因決計傳布內地」，故將傳習所由上海移往紹興山陰縣所屬的臨浦鎮。有感於第一屆修業年限過短，故將修業的時間延長至一年，並增設國文、算學、手工、機器與烹飪等科。¹⁰¹這些手工傳習所所教授的技能，大多還是以傳統中國婦女所擅長的女工為主，例如織布、縫紉與刺繡等等，讓女子用女工的手藝，也能賺取薪資收入。¹⁰²傳統女紅的訓練，主要展現女性的德性，一手美麗的女紅，代表著良好的教養與女德。不過，晚清女工傳習所的設立，正式將女紅轉化為謀生的技能，由家庭內的女德解放出來，刺繡、縫紉等技藝，成為一種社會上的職業，與男性的工匠相似，讓中國婦女藉著一技之長來自謀衣食，邁入經濟獨立自主的生活。

除了講求速成的女子手工傳習所外，另有更專業的女子實業學堂的設立，例如分科細緻且專業的女子蠶業學校。由《續辦女子世界》所收錄的女子蠶業學校章程中，得知其辦校的宗旨為「注重栽桑、養蠶、製種、繅絲等，實驗並改良舊法，兼授普通及專門學理，以擴充女子職業，挽回我國利權為宗旨」。¹⁰³分為預科、本科與選科，預科修業需兩年，期滿升上本科，再讀三年，選科則需讀半年，修業期滿後通過試驗者，方才授予畢業證書。在學習的科目上，蠶業學校本科所

頁 80-81 (頁 554-555)。

⁹⁸ 關於手工傳習所的章程，參見李又寧、張玉法主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 1842-1911》(台北：龍文出版社，1995)，頁 1289-1290。

⁹⁹ 俞樹萱曾經在張竹君創辦的女工傳習所中學習，後張竹君離開愛國女學校，創辦育賢女工分院時，俞樹萱因其學業未成故隨之。後來，卒業以後，她自己便在上海創辦了自立女工傳習所。見俞樹萱：〈女子自立集序〉，《女子世界》第十一期(1905.2)，頁 77 (1019)。

¹⁰⁰ 〈自立女工傳習所章程〉，參見李又寧、張玉法主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 1842-1911》，頁 1292。

¹⁰¹ 〈自立女工傳習所改良章程〉，見李又寧、張玉法主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 1842-1911》，頁 1293-1294。

¹⁰² Paul Bailey 認為「1900 年代早期評論家，在堅持女性有「謀生」義務時，他們所想的，是在家計生產 (household production) 脈絡下，復興手工業或其他職業技藝。……女工廠的目標，在訓練家境較不富有的年輕女性紡織棉巾、刺繡、做紙花和編籃子，同時指導她們道德和家政，以此恢復傳統的理想。這個理想可概括為「男織女耕」——女性用手工藝也能創造家庭收入。」見 Paul Bailey 著；古偉瀛、蔡嵐婷譯：〈「女子行為不檢」：二十世紀初中國的犯罪、踰矩與性別〉(《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25 期，2008.6)，頁 180。

¹⁰³ 〈女子蠶業學校章程〉，《續辦女子世界》(1907.?)，頁 79 (頁 1691)。

羅列的科目相當專業，有蠶體解剖、蠶體生理、蠶病理、栽桑法、養蠶法、繅絲法、土壤學與肥料學等。這些科目的內涵，可以看出女子實業已逐漸擺脫以技術為主的教學，開始了專業學理的探討，婦女不再只是被看待成養蠶的女工，而是被期許為擁有蠶業相關的專業人士。

在女學堂的推波助瀾之下，婦女的知識層面得以逐漸擴張，從與家庭有關的知識出發，到純粹學理的考掘，讓婦女一步步朝專業人士的道路前進。《女子世界》處在此一知識轉型的過渡階段，其期刊欄目的安排，與女學科目的內容密切相關。除了在「論說」與「講壇」欄，鼓吹振興女學、啟發女智的重要之外，其「科學」、「衛生」欄，則在講述西方新的科學知識與觀念，並藉由翻譯文章來傳遞新知，例如日本女子大學講師高田濱子的〈演熱〉，與自立翻譯的〈演電〉，以及長生翻譯的一系列關於身體衛生的文章。其「實業」欄，以剪裁衣服、料理烹飪等，日常家居的婦女知識為主，刊登了〈料理新法〉與醉茗閣稿本的〈裁書〉；為推動婦女的音樂教育，《女子世界》在文苑欄下，特別開闢「學校唱歌」來刊登新編的歌曲，原本之刊登歌詞，後來為方便讀者傳唱歌曲，並加上簡譜。¹⁰⁴在《女子世界》刊行的時間，其期刊的內容與婦女知識啟蒙的內涵是相互配合的，丁初我等人意欲藉此期刊，以達到啟發女智的目的。

（三）新女德：公德的推行

傳統中國婦女的教育內容，由其所閱讀的《女四書》、《女孝經》與《列女傳》等書，則知其著重在婦女道德內容的規訓，教育的目地即在養成婦女的道德。金松岑在《女界鐘》就曾對傳統中國婦女的道德教育進行分類，一共有三種：一是對自身而言，即世俗所謂女訓；一是對男子的道德，即所謂的相夫；一是對家庭的道德，即閭範是也。晚清女學堂的「修身」一科，即為婦女道德教育的內容。由現存的資料來看，「修身」科的讀本，傳統女教的書籍仍是教授的內容，例如中國女學堂的華文課程中，即以《女孝經》、《女四書》、《內則衍義》等為教本。

¹⁰⁴ 在《女子世界》第一、二期之「學校唱歌」，只將〈醒世歌〉、〈放假時之歌〉、〈樂群歌〉與〈女學生入學歌〉、〈勉學〉等歌詞刊登。至第十期，則在歌詞上附加簡譜，以方便讀者加以傳唱。

¹⁰⁵以《女子世界》所收錄的女學堂章程為例，對於婦女行為方面的規訓也都趨向保守，特別是在女性的裝束方面，許多章程都明令「學生不得著艷麗衣服及塗抹脂粉」，¹⁰⁶期望女學生的服裝儀容以「樸實潔淨為主」。¹⁰⁷

《女子世界》主要沿襲金松岑《女界鐘》中的主張，基本上還是認同婦女對於家庭與丈夫的道德，只是認為中國婦女「常注意於個人之私德，而於公德則直可謂之未嘗聞也」，¹⁰⁸批評傳統婦女僅關注一身一家之利益，而忽略國家全體之利益，故主張在女子德育教育方面，應當要進行將私德轉為公德的工作，讓婦女的德育的內容加以擴充。觀察晚清的女子修身教科書，除了傳統女教的內容之外，教科書也不斷對婦女進行公德教育的訓練，認為作為一個新女性，必須要將自身利益與國家關懷連結在一起，婦女必須領略公德重要，在舊倫理的基礎上發揚新道德。¹⁰⁹

《女子世界》在發刊之初，對於傳統女訓的立場，基本上是採取折衷態度。丁初我等人雖將女子地位的低落，歸咎於中國傳統對於女性的壓迫，他們注重討論傳統家庭道德對婦女權利壓抑，並沒有全盤否定婦女對家庭應負的道德與責任。¹¹⁰在丁初我所講述的女魔中，其中的關鍵也是認為中國婦女過於專注小我的生活，而缺乏對國家民族與社會的關照。丁初我基本上亦跟隨《女界鐘》對婦女道德的主張，認為對女性道德的內涵必須加以延伸與擴大。《女子世界》依循《女

¹⁰⁵ 〈上海創設中國女學堂記〉，見李又寧、張玉法主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 1842-1911》，頁 1006。

¹⁰⁶ 〈公立杭州女學校章程〉，見《女子世界》第三期（1904.3），頁 70（頁 244）。

¹⁰⁷ 〈宗孟女學堂章程〉，見《女子世界》第四期，頁 58。其他如〈愛國女學校章程〉第十七條規約「（甲）不得纏足（已纏足者，入學後須漸放解）（乙）不得塗抹脂粉（丙）不得著靡麗之衣服及首飾」（見《女子世界》第六期，頁 71）；〈香山女學學約〉中亦以「脂粉妝奩為女子之陋習」（見《女子世界》第七期，頁 73）；〈鎮江承志學堂附屬女學校章程〉亦有「凡來學者，均不得艷妝華服」的注意事項（見《女子世界》第十六、十七期，頁 104）；〈天津淑範女學堂章程〉亦規定「女生無論貧富，一律恪守學規。衣服以潔淨樸實為宜，嚴戒妝飾浮華，免茲流弊。」（見《女子世界》第十六、十七期，頁 105）。在大部分的女學章程中，都有關於女子服飾的規定，禁濃妝華飾已成為一種普遍的共識。

¹⁰⁸ 金天翮（金松岑）：《女界鐘》，頁 6-11。

¹⁰⁹ Joan Judge 著；孫慧敏譯：〈改造國家——晚清的教科書與國民讀本〉（《新史學》12 卷 2 期，2001.6），頁 22。

¹¹⁰ 以丁初我為例，他雖然提出「女子家庭革命說」，一一陳述女子在家庭中所受的壓迫，並提倡女子爭取婚姻自由，與在家庭中的權利，其言女子權力若能光復，則「有學問而後有知識，有交際而後有社會，有營業而後有生利，有出入自由而後去種種之束縛，得種種之運動，終之以婚姻自由。」他的前提，還是主張女子在家庭中擔任妻子與母親的角色，而不鼓勵女子全然擺脫家庭出走，去追尋自我。參見丁初我：〈女子家庭革命說〉，《女子世界》第四期（1904.4），頁 6-7（頁 280-281）。

界鐘》對於女性德育的討論，自立主張推動「新道德」：

固非振興女學，發明新道德，不能破鐵鎖而啟重門也。德育云云者，將以養成高尚純潔，改造風氣，儀型國民，熱心公德之女子，不使之一再墮落，賣戀賣笑以不名譽之詞，概我女界也。¹¹¹

所謂的「新道德」，即指「公德」。女性德育主要的目的地，在將婦女的道德由閨房與家庭，逐漸移轉到對國家民族公德，將個人的小愛，轉變為對國家民族的大愛，並期望婦女成為未來國民的典範，擺脫玩物的性質，成為道德高尚純潔的女性。

「公德」一詞，梁啟超在 1902 年的〈新民叢報章程〉中就已提及，後在〈新民說〉「論公德」一節中，將公德加以定義：

我國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為群，國家之所以為國，賴此德已成立者也。人也者，善群之動物也。……必有一物焉，貫注而聯絡之，然後群之實乃舉，若此者謂之「公德」。道德之本體，一而已。但其發表於外，則公私之名立焉。人人獨善其身者，謂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謂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¹¹²

梁啟超的公德觀念，基本上即指「人的行為中能對公共利益、社群凝聚有所貢獻者」，¹¹³與公德相對應的為「利群」的概念。「群」即同為西方 *society*，戊戌以後中國知識分子開始推廣群學的概念，藉以推進民眾對於國家觀念的理解。¹¹⁴公德即包含著利群的內涵，鼓勵民眾應以國家社會群體的利益為考量，而不應以一己一家之私利危害全體之利益，丁初我等人在《女子世界》中的公德論述即是如此。

¹¹¹ 自立：〈女魂篇〉，《女子世界》第三期（1904.3），頁 11（頁 185）。

¹¹² 梁啟超：〈新民說·論公德〉，《飲冰室全集》，頁 11。

¹¹³ 陳弱水：〈公德觀念的初步探討——歷史源流與理論建構〉（《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9 卷 2 期，1997.6），頁 42。

¹¹⁴ 在戊戌維新時期，知識界大力推動合群運動，使得「群學」成為一個新興的潮流。知識份子捨棄「會」而採用「群」來翻譯 *society*，主要是因為在中國的語境中，「會」常與小團體與組織的概念連結在一起，「群」則能更涵蓋連結個人與各個團體的理念。參見金觀濤、劉青峰：〈從「群」到「社會」、「社會主義」——中國近代公共領域變遷的思想史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5 期，2001.6）頁 15。

對於公德的概念，藉由社會上書籍與期刊的傳播，再輔以學校教育的提倡，影響所及連尚在城東女學校就學的女學生顧志堅，亦能為文討論公德的內涵：

公德者何？對於社會上之德義也。公德之發生，自人民之有公共之樂利始也。野蠻未開化之民族，不知有公共之樂利，一身以外非所知，故野蠻民族之中，斷無公德心之發見。吾中國固非野蠻之民族，然所謂公共之樂利者，又誰知之？嗚呼！吾中國可謂但有個人主義而已。雖然，吾輩今日為學生者，不可不注意公德，既為國民一分子，必使一言一動，於一群有益而無損，庶乎其可耳。¹¹⁵

顧志堅的短文以二元對立的方式，更能看出公德與傳統概念的對立之處，她基本上劃分了兩個世界：文明與野蠻。野蠻的世界以私德為主，僅知一身利益的個人主義；但文明的世界則不然，國民以公共的利益為考量，是自己的行為能合乎公德。中國既不想成為一個野蠻的民族，便應知道世界文明的趨勢，開始進行道德的改良運動——變私德為公德，方能成為文明世界中之一員。

當知識份子認知到女子公德之重要時，應當如何推行，方能收其成效呢？在公德推行上，時造提出自己的看法，認為如果流於公德義理上的長篇大論，不僅不容易為女性所接受，反而會產生流弊，故應當順應中國婦女的現狀「因勢利導」，使婦女認識到公德的推行，不僅於社會有益，對於家庭與自身也是有益處的：

德育上宜重主觀而輕客觀，我國舊習祇知利己持家主義而已，婦人尤甚，然不妨因勢而利導之，若社會共同之道德，語之不詳、受之不切，徒以滋弊而無益，但能勗助以孝慈，俾足表率兒女，導以獨立，破倚賴迷信之鄙見，引其自治之觀念，斯人格漸高，社會之思想漸生矣。¹¹⁶

「因勢利導」是一種婦女公德推行的使用策略，立足於婦女的現狀，捨棄純學理

¹¹⁵ 顧志堅：〈修公德說〉，《女子世界》第十期（1904.？），頁78（頁934）。

¹¹⁶ 時造：〈婦人之教育〉，《女子世界》第十二期（1905.4），頁4（頁1036）。

的疏離感，而就婦女的實際狀況，來宣導女子如行使公德所能獲得的效益，例如對家庭與子女有實際的效用，如此一來，會讓女子覺得公德與自身利益相關，反而會樂於實行。

《女子世界》推動女子公德的實踐，在 1904 年的抗俄運動，以及 1905 年的抵制美貨運動中，最能看出其對女子公德訴求與策略的使用——由婦女的日常生活出發。《女子世界》創刊之初，恰逢拒俄運動時期，期刊中報導不少日俄戰爭的情況，讓讀者知道現今戰況如何。桑兵認為拒俄運動最重要的影響之一，即是造就了中等社會的覺醒。¹¹⁷不僅僅是中等社會的覺醒，女界更在拒俄期間開始集結團體，如鄭素伊等人成立〈對俄女同志會〉，以及胡彬夏等人組成的〈共愛會〉，以實際的行為來表達對國事的關心。在第三期的讀者投書中，便有黃芬慧女士以一篇〈敬告全國女子〉的文章，希望中國的女子勿置身事外，捐出零用金來籌措軍餉：

我國之弱之危，我同胞皆知之矣，我女同胞亦知之矣，既知之，何以不設法以救之。其法如何，何以阻止強俄蠶食我土地為第一。慧知諸姐妹見之，必笑慧為癡為迂，以為俄者虎狼之國，政府尚不能阻，況我等柔弱之女子乎。慧亦深知此事誠非容易，然諸姐妹豈不聞數年前張園演說之薛錦琴姊姊乎，薛姊姊亦吾同胞之一也，彼以俄約一定，瓜分既成，故痛陳利害，以致集資電爭，密約不成，此攻之首，非薛而誰。至於今日，則非電爭所能阻矣。慧之愚見，惟祈我二萬萬同胞姐妹，自今日始，請將各位日費零用，略省一二，日積月深，便成巨數。更勸各位之父兄子弟等，悉一心拒俄，則亦於籌餉練兵，非小補也。夫列強之所以瓜分我而尚遲遲者，畏我人民之眾耳，使我二萬萬女同胞，竟不能設一策，則我人民四萬萬已去其半矣。男女平權，豈分彼此，願我同胞姐妹其思之。¹¹⁸

¹¹⁷ 桑兵認為：「1901 至 1905 年的拒俄運動，在近代中國史上有著分水嶺式的重要地位。……在此之前，趨新人士與廣大民眾在近代革新救亡的努力中長期處於分離狀態，不僅各自行動，甚至彼此衝突，最為典型的例證就是戊戌變法與義和團事變。經過拒俄運動，雙方觀念和行動上開始尋求合拍，從而在 1905 年的抵制美貨風潮中合為一體。而其中重要的一環，則是所謂「中等社會」的自覺。這種本能的自我意識經過引進的各種社會學說的加工，成為青年學生和趨新士紳的思想武器，在清末的政治舞台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參見桑兵：〈拒俄運動與中等社會的自覺〉（《近代史研究》2004.4 期），頁 157-158。

¹¹⁸ 黃芬慧：〈敬告全國女子〉，《女子世界》第三期（1904.3），頁 83（頁 257）。

黃芬慧認為自己雖身為女子，亦能為國家盡一份力，表達自己的愛國心，並鼓勵女性讀者應當勉力國事。女子雖不能親上戰場，卻能有錢出錢的將自己的私財貢獻國家，做為戰爭時的軍餉，這是婦女愛國的方式之一。將私財作為公共之用，是推進女子公德「因勢利導」的具體作法，不用玄妙高深的議論言說，而採用演講式的白話口語，由日常生活的實踐做起——捐出零用錢，直接提供具體的做法，並賦予婦女此行為「愛國」與「平權」的美名，讓婦女在捐款之餘，亦認同自己是擁有高貴情操之人。

美國針對在美華工從 1882 年 1905 間，不斷地增加其排華條款。¹¹⁹1905 年 5 月 10 日，上海商業總會為了抗議美國對華的禁工條約，首先發起了抵制美貨的運動。¹²⁰《女子世界》原對時事十分關注，丁初我在批評時事時，也加入了女界對華工禁約應抱持的態度：

能愛人者，莫如吾女子。愛國愛種之舉動，孰如吾國人今日對付華工之禁約。商界風潮，浸及於學界，一二女校且代表贊成之。嗚呼！大好擴張女權之一機會。華工者，吾同胞也。美貨者，吾女子用之且獨多也。吾女子其急謀抵制，其急自謀推廣織物製品，以實行其抵制，蓋吾普通女子之責任，胡獨以為男子事。¹²¹

丁初我認為拒美貨運動，是婦女進入公共事務，擴張女權的好契機，婦女應趁機藉此來證明自己亦是國家的一份子，況且在簡單的購買行為中，就能展現婦女的

¹¹⁹ 1882 年 5 月 6 日美國總統 Chester A. Arthur，簽署了第一份排華法案，十年內禁止華工前往美國工作，但不溯及既往。1888 年美國國會正式通過了「斯科特（Scott）法案」，明令離開美國的華工，不得再返回美國，除非他在美國擁有財產與直系血親。1902 年 Benjamin Harrison 頒布了「吉亞里（Geary）法案」，主張 1882 的禁令再延長十年，此條法案直至 1894 年才獲得清朝與美國雙方的簽署，不僅禁令延長十年，在美的華人還必須註冊。1898 年美國將夏威夷納入版圖，其排華的禁令也隨之在美國本土以外適用，1899 年甚至在菲律賓也使用排華條約。1902 年又頒布新法案，規定居住在新領土的中國華工，禁止進入美國本土。1903 年中國告知美國應當解除禁令時，談判陷入僵局，在美華商恐再次簽訂排華法案，故一場融合民族主義與商業競爭的抵制美貨運動就於 1905 年正式展開。參見王冠華著；劉甜甜譯：《尋求正義：1905-1906 年的抵制美貨運動》（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頁 28-40。

¹²⁰ 王立新：〈試論美國對中國 1905 年抵制美貨運動的反應和政策〉（《世界歷史》1999.4 期），頁 23。

¹²¹ 丁初我：〈女界之對於華工禁約〉，《女子世界》第十三期（1905.？），頁 76（頁 1206）。

愛國心，對婦女而言應當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隨著抵制風潮愈盛，《女子世界》針對華工禁約的抵制，在第十四期後便開始挪出一半的篇幅，做為拒約的機關報。在鼓吹中國婦女對此運動的參與，所採取的策略即在鼓動婦女「拒買美貨，愛用土貨」，亦是從婦女日常生活的實踐入手，藉由慣常的消費習慣，來表達婦女的簡單的買賣行為，亦是關係到國家的大事。陳志群針對美貨的主要消費者——女子，寫了一篇〈爭約警告〉云：

女子也是國民一分子，豈可袖手旁觀他們的力爭，難道自己就一任美國人欺負同胞不成，所以我這回警告，要奉勸列位姊姊妹妹也照他們不買美貨，盡實行抵制的義務，不負國民一分子的责任呢！比方那一件美貨，價祇要五角，土貨要一圓，還不及他的好，我們情願買土貨，不買美貨，這樣辦法，好叫美國在中國的商務，大大阻礙，他們自然肯把華工禁例刪除了。但辦這事，須要合群同心，始終堅持，才有效驗，所望各位姐妹們，自己既然不買美貨，還要勸別人不買，逢人便將美國待華工的苛酷，和不買美貨的緣故，細細講給人聽，想別人也沒有不贊成的。……姐妹們買東西時，最好問明店裡人，是不是美貨，再定主意。還有一句，姐妹們都要知道，我們不買美貨，是暫時的抵制，美國能刪除苛例，優待華工，我們就立刻改變，並不是和他們尋仇哩！¹²²

陳志群文中來特別指導女子如何辨識貨品的產地標籤，美貨共有四種標記方式：United States（合眾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美之合眾國）、U. S. A（「合眾國」之減寫法）、U. S. Of America（「美之合眾國」之減寫法），並附上正在市面上流通的美貨清單，讓女子在購買生活日用品時能有所依循，如怕購買到美貨，陳志群以為詢問店主是最不易出錯的方法。¹²³

將私德轉化為公德，是《女子世界》改良女子道德最重要的目標。他們並沒有全盤否定婦女對於家庭的道德責任，而是將女性視野由家庭擴大至社會國家，鼓勵女性除了家庭責任之外，亦能對國家與社會有所貢獻，愛國的行為並非只屬

¹²² 志群（陳志群）：〈爭約警告〉，《女子世界》第十四期（1905.？），頁 11-16（頁 1263-1268）。

¹²³ 志群（陳志群）：〈爭約警告〉，《女子世界》第十四期（1905.？），頁 12-16（頁 1264-1268）。

於男性，女性亦能藉由捐獻零用錢與拒買洋貨等日常行為，來表達自己的愛國心與對公共事務的參與。

至晚清以後，中國女子訓育的方式，正式產生轉變，由「德言容功」轉向「德智體」的規訓方式。所謂的「德言容功」，班昭將其定義為：

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洗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德，而不可乏者也。¹²⁴

雖言「德言容功」四個項目，其實中國婦女不論在才能、言語、容貌與女工方面，都被要求在道德的框架底下進行。「德言容功」象徵古代婦女閨訓中，女德是最主要的考量，只要與女德相抵觸，則寧可採取保守消極的態度。以閱讀書寫為例，古時道德家恐懼女性一旦擁有閱讀的能力，便能多方吸取知識，而容易不安於室，難以規訓，故寧可選擇愚女策略，讓婦女喪失閱讀書寫的能力，甘心禁錮閨中，以保全其完美的女德。至晚清則女性的規訓方式，開始產生轉變，由「德言容功」的家庭式規訓，變為「德智體」的學校式正規教育。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此種轉變並非一夕之突變，而是一種口號先行的漸變。晚清的女學教育，基本上並沒有全盤推翻女德的內容，在修身的科目中，傳統女德的教本仍被沿用，只是加以擴大，加入的公德的內容，期望女子能保有傳統對家庭的責任外，亦能廣及對國家社會貢獻一己之力。在女性的知識教育方面，教育的場所由零星的家庭式私塾到學校教育，知識的範圍也得以擴大，不再侷限於文學詩歌的「詞章之學」。

¹²⁵體育更是女子教育的新內容，讓婦女的身體開始得以舒展解放，連帶的帶動女

¹²⁴ 《曹昭女誡》，引自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閩媛典·第二卷·閩媛總部》（台北：文星，1964），頁16。

¹²⁵ 陳平原認為在晚清西學分科的影響之下，學科的地位也開始升降，「原先中國人引以為傲的『詞章之學』，在這各變動過程中，因其『不切實用』，而明顯的被邊緣化了。」參見陳平原：〈晚清辭書與教科書視野中的「文學」——以黃人的編纂活動為中心〉，收錄於陳平原、米列娜主編：《近代中國的百科辭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頁174。

子活動空間的擴大，身體自由帶動著行動的自由。

晚清知識分子所進行的婦女改造運動，在一波波趨新的風潮底下，時代新女性的定義也隨之改變。對傳統中國婦女的揚棄與對新女性的期待，在當時許多知識份子的徵婚條件中便可見到。在《女子世界》第十五期中，有一自稱為「慕蝶」的男子，¹²⁶公開寫了一篇〈求妻告白〉，列舉自己的條件與徵婚的標準：

僕現年十八，留學日本東京，將來擬學文科，且有專肄英文，自東徂西之志。思想自命較凡人高一籌，素喜看哲理及佛經，深痛祖國專制結婚，於是仿登報求婚之法，欲一洗舊俗，自我作古也。

求妻之資格（一）通英文（一）思想高（一）稍知西文（一）天足（一）相貌不可醜陋（一）年齡相等或稍小者

具有以上數種之資格，欲與僕作偶者，請將本人歷史及寫真片一張，寄日本東京神田駿河臺鈴木町十八番地中國留學會館轉交可也。如兩面都合意，僕再寄詳函及拙片一張，以為報李。但望來函，需詳示住址。¹²⁷

當時新式知識份子認為，理想的另一半應該是「知書識字的天足女學生」，¹²⁸簡單幾個字卻一言以蔽之的說明了新女性的最基本條件，她必須上過學是個讀新書

¹²⁶ 中國最早的徵婚啟事，是 1902 年 6 月 26 日南清志士在《大公報》上刊登的，並表明「一要天足，二要通曉中西學術門徑，三聘娶儀節悉照文明通例，盡除中國舊有之陋俗。如有能合以上諸格及自願出嫁又有完全自主權者，毋論滿漢新舊，貧富貴賤，長幼妍媸，均可。」南清志士的徵婚啟事刊登後不久，即引起林宗素的抨擊。林宗素認為南清志士不肯以真名示人，卻又對女子公然開出條件，是以對待娼妓的方式，對待二萬萬的中國女子，讓身為中國女子之一的林宗素深感受辱，並為文加以抨擊。參見閔杰：《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錄·第二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頁 239-241。《女子世界》中除了第十五期化名「慕蝶」者所刊登的〈求妻告白〉外，在第十三期與第十四期有留日學生王建善刊登的〈敬告女同志·通信訂婚法〉啟事。他提倡「宜由男女互通信，先各抒衷曲，質疑問難，徐議訂婚。既可免嫌疑，又不致妍媸誤配，誠一夫一妻偕老同穴之善法也。」夏曉虹認為王建善的通信訂婚法，「既可行自由結婚之實，又可免放縱越禮之名，可謂兩全其美。但其使用範圍依然有限，能讀書識字、具備相當文化水準是最基本的條件。」參見夏曉虹：《晚清社會與文化》（武漢：湖北教育，2000），頁 304。近代的徵婚啟事，是藉助公開的媒介將婚姻私事公開於眾，在不同的時空下，所提出的徵婚條件亦有異，陳湘涵便對報刊上的徵婚啟事加以研究，分析其中婚姻問題所蘊含之時代性。參見陳湘涵：《尋覓良伴：近代中國的徵婚廣告（1912-1949）》（新竹：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¹²⁷ 慕蝶：〈求妻告白〉，《女子世界》第十五期（1905.？），頁 30（頁 1392）。

¹²⁸ 柳亞子就曾經提及，他理想的結婚對象應該具備的條件：「我最初的目標，自然希望找一個才貌雙全的配偶。但到了辛丑壬寅之間，天足運動起來，目標便又轉變了。一個理想的條件，應該是知書識字的天足女學生。更理想一點，則要懂得革命，或竟是能夠實行革命的，像法國瑪麗儂、俄國蘇菲亞一流人物才行。」柳亞子：〈五十七年〉，收入柳亞子著；柳無忌、柳無非編：《柳亞子文集（自傳·年譜·日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頁 160。

的女學生，並且不纏裹小腳，即符合「德智體」三育下所養成女性。女性在社會的催促下，開始走出閨門進入校門，逐漸迎向與傳統婦女不同的人生風景。

四、完美的母親：國民母的訴求

傳統中國婦女在《女子世界》編輯群的眼中，有著種種不堪的弊病，例如無知識、迷信、身體孱弱與自私自利等，他們認為唯有透過啟蒙的力量，將體育、智育與德育加以推廣，婦女方能有革新的機會，從而「必斷絕其劣根性，而後回復其固有性，跳出於舊風氣，而後接近於新風氣，排除其依賴心，而後養成其獨立心」。¹²⁹晚清時期面臨新舊思潮衝擊，中國婦女在國家存亡的壓力底下，必須有所改變，必須變換角色，以適應新時代的來臨。《女子世界》在此背景之下，呼籲婦女走出家庭，進入學校、社會與國家機制之中，要婦女以新的角色適應二十世紀。

在金松岑所寫《女子世界》的發刊辭中言：「女子者，國民之母也。欲新中國，必新女子；欲強中國，必強女子；欲文明中國，必先文明我女子；欲普救中國，必先普救我女子，無可疑也。」¹³⁰「國民母」一詞，根據夏曉虹的考證，最早即出自金松岑的《女界鐘》：

國於天地必有與立，與立者國民之謂也。而女子者，國民之母也。今吾中國“國民”之稱其無有矣，其代名詞則“萬性”是也。是代表吾國民無精彩、不風骨，徒於史姓韻編占一席之地而已。夫個人之品性，雖由外界之風俗境遇薰染刺激而化，亦自因內界之數十代遺傳根性醞釀陶鑄而成。而根性之傳，必離母以附子，陽施陰受，頓漸各殊。故國民無師，其所師則女子也。¹³¹

¹²⁹ 亞特：〈論鑄造國民母〉，《女子世界》第七期（1904.6），頁3（頁579）。

¹³⁰ 金一（金松岑）：〈女子世界發刊詞〉，《女子世界》第一期（1904.1），頁1（頁9）。

¹³¹ 金天翮（金松岑）：《女界鐘》，頁4。

此「女子者，國民之母也」句，在《女子世界》其他的文章中也常常出現。¹³²金松岑將新女性的身分定義為「國民母」，意即「國民之母」。他將《女界鐘》中的「國民母」一詞，徑搬入《女子世界》的發刊辭中，也為《女子世界》確立了女性身份的定位。丁初我在緊接著的〈《女子世界》頌詞〉中說：「女子者，國民之公母也。長棄其母，胡育其子。」¹³³更明確的說明編輯群認為婦女的改造，最終就是要以國民母為目標。

《女子世界》中的「社說」欄（七期後改為「論說」），通常為立意嚴肅的論說文，幾乎是男性編輯權的發言場域。¹³⁴「演壇」欄則是一改社說欄目的立論風格，轉錄演講稿或者以白話口語的方式，將新思想與新概念傳達至下層民眾。¹³⁵論說與演壇兩個欄目，主要由《女子世界》的編輯群所撰寫，傳達出期刊的主要婦女論述，不同的是在敘述的語言口氣上，一是以正式散文的形式書寫，一則是以演講稿的方式呈現。¹³⁶不過，第八期後兩者的分野則逐漸消失，在第八期中就收錄了丁初我在常州音樂會的演說稿，第十一期則又收丁初我在城東女學社年假的演說講，在兩欄位的差異性日漸消彌的情況下，至在十三期以後演壇欄位正式消失，原刊登在演壇中自立〈實用話〉，被劃入論說欄當中，更可知道此二欄位，

¹³²如丁初我〈《女子世界》頌詞〉（第一期，頁5）、自立〈女魂篇〉（第二期，頁7）、〈黎里不纏足會緣起〉（第三期，頁72）、曾競雄〈女權為強國之元素〉（第三期，頁79）、莫虎飛〈女中華〉（第五期，頁85）、張肩任〈急救甲辰年女子之方法〉（第六期，頁86）等文，皆有「女子者，國民之母」的句子，可見其使用率是相當高的。

¹³³ 初我（丁初我）：〈《女子世界》頌詞〉，《女子世界》第一期（1904.1），頁5（頁13）。

¹³⁴ 《女子世界》的論說欄，除了第十四期中張昭漢〈爭約勸告辭〉外，其餘為男性作家的作品。夏曉紅認為「《女子世界》『論說』欄作者的性別比例，既顯示了雜誌的男性編者自覺負有“開通女智”責任的先知先覺心態，也是晚清女性大抵未脫男性啟蒙的角色這一真實情況的映現。」參見夏曉紅：《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頁92-93。

¹³⁵ 自立在〈讖言〉一文前言：「列位算到甲午中國被日本打敗以後，大家都曉得『變法自強』四個字，是今日最不可缺的。不過曉得的，都是我們一班無權無勢的人，只好出幾種報，說幾句話，望兄弟們、姐妹們，一個個都曉得點。……所以陸續出來的有《杭州白話報》、《蘇州白話報》、《智群白話報》、《中國白話報》、《寧波白話報》，以及《國民白話報》的演壇，也是用那粗俗的白話，勸勸做國民的人。然而說的也算不少了，聽的也厭煩了，這《女子世界》內巧巧又定了這白話一門，教我做些白話，給列位看看。我想所要說的，已被各報說過，教我又說什麼呢？古人有句話說：『姑妄言之，姑妄聽之。』列位勿笑我亂說，只算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鐘。」見《女子世界》第二期（1904.2），頁13（頁99）。晚清知識份子常藉由白話書寫或口語演說的方式，將新觀念與新思潮傳遞給下層民眾。李孝悌認為二十世紀的演說是古時宣講的變形，不同的是，更注重的是一種「口語」方式的啟蒙。參見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 1901-191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頁60。

¹³⁶ 陳平原認為「晚清興起、五四後蔚為大觀的演說熱潮，以及那些落後在紙面上的『聲音』，包括演講的底稿、記錄稿、整理稿，以及模擬演講的文章，其對白話文運動和文章體式改進的積極影響，不容低估。」見陳平原：〈有聲的中國——「演說」與近現代中國文章變革〉（《文學評論》2007.3期），頁14。

主要的差別在書寫表達的方式不同，內涵上的是有很高同質性的。在論說與演壇欄位中的文章，主要討論女性身份的定位，「國民母」自然是最常被討論的內容。

在《女子世界》第二期中自立便以演講稿的形式，向婦女聽眾具體地說明「國民母」的內涵，希望「國民母」這一女性新身份，能廣為一般大眾理解：

我的姐妹們，可曉得「國民母」三個字什麼解釋？原來一個國內要生出許許多多純純正正的國民，所可靠的只有女子，說句笑話，譬如世界上都是男子，個個都是大聖大賢，只要一個女子沒有，不上數十年，這些國民一個個老死了，還成世界麼。況且女子不僅生育男女，是一件大事，古語說的好，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只要生出的子女，從小母教好了，自然長大後，弗做不好的事情，比之在學堂中請先生管束還親切許多，得力許多。¹³⁷

自立這段話是由「母教」出發，小孩的孕育與教養過程中，母親通常是最初的教養者，影響著小孩先天的賦予與後天的形成。種戰的危機意識，是晚清知識份子開始關注女性議題的起點，對於亡國滅種的恐懼，進而關心生產國民的母親。

早在《女子世界》之前，梁啟超在提倡女學時，便認為婦女教育的目標，最主要的目的在於振興母教，讓中國婦女學習如何做一個好母親：

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遠可善種。婦道既昌，千室良善。豈不然哉？豈不然哉？是以三百五篇之訓，勤勤於母儀，七十後學之記，蜚蜚於胎教。宮中宗室，古經厘其規綱，德音容工，婚義程其課目，必待傅姆，陽秋之賢伯姬。¹³⁸

女學堂是中國人最早自辦的女子學堂，由康廣仁與梁啟超等人，於光緒二十三年（1897）在上海成立。¹³⁹梁啟超認為婦女受教的目的，即為「相夫教子」與「宜

¹³⁷ 自立：〈讜言〉，《女子世界》第二期（1904.2），頁15（頁101）。

¹³⁸ 梁啟超：《變法通議·倡設女學堂啟》，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頁104。

¹³⁹ 廖秀真：〈清末女學在學制上的演進及女子小學教育的發展（1897-1911）〉，收入李又寧、張玉法編：《中國婦女史論文集·第二輯》（台北：台灣商務，1988），頁220。

家善種」，能相夫者為「良妻」，能教子者為「賢母」。¹⁴⁰良妻賢母主義，¹⁴¹是維新時期重要的婦女論述。它採取了一個折衷的策略，由上古中國的姆師傳統說起，認為中國原來是有婦女教育的，只是隨著時間遞嬗中國婦女被緊鎖閨門之內，過著一種與世隔絕，無知無識的生活。此處採用了一種復古的隱喻，認為現今只是將流失的傳統找回，讓婦女進入學堂就讀，既符合古制也是時勢所趨。不過，梁啟超所提倡的女學對象，要比傳統女學要擴大許多，不再只是「宮中宗室」的貴族婦女或是士紳階級家的女眷，才能擁有受教權，而是凡要成為他人妻子與母親者，皆有受教育的必要，乃因「吾推極天下積弱之本，則必自婦人不學始」，¹⁴²女學再也不是一人一家之事，而是關乎國家興盛強弱之大事。¹⁴³換言之，一個

¹⁴⁰ 雖然梁啟超本人，並沒有完整提出「良妻賢母」四字，但程謫凡在 1934 年出版的《中國現代女子教育史》書中分析維新時期的女子教育觀時，認為「在女子教育萌芽時期，一般人對於女子教育的觀念，都是在於養成女子之『相夫教子』的能力。能『相夫』，那就是良妻；能『教子』，那就是賢母。我們說牠（應作『它』）是良妻賢母的女子教育觀，也未為不可。總之，『相夫教子』的女子教育觀，或是良妻賢母的女子教育觀之在當時，確已成為一般社會先覺者的共同思想了。」參見程謫凡：《中國現代女子教育史》（上海：中華書局，1934），頁 41。陳延媛也依程謫凡的分析，認為雖然梁啟超的文集中，未曾將「良妻賢母」連用，甚或在〈變法通議〉中連「良妻」與「賢母」都沒出現過，但梁啟超在文中所提及的女姓角色內涵，即等同於良妻賢母主義的內容，她認為「正如中村正直被同時代人視為『良妻賢母』一詞的發明人，梁啟超身為中國近代女學論的先驅，雖然其著作〈論女學〉一文中也沒有提出類似『賢妻良母』的詞彙，仍然同樣被當時中國的言論界視為提出『賢妻良母』論，主張培養能夠養育良好兒童以使國家富強的婦女。……如果說日文『良妻賢母』被賦予的最初涵義，是中村正直所塑造的婦女形象，同理可知，中文『賢妻良母』的原始意義，則是梁啟超所提出的婦女形象。」參見陳延媛：《從東亞看近代中國婦女教育：知識分子對「賢妻良母」的改造》（台北：稻鄉出版社，2005），頁 71。

¹⁴¹ 近代東亞的儒家文化圈，都有將「賢良」二字，冠於「妻母」上，只是在定名上有所不同。日本慣稱「良妻賢母」，韓國多用「賢母良妻」，中國則用「賢妻良母」。陳延媛認為「從三種語言的辭典檢視，雖然用字不完全相同，但無論是『良妻賢母』、『賢妻良母』或『賢母良妻』，定義可說是完全一致，都是『對丈夫做為良好的妻子，對兒女做為良好的母親。』」參見陳延媛：《從東亞看近代中國婦女教育：知識分子對「賢妻良母」的改造》，頁 3。關於中、日、韓三國，對於賢妻良母的研究成果評介，亦可參考陳延媛：〈簡介近代亞洲的「賢妻良母」思想---從回顧日本、韓國、中國的研究成果談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0 期，2002.10），頁 199-219。關於近代中國賢妻良母的起源，呂美頤認為，早在中國古代便有賢妻與良母的概念流傳，但是到了 1905 年左右，方才將賢妻與良母聯繫在一起，她以 1905 年《女子世界》中蘇英的〈蘇蘇女校開學演說〉作為較早使用這一概念的佐證，參見呂美頤：〈評中國近代關於賢妻良母主義的論爭〉（《天津社會科學》1995.5 期），頁 73。不過，陳延媛以思想發展的角度分析，主張早在 1896 至 1899 年梁啟超在《時務報》的〈變法通議〉中〈論女學〉的內容，便可以看到賢妻良母思想最主要的內涵——「著眼於母親的角色提出婦女教育論」，參見陳延媛：《從東亞看近代中國婦女教育：知識分子對「賢妻良母」的改造》，頁 68-69。

¹⁴² 梁啟超：〈變法通議·設女學〉，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頁 30。

¹⁴³ 王萌認為晚清時期「賢母良妻」的提出已經意味著比傳統賢妻良母對女性的要求有所提高，除了傳統的賢妻良母所要求女性具備的一切條件之外，它還要求女性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識，以便給子女最好的母教，為國家培養合格的國民，從而達到由齊家而強國的目的。與傳統的賢妻良母主義相比，賢母良妻主義並不反對在不影響家庭的情況下，女性有一定獨立生活的能力與經濟來源。」見王萌：〈論《婦女雜誌》中的賢母良妻主義及其影響下的文學創作〉（《銅仁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8 卷 4 期，2006.7），頁 20。

理想的賢妻良母必須是要受過教育擁有知識的，才能真正承擔起母教的責任，替國家教育優良的國民，國家方能有所進步與富強。¹⁴⁴

金松岑的「國民母」論點，也是由古來的賢母賢妻所發起的。他在〈女子世界發刊詞〉中便言：「中國前者之所以強乎，屈指而數，案籍而稽，彼聖賢、帝王、英雄、俠義，皆有賢妻賢母以為左右也。」¹⁴⁵賢妻良母與國民母，雖都強調「母親的重要」，但賢妻良母容易與傳統婦女家庭中的角色（妻子、母親）疊合，特別是妻子的角色，「相夫」由字面上看來，容易與婦女在家庭中的屈從地位相應，這正是《女子世界》所反對的。故「國民母」的主張，相較於「賢妻良母」，它仍然強調婦女母職的角色，但弱化了妻職的身分，「誕育佳兒」以養成優秀國民，是一種相對而言，較正面也較中性的女性角色，不論是激進派或是保守派，對於「國民母」的主張通常都是採取支持的態度。¹⁴⁶

簡言之，所謂的「國民母」即是「國民之母」。晚清時期對母親身分的期待，不僅僅只在成就家庭或個人，而是根源於對「國民」的迫切需要，將母親的重要性由家庭推及至國家，循著「無國民母，則無國民；無國民，則國亡」的依存邏輯，¹⁴⁷「國民母」之所以重要，其最主要的任務即在「誕育國民」。

「國民」一詞，是近代的產物。晚清時期，康有為為最早使用「國民」一詞者，¹⁴⁸嚴復則進一步在文章中主張「國民」為國家富強之根本，¹⁴⁹梁啟超則是最

¹⁴⁴ 呂美頤：〈評中國近代關於賢妻良母主義的論爭〉，頁 75。

¹⁴⁵ 金一（金松岑）：〈女子世界發刊詞〉，《女子世界》第一期（1904.1），頁 1-2（頁 9-10）。

¹⁴⁶ 夏曉虹認為：「在『賢母良妻』與『非賢母良妻』之間，『國民之母』顯然有較大的迴旋餘地，兩方面的論者都樂於接受它，由此決定了其成為晚清關於女性使用頻率最高的一個詞語。」見夏曉虹：《晚清文人婦女觀》（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頁 82。

¹⁴⁷ 正如亞特在〈論鑄造國民母〉中所言：「國無國民母，則國民安生？國無國民母所生之國民，則國將不國，故欲鑄造國民，必先鑄造國民母始。」國家存亡與國民之有無，以及鑄造國民母之間的密切關係。見亞特：〈論鑄造國民母〉，《女子世界》第七期（1904.7），頁 1（頁 577）。

¹⁴⁸ 康有為在 1898 年的〈請開學校折〉中，為晚清最早使用「國民」一詞的記錄，在進呈光緒皇帝的奏摺中，他使用了「國民」與「國民學」的辭彙，但康有為並未對「國民」二字加以解釋，真正開始對「國民」加以定義，則要等到梁啟超 1899 年的〈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前途〉一文。參見梁景和：《清末國民意識與參政意識研究》（長沙：湖南出版社，1999），頁 9。

¹⁴⁹ 高力克認為「『公民』概念由晚清知識分子引入中國，用以建構啟蒙理論和民族國家理論。嚴復立基於『開民智』、『鼓民力』、『新民德』的公民籲求，揭示維新派啟蒙理論的思想主題。梁啟超的新民說進一步發揮了嚴復進化論式的公民啟蒙理論。」參見高力克：〈五四知識分子的公民觀〉，收入許紀霖主編：《公共性與公共知識份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頁 225。在現今的語彙中「國民」與「公民」有不同的意涵，國民（people）即指凡一國之內的居民，公民（citizen）則指擁有行使參政權之國民，但根據沈松橋的研究發現，「在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知識階層的認知框架中，『國民』概念最突出的特質，卻是其所包攝的個人尊嚴、平等與權利等西方（特別是英、美）自由民主政治體制所賴以存立的諸項核心價值；易言之，他們所理解的『國民』，其實兼具著西方政治思想傳統中的 citizen（公民）與 citizenship（公民權、公民資格）的意涵。」

早對「國民」一詞賦予現代意義。¹⁵⁰梁啟超在〈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前途〉一文中，便對「國民」二字加以定義：

中國人不知有國民也，數千年來通行之語，只有以國家二字並稱者，未聞有以國民二字並稱者。國家者何？國民者何？國家者，以國為一家私產之稱也。古者國之起源，必自家族，一族之長者，若其勇者，統率其族以與他族相角，久之而化家為國。其權無限，奴畜群族，鞭笞叱吒，一家失勢，他家代之，以暴易暴，無有已時，是之謂國家。國民者，以國為人民公產之稱也。國者積民而成，捨民之外，則無有國。以一國之民，治一國之事，定一國之法，謀一國之利，捍一國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國不可得而亡，是之謂國民。¹⁵¹

梁啟超對於「國民」的理解，主要受到日文「國民」意涵的影響。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產生了「國民」一詞，以對應西方「citizen」的政治概念，意指「作為國家主體，人人有權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現代公民」。¹⁵²在梁啟超的觀點下，國家是全體國民之公產，非一家之私產，國民共同享有治理國家、訂定法律、謀求福利，以及抵禦外侮的責任，最重要的是，「其國不得國民則亡」，梁啟超的國民論述再次緊扣了晚清的救亡焦慮。在梁啟超的影響下，「國民」一詞隨即「成為晚清知識階層習慣用的熟語」。¹⁵³

自立在講述國民母的義務時，即是從「國民」二字說起，向女性聽眾解釋國民的基本意涵，舉出符合國民的要件：

今日世界上有自尊的一句話，叫國民。……我按著字義，解釋國民二字，原不過是國家的百姓個意思。既做了人，便有住的地方，有了住的地方，

見沈松僑：〈國權與民權：晚清的「國民」論述，1895-1911〉，頁 687。

¹⁵⁰ 楊聯芬：〈晚清與五四文學的國民性焦慮（一）：梁啟超及晚清啟蒙者的國民性批判〉（《魯迅研究月刊》2003 年 10 期），頁 57。

¹⁵¹ 梁啟超：〈論近世國民競爭之大勢及中國前途〉，梁啟超著；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 309。

¹⁵² 沈松僑：〈國權與民權：晚清的「國民」論述，1895-1911〉，頁 693。

¹⁵³ 沈松僑：〈國權與民權：晚清的「國民」論述，1895-1911〉，頁 693-694。

便有國家管轄著，這國民二字，又算什麼呢？這國民究竟要怎樣做法，纔合式呢？後來有學問的人告訴我，講究做國民的法子，說一來要沒有倚賴的心腸，便是獨立；二來要肯做公共的事情，便是公德；三來自己勿做傷風敗俗的事，便是自治；四來要合些同志的人一同辦事，便是合群；五來要不許他人侵犯著我，并我亦不可侵犯他人，便是自由；六來任憑什麼事，苟是自己分內所應得的，不可讓人，便是權利；七來我所應得做的，該應盡心著力的做，便是義務。這七件事以外，尚有一項最要緊的，最不可缺的，叫做參與政權。至於完納租稅，教育子女，都是國民的責任。¹⁵⁴

按造自立的理解，國民應當有經濟獨立能力，並且能以公眾利益為考量，擁有自我節制的能力，懂得與人團結合作，明白自由的界限，與權利、義務能力，最重要的是擁有參政權，其他如繳稅和教養子女的責任，自然也是國民的範疇。自立對於國民的定義，依循的即是晚清知識階層對國民論述的理解。

不過，自立所理解的國民，其預設的對象是男性，女性並不在國民預設的行列中，他將「我的兄弟們」等同「國民」，「我的姐妹們」等同「國民母」。他認為男性的國民既然已經墮落至極，那麼就只能將希望寄託在誕育國民的「國民母」身上。如此一來，國民的責任與國民母的責任，便有所區別了。他接著列舉了國民母應該做的五件事：首先「是曉得改變」，他認為婦女必須要體認到，現在的世界是隨時在改變的，斷不可以沒有革新的念頭，只想尋著慣例來行事；第二件事是「曉得自尊」，不要認為自己是必須依賴男子的，要女子自己好好思考，女子手足行動與男子無差異，日常生活的需求也與男子相同，為何衣食供給卻必須依賴男子，讓男子如家畜一般的對待，卻不想自立自尊謀求獨立的生活；¹⁵⁵第三件「要曉得做善事」，所謂的善事並不是吃齋念佛之類的事情，而是指將這些原本捐獻給寺廟的錢，轉而集資起來建女學堂或蒙學堂等，讓更多的人能夠有機會接受教育，這才是真正的做善事；第四件是要「曉得學好」，見著比自己學問好、品德好的人，要知道見賢思齊努力期許自己也要達到那樣的境地；第五件是「弗要畏難」，他認為這些革新的事情，真正去實踐時難免會遇到不少阻礙，但姊妹

¹⁵⁴ 自立：〈譚言〉，《女子世界》第二期（1904.2），頁14（頁100）。

¹⁵⁵ 自立：〈譚言〉，《女子世界》第二期（1904.2），頁15-17（頁101-103）。

們應當學習西天取經的精神，就算面臨重重困難也不輕言放棄。¹⁵⁶自立雖曾提及國民的七件事，亦是婦女當盡的責任，不過，卻另外列舉了國民母應做的五件事，有意的將「國民責任」與「國民母責任」加以區分。國民是以男性的角度來說，男子被理所當然的賦予國民的權利與義務，婦女則直接與母親的角色聯繫在一起。男子沒有被強調賦予「國民父」的角色，但中國婦女的價值常與家庭中的生兒育女相聯繫，故對於婦女而言，自己本身的權利義務的追求，在此階段，遠不及誕育優秀國民來的重要。¹⁵⁷女性的價值，根植於她是否能做一個優秀的母親，而非一個健全的國民。婦女作為「國民母」的角色受到重視，並非對女性本身的價值肯定，乃因國民是國家強盛的決勝點，故為有優秀的國民，其生育國民的母親也必須是完善的。

「國民母」的角色，女性的價值主要是在「誕育佳兒」，之所以要將其培養成為一個有智識，且身體強壯的女性，主要為了使其成為優良的母親，生下強壯的下一代中國兒子。女性的主體性，在國民母的角色認同中，是一個曖昧又模糊的存在。只是女子既為國民之母，她是否也是國民呢？有趣的是，在《女子世界》中「國民母」常與「女子亦國民一份子」、「女國民」等詞黏合，使女性定位在國民與母職中游移。

《女子世界》中「女子亦國民一份子」的聲音，常常與「國民母」混雜並置，也是知識份子提升女性地位時常用的論述手法。自立在〈讖言〉中便是以與「男子無異」鼓吹女子自尊，不要自我輕視。又如吹萬¹⁵⁸〈女子唱歌〉首段：「分明鼻舌與眼耳，同是國民一份子。女子何為獨輕視，公然半教任詆訾，要當雪斯恥。」¹⁵⁹點出男女都有眼耳口目，以供視聽食息，自然也應當是國民的一份子，不應自我輕視。這其中雖不免仍參雜男性視角，但此種「國民一份子」的看法，似乎已較「國民母」有些微不同，國民母重視的是女子在強國強種的觀念底下，撫育新

¹⁵⁶ 自立：〈讖言〉，《女子世界》第三期（1904.3），頁 15-18（頁 189-192）。

¹⁵⁷ 柯惠鈴認為：「清末在國族意識推動下的女子教育，本質上是深化婦女改造，各種訴諸道德的理想如「責任」、「大義」、「本份」等仍舊依循壓抑個人的方式，雖然圍繞著提升女權的議題，卻朝向將內／外與男／女之間的對應關係強化的方向，如「國民母」將養子、育子教育明確安置在內（家庭）的位置，表面上提升了女子地位，事實上卻是性別刻板印象的複製。」見柯惠鈴：《性別與政治：近代中國革命運動中的婦女 1900s-1920s》，（台北：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頁 31。

¹⁵⁸ 高燮（1879-1958），江蘇金山人，字時若，又字吹萬，姪高旭、高增，後來三人均為南社成員。見陳玉堂：《中國近代人物名號大辭典》（杭州：浙江古籍，1996），頁 1058-1059。

¹⁵⁹ 吹萬（高燮）：〈女子唱歌〉，《女子世界》第三期（1904.3），頁 59（頁 233）。

國民的母親身分，但「國民一份子」則認為女子應當也為國家之一分子，屬於國民的範疇，漸漸將婦女由國民之母的從屬地位抽離。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吹萬〈女子唱歌〉的接下來幾段，又將女子與家庭責任縛在一處：

家齊然後能治國，齊家之任伊誰責？丈夫安肯首家室，因人成事計非得，
大家須自立。……

體育發達裙釵選，有用之材驟增半。種既強壯身又建，後生個個皆好漢，
全球都驚羨。¹⁶⁰

吹萬的〈女子唱歌〉中還是將齊家與母親的身分賦予女性，婦女可以在為家庭盡義務的同時，即是為國家貢獻心力。妻子與母親仍然是婦女主要的身分，換句話說，女性在國家中的地位，依靠的是她在家庭中的角色。婦女既是「國民母」也是國民之一份子，站在國家的利益上，兩者並沒有違背之處。

而當婦女主體性漸次抬頭，為傳達男女位階的均等，出現了「男女平等說」與「男女都一樣」的聲浪。杜清持在《女子世界》第六期，發表了一篇〈男女都是一樣〉的演說稿：

立於大地之上，列於哺乳動物之部，圓其顛，方其趾，有氣血，有神經者，
皆字之曰人。既同為人，其居處同，其飲食同，其能言語能動作同，則是
受教育也亦當無不同，故夫地無論中外，人無論男女，而皆當施以同等之
教育，此固大地萬國所共認也。¹⁶¹

杜清持跳脫性別的框架，而以「人」的角度，認為既然男女同為人，擁有相同的稟賦，那就不應該有不同的待遇。她主張男女平等，婦女不應被要求纏裹小腳，要還女子本然的身軀與行動的自由；並且給予女子與男子相等的受教權，讓女子一樣能「讀些有用的新書，靠讀書來明白人間的公理，見得男女都是一樣，就當盡國民的義務，各人都出來辦事，各人都出來謀生，彼此創出一番新世界來，何

¹⁶⁰ 吹萬（高燮）：〈女子唱歌〉，《女子世界》第三期（1904.3），頁59（頁233）。

¹⁶¹ 〈香山女學校募捐啟〉，《女子世界》第七期（1904.7），頁75-76（頁651）。

嘗有一毫流弊呢！」¹⁶²知識分子認為「男女同為人」，擁有相同的感官，與智能思考的能力，女子既擁有相同的稟賦，自然要被賦予相同的權利。

從「女子亦國民一份子」到「男女都一樣」，男性既然是國民，那女性自然就是女國民了，《女子世界》中也出現了「女國民」的詞彙。¹⁶³女國民的思維，是由國民而來的，既然男女都是人，都處於平等的位置，在國家社會的地位與身分上也不應有差別。¹⁶⁴第五期中大雄¹⁶⁵所創作的〈女中華傳奇〉戲曲，便以「女國民」為號召，其中藉由辮髮西裝的女主角黃英雌，說出對女國民的企求：

想起我姐妹們，內受丈夫的壓制，外而受異族的壓制，算來已到極點，萬不可一誤再誤，做萬劫不復的奴隸，須速速重振旗鼓做個女國民。

【小皮靴】周家禾黍，吾宮花草，堪歎、堪憐、堪弔。問誰愛國裙釵，大有盧梭，鞭垂楊柳，馬跨桃花，火速黃龍搗，羅蘭流血真先導，路易心旌暗動搖，女界鐘都驚覺。

說到此處，不覺精神振作起來，有俾倪全球之概。要將參政權都收回轉來。

¹⁶² 杜清持：〈男女都是一樣〉，《女子世界》第六期（1904.6），頁15（頁489）。

¹⁶³ 陳永森認為，早在康有為生前未發表的《大同書》中，就已經提出「女公民」的概念。只是此書秘而不宣，故對當時的社會沒有產生什麼影響，但至少可以說明在康有為的思想中，將女性視為公民的一部份，乃其政治理想的一個側面。參見陳永森：《告別臣民的嘗試：清末民初的公民意識與公民行為》（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頁162-164。

¹⁶⁴ 鄭永福與呂美頤主張「女國民觀念的提出在20世紀初，正值清朝末年，是在國民概念的基礎上由『國民之母』延伸出來的，它的出現有兩個前提，一個國家意識的覺醒，二是人權與女權意識的覺醒。」參見鄭永福、呂美頤：〈關於近代中國「女國民」觀念的歷史考察〉（《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32卷4期，2005.7），頁58。對於鄭永福與呂美頤認為女國民是由國民母的概念延伸出來的說法，筆者以為此兩種女性身分是否具有此種線性的影響，是值得商榷的。國民母主要是由「母職」的角度出發，女國民則是「國民」的概念發想，兩者雖都與國民的論述源流有關，但兩者之間，並不存在著一定的影響。正如喬以鋼與劉堃所言：「雖同有『國民』二字，做『國民之母』並不必然導出『女國民』的主體生成，女性只有逾越了自身在生育場域中的性別角色，以主體身分直接服務於國家，在無性別差異的個人與國家之間構建充分的權利和責任空間，才是實現『女國民』身份的唯一正途。」見喬以鋼、劉堃：〈「女國民」的興起：近代中國女性主體身份與文學實踐〉，收入劉澤華、羅宗強主編：《中國思想與社會研究·第二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頁542。

¹⁶⁵ 高增在《女子世界》中有兩個署名：「大雄」與「覺佛」。高增（1881-1943），字岫雲、澹安、澹庵，別號卓公、筠庵、佛子、大雄，又別署吳魂、秋士、嘯天廬，著有《嘯天廬詞存》。後為南社詩人，高旭之弟，高燮之侄。在《女子世界》中的作品有：〈女中華傳奇〉（第五期，署名「大雄」）、〈獅子吼〉（第六期，署名「覺佛」），還有署名「大雄」所創作的詩詞，如〈題女子世界〉（第八期）、〈賀何氏女塾〉（第十四期）、〈女國民勵志歌〉（第十六、十七期）、〈明季寇亂婦女不辱而自殺者無算為紀詩以嘉之〉（第十六、十七期）、〈讀女界鐘感言〉（第十六、十七期），另外還有〈書謝小娥事〉（第十四期，署名「覺佛」）一首。見陳玉堂：《中國近代人物名號大辭典》，頁1058。

婦女成為種族與性別下的雙重奴隸，故女子要掙脫的除了種族革命之外，還有性別革命的部份，要從男性那裡把權利拿回來：

還有一班男子漢，平日作威作福，壓抑我們。那知他也做異族的走狗，唉，他又枉算是個國民了。……俺想責人不如責己，俺雖罵他們的壞處。倒不如自己先改良人格，恢復自由，使東西文明國人，不敢輕看我們，稱俺做女中華、女豪傑，真真快活得狠呢！¹⁶⁷

由「改良人格，恢復自由」使婦女以女國民的身分自我定位，而不再將婦女的價值根植於「母親」的角色上，就算不做母親，婦女也是國家一份子，在國家與社會中也能佔一席之地。

嚴格定義上的「女國民」，主要是指參政權的行使。賢妻良母與國民母的身分中，不斷提及婦女對國家與家庭的責任與義務，卻沒有提及婦女參政的權利。自立所言的國民七件事，最後提到參政權的賦予，但在國民母的當盡義務中卻略而不提。但在「女國民」的定義上，開始有不少知識分子討論婦女在政治上的權利與義務，以及參與政治的權利。馬君武在 1902 年翻譯《斯賓塞女權篇》後，在 1903 年 4 月寫作了〈彌勒約翰之學說〉一文中，便主張婦女應當有監督、組織政府、過問國事的權利，婦女也能擔任公職，並享有每個國民應有的權利與義務。¹⁶⁸不久之後，金松岑出版的《女界鐘》也主張婦女應有選舉代議的權利，更希望能通過立法來保障女子的入學、交友、營業、財產、出入自由與婚姻自由等權利。¹⁶⁹

金松岑後來在〈女子世界發刊詞〉中便將「國民母」與「女國民」並置，首段末便向花神祝禱，「吾乃焚香縹筆問花之神，祝花之魂，願花常好，以為二十

¹⁶⁶ 大雄：〈女中華傳奇〉，《女子世界》第五期（1904.5），頁 54（頁 428）。

¹⁶⁷ 大雄：〈女中華傳奇〉，《女子世界》第五期（1904.5），頁 54-55（頁 428-429）。

¹⁶⁸ 莫世祥編：《馬君武集 1900-1919》（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頁 142-145。

¹⁶⁹ 金天翮（金松岑）：《女界鐘》，頁 50-53。

世紀女國民」，¹⁷⁰次段即言「女子者，國民之母也」，便將國民母與女國民同時並置於女子身上。國民母與女國民，在概念上都與女性的國家責任有關，故實際的使用上，我們可以看到並置不衝突的情形，例如署名為莫虎飛的松江女子，寫了一篇〈女中華〉：

有女子斯有男子，男子者，女子之出產物也。故一國之女子，一國國民之母也。拿破崙謂欲強其國，必先強一國之母。……以公理而論，一國之男女，固宜平權平等。夫易基乾坤，詩始關雎，孔孟稱匹夫匹婦，男與女固並育而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蓋天生男女，未始有異，同具耳目，同具手足，同賦自由之權，同賦主人翁之責任，是故男子當盡愛國之責任，女之亦當盡愛國之責任，男子當盡國民之義務，女子亦當盡國民之義務。女子者，亦國中之一份子也。……傳曰：家齊而後國治。齊家者，固女子之責任也。一國之女子，人人知齊家之責任，則其國必強，故欲強中華，必先使女子之齊家。欲女子知齊家，必先興女學。夫后妃化南國之人，詩人美之；孟母垂三遷之訓，後世稱之。而況天下古今聖賢豪傑，為驚天地泣鬼神之事業，未嘗不由母教陶鑄也。藐姑山之神，糝垢塵糠，陶鑄堯舜，同胞姐妹其知之否耶？女學者，立國之根本，女國民之責任也，同胞姐妹盍亦留意於此乎？¹⁷¹

此文中便將國民母、國民一份子與女國民並置討論，三者都是以強國為前提的女性定位，故將其並置於婦女身上並不產生衝突。但深究起來，三者的意涵是不儘相同的，國民母是對國民的迫切需求，將婦女以家庭母親的重要，提升到國家母親的高度，婦女基本上還是固著在母親的角色之內；「女子亦國民一分子」則是以國家一份子的轉化，女性既為國家中之一人，則理所當然地為全體國民之一份子；「女國民」則是明確的在男女平權的基礎上，認為男女不僅同為國民之一份子，婦女在政治法律上應該擁有與男性相同的地位。

而且在指涉對象上，國民母與「女子為國民一分子」所針對的是全體中國婦

¹⁷⁰ 金一（金松岑）：〈女子世界發刊辭〉，《女子世界》第一期（1904.1），頁1（頁9）。

¹⁷¹ 莫虎飛：〈女中華〉，《女子世界》第五期（1904.5），頁85-87（頁459-461）。

女而言，不過，女國民則不然。在《女子世界》中可以發現，女國民常不自覺將與女學生的身分疊合。大慈〈恭賀新年〉一文中，在乙巳新年向學界、工藝界、農界與商業界的女性拜年，但只有向女學生恭賀時，提出了「女國民」的期許：

恭喜一般讀書社會的女學生，你們一年到頭，科學有若干進步，國文有若干進步，外國語言有若干進步，按著時刻，逐層逐層的進步，經了一層艱難，得著一種樂境。苦也非常之苦，樂也非常之樂，將來培養成了女國民，增進女子社會的幸福。這纔是力爭來的權利，自能永永享受平等、自由、獨立的快樂。到了這個地位，我們女子世界，便要用一個極美麗，極芬芳的花圈，以紀念我中國的女國民哩！¹⁷²

接受新式教育的女學生，在晚清知識分子的眼中，是中國婦女未來的希望。國民母是以全體女性為呼籲，不論年齡層與之前的教育程度，不管是以為人母或將為人母的，都希望能接受知識，以達到教養子女的目的地。將女學生與女國民連繫在一起，通常是指年輕的女學生，她們從小接受新思潮與西方知識，被認為具有前衛的思想與眼光，與中國所培養的新一代男性國民一樣擁有接受教育的機會，她們是中國未來的女界明星。她們不需要非要成為母親後，才能對國家有所貢獻，她們能以自己的名字立足於社會之上，而非某人之妻或母。

國民母在賢妻良母的基礎上延伸，讓婦女以「母親」的身份由家庭進入國家，使中國婦女進入國民論述的範疇。國民母也能與「女國民」相容於一文之中，一個是女性的近程目標，另一個則是遠程目標，兩者身份之間也有著關聯性。晚清知識分子對於中國女性的期望，先在現有家庭母的基礎上，希望婦女進學堂接受新式教育，以德智體三育齊下，讓婦女成為能夠誕育國民的國民母。接著，當越來越多的女性接受教育，認知平等平權的概念，擁有和男性一樣的能力與權利，便能成為女國民，而這些女國民如果未來結婚生子，則將會是更加理想的國民母。國民母一詞能與晚清多種女性身份相容，主要在於國民母一詞的曖昧性，¹⁷³

¹⁷² 大慈：〈恭賀新年〉，《女子世界》第十一期（1905.2），頁20（頁962）。

¹⁷³ 宋少鵬認為，金松岑所鼓吹的「國民母」主張，「強調的是傳統母親身份的現代轉型，並不是強調女性的主體身份，但是“賢妻良母”身份到“國民之母”身份的轉變使女性身份從一個融於家庭集合體內的身份轉化成了一個個體身份。儘管“國民之母”的身份並非是一個完全獨立的身

它家庭與國家、現在與未來的中間，使中國婦女能得以穿越家庭逐漸在國家中找到位置。

五、為妻？為母？抑為人：女性角色的眾聲喧嘩

《女子世界》以國民母做為女性身分的主要定位，在母親的訴求上，它和賢妻良母主義有相通之處；在國民的論述下，它能與女國民的定義相容。但隨著思潮的不斷前進，越來越要求女性以個人的名義為國家社會貢獻心力，女國民的概念開始與維新時期以來賢妻良母觀念發生衝突。賢妻良母的論述，希望女子受教育之後，能回歸家庭成為好的妻子與母親。但女國民則不以回歸家庭為依歸，而是以女子成為完整的個體，就直接可以一己之力替國家盡力。在《女子世界》中就出現了對女性角色定位的論爭，不同立場的知識份子企圖為女子在家庭與國家之中尋找出的新位置。

《女子世界》為集合眾人之作的期刊，隨著刊物的發行，只要對於女界現況與未來發展有想法的人，都可以為文投稿以抒己懷。由現存的文章來看，就算是同一期刊當中，隨著撰稿人的女性立場不同，所提倡的主張亦有不同，其筆戰自難避免。《女子世界》中最有名的筆戰，就是蔣維喬與柳亞子對於「女學與女權孰先」的爭論。蔣維喬在第五期發表〈女權說〉，認為女學應先於女權的提倡，如果中國婦女沒有知識作為後盾，並了解自由的界說，便容易被有心人士假藉自由之名操弄。他抨擊那些稍具維新思想便貿貿然鼓吹自由的男性知識份子，為文明之蠱賊，認為中國不能驟行女權，一切要等女學完備之後才行。蔣維喬的文章，引起柳亞子的不滿。柳亞子在第九期中寫作〈哀女界〉一文，來反駁蔣維喬的說法。他認為女權原為女子所有，只是在歷史演進中為男性所剝奪，現在只是恢復女權，何以要等到數十年以後，並稱蔣維喬等人的溫和派為「偽文明」。之後丁初我與丹忱也加入這場論戰當中，並且申援蔣維喬，認為恢復女權必須以教育為

份，但卻開啟了一個可能的空間。而女性通過對國民身份的建構和認同，得以穿越家庭，直接成為國家的構成單位，相對於國家，構成了與男性平等的政治身份。」見宋少鵬：〈民族國家觀念的建構與女性個體國民身份確立之間的關係〉（《婦女研究論叢》68期，2005.11），頁49-50。

後盾。柳亞子則一如既往，為文反駁眾人的議論。¹⁷⁴

在這場女學 / 女權與真 / 偽文明的論戰，女學界的亂象，成為雙方攻防的戰場之一。女學生原是有志之士寄以厚望的中國未來新女性，但在女學初開的新舊過渡時期，丁初我等人認為收效如何尚未可知，但卻顯現不少的弊端。他在第十期發表〈女界之怪現象〉一文，認為舊社會有其不足之處，但相較於新社會而言，卻沒有失德的敗行，在文明與道德之間，他認為「女子苟無舊道德，女子斷不容有新文明」。¹⁷⁵ 接著在第十一期的〈新年之感〉中，他重申女子新道德理論：「假自由平等之名以恣縱，毋寧守其舊道德。」¹⁷⁶緊接著在〈新罪業〉一文中，開始細數中國女學界的七大罪業。〈新罪業〉是丁初我對城東女學社的年假演說稿，他語重心長的對女學生細數其他觀察的女學界七大罪業：受虛榮、耽逸樂、觀望不前、沾染氣焰、虛擲、被吸與無成立。文後並請在座的女學生自我檢討，是否有犯以上七大罪業，並針對七大罪業提出解決之道。¹⁷⁷

基本上，丁初我的女性立場以國民母為基準，而偏向賢妻良母主義的。他認為女性舊道德，就是指婦女在家庭中做為妻子與母親的角色。丁初我在時事批評中，講述中國留日女學生的現況時，便認為婦女教育還是應當以良妻、良母為主，為造養新國民的基礎也正在此：

師範也，工藝也，家庭教育之淵泉，箇人生活之基礎也。有家庭而後有學校，有箇人而後有社會，造成吾國新家庭新社會，非有實驗教育之女子之力，專恃男子之一方面，雖數千百年無以得純美完全之結果。

畢業之期，一年耳。速成教法，藥我沉痾之女子良當也，此義普及於各省，一、二年中驟增無數之良教師、良保母、良妻、良母，以為造養新國民之基礎計良得。¹⁷⁸

文末丁初我更呼籲留日的女學生們，聽聞日本「女風非良美，我國女德且右之。」

¹⁷⁴ 關於蔣維喬與柳亞子論戰的分析，可參見夏曉虹：《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頁 83-92。

¹⁷⁵ 初我（丁初我）：〈女界之怪現象〉，《女子世界》第十期（1904.？），頁 3（頁 859）。

¹⁷⁶ 初我（丁初我）：〈新年之感〉，《女子世界》第十一期（1905.2），頁 3（頁 945）。

¹⁷⁷ 初我（丁初我）：〈新罪業 亞陸女學界七大罪業（城東女學社年假演說稿）〉，《女子世界》第十一期（1905.2），頁 7-18（頁 949-960）。

¹⁷⁸ 初我（丁初我）：〈東渡之女學生〉，《女子世界》第十四期（1905.？），頁 91（頁 1343）。

嗚呼！採收其教育，不沾染其風氣」。¹⁷⁹丁初我等人在見到女學界的亂象之後，便對女權的提倡採取保守的策略，反而進一步鼓吹中國婦女應當守護「舊道德」。此舊道德自然不是傳統的三從四德，而是希望女子在接受新知識後，成為家庭中良母、良妻，此類擁有新知識和舊道德的女性，才是丁初我等人提倡女學樂見的成果。

柳亞子對丁初我等人溫和派的言論，持反對的意見。他認為此輩人藉此模擬兩可的論調，無異是將女子培養成賢妻良母，只不過是要將婦女培養成「高等之奴隸」，在本質上還是屬於奴隸教育的內容：

今之言女子教育，吾固不敢以一筆抹盡天下，謂終無真能為女界謀利益者，然而大多數之緒論，則亦鑿聞之矣。明知女權、女學之當平等，而靈臺一境，魔鬼間之，則模糊兩可其辭以相誤，謂平等之中，終有不能探險造極之一微點在，而其相期於黃金之前途，不過曰：願得賢母良妻之一資格而已。夫男女平等之中，既仍有不平等之一境，則使遍中國二萬萬女子而盡具賢母良妻之資格，其為男子計，內助有人，儻來無慮固良得矣，而於我女界何利焉！……嗚呼！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教育普及於女界，亦徒為男子造高等之奴隸而已，甯有益哉？甯有益哉？¹⁸⁰

柳亞子提出一個有力的問題：賢妻良母於婦女何益？如果婦女受教育的目的，僅僅是為的成為男子的賢內助的話，那麼新女性相較於舊女性，僅是多了知識罷了，在家庭中依然扮演著與傳統婦女一樣是受人驅使的奴隸角色，在家庭之外，別無自我實現的可能。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柳亞子雖將賢妻與良母並舉，但是所抨擊對象，則集中在妻子的角色，母親的職責巧妙的避而不談。

柳亞子既站在女性利益的角度思考，便進一步呼求當時婦女勿以賢妻良母為滿足，而應當努力的充實學問，以實現自身的抱負：

嗚呼！我最親愛之二萬萬姐妹乎！我敢進一言。數千年所享受之幸福，若

¹⁷⁹ 初我（丁初我）：〈東渡之女學生〉，《女子世界》第十四期（1905.？），頁92（頁1344）。

¹⁸⁰ 安如（柳亞子）：〈論女界之前途〉，《女子世界》第十三期（1905.？），頁2-3（頁1132-1133）。

何矣？壓制之籠，處之果安也。奴隸之卮，飲之而果甘也。則吾復有何說？非然者，一髮千鈞，時乎不再，既知求學問矣。而學成之後，如茶如錦之前途，亦不可不好為想像。民族主義乎？共和主義乎？虛無黨主義乎？軍國主義乎？神州赤縣掃淨胡氛，銅像巍巍頭顱大好，非我姐妹之責，而誰之責耶？若跼蹐家庭，拘攣名義，求為一賢母良妻而自足，或恫於言論之惡潮而灰心喪志，則果烏用此學問為也。¹⁸¹

柳亞子認為婦女自我實現的舞台，不該僅限於家庭之中，他憑恃種族主義的呼籲，要求女子進入國家革命的行列，以自身的學識替國家社會貢獻心力。

丁初我與柳亞子在女性角色認定上的分歧，在女子從軍的議題上更為明顯。柳亞子認為女子既為國民之一份子，在社會上擁有與男子相同的地位，那麼應當親上戰場，實現女英雄豪傑的理想。丁初我採取不同的看法，認為女子應當為男子的後備，鼓勵男子上戰場光耀門楣：

且女子者，徵兵之後備也。有內助而兵志堅，有優遇而兵格貴，我女子其勿棄義務，我女子其善享權利。

勗爾子，勸爾夫，規勸爾兄弟，以光榮爾國，光榮爾家，光榮爾母、爾妻、爾姐妹。¹⁸²

與柳亞子相比，丁初我的言論則顯得保守許多。他依然將女性定位在一個輔助者的角色，女性的價值通過「為母」、「為妻」來顯現，她的光榮一部分需要靠他人的成就（夫與子）來彰顯，而不是自己去達成。

不僅是男性知識份子，對於將女性固著在賢妻良母的角色感到不滿，一些女性的辦學者也為文反對。蘇英在蘇蘇女校的開學演說中，言詞激烈的撻伐以賢妻良母為目的女學教育，並稱這些以賢妻良母為號召的辦學者為「女界之大蝨賊」，認為他們打著新學的旗幟，其內容確是傳統舊學，實在是比頑固的保守份子還可惡：

¹⁸¹ 安如（柳亞子）：〈論女界之前途〉，《女子世界》第十三期，頁4-5。

¹⁸² 初我：〈女子之對於徵兵〉，《女子世界》第十六、十七期，頁75。

照他們的希望，就使吾們同胞姐妹都講了教育，有了學問，到頭來不過巴結到一箇賢母良妻的資格，說什麼母教，說什麼內助，還是男子的高衙奴隸，異族的雙料奴隸罷了。……我期望我們校中的姐妹，總要握定一箇堅貞激烈的宗旨，做他日女軍人的預備功夫，一面研究國文，開通智識，發達這愛國思想，一面注重兵操，練習體魄，提倡這尚武精神。而且還要保存公德，扶助愛情，教那校中二十餘個姐妹，結成一箇人似的，互相磋磨、互相激勵，漫漫兒以小團體推到大團體，合群愈廣，勢力愈大。那時候振臂一呼，全國響應，就好排除異族，還我山河，實行那男降女不降的主義。就使貞德再世，瑪利儂重生，也要佩服我們姐妹的熱心毅力，這便是我區區的希望了。¹⁸³

蘇英的這段對賢妻良母的批評，混合了幾項元素：女權主義、種族主義與軍國民主義。她認為這些半新半舊的教育人，將女子教育成賢妻良母，對男子是有利的，但對女子而言，又有何利益呢？故她認為女性應當有自覺的擺脫依附男子為賢妻良母的依賴性，要自己去創造在國家社會中的價值，首先要進入政治當中，取得參政權與選舉權，婦女應當努力充實智識、培養公德與鍛鍊體魄，然後團結成群互相扶持，進而推翻異族，擺脫雙重奴隸的身分。

《女子世界》為集合眾人的刊物，由對妻職、母職與女權的討論中，可以發現《女子世界》存在著激進與保守兩股力量。通常來說，「國民母」的角色，是沒有爭議的，不管是激進派還是保守派都是贊成的，這也是《女子世界》中女性角色最主要的訴求。「女國民」與「賢妻良母」則分別佔據激進與保守光譜之兩端，激進者認為女性應該尋求自身的價值，她在社會上擁有與男性相同的權利與義務，應當做與男性相同的事情；保守者則認為就現階段而言，女性如能增進知識、強化體能，在家庭中扮演賢妻良母的角色，對國家與社會而言，便是一種最大的貢獻。

這場論爭的關鍵在於：如果女性作為母親與妻子，就能對家庭與國家有所貢獻，那麼身為妻母的女子，是否有必要走出家庭追求自我？而當女性走出家庭追

¹⁸³ 蘇英：〈蘇蘇女校開學演說〉，《女子世界》第十二期（1905.4），頁11-13（頁1043-1045）。

求自我之後，家庭的責任與家務又該由誰負責；支持女權的論者，女子既已接受與男子相同的教育，當然應當獲得與男子一樣自我實現的機會，家庭不該再是女子最終的歸宿與終極的關懷。而這場賢妻良母的爭論，爭執的是女性價值的體現，究竟是在為母親、為妻子，還是做一個人，這一議題從《女子世界》之後，仍然方興未艾持續不斷的進行著正反雙方的攻防戰。

晚清以後對賢妻良母身分，最強烈的反動，即是自願的獨身主義。晚清後的獨身主義（或稱「不嫁主義」），是婦女在家庭的妻子與母親的角色，與個人事業的自我實踐發生衝突，所做的另一種選擇。¹⁸⁴近代中國出現了不少自願獨身的女性，其選擇獨身的理由因人而異，但女性在婚後的生活與婆家的處境，是不少女性對婚姻卻步的主要因素。五四時期中國出現的娜拉熱潮，易卜生的戲劇經由翻譯傳進中國，《新青年》在1918年6月特別發行「易卜生號」，來介紹易卜生及其作品。娜拉在胡適等人的引介下，為中國知識界所認識。「像娜拉一樣出走家庭，追求自我」，成為五四時期婦女運動的潮流之一。¹⁸⁵女性在家庭與自我的抉擇，亦是討論的主要戰場。

至1930年代歐美國家在經濟大恐慌的環境下，提出「婦女回家」的口號。中國亦受其風潮影響，五四時期被期待出走家庭的中國娜拉們，被召喚回歸家庭作良妻賢母。30年代復古風潮吹起，在政治與經濟的影響下，再加上戰爭的緣故，復興傳統的聲浪瀰漫社會，提倡所謂的「新賢妻良母主義」，希望女性回歸家庭做好妻子與母親的角色。¹⁸⁶

女性在家庭與國家中的位置，隨著不同時期的風潮，亦有消長與變化。從晚清的賢妻良母、國民母到女國民身分的轉變，乃至五四的娜拉熱潮，到了1930年代被復古風潮所壟罩，在「婦女回家」的論戰中，女性被期許回歸家庭做賢妻良母，成為家庭的穩定力量。在近代的歷史中，中國女性不停地在家庭與自我中尋找適當的位置，也在妻子、母親與「我」的角色中尋找安頓自身的方式。

¹⁸⁴ 關於二十世紀前半期的女子獨身言論，參見游鑑明：〈千山我獨行？廿世紀前半期中國有關女性獨身的言論〉（《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9期，2001.8），頁121-187。

¹⁸⁵ 關於娜拉在中國的流行及其演變，參見許慧琦：《「娜拉」在中國：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變（1900s-1930s）》（台北：政大歷史系，2003）一書。

¹⁸⁶ 許慧琦：〈一九三〇年代「婦女回家」論戰的時代背景及其內容---兼論娜拉形象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東華人文學報》4期，2002.7），頁131。

六、小結

丁初我等人創辦《女子世界》的目地，是為了改良當時的女子，以促進中國的強盛。在面對當時即需改良的女子，丁初我等人藉由一篇篇的論說，針貶當時中國女子的弊病。他們開始對中國傳統的文化進行批判，努力藉由對「男尊女卑」、「三從四德」與「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梳理，找出中國女子處境卑弱的原因。一方面承認女子為傳統文化下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則鼓勵女子擺脫寄生蟲的依賴性格，讓自己成為新時代的國民母。

國民母是《女子世界》中最核心的婦女角色，女子被期望進入國家社會，成為拯救國家的未來希望。只是如何要讓女子由分利者變為生利者，由寄生蟲變為國民母，成為知識份子思考的議題。丁初我等人借用嚴復〈原強〉中提倡民力、民德和民智的方法，採取由智育、德育與體育三管齊下的方式，冀望女子能由舊女性過渡成為新女性。在智育方面，首先破除傳統「才德相妨」與「無才是德」的偏見，鼓勵女子進學堂接受新式教育，女子開始面對更廣泛的知識系統，除了文學以外，尚有地理、歷史、算學、家政、圖畫與音樂等等不同的知識領域，而傳統以口授的縫紉與養蠶等技術知識，也出現的以女性為對象的手工傳習所與專門學校，也更系統化的方式讓女子養成專門的知識與技能，為子女之經濟獨立奠定基礎。在德育方面，想要慢慢將女子由傳統的女訓中解放出來，在傳統私德的基礎上擴充，希望女子能進一步朝著公德的理想邁進，不將一己與一家的利益為優先考量，而是以國家社會的群體公益為主。在體育方面，建立一種健美的審美觀，肯定女子健康活潑的自然美。但纏足為中國女子特有之現象，成為推動體育時的重要障礙。知識份子站在衛生與健康的基礎上，鼓勵女子解放纏足並走出閨門，朝著運動場前行活動筋骨，如不能行動自如，也期望她能以簡易體操在日常家庭生活中試著操作，也達到伸展筋骨以強身的目地。知識份子相信在以「德智體」三管齊下的策略下，中國女子會逐漸擺脫其不良之習性，朝著完美的國民母道路前進。

只是隨著女學與女權的漸次發展，前衛的知識份子開始思索女性在母職、妻職與國民之間的平衡。國民母是以母職的角色出發，將女子由家庭母親的角色拉

至國家母親的位階，是屬於過渡階段符合大多數知識份子的女性角色定位。但對於賢妻良母的女性定位，特別是在妻職的角色上，知識份子則有不同的立場與見解。丁初我等人基本上肯定女性作為賢內助的妻子角色，柳亞子則不以為然，認為鼓勵女子受教育成為賢內助，只不過將雙重奴隸變為高等奴隸，於女性自身並無益處。直至五四以後，這種對於妻職與母職的爭論，依然成為女性角色定位重要的議題，許多的知識份子都參與其中發表自己的意見，婦女在家庭與國家中的身分，自晚清以後成為知識份子的關注的要點。

第三章 打造新家庭：婦女居家知識的更新

一、前言

晚清的知識流動是廣泛而駁雜的，《女子世界》的編輯群們則挑選了與婦女生活相關的類別，進行翻譯與介紹。這些知識大多來自西方與日本，希望藉由期刊的推廣，進入婦女的知識體系當中。¹《女子世界》在第五期開始，增設了一些新的欄目，例如教育、實業、科學與衛生等，主要是針對女性讀者所開闢的，引介的內容被認為是婦女生活所需要的知識，《女子世界》在第四期的最後刊登啟示：

本誌下期大改良，前四期趨重文學，尚少實業，自下期（第五期）始加入科學（自然科學之有裨女子智識學業者）、衛生（注重家庭及育兒保產之方法）、實業（述刺繡、裁縫、手工諸項之裨益生計者），三科立說，務求淺易，裨閱者人人能曉解，人人能實行，為女子獨立自營紹介焉。

第五期後面重登此啟示時，又加入了教育一條：「教育（演解女子及家庭之教育，以改良陋習養成學業為主）」。由其後所刊登的文章來看，衛生欄主要講述人體的各個部份，例如齒、腦、心、耳、鼻、舌與眼等，以專文詳加介紹；實業欄則有〈裁書〉、〈料理新法〉、〈薄荷栽培製造法〉與〈普通寫真術〉等文，對剪裁衣物、飲食料理及其他的技術，提供入門的方法；科學欄則是對熱學、電學以及植物學的內容加以介紹，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女子世界》在第十二期以後，便沒有了「衛生欄」，與人體衛生相關的〈神經系統之衛生〉與〈說觸覺器〉二文，則被

¹ 在《女子世界》這些欄目的文章，常註有「譯稿」的字樣，有些只有翻譯者的名字，而沒有原始作者的姓名，故只能得知其由翻譯而來，不知其確實的出處為何；有的則直接標舉作者的名字，而省略譯者的名號，例如〈演熟〉一文，就明確的指出作者為「日本女子大學講師高田濱子」。除了對於文章出處並無詳加記錄之外，翻譯者在譯介之時，也常以己見加入譯文之中，故造成至現今學者於考索源頭時，實有其困難之處。

歸入了「科學」欄中，而在科學欄的其他文章中，也可以看到科學與衛生的相關之處。至於教育欄，則主要有〈女子社會教育的方法〉、〈為母的心得〉、〈女子簡易體育〉、〈育兒法〉、〈家庭的職業教育〉與〈兒童教育法〉等文，其內容大多有教養兒童與女子相關。

第五期以後新增的欄目，其內容即以家庭日常的知識為主，由衛生、食衣住與育兒等內涵相關，這些增加的欄目，除了是要讓婦女得到獨立營生的新知之外，丁初我等人的目的主要是在「改造新家庭」。丁初我在第十一期的〈新年之感〉一文中，就提出「新家庭理論」。他認為婦女在家庭當中擔任主婦（妻子與母親）的角色，要注意讓家庭維持和樂的氣氛，身為母親要知曉教養孩子的方法，身為一家的主婦，則要知道自己掌握一家人的身體健康，要在衣食住行與經濟等方面，透過學習新知，努力打造新家庭。²

《女子世界》中對於居家知識的介紹，大多順著現代衛生概念來進行，藉著對日常生活習慣的改變，要婦女改除傳統的不良習性，以衛生為準繩，開始進行一種新式家庭生活的改造運動。本章即以這些知識的輸入，討論《女子世界》中如何透過對新身體的建構，企圖讓讀者認識一個現代的身體樣貌——符合醫學衛生的身體。再者，婦女在家庭中通常擔任主婦的職務，如何藉由期刊對於日常生活中飲食穿衣與居住衛生方面的介紹，開始學習一套居家的新知識，做一個現代的新主婦。最後，「母親」仍是當時女性常被賦予的身分，在《女子世界》中也針對育兒的方法加以介紹，透過對外國知識的譯介，企圖輸入新的育兒知識，讓中國能夠有健康的下一代。

二、認識身體保健：「衛生」觀念的引進

晚清之前的中國，通常透過中國傳統醫學來理解人的身體，但隨著西方傳教士的東來，西方衛生醫學便進入中國人的生活當中。³在不少傳教士的紀錄中，

² 初我（丁初我）：〈新年之感〉，《女子世界》第十一期（1905.2），頁 4-5（頁 946-947）。

³ 何小蓮認為，「教育、出版、醫學是晚清以來基督教傳教士間接傳教的三大途徑」，伴隨著傳教士在中國創辦醫院與傳播醫學知識，中國人的醫療觀念與醫病關係也開始與傳統產生裂變。參見何小蓮：〈西醫東傳：晚清醫療制度變革的人文意義〉（《史林》2002.4 期），頁 66-75。楊念群認

都提及中國人「不衛生」的形象。中國知識分子由西方衛生的觀點來察看中國，也發現中國人在公共衛生與個人衛生方面，都有需要改進的地方。⁴在晚清的報刊與書籍出版方面，知識分子開始大量譯介西方衛生的概念與書籍，⁵教導中國人重新學習以衛生的方式保健身體，以達到強國強種的目地。⁶

衛生的定義，從晚清到民國許多人都給予不同定義，而究其內涵大都與「保衛生命」相關。羅芙芸（Ruth Rogaski）認為「衛生」二字，在中國早已有之，最早在《莊子》的〈庚桑楚〉中就可以看到，但在二十世紀以前的中國，「衛生」的詞意常與「保衛生命」的養生術畫上等號：「從 19 世紀中期至 20 世紀中期，衛生（weisheng）被譯為很多不同的詞匯和短語——健康、衛生、生理學、營養、清潔、醫藥、保護內在生命力、衛生科學、促進繁殖、公共衛生以及戰勝死亡，命名——從而也是問題所在。最後，這個詞指的是人類為確保健康而可能採取的行為。」⁷稍早於《女子世界》出刊的《江蘇》，在第一期到第四期中也開闢「衛

為「『衛生』觀念的引入改變了中國人對疾病與環境關係的看法。原來中醫理論認為疾病的發生只與不正常的天氣、無節制的飲食以及惡鬼的存在相關，而到了 20 世紀初期，『是否衛生』已成為評價城市文明程度的標準，疾病的發生與城市環境建立起了直接相關的聯繫。」見楊念群：《再造「病人」：中西醫衝突下的空間政治 1832-1985》（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頁 233。

⁴ 英國傳教士維魏林初抵上海時，便對中國人居住環境之髒亂印象深刻。1962 年上海爆發霍亂的流行，西方人用現代細菌學的角度來觀察上海，發現中國人「不衛生」的生活習慣，是導致疾病流行最主要的原因。1870-1880 年代伴隨著西方對中國人生命統計數字的公佈與顯微鏡知識的影響，中國的菁英份子已普遍認同中國人「不衛生」的形象。參見胡成：〈「不衛生」的華人形象：中外間的不同講述——以上海公共衛生為中心的觀察（1860-191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6 期，2007.6），頁 6-14。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當西方醫生對中國人的不衛生加以批評的同時，英國傳教士醫生德貞（John Hepburn Dudgeon, 1837-1901）卻有不同的見解。德貞初來中國之時，眼見中國人的生活習慣，深感其髒亂與不衛生至無法想像之地步，但他驚訝的是，中國人何以在這種環境中，有的卻依然身體健康不為熱病所苦，他認為中國人的飲食習慣與生活作息規律，再加上傳統養生觀念的實踐，使中國人即使處於不衛生的情況，依然不容易生病，並鼓勵西方社會應當學習中國人的經驗。在晚清知識份子主張向西方學習的同時，德貞的「向中國學習」是當時言論界的異數。參見李尚仁：〈健康的道德經濟——德貞論中國人的生活習慣和衛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6 本 3 分，2005.9），頁 474-481。

⁵ 張仲民研究晚清衛生書籍的出版現象，整理出了生理衛生書籍與生殖衛生的出版書單，可見晚清衛生書籍出版之種類與數量之多，並且歸納發現，在十九世紀末以前，中國的衛生書籍大多由傳教士出版，但至二十世紀以後，則由中國知識分子主導書籍的翻譯與出版。附表參見張仲民：《出版與文化政治：晚清的「衛生」書籍研究》（上海：上海書店，2009），頁 114-121、184-188。

⁶ 雷祥麟發現，直到民國時期「中國朝野對這種『個人衛生』的重視，正是對這種東方主義式的 John Chinaman 的形象的集體抵抗，個人衛生從而成為二十世紀鑄造『新民』、『新生活』的重要成分之一。」見雷祥麟：〈衛生為何不是保衛生命？民國時期另類的衛生、自我、與疾病〉（《台灣社會研究季刊》54 期，2004.6），頁 41。

⁷ 參見羅芙芸著；向磊譯：《衛生的現代性：中國通商口岸衛生與疾病的含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頁 17。張仲民認為：「衛生一詞從 1880 年開始流行，逐漸為晚清各界廣泛使用，這體現在從報刊論述到日記、書信、教科書、竹枝詞、小說、廣告中，而且不同的人對之有不同的用法，其中很多人使用的一直是其『保衛生命』之意。」見張仲民：《出版與文化政治：晚清的「衛生」書籍研究》，頁 79-80。

生」的欄目。⁸三、四期中刊登了普澄的〈衛生學概論〉，可為當時衛生學內涵討論之佐證。普澄認為西方文明之國，特別是英國在公共衛生方面，是其他各國之模範，反觀中國則街道汙穢屎尿遍地，飲水不潔，導致疾病的流行，實為文明落後之表現，故他認為「中國而不欲改革則已，苟欲改革，必自注意衛生始。不然者，且不能戰勝於天演，又烏能與列強相抗耶！」⁹而衛生之範圍，則可粗分為公共衛生與個人衛生，認為衛生與醫學相關，並涵容其他不同的科學內容。他反駁一般人以為衛生被包含在醫學之內的觀點，反而認為應是醫學被涵括在衛生的範疇之內：

世人有以衛生學為醫學之一部者，是又坐井觀天之失也。推其所以，蓋以醫學為療病之學，而衛生學亦為去疾之一端也。醫學以保全軀體為主，而衛生學亦以不害健康為目地。也不知醫學者治已發之疾病，衛生學者防未來之疾病者也；醫學者務保固有之健康，衛生者且增未有之健康者也，是衛生不屬於醫學者明矣。雖然自方法言之，衛生學與醫學故不相同，自宗旨言之，衛生學實足以括醫學也。既曰：保全健康，則固守未失之健康，恢復已失的健康，皆得謂之保全者也。僅能固守未失之健康，不知恢復已失之健康者，猶未盡保全之道也，故無醫學不得謂完全之衛生學，醫學實補衛生學之不足，直謂之屬於衛生學可也。¹⁰

由普澄的定義可以知道，衛生主要是指「用正確的方法，預防疾病的發生或恢復身體健康的方法」。在公共衛生方面，則需設立專責機構，以負責疾病的流傳、乾淨飲水與污水設施的建立，設置醫院以醫治病患，並致力宣導衛生觀念的普及。個人衛生方面，則由認識身體始，知道保養身體的方法，以預防疾病的發生，或增強自身健康有缺失的部分。

如以衛生的範疇觀之，《女子世界》所刊登的內容是以個人衛生為主。在其

⁸ 《江蘇》是1903年4月在東京創刊，至1905年停刊，一共發行了十二期。衛生欄僅出現第一期到第四期，總共有兩篇文章，一、二期刊登上海魂〈說腦〉上、下篇，三、四期則是普澄的〈衛生學概論〉。

⁹ 普澄：〈衛生學概論〉，《江蘇》第三期，頁79。

¹⁰ 普澄：〈衛生學概論〉，《江蘇》第三期，頁82-83。

衛生的欄目中，關於人體器官的介紹，主要的譯介者為「長生」，¹¹引進當時西方與日本衛生保健的知識，讓女性讀者介紹人體的腦、心、齒、耳、鼻、舌、眼與神經系統等等衛生保健的方式。在第五期講解完飲食的衛生科學之後，¹²長生接著在第六期介紹與飲食最相關的部份——牙齒，長生在前言中說：「余前期既將食物之要，介紹於女同胞矣。又思與食最有關係，而人所易忽者，厥為齒，茲述齒之衛生之要。」由前言中可以看出，長生的文章是以女性讀者為預期讀者，講述時也以衛生保養為首要之務，並教導讀者正確的認識牙齒的結構與保養的方法。¹³文章一開始，以預防保健的觀點，提醒太太小姐們趁牙齒尚未蝕壞以前，便要注意保養的方法，不要等到牙齒掉落以後，方去外國醫生處裝置假牙以補救。文中並說明牙齒之所以會蝕蛀與疼痛，主要是因為齒縫中藏有食物碎屑，產生微生物破壞牙齒：

齒的職司，便是將所食的東西嚼碎。假使齒縫內及齒根處，留下不少碎物，不洗刷乾淨，便有一種黴菌（一名微生物）附在上面。……所以牙齒尚衛生的理，第一是常常洗刷乾淨，第二是將食物漫漫嚼細，然後嚥下。……人的牙齒，石灰的分數最多，最容易損壞的，便是酸質……齒縫中及齒根處，留下了碎物，腐了便化成一種酸味，於化學上，這種便叫酸化，最能腐蝕齒的。¹⁴

¹¹ 此外還有「自立」的〈說心〉，與「不老」的〈說觸覺器〉。此三筆名在《女子世界》的科學與衛生欄目中，常可見到其文章，不過由於資料有限，究為何人實不可考。不過依筆者推測，自立與長生應為同一人之筆名，長生在第五期〈說食〉中署名，第六期〈說齒〉一文中明顯提及第五期的〈說食〉一文，第七期又撰寫〈說腦〉一文，第八期〈說心〉一文下未署名，但文中又提及〈說腦〉一文，第九期〈說心〉為第八期的續集，但卻署名「自立」，而正文也加註「承前」字樣，故自立與長生應為同一人之不同筆名。夏曉虹在討論「自立」時曾言：「還有一位以“自立”為筆名的作者，從《女子世界》創刊起，便活躍於談藪、社說、演壇、科學、衛生諸欄，最多時，一期可跨越三個欄目。這種每期必見的紀錄一直保持到第十三期，其人也成為在“初我”之外出現頻率最高的撰稿人。只是目前還無法找到可靠的材料確定其真名，誠為憾事。而從雜誌中可以獲知的是，「自立」為男性，通日文，對自然科學很有興趣，與金一為友。」參見夏曉虹：《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頁 74。另外，《女子世界》第七期中有長生〈說腦〉一文，《江蘇》一、二期中，則有標註「以日本小林義直所譯《生理養生論》為藍本附以它說」由上海魂撰寫的〈說腦〉上、下篇，兩文內容上有其相似之處，只是行文上，上海魂以文言出之，長生以白話居多。兩人是否同為一人之不同筆名，由於筆者現材料不足，無法考證，此處提出疑問，以待來者。

¹² 關於飲食部份的內容，將於本章下一節討論。

¹³ 在〈說齒〉下加註為「譯稿」，但長生並未說明原文出處為何。見長生：〈說齒〉，《女子世界》第六期（1904.6），頁 45（頁 519）。

¹⁴ 長生：〈說齒〉，《女子世界》第六期（1904.6），頁 46-48（頁 520-522）。

長生用淺近的語言，將牙齒蛀蝕的原理說解，以期女性讀者能夠了解蛀牙發生的原因。既以知曉其蛀牙是由食物的殘滓所引起的，那麼日常的牙齒清潔就顯得格外重要：

欲免種種的齒病，於睡時及晨起，用稀薄的石灰酸，沖入溫水中，緩緩含嗽吐出。濃重的石灰酸，食了害身體，稀薄的較可，總以不要嚥下為是。現在各國於齒的衛生上，有通用的兩種物，一種為細楊枝，一種為擦牙粉。細楊枝，我們國內也有，蘇州風俗考究的酒筵上，食至中間，便有牙簽送來，以便將留下的物剔去，這確是衛生的意思。楊枝質軟，不致將齒質損傷，現在人家有用金類作牙簽的，其質過硬，實不宜於衛生。擦牙粉，東西洋俱有出售，售價極便宜，而質粗惡的，實不適用，用了或磨損齒上的琺瑯質。此琺瑯質在齒的上皮部，一被磨損，則齒必漸軟，所以擦牙粉最妙由齒科醫檢定，用之方不受害。擦的方法，須將齒的全面擦淨，即裡面、外面、咀嚼面，皆須擦到。擦的時候，莫適宜於夜間睡的時候擦淨，以及朝上起來的時候擦淨，食過飯後擦淨，皆最有益的。¹⁵

現代生活中的牙齒保健，在這文章中已經可以看出，為了避免牙齒酸化導致蛀牙，刷牙習慣的養成是關鍵，刷具不宜過硬以免適得其反的傷害牙齒，而刷牙的時間，宜在睡前、起床後與用餐後，如此方能避免蛀牙與牙痛。除此之外，也要養成定期看牙醫的習慣，「大約五六個月，診察一次，便可保全齒的腐蝕了」。¹⁶

有趣的是，〈說齒〉在一開始就已註明為譯稿，但長生在文中則加入的蘇州人的生活習慣以為佐證，這明顯不是原文的內容，而長生加入此段的原因，一部分自然是使讀者讀來有其親切感，另一方面則反映了晚清對翻譯的態度。以現今的角度來看，晚清時期對於翻譯的態度相對而言是自由的，更多時候譯者認為為了切合中國國情，必要性的增刪一些內容是被允許的。¹⁷有些翻譯者是以文化中

¹⁵ 長生：〈說齒〉，《女子世界》第六期（1904.6），頁48-49（頁522-523）。

¹⁶ 長生：〈說齒〉，《女子世界》第六期（1904.6），頁49（頁523）。

¹⁷ 澤田瑞穗在研究晚清翻譯小說時發現，當時知識份子在翻譯外國文學時，有的僅翻譯原作的情節大綱，其內容則翻譯者依己意創作；有的則任意的意譯、節譯或刪譯，將長篇巨作濃縮為薄

介人的角色自居，對原文進行增刪以符合讀者需要，被視為是一種義務。¹⁸以此觀之，《女子世界》中對於譯稿出處的交代不明，以及在文中增加中國式的經驗，讓讀者更能理解文中之義，被視為是一種合理的行為。

而接下的幾期由〈說腦〉開始，長生開始對人體的其他器官加以解說。關於腦的部份，在概說中長生澄清中國語彙中認為心是思考的器官，是不正確的：

姐妹們，今日要同你們辨明一句話。這句話，關係甚大，卻僅有兩個字，叫心思。心思為什麼要辨明呢？考究生理學的人說過，人的心是不會思想的，思想是從腦內出來的。¹⁹

接著他便說明，腦的結構為大腦、小腦和延髓。並以實驗為例，說明各個部份所掌管的功用不同，大腦掌管人的精神思想，如果將蟾蜍的大腦割除，丟至水中則無法自由游泳，但是牠的呼吸不變，但若沒人去翻動牠的話，他便會一動不動，相同的道理，人也是一樣的，如果大腦受到損傷的話，「往往昏迷惑亂，內裡不能發出運動力，狀若睡眠，一點沒有精神」。²⁰小腦則是負責執行大腦所知覺的動作，例如皮膚癢動手去抓，癢是大腦所知覺的，動手抓則是小腦負責去支配的。延髓延伸下來十二對神經系統，掌管著人體不同的知覺與運動。腦對於人身而言，是至為重要的，在保養上以睡眠為最重要：

睡眠的時候，當依著人的年紀定局。自一二歲到七八歲，大抵要十二點鐘。自八九歲到十四五歲，大抵要十點鐘。成年以上，大抵要七八點鐘。若年紀老了，睡的時候更要加些，因為精神發育較鈍，不甚活潑的緣故。再有

薄一二冊；有的翻譯者，甚或不列原著者之名字；有的雖名為翻譯或改編，確以創作的姿態出版，晚清這種翻譯的現象，澤田瑞穗稱之為「豪傑譯」。晚清知識份子的豪傑譯，有其不同的考量，有的想藉文學作品宣傳政治運動，有的則藉由翻譯作來達到啟蒙國民的目地，故其隨意增刪以符合其目地的情況則屢見不鮮。參見澤田瑞穗：〈晚清小說概觀〉，收入林明德編：《晚清小說研究》（台北：聯經文化事業，1988），頁 54-57。

¹⁸ 孔慧怡即認為：「20世紀初的小說譯者並沒有受到『忠於原著』這類思想規範的影響，也不覺得自己就譯作而言所占的地位比原作者低；當時的譯者是兩個文化的中介人，利用他們的專長，在社會上實踐教育民眾的任務，因此剪裁作品以適應讀者的需要不但是他們的權利，也是他們的義務。」見孔慧怡：〈以通俗小說為教化工具：福爾摩斯在中國（1896-1916）〉，收入孔慧怡：《翻譯·文學·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頁 25。

¹⁹ 長生：〈說腦〉，《女子世界》第七期（1904.7），頁 49（頁 625）。

²⁰ 長生：〈說腦〉，《女子世界》第七期（1904.7），頁 51（頁 627）。

睡起的時刻，亦甚要緊，須在什麼時刻呢？必需在太陽已在地平線上，即行起身，開放窗戶，吸取新鮮空氣，最為得益。比之眠晏起遲者，有天淵的分別，不論什麼樣人，都要明白這種道理纔好哩！²¹

除了充足的睡眠之外，適當的腦力訓練也是很必要的，訓練的場所不必侷限於學校，任何的地點都可以進行腦神經的刺激與訓練。適當是很重要的，過度用功與刺激反而會造成腦神經的衰弱，引起失眠與種種腦神經的病變。²²

無獨有偶，在《江蘇》第一期與第二期中，也出現〈說腦〉一文，其下註明乃是「以日本小林義直所譯《生理養生論》為藍本附以他說」，可見其中亦有譯者自我發明之處。就行文來看，《江蘇》針對的對象是教育程度較高的知識份子，譯文以文言出之，並附上解剖圖以解說人腦、魚腦、鳥類腦與爬蟲類腦之不同。在篇幅上，《江蘇》的〈說腦〉明顯長於《女子世界》中的〈說腦〉，在《女子世界》中長生只簡單交代了「腦的解剖」、「精神的發達」、「腦的衛生」與「夢」四個部分，《江蘇》中則將十二對腦神經仔細解說其功用，並時時用中國儒家的話語以區別「心」與「思」之分別等。以此觀之，《女子世界》的譯者在面對女性讀者時，針對其閱讀能力，在翻譯時不僅加入中國式經驗以為佐證，在用字遣詞上也盡量以淺白的語句書寫，為避免文章過於冗長，並做了適度的刪減與調整。

一方面為了使身體衛生的方法能為女性讀者簡單掌握，《女子世界》「衛生」欄的文章，通常在說解完各器官的結構與作用之後，常將衛生的法則以「條列式」的方式羅列，讓女性讀者分條記憶。在〈說心〉、〈說耳〉、〈說鼻〉、〈說舌〉與〈說眼〉等文中，皆是以條列式的方式，讓女性讀者理解衛生的方法。例如〈說心〉一文，即先解說心臟乃是掌管全身血液的運行，經由動脈與靜脈將全身的血液運入或送出心臟，關於心臟的保養，則有九項細則可遵守：第一，不要穿著過小的衣服，以免壓迫到心臟；第二，每日要做些體操，以促進血液的循環；第三，行

²¹ 長生：〈說腦〉，《女子世界》第七期（1904.7），頁54（頁630）。

²² 長生舉東西洋學校中的學生與教員，常患腦神經衰弱的病症為例：「東洋西洋的各國，不祇大專學校專門學校的學生，就是受普通教育的中學生，或者沒有卒業，成了病體，或者卒業的時期，卻告了病假，這個得病的原因，都由過度用功所致。學生、教員、律師等，常在一室內作事，多使用腦筋，是以多生腦病，遂致神經衰弱。況且另外加病的緣故，更不止一端，室內的不清潔，煙酒的無厭，蜷伏一處，空氣的不更換，夜過十二點不睡，朝晨到九點十點起身，夜間食物過飽，都是致病的原因。胃腸肝臟，本種種惡習慣，成了一種變狀，精神的動作，既然有害，神經自然也受病了。」參見長生：〈神經系統之衛生說〉，《女子世界》第十三期（1905.？），頁16（頁1146）。

動不宜乍行乍止，以避免血液快速流動或停止，造成的貧血與充血的徵狀；第四，避免劇烈運動，導致血液流通快速，造成的破裂；第五，要小心留意發燒引起的心跳加速；第六，身體如有出血，宜清洗乾淨以繃帶包裹；第七，如遇刀傷出血，則先觀察其血液顏色，「如其血色鮮紅，流出不止，便是動脈的血，急將心臟側，用腐棉圍裹，緊緊縛住，止其出血的路；如其血色暗紅，便是靜脈的血，洗淨出血處，用棉布壓緊，即可止血；如其出血不多，便是毛細管出血，以石炭酸或冷水洗之，或用布壓之，這就是止血之法」；第八，茶酒雖然有助發血，但不可過度飲用；第九，菸葉內含有毒物質，必須戒除。²³這些對心臟的保養觀念，有的到現在仍然在被遵行著，適當的運動與正確的止血方法，以及少喝刺激性的酒、茶等飲料，還有戒菸等等，對於心臟的日常保養，從晚清開始便影響至今。

〈說耳〉則說明人能聽到聲音，主要是耳朵透過聽神經將聲音傳達到腦內。耳朵的結構，分為外耳、中耳與內耳。如果耳朵受損的話，則會導致聽力的喪失，「即不解語言，與啞人無異」，²⁴故耳朵的保健也是相當重要的：

姐妹們，欲耳的健全，這個衛生的法子，便不可不考究。我將各事列後，請留心看看啊！一、不可感觸極冷極熱，皆能損傷其神經。二、除耳垢，不可用竹木簪頭，恐損皮膚及鼓膜，宜注入微溫湯，仔細去之，又不可用冷水。三、蟲入耳內，宜注少許油液，使其死去，然後溫湯洗之，決不可用刀捲去耳毛，最要最要。四、聲音的感觸，亦宜留意。五、耳漏由於不潔，故入浴時候，須以水刷其周圍，不可浸入水內。六、耳若生疾，急宜就良醫療治之，不可怠忽。²⁵

這些衛生保健的方法，以日常生活中常觸及的狀況入手，例如除耳垢時應當注意的事項，洗澡沐浴時應當要小心的部份等等。

嗅覺的產生，乃是因為氣味經由鼻腔內的嗅神經，傳達到腦內，讓人能分辨各種的氣味。與聲音一樣，氣味也是藉由空氣傳導，鼻子的結構分為兩部份，外部突出分為左右兩孔為鼻孔，內部為鼻腔，鼻腔貫通鼻孔下接咽喉，鼻腔內布分

²³ 長生：〈說心〉，《女子世界》第九期（1904.9），頁36-37（頁804-805）。

²⁴ 長生：〈說耳〉，《女子世界》第十期（1904.？），頁36（頁892）。

²⁵ 長生：〈說耳〉，《女子世界》第十期（1904.？），頁38（頁894）。

散著許多鼻毛與粘膜，即為嗅神經分散之處，內部並有軟骨以保護鼻子。日常生活中，對於鼻子的保養有幾項原則：

嗅神經愈用愈銳敏，切不可久置不用，若常把鼻孔塞了，神經便要遲鈍。今將衛生的法子，逐件舉來，請各位看看。第一，鼻腔內密生的硬毛，以防吸入穢氣，保護粘膜，故不可用刀薙去，否則易受感冒。第二，凡有惡臭，留心迴避，以免嘔吐而害呼吸。第三，每朝以冷水或溫湯通鼻腔，令其粘膜強壯，初時雖覺微痛，習慣了得益不少。第四，嗅神經較他經較弱，如觸了汙穢的氣，須時時吸入新鮮空氣，使他的官能，容易復舊（置一香物於室中，久而久之，即不覺為香，就是嗅神經疲勞的緣故）。第五，鼻粘膜亦受刺激，所以氣候變遷的時候，須要留意，以防感冒，若粘膜腫脹，塞鼻道而杜空氣，或粘膜過於乾燥，便致嗅覺不良。第六，不獨鼻煙萬不可用，恐至鼻粘膜肥滿或乾燥，即尋常煙酒，亦易受同等的害。²⁶

鼻子的保健，除了保持鼻腔內的清潔之外，對於氣味的嗅聞也要特別注意，極度刺激的氣味容易引起嗅覺的疲勞，導致嗅覺的遲鈍與退化。而在氣溫變化的時候，也要注意鼻粘膜的防護，以免引起感冒等不適的症狀，另外煙酒也要絕對禁止，以免讓嗅覺受損。

人的味覺則由舌咽神經掌管，透過口腔內的舌頭，讓人能品嚐食物的甘苦鹹酸等滋味。舌頭上分布的大小突起的乳頭，分為三種，一是輪廓乳頭，主要分泌黏液；一是線狀乳頭以及蕈狀乳頭，這些不同的突起乳頭與神經相連接，故人能品嚐出各種食物的滋味。為了能愉快的享用食物的滋味，這味覺也要好好保健才行，一共有五個原則需要掌握：第一，少年時不可偏食一種食物，而年長後則不宜雜食，酸甜不忌，兩者都容易導致味覺疲勞；第二，嗅覺與味覺相通，味道過於濃烈之食物，則不宜多吃；第三，適度的運動，能促進食慾；第四，酒與辛辣香料，不宜多吃；第五，與心臟的保健相同，菸酒等也會對味覺造成傷害，應當禁止為佳。²⁷

²⁶ 長生：〈說鼻〉，《女子世界》第十一期（1905.2），頁38-39（頁980-981）。

²⁷ 長生：〈說舌〉，《女子世界》第十一期（1905.2），頁41-42（頁983-984）。

講述過耳、鼻、舌之後，長生接著介紹眼睛的知識與保養之法。相較於中國，西方的眼外科發展的較早，得力於解剖學的發達，讓眼睛的內部結構能為所知曉，晚清時期中國最早的眼科診所即是傳教士所開設的，開始用外科的方法，治療中國人的眼疾。²⁸以眼睛的結構來看，可粗分為內部、外部與附屬器。內部又有三層被膜與三層曲折體，外部則有淚腺與眼球筋二種，附屬器則指眉毛與眼瞼。光線透過三層被膜與曲折體，傳達到視神經，產生影像使人能分辨物品的面貌。在視力的保健方面，長生列舉十六點細則：

眼睛若不保護，便要成病。茲一一臚舉如下，務勸各位要留意。一，眼忌驟用驟息，以致視力衰弱。二，虹彩應光線強弱，而為張翕，光線變動，最要趨避，若暗處忽覩大光，晨興藉燈火讀書，或陡起窗戶，致日光射入。三，斜視物體，日久成斜視眼，若雙眼鬪視，或上下圓轉，皆能害目。四，遠物近物，宜交換而視，免致成病。五，每朝宜以微溫湯，或冷水洗目，以保清潔。六，有物入眼，宜引病人於明處，一手開眼，一手以軟布輕拭尖端，不可撫摩。七，暗處披書，凝視細字，皆令人近視。八，夜間燈光須亮，最好有罩，使不直射。九，讀書習字，不可偏倚，眼接桌面。十，久視一物，便要目倦，故若干時，須向屋外樹木或畫圖一看，時以冷溫湯洗之。十一，不可使烈光線刺目，凝視日蝕，便致失明。十二，旅行沙雪中，宜帶墨晶或藍色玻璃。十三，久圍爐火，暖烘下部，上薰害目。十四，車上或行走，不可看書，因其時常搖動。十五，讀書作事，光線俱宜從側面射來，不可迎面射入。十六，煙酒害目，俱宜切戒。²⁹

這十六項細則，大都是日常生活中的眼睛衛生的保養方法，例如讀書時應注意姿勢，在光線驟變的地方，要注意眼睛的適應。其他如清潔的部份，以及眼球有異

²⁸ 根據何小蓮的研究，「早在 1820 年，英國傳教士馬禮遜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與東印度公司醫生李文斯頓 (John Livingstone) 在澳門開設一家眼科診所，是為基督新教在華行醫施藥的開始。幾個月內，診所便為 300 名病人施診。1827 年，馬、李與新來華的郭雷樞 (T. R. Colledge) 醫生，在澳門開設眼科醫院，主要為窮人施診，主治眼病，兼治他病，來診者每天平均有 40 人之多，澳門附近亦有人前往就診。據統計，從 1827 年到 1832 年 10 月，5 年之中，共治癒 4000 餘人。」參見何小蓮：〈西醫東傳：晚清醫療制度變革的人文意義〉，頁 67。

²⁹ 長生：〈說眼〉，《女子世界》第十二期 (1905.4)，頁 43-44 (頁 1075-1076)。

物進入時的處理，都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

為了因應女性讀者的閱讀，在譯介這些身體知識時，通常採取的策略就是以近似口語的方式敘述，避用艱難的字彙，盡量以淺白的文字出之。為了配合理解文中的要義，適當的採用中國式的經驗說明，讓讀者容易了解，也是常用的書寫策略。而條列式的羅列，看似零星散亂，但卻能使女性讀者有按圖索驥的便利，以應付日常生活中突發狀況，也有助於成為日常生活的保養法條，更容易在生活中實踐。

不過，衛生欄目雖是以主婦為預設的讀者，但卻無專章討論婦女的生理衛生，例如生產與月經等。³⁰關於女子衛生法的部分，主要討論運動健身與反對施粉兩個面向。不少有志之士為了要讓女子能夠運動強身，開始提倡日常生活中的體育實踐，亞華提倡的女子簡易體操，就是希望女子能在日常生活中便於施行。³¹自立也認為運動不一定要大費周章式的進行，在每天的生活中心中固定安排一些簡單的體操來進行，不僅容易施行也容易持之以恆。而最簡便的方式，就是養成飯後散步的習慣，於身心都是有益的：

我今日講一個最普通的運動法，不論男女老少，通通做得到，就是飯後散步的一事，心中一點不想什麼，慢慢的走路，看那青翠的草木，高下的山谷，愉快不愉快呢？但這個時候，決不可存一點憂愁的心腸，務要排除一切，方有利益哩！普通的體操術，最有益於身體，日日操一次或二次，限定時刻，可稱完全的運動法。不獨男子應得習練，就是女子於健康上，行了也定有效驗。不要聽了人家瞎說，學習體操，很難為情。男女的身子總是一樣，原不能把這種事情，都推在男子身上，說與女子總是不相干的哩！

32

³⁰ 即使是民國時期的《婦女雜誌》為讀者所開闢「醫事衛生顧問」專欄，由現存的資料顯示，大多的問題都與外在形象有關，例如過胖、發育不良與體味等，對於女性生理現象雖有信件提及，但仍舊是屬於少數。見張哲嘉：〈《婦女雜誌》中的「醫事衛生顧問」〉（《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2期，2004.12），頁154-155。

³¹ 亞華〈女子簡易的體育〉中言：「看來女子身上種種的缺點，一半本於先天的，一半成於後天的。要想矯正這般的弊害，訓練發達到完全地步，自然要天天實做體操的功夫，還有些效驗。咳！現今的女子，那能箇箇進學堂，又安能家家去請教師。吾想運動遊戲的法子很好，人家買本遊戲教科書來看看，也可以半當玩耍，半當正經的事情做去，著實有益身體弗少。」參見亞華：〈女子簡易的體育〉，《女子世界》第十期（1904.？），頁22（頁878）。

³² 自立：〈實用話〉，《女子世界》第十二期（1905.2），頁10-11（頁1042-1043）。

「飯後散步」對應於從前「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論述，賦予婦女每日走出家庭的合理性。以衛生保健為後盾支持，婦女出門不再是不守婦道的表現，而是合於衛生的現代生活方式。每日散步除了有助於身體的運動之外，外出也是實際與外界接觸的方式，婦女可以親見外在社會的變化，擴展自身的見聞。而出外走動也能呼吸新鮮空氣，對於身心都是有幫助的。

另一方面對於女性衛生的焦點，則集中對於女性施粉的行為上。當時的知識份子以衛生的角度，勸戒女子勿要施粉，因為這些修容粉的成份是不安全的，對人體有危害的。陳志群分析修容粉的成份，認為粉末製造的過程不潔，且其中所含之鉛毒，對於身體健康是有損傷的：

我國女子所用之面粉，為炭酸鉛（西洋面粉則係炭酸亞鉛）鉛既有毒，而其製造時，又置於馬矢中，未免污穢，故粉不宜施。³³

並報導西方女子的例子以資證明，不施粉對於女子身體健康是有益的：

米利堅某雜誌云：女子之容貌，非限於生成者也，如能注意以修養之，無一不能成為美人。試略言其術，則須得滋養之甘味，行適宜之運動，吸良好之空氣，定起臥之時間。每日梳妝之前，須行簡單之運動，五分或十分時，使血脈得以流通，而顏之色自美。粗質之石鹼（肥皂）不可用，用則柔嫩之膚有害。以水洗面，日不可以過二三，過則色之光有損。顏之黃且油者，多以水洗過度，及用不良之石鹼所致也。大風之後，寒暑酷烈之日，勿洗面，洗則於面上之肌理有害，此皆美容家不可不知者。³⁴

知識份子認為施粉不合衛生容易傷身，希望女性能將施粉的習慣改除。晚清以降，中國女性審美觀，除了從柔弱美改為崇尚健康美外，在外在的裝飾方面，也逐漸鼓吹女子的自然美風尚，認為透過運動讓臉色自然紅潤，便不需依賴傷身的

³³ 志群（陳志群）：〈女子教育〉，《續辦女子世界》（1907.？），頁5（頁1617）。

³⁴ 〈女子之美容術〉，《續辦女子世界》（1907.？），頁53-54（1665-1666）。

化妝品來粉飾臉色。

晚清時期為了推廣衛生的觀念，不少地方都成立了衛生講習會。例如張竹君由廣東到上海辦了衛生講習會，其宗旨就是「謀為國民增健康之幸福，立強毅之基礎」，講述的內容包含生理衛生、診病法與體操，旁及其他關於衛生的科學。講習會以三個月為期，除星期天以外，每天下午四點半到六點為講習的時間。³⁵個人衛生觀念的推廣，有賴於生理學的知識，要先從對自我身體的認識開始。《女子世界》中採用了人體解剖學的知識，開始重塑中國人對自己身體衛生保健的理解，例如人思考的器官，不是心，而是腦；³⁶而對心臟、耳朵、舌頭與牙齒，身體各個部位都以生理學的方式加以講說，而講述身體知識的最終目的地，則在維持人體各個器官與部位的衛生，期望藉由對身體的重新認識，來好好維護人的健康，使中國人能擁有一副健康的身體。

三、日常居家的知識：飲食、穿衣與居住的科學

晚清的衛生學具有跨領域的性質，由現存的書目中即可看見《生理衛生學》、《最新解剖生理衛生學》、《居處衛生論》、《化學衛生論》與《化學衛生論》等。³⁷在《女子世界》中衛生觀念也常與其他學科相結合，例如第五期中日本女子大學講師高田濱子的〈演熱〉就站在科學的角度，演說熱的種種現象，其講述敷演熱概念的主要目的，其結論中說：

我所說熱的根源，及關係於人類學上的原因，皆已詳細告你們了。然我們國度的位置，天然氣候是絕妙的。一家團樂，務使熱度適宜，以為衛生之助，你們需要留意，不可淡忘了。³⁸

³⁵ 〈衛生講習會章程〉，《女子世界》第六期（1904.6），頁74（頁548）。

³⁶ 長生：〈說腦〉，《女子世界》第七期（1904.7），頁49（頁625）。

³⁷ 參考張仲民所整理的晚清生理衛生的書目，見張仲民：《出版與文化政治：晚清的「衛生」書籍研究》，頁114-120。

³⁸ 高田濱子：〈演熱〉，《女子世界》第五期（1904.5），頁44（頁418）。

衛生與其他知識的結合，在《女子世界》是相當常見的現象。特別是在傳遞居家知識時，衛生也成為其中講述的要點之一：日常居家的各個方面，必須符合衛生的條件。婦女在家庭當中，主要擔任主婦的工作，家庭成員的飲食、穿衣與居住環境的維持，通常都為其所打理。³⁹丁初我所提出的「新家庭之理論」，即認為：

家庭注意於房屋，飲食之衛生，器用之便宜，不宜有妨害利用的。

房屋可狹小，而不可混雜（起居室、讀書室、應接室、運動遊戲場，必不可缺）；可樸陋，而不可污穢；可粗疏，而不可黑暗。飲食以清淡爛熟為主，以濃厚堅韌為戒。器具貴堅固便利，勿貪廉價，勿好侈麗。寢具、食具外，必不可無者，遊戲之器具。⁴⁰

站在衛生的觀點，這些部份都是家庭衛生主要關注的焦點，故《女子世界》針對飲食、穿衣與居住方面的注意事項加以說明。家庭居家知識成為《女子世界》在篩選眾多知識時的主要考量，針對主婦的日常生活所需，介紹其當前所需的知識內涵。

在飲食知識的部份，長生翻譯了日本家政學家西河璞的一篇文章，希望將日本食物衛生的知識，傳遞給中國的主婦們。文中不斷以「姊姊」二字稱呼讀者，在行文中容易讓讀者產生親切感，像是分享著女性之間的私語一般，以這樣的方式傳遞知識，也容易讓女性讀者在閱讀時產生共鳴。〈說食〉一文認為飲食的關鍵在於「容易消化」四字，故要先了解人體的消化系統。藉著淺白的文字，對人的消化系統以透視的方式說明，當食物經由牙齒的咀嚼之後進入胃部，胃的形狀像是一個袋子，其中充滿著胃液將進入的食物消化吸收，之後剩餘的殘渣則進入腸中，再由腸液、胰液與肝液次第消化，之後變成為糞便排出體外。其次，便對身體中五種的消化液做說明，唾液負責消化食物中的澱粉，胃液消化蛋白質，胰

³⁹ 王惠姬認為：「家政在學術領域中，是一門應用科學，包含六大範圍的專業科目：食物與營養、衣服與織物、人類發展、家庭管理、消費經濟、居住環境。」見王惠姬：〈廿世紀前期留美女生與中國家政學的發展（1910s-1930s）〉（《中正歷史學刊》8期，2006），頁31。《女子世界》中的居家知識，即在衛生的框架下，傳遞著關於家庭中飲食、衣服與居住的新知識，因當時未貫以「家政學」之名，且並無後來學術的系統性整理，故本文以「居家知識」為題，來分析其中對於日常居家新知的介紹。

⁴⁰ 初我（丁初我）：〈新年之感〉，《女子世界》第十一期（1905.2），頁4-5（頁946-947）。

液與腸液則將胃液未能消化吸收的蛋白質與澱粉再次處理，肝液俗名膽汁，則負責消化腸內的脂肪。而不同的食物，所需要消化的時間也不相同：

食物留在消化器內，要經多少時間，殊不一定。通常的人，食物在胃內，大約一點鐘至六點鐘，在小腸三點鐘，在大腸十二點鐘。而在胃內的物，米飯一點鐘，生卵一點鐘三十分，生乳二點鐘，麵包一點鐘至二點鐘，馬鈴薯與煮豆二點鐘三十分，半熟卵三點鐘，豬肉牛肉四點鐘，熟卵五點鐘。入腸內的麵包及飯等，約留一晝夜。⁴¹

列舉這些食物與消化所需時間的原因，主要是要讓主婦在調理食物時，要知道進食的順序與時間：

晨起吃朝飯，利害究竟如何呢？身體的機關，經久息後，消化力薄弱，如將難消化的海苔、香豆，易腐敗的醬汁等，在晨起的時候，任意亂食，實非養生的道理。有個培陸醫師的話，說得好，東洋人三千年來吃米飯，至今尚不知吃法，實在詫異。哈哈！真正說著了。依我說來，朝上起來，先吞白湯一杯，少停，再用牛乳、半熟卵，或粥一二碗，新麵包一二片，再吃些水果，胸中自然流離活潑。這件事是有名的醫家說出，很靠得住的。至於腸胃弱的人，朝飯可不吃，八點鐘時，吃牛乳一杯，較之吃補藥更為有益。⁴²

此處引進的飲食經驗，對於中國人而言是新鮮的，中國人雖不似日本人早餐吃海苔與香豆等物，但藉由〈說食〉一文的介紹，再加上醫學的背書，真正符合衛生觀念的早餐經驗由是產生。喝牛奶、吃雞蛋與麵包，這是西方的早餐經驗，但對當時的讀者而言，卻是既衛生又文明的現代早餐。

除了對食物的講究之外，飲食習慣也是影響消化衛生的重要關鍵，故改正飲食習慣也是相當重要的一環：

⁴¹ 長生譯：〈說食〉，《女子世界》第五期（1904.5），頁47（頁421）。

⁴² 長生譯：〈說食〉，《女子世界》第五期（1904.5），頁47-48（頁421-422）。

食物的要項，在次第消化，改良不合理的習慣，自然有效。習慣中最不合理的，莫如沒有一定時候，一定分量，並不時吃茶，務須除去。一切東西皆細細嚼碎，唾液拌勻，然後嚥下，最為得益。不可以茶澆飯內，食物時不可屈身，除去一切用腦思索的事，不可過飽。食後三十分鐘，安坐談笑，使血液咸集於胃腸中。最不可姑息者，一切不欲食之物，一切變味之物，不潔之水，無論大人小孩，均宜留意。盛的雨水，不甚潔淨，貴價的不皆滋養，此亦姊姊們所應曉得的。⁴³

飲食是家庭中最基本的事，但也是最重要的事，主婦掌握著一家人的飲食，也等於掌握著一家人的健康，故對飲食衛生的改良，要先從主婦開始教育，再由主婦向其他家人推廣，再向其它家庭推及，層層而上，整個社會國家便開始建立正確的飲食衛生。

晚清時期的中國家庭中並無現代化的冰箱，故對於食物的保存，也是飲食衛生中需要被關注的事項。丁初我撰寫的〈料理新法〉序言中說：「料理是家政中一件要事，在日用衛生上，狠有些關係。吾國婦女素來家庭習慣的事故，多不去講究，實在是家政上一大缺點。這部女子世界，既添列了實業一門，吾把近來料理新法，合用吾國的，逐漸講給你們聽罷！」⁴⁴〈料理新法〉一共連載了三期，分別在第五、六及七期當中，其內容十分駁雜，⁴⁵有點類似現在家政書籍中的家事小偏方。關於食物保存的部份，例如教導主婦白米在夏日容易生長米蟲，可以預先放些梅樹葉子在米桶中，便不會生蟲；⁴⁶而想要防止餅發霉的方法，則要先在貯餅容器先塗上酒，然後將餅放入細細封好即可；⁴⁷而要保存青瓜使其不變色，則先要在冬天將雪與鹽混合，等到夏天時再用來醃青瓜，則可以使青瓜一年不變色，或者在夏天時將青瓜細切曬乾，用酒醃漬使不與空氣接觸，如此冬天時

⁴³ 長生譯：〈說食〉，《女子世界》第五期（1904.5），頁 48（頁 422）。

⁴⁴ 初我（丁初我）：〈料理新法〉，《女子世界》第五期（1904.5），頁 33（頁 407）。

⁴⁵ 除了關於食物保存的部分之外，還有整理衣服的方法，例如如何去除衣服上的油漬、污垢等等，也教導書畫筆硯的保存方法。

⁴⁶ 初我（丁初我）：〈料理新法〉，《女子世界》第五期（1904.5），頁 33（頁 407）。

⁴⁷ 初我（丁初我）：〈料理新法〉，《女子世界》第五期（1904.5），頁 33（頁 407）。

便可以青瓜可以食用。⁴⁸丁初我以一個男性的指導者，將這些關於飲食的小偏方，由一個公共刊物向讀者宣導，教導女性如何能夠做好家中飲食的工作，與傳統中國男子遠庖廚的角色大異其趣。丁初我之所以能以如此自然的姿態敘說家庭中日常瑣事，其主要是因其挾帶著科學與衛生的知識優勢，以教導者的角色來教育和啟蒙家庭中的主婦，此時這些瑣事就不再只是瑣事，而是一種新知識的更新與取代。⁴⁹

在衣服的日常知識中，《女子世界》特別開闢了〈裁衣〉的專欄，教導主婦如何剪裁衣服。一般而言，裁衣對於中國婦女來說，應該是一種基本的技能，⁵⁰既然是基本的常識，《女子世界》為何還要用好幾期的篇幅連載呢？作者的前言可以解答這個疑問：

人的一身，最要緊的，吃飯之外，就是穿衣。世界上沒有一個不穿衣的，這衣服不應該考究考究麼？有人說我們中國人，裁縫的一個行業，本領大的也很多，你實在又不是裁縫司務，為什麼作這個裁書呢？既然要作做衣服用的書，為什麼祇作裁書，不作裁縫書呢？我說我的意思，最要緊的，是叫人家曉得裁剪，不要將好好的衣料，無端的糟韃了。並且我所曉得也是有限，還要望看這《女子世界》的，如果有便捷的法子，或者是我說的，再有見弗到的所在，剪一樣子，寫一封信，送到我們的總發行所，教導教導，所以這一種書，還是稿本，要同諸君商量商量。我想做衣服的法子，

⁴⁸ 初我（丁初我）：〈料理新法〉，《女子世界》第五期（1904.5），頁34（頁408）。

⁴⁹ 游鑑明在分析《婦女雜誌》時主張，晚清民初時女性知識的建構多由男性掌控，直到民初的《婦女雜誌》才出現女性的聲音：「從知識建構來看，建構知識的人通常是學者專家，他們根據自己在知識方面的掌握，以權威的話語向人們傳輸知識，並內化進人們的生活。一般認為，知識權力是掌握在男性手中，女性只是知識的接受者，但隨著具有專業知識女性的日益增加，為女性建構知識的不完全是男性，《婦女雜誌》便呈現這種現象。」參見游鑑明：《〈婦女雜誌〉（1915-1931）對近代家政知識的建構：以食衣住為例》，收入走向近代編輯小組：《走向近代：國史發展與區域動向》（台北：台灣東華，2004），頁248。

⁵⁰ 盧漢超在討論晚清民初上海的日常生活時，提及即使是在上海的都會女性，被稱為所謂的「業餘裁縫」，裁剪衣服對她們而言是一種太尋常的事：「除了西式男裝和外套被認為是複雜的服裝而必須由專業裁縫做外，上海人敢於自己裁布做衣，結果他們頗為得意地穿著自家做的各式衣服。這些業餘裁縫大多為婦女；在實際生活中，裁剪在上海婦女中太尋常了，以至於來自社會各階層的大部分婦女都懂得做衣服的方法。做衣服的能力受到重視不僅僅是出於現實的理由（為了省錢），更因為它被視作婦女技能的一種展示。」通常一位專職的家庭主婦，會為家中的成員裁製衣服，從襯衫、裙子到褲子等等都能完成，即使身為知識份子的許廣平，一般而言被認為是不熟悉針線功夫的一群人，也能為她的兒子縫製大部分的衣物。參見盧漢超著；段煉、吳敏、子羽譯：《霓虹燈外：20世紀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頁235。

裁剪是起先動手，至於要縫的話，且待我把裁的法子說完了，然後再說阿。

51

作者的前言寫得謙虛，認為自己雖非專業的裁縫師，所知道的也有限，但仍希望將自己知道的貢獻出來，以達到讓主婦在剪裁衣料時，「不要將好好的衣料，無端的糟躉了」的目的。這題為醉茗閣的裁書註為「稿本」，乃為一個屬於草稿階段的書籍，作者希望藉由讀者的集思廣益，能夠有一個完整的裁書的本子出現。

中國從古到今的裁縫師不少，但將剪裁衣物的方法，以連載的形式出現在女性閱讀的報刊上，《女子世界》是第一個，之前陳擷芬主編的《女學報》尚未有實業與裁書之類的欄目，而在《女子世界》首開先例之後，後來的陳以益主編的《女報》也把「實業」列入固定的欄位當中。《女子世界》從第五期開始連載裁書的內容，由現存的内容來看，〈裁書〉中首先對裁衣的器具、衣服各部的稱呼、⁵²剪裁上的分法、尺圖等基本概念先加以介紹，其次便開始介紹各類衣服的製作，由於〈裁書〉只連載到第十三期，加上《女子世界》刊物的結束，故現存看到的〈裁書〉僅對馬褂與馬夾的製作加以介紹。介紹的順序，一般先從馬褂與馬夾的種類、釋名加以分說，之後敘說不同種類的馬褂與馬夾在剪裁時要注意的細節，最後還會附上剪裁圖，以方便讀者根據尺圖加以利用來剪裁。

〈裁書〉將女性知識體系中原屬於基本常識的部份，將以系統化的介紹，並分門別類的將其製作方式以書面的方式敘說出來，再加以圖像的方式讓讀者能夠按圖索驥，晚清在對婦女知識更新的内容中，出現了所謂「教科書化」的傾向。將一些原本以口耳相傳，或者女性長輩（如婆婆或母親）向女性晚輩（媳婦或女兒）的知識傳遞系統，推向另一個不同的教育場所——學堂與公共報刊。這些婦女的知識傳承，開始出現系統化、書面化的歷程，學堂企圖將這些技能變為一種謀生的工具，故以教科書的方式教導來學堂中求學的婦女，婦女知識的傳遞不再侷限於家庭中的教導，在學堂中不管是來自何種家庭，大家藉由相同的教科書學習一樣的女性技能，知識轉為一種公開性的傳承，不再只以家學的方式進行，這

⁵¹ 〈裁書（醉茗閣稿本）〉，《女子世界》第五期（1904.5），頁 29（頁 401）。

⁵² 對於「衣上各種的稱呼」，作者特別言明以蘇州地區的稱呼為主：「衣上的各種稱呼，想來各處弗同的。我現在所說的，不過是我們蘇州府內的稱呼罷了。然而別的地方，看了下面的圖，想來也容易明白。」見《女子世界》第五期（1904.5），頁 31（頁 403）。

與晚清發展的家政學科的系統化相關。

〈裁書〉一文連載到第十三期，之後第十四期出現了一篇公養翻譯的〈衣服之科學〉，將衣服與科學相關，穿衣再也不是一件日常的小事，而是關乎衛生與科學的大事，保護人類健康的利器：

人類之血，溫度無異同，此全恃皮膚之作用，以調節其溫度。而溫度之調節，實於衣服有絕大之關係。當空氣直接於皮膚，減失其溫度之際，惟衣服之使用，得保存其同一之溫度而稍失之故，衣服實宜於寒而不宜於暑，可謂吾人第二之屋宇，保護人類健康之利器也。⁵³

穿衣與健康相關，如何選擇正確的衣服，達到科學與健康的原則，是這篇文章主要討論的部份。在選擇衣服時，衣服的質地很重要，最好要符合透氣的原則，對身體是比較好的。⁵⁴作者接著比較當時衣服材質的含空氣比例與防失體溫的比例，認為洋絨最佳，其次是綿布，再次是絹布，最差的是麻布。除了透氣之外，衣服的吸水性也很重要，既不透氣又不吸水，對穿衣者的身體會造成不良的影響。在分析各種質料的吸水性與透氣性後，毛布雖有比較好的吸水性與保溫的作用，但是容易有沾染異味、殘汙納垢與霉菌孳生的缺點。⁵⁵衣服的作用還有抵禦日光的作用，不同顏色的衣服對於日光的吸收也不同，其中以黑色最容易吸收日光溫度，越淺的顏色越不容易吸收，所以衣服也要隨著季節交替，夏天宜穿淺色衣服，冬天則以深色衣服為佳。⁵⁶而人在睡眠中體溫變化少，故睡眠時也要穿著適當的睡衣：

睡眠中諸臟器休息之時，體溫之發生極少，加以夜間外氣之寒冷，故夜眠之具，不僅如衣服之選擇保溫、透氣、吸水之良材，尤貴適於吾人之安眠。內溫其皮膚，而多注其血液於外圍，使腦氣常處於安靜，即如夜眠之衣料，亦宜稍偏於溫暖者也。寢衣固貴清潔，尤宜寬大而加長，以便血脈之運轉。

⁵³ 公養譯：〈衣服之科學〉，《女子世界》第十四期（1905.？），頁47（頁1299）。

⁵⁴ 公養譯：〈衣服之科學〉，《女子世界》第十四期（1905.？），頁48（頁1300）。

⁵⁵ 公養譯：〈衣服之科學〉，《女子世界》第十四期（1905.？），頁49-50（頁1301-1302）。

⁵⁶ 公養譯：〈衣服之科學〉，《女子世界》第十四期（1905.？），頁51（頁1303）。

顏色以白者為最宜，得常保其清潔，以豫防其傳染病，此無論四季之時節，皆適宜之。⁵⁷

睡衣為配合睡眠時人體的狀態，要以保溫、透氣與吸水的材質為佳，以使睡眠著能有良好的睡眠品質，也不致於睡眠中得病。穿著睡衣除了符合衛生之外，到了民初的上海，睡衣也變成一種時尚生活的表徵，通常一大早會看到不少上海人穿著睡衣到街上去買早餐，對他們而言，睡衣是一種炫耀式的消費，只有有錢人才會奢侈的買睡衣，能穿著睡衣代表著一種時尚的生活。直到現今，能有不少上海人習慣穿著睡衣上街，形成上海獨特的睡衣文化。⁵⁸

《女子世界》中對於衣服的知識，認為穿衣服不是為了美觀，而是為了身體健康，自立曾勸主婦們：「各位做衣服，須要使衣服，不切緊身上，不離開身上，這便是曉得衛生的道理了。著衣服原是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不是穿了供人家玩賞的啊！這件事於我們女同胞，最容易犯的毛病，奉勸要打定主意纔好。」⁵⁹穿衣既是為了保全生命，衣服的調節則影響到身體的健康。家中的主婦則要隨時注意家中老少的穿著，最重要的就是「適宜」二字，根據年齡、職業、季節的不同，對於衣服的材質與顏色都要不同，務使身體與外在溫度去的良好調節，不致傷風或中暑，以確保身體之健康。

關於居住環境的要點，也與衛生健康脫不了關係。自立〈實用話〉中認為，中國人對於居住環境的要求，傳統上把握三個原則：地基高爽、向南方以及空間要大，以使空氣流通，這是有道理的。不過，江蘇地方上流行「暗房亮竈」的話，他覺得有點荒謬：

不論什麼動物，和日光與空氣，是有大關係的。我們家鄉，有句最謬的話，是「暗房亮竈」四個字。竈間亮了，一切便益，故不必說。至於房間一日

⁵⁷ 公養譯：〈衣服之科學〉，《女子世界》第十四期（1905.？），頁 51-52（頁 1303-1304）。

⁵⁸ 上海市政府為迎接 2010 年上海世博會，希望上海人能不要穿著睡衣上街，喊出「睡衣睡褲不出門，爭做世博文明人」的口號，引起不少爭議。相關的報導可見：王晶晶：〈一件睡衣引發的戰爭〉（《中國青年報》2009.11.17）、張蕾：〈上海：脫的不是睡衣，是自由？〉（《中國新聞周刊》2009.11.2，頁 40-41）、梅俊杰：〈回歸「穿睡衣上街」問題的本原〉（《視點》2010.6，頁 40-41）、上上籤：〈睡衣上街〉（《中國新聞周刊》2010.5.31，頁 84）等文。

⁵⁹ 自立：〈實用話〉，《女子世界》第八期（1904.8），頁 10（頁 638）。

中二十四點鐘，卻有十點鐘常在裡頭。況且中國的風俗，女人尤以不出閨門為第一要事，現在革除這陋習，固然不容易。這房間再一暗了，便同人家說的黑暗地獄，有什麼分別呢？你看種的花，常放在暗處，尚且要萎黃憔悴，何況人呢！⁶⁰

自立以植物的生長為例，認為空氣流通與光線充足，既然符合植物生長，當然也是適合人生活的環境。植物的生長主要仰賴陽光、空氣與水，晚清知識份子認為人的生活環境中，這三者也是重要的條件。就身體的健康而言，鼓勵人走向戶外呼吸新鮮的空氣，室內則注意空氣流通與光線照明，明亮的住所能讓人心情愉悅開朗，不僅有助生理健康，也有益於心理衛生。

除此之外，在中西家庭的配置圖中，廁所的設置有著明顯的不同。中國傳統的居所中，通常在房中安置廁桶，每日派人傾倒清理，有時房中氣味不佳，也不符合衛生的原則。西式的洋房中，則有廁所的配置，相較中國的傳統住所被認為是較衛生的安排：

更有不可不留意的，便是廁所。安置的所在，總不要近臥房。屋上設立通風管，以便洩出臭味。門戶要堅緻緊切。有廁床的，要做得高，常用水沖刷，務使一點臭氣沒有，這纔好哩！現在人家的房內，尚不能把儲尿糞的東西，一齊去掉，然總要慢慢想法，能夠不用便好了。⁶¹

自立認為要立即更改中國人的如廁習慣是有困難的，但如果掌管家事的主婦能先有衛生的觀念，改變之日則指日可待。因為接受西方影響的程度不一，晚清在住房上也呈現了不統一的狀況，中式的住房逐漸受到西式格局的影響。以晚清在上海出現的石庫門建築為例，羅蘇文即認為其「既吸收某些江南民居的特色，又具有西方城市民居的特點，可以說是兼容中西的產物」。⁶²在後期的石庫門建築中，衛生間（廁所與浴室）也成為了住房中的必備物，⁶³在城市生活中傳統的廁桶則

⁶⁰ 自立：〈實用話〉，《女子世界》第十二期（1905.4），頁7（頁1039）。

⁶¹ 自立：〈實用話〉，《女子世界》第十二期（1905.4），頁9（頁1041）。

⁶² 羅蘇文：《近代上海：都市社會與生活》（北京：中華書局，2006），頁53。

⁶³ 羅蘇文：《近代上海：都市社會與生活》，頁57。

逐漸被取代。

晚清以後居家生活中由於電氣的使用，中國人日常生活的樣貌已與傳統大不同。自立翻譯了日本松琴女史之〈演電〉一文，其中採用了類似小說對話的形式，藉由母子與姐弟之間的對話，來傳達現代化電氣生活的情況。松琴女士自言：「余連日至戚友家，聞問答之詞，皆有繫於電氣學者共三次，余試述之，為諸君告。」⁶⁴〈演電〉分別刊於《女子世界》之第六期與第七期的「科學」欄，松琴女史以其三次訪親友之見聞，將其對於電氣相關之對話加以記錄。第一部分主要藉由母子的對話，由母親告訴兒子電話的原理與便利，以及使用的方法。⁶⁵第二部分則是姐姐告訴弟弟在家庭中使用電燈的好處時，以衛生的原則來看，電燈比油燈來的健康：

現在用電燈，卻另有一種緣故。兄弟，生理學上的話，人總須吸氧放炭。若吸了炭養氣，血質便要變壞，所以最不宜的是，許多人聚在不通風的小室中，因口中呼出的炭養氣較濃，身體便要受害。火油燈放出的炭養氣甚多，若室中通了風，虛弱的人便要頭痛。若不通風，便要吸入炭養氣，所以用電氣燈最好沒有這種毛病。⁶⁶

電燈不產生二氧化碳，故較傳統的油燈為佳，衛生原則也給了現代電氣進入家庭最有力的支持。第三部分則是由拈花女史對其鄉下來的族弟們，介紹都市中的電車與馬車、汽車之不同。有趣的是，〈演電〉一文中，擔任啟蒙者角色的是女性——媽媽和姐姐，對家中的年幼的男性進行生活知識的教育，不同於晚清文本中以男性為啟蒙者的習慣。

《女子世界》所引介的科學與衛生文章，通常使用白話的口吻，有的用演講的形式，有的用小說對話的方式來進行敘說，而不採用論說的方式來進行，主要

⁶⁴ 松琴女史著；自立譯：〈演電〉，《女子世界》第六期（1904.6），頁41（頁515）。

⁶⁵ 上海為中國最早架設電話的城市，英國電氣工程師畢曉普（J. D. Bishop）在1882年架設第一套對講電話。至1898年，上海一共有338電話架設戶，之後安裝戶逐年呈倍數成長。到了1940年代，「上海多種商業服務都以電話作為便捷的聯繫方式，如電話預訂戲票、出租汽車、用餐。此外，街頭的電話亭和路燈一樣，屬於近代城市的公共設施。安裝私人電話，也是中產人家的一種時尚消費。電話成為上海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伙伴。」見羅蘇文：《上海傳奇：文明嬗變的側影（1553-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頁186-189。

⁶⁶ 松琴女史著；自立譯：〈演電〉，《女子世界》第七期（1904.7），頁43（頁619）。

也是為了配合女子的閱讀能力，將這些看似深奧的學科，與日常的家庭生活相連結，用日常居家生活的小細節，例如飲食的順序、衣服的材質的替換與居住環境的衛生等等，讓讀者在閱讀時容易在生活經驗中獲得實際的體悟，更能達到推廣知識的目的。⁶⁷丁初我等人企圖由食衣住等方面，將舊有的女性知識進行改造，在新知識的帶領下，讓女性引領家庭能進入一個現代化的模式，符合科學、衛生與便利的現代生活。

四、新式母親：兒童教養知識的譯介

中國古代自有一套教養兒童的方法，從懷孕開始，母親就謹守禁忌來保養孩子，希望能孕育出健康的孩子。⁶⁸及至出生以後，中國傳統的醫書當中，對於嬰孩的生養與疾病醫療都曾加以注意，明清時期還有醫書專以幼科為論述，例如《保嬰全書》與《幼科準繩》等書，熊秉真更進一步認為「與西方相較，新生兒照護在傳統中國一直特別受到重視。從目前文獻看來，歐美幼科醫學獨立為專科的時間相當晚」。⁶⁹醫學書籍、民間禁忌與親友間的口授育兒法，讓中國在明清之前

⁶⁷ 游鑑明在研究《婦女雜誌》中的食衣住時，便發現「『科學』如影隨形穿梭其內，這時的『科學』涵蓋甚廣，凡是化學、物理學、醫學、生物學或數學都囊括在內。……科學取代傳統知識與經驗，成為女性處理家政的必備知識，『營養』這個觀念也被帶入女性的家政世界。」參見游鑑明：《〈婦女雜誌〉（1915-1931）對近代家政知識的建構：以食衣住為例》，收入走向近代編輯小組：《走向近代：國史發展與區域動向》（台北：台灣東華，2004），頁 238。

⁶⁸ 中國女子在懷孕期間，有許多的胎教禁忌，主要是根源母親會影響胎兒的聯想。在《博物志》中即記載：「婦人妊娠，不欲令見醜惡物、異類鳥獸。食當避其異常味，不欲令見熊羆虎豹。御及鳥射雉，食牛心、白犬肉、鯉魚頭。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聽誦詩書諷詠之音，不聽淫聲，不視邪色。以此產子，必賢明端正壽考。所謂父母胎教之法。故古者婦人妊娠，必慎所感，感於善則善，惡則惡矣。妊娠者不可啖兔肉。又不可見兔，令兒缺唇。又不可啖生薑，令兒多指。」引自張華著；范寧校證，《博物志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 109。醫書中也有類似的記載，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也云：「兒在胎，日月未滿，陰陽未滿，腑臟骨節，皆未成足。故自初妊迄午將產，飲食居外，皆有禁忌：妊娠食羊肝，令子多厄；食山羊肉，令子多病；妊娠食驢馬肉，令子延月，食驢肉產難；妊娠食兔肉犬肉，令子無音聲，並兔唇；妊娠食雞肉糯米，令子多寸白蟲；妊娠食雞子及干鯉魚，令子多瘡；妊娠者食椹并鴨子，令子側出心寒；妊娠者食雀肉并豆醬，令子滿面多黧黔黑子；妊娠者食雀肉飲酒，令子心淫情亂，不畏羞恥；妊娠者食鱉，令子短頸；妊娠者食冰漿絕胎；妊娠勿向非常地大小便，必半產殺人。」見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台北：地球出版社，1975），頁 20-21。胎產書多認為母親與孩子擁有直接聯繫，懷孕期間的一切行為，都會對孩子造成直接的影響。有些內容看來確實有些荒誕，例如食兔肉，則子兔唇；亂大小便，則半產殺人。但中國胎產文化的胎教禁忌，至今仍有不少人遵行，只是在細節內容上有些改變。

⁶⁹ 熊秉真認為西方在十九世紀以前對兒童疾病的討論，與衛生保健方面的知識，都不及中國的成果豐碩。中國在隋唐時期及至明清的一千年間，在新生兒照護方面的知識有全面的進步。參見

對於兒童的生養與教育自有一套方式。

但時至晚清，在西方列強不斷侵略的情況之下，伴隨著中國的連年戰敗，連帶得使中國傳統的育兒方法受到知識分子的質疑。丁初我在分析中國人體格病弱的原因時，歸結出一條為「不知養育之弱種」，認為中國人在教養子女上不得其法，故使中國人在體格上遜於西方歐美之人：

入歐美之道路，無一不挺胸正幹，捷足飛行者，而我則偻身曲背、蹣跚癱腫，纍纍如病夫。遇白色之種族，無一不雄偉壯大，精悍猛鷲者，而我則短小脆弱，痿痺偃蹇，奄奄如乞丐，豈天賦之懸殊哉！亦不知養育之一點有以致之。西人胎教之書、育兒之法，夥矣！自胎孕至於襁褓，其注意於根性之遺傳，血質之黏合，懷胎之舉動，乳母之選良，一切容止飲食居處衣服之衛生，及因其天性感情而利導之教育，莫不考其氣質之強弱，血液之重輕，性情之偏向，因其年齡，較其程度，以救其偏，以劑其平，以達於粹美完全之境域，故舉國而無一不被養育之人，即舉國而無一不成人格之人。養育之母，權有以補全人種之偏倚，而操改良天演之勢力者也。⁷⁰

丁初我在這裡指出晚清男性文人普遍的焦慮，面對西方人高大的身體，中國人的體格就顯得矮小瘦弱許多，他們認為若要從根本改善中國的國力，要先由中國人的體質開始，讓中國人的下一代也強壯高大起來，和西方人一樣，如此一來，種強自然國強。母親對於小孩的影響甚大，這是許多知識份子在當時的共識，也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男性知識分子才開始認知到改造母親的重要。而要讓中國下一代的體格強壯，則負責養育小孩的母親，則要開始更新她們的教養知識，要使用科學有效的方法，方能養育出優秀的下一代。於是，知識分子們便開始翻譯引介域外對於兒童教養之法，希望能夠將中國的下一代，養育成為如歐美日本等國的小孩一般。

在《女子世界》當中，關於教養兒童的文章，主要有丁初我翻譯的〈為母的

熊秉真：《幼幼：傳統中國的襁褓之道》（台北：聯經文化事業，1995），頁99。另有《安恙：近世中國兒童的疾病與健康》（台北：聯經文化事業，1999）一書，則討論由宋至清代對於兒童「驚、疳、吐、瀉、痘、疹」六大病症的紀錄與醫療方式。

⁷⁰ 初我（丁初我）：〈哀女種〉，《女子世界》第六期（1904.6），頁4-5（頁478-479）。

心得〉與蔣維喬翻譯的〈育兒法〉，以及競華的〈兒童教育話〉。丁初我翻譯的〈為母的心得〉，只有註記其為「譯稿」，卻沒有詳加標誌其出處為何，不過從其行文中「歐美」與「我國」的話語，如果探究其原稿的源頭，來自日本的機率大一點。⁷¹就譯文中所述家庭生活的情況，也與日本較為相似，而日本對於兒童養育與教育的方法，發展的也比中國早一些，再加上在《女子世界》中丁初我還翻譯了其他的日文文章，可知他是知曉日文的，例如第四期「譯林欄」中的〈婚姻問題〉，這篇文章中討論了日本與其他歐美國家在結婚率、結婚年齡、出生率與離婚率的比較。不過有趣的是，丁初我在翻譯〈婚姻問題〉時，對日本不用「我國」而用「日本」，與〈為母的心得〉中稱「我國」而不直稱其國名不同，這也許是兩篇文章的原始作者所使用的語句原本就不相同。不過，丁初我在〈為母的心得〉中數稱「我國」，再加上對我國的國內情形的敘述，會使讀者在閱讀時不覺其在讀一篇翻譯的文章，因為其生活經驗與中國的情形十分貼切，但其篇名又註為「譯稿」，則又讓文中的新知賦予另一種可信度——畢竟外國經驗總是值得學習。

丁初我譯介的〈為母的心得〉，使用了白話口語的形式，採用第一人稱「我」的敘述，使整篇文章像是一種養兒經驗的分享，而不像理論說教的文章。一開始便以當時流行的「家庭教育」起頭，述說現今的家庭教育理論過多，卻不切合實際的需要，母親是家庭中重要的角色，要進行家庭教育，需先使母親了解新式教育之法才行：

據我見解看起來，今日的家庭正是從舊思想時代，轉入新思想時代的過渡時代。一般家庭內的婦女，都養成前時代的舊思想，使他教育新時代的兒童來，所以有著這樣的結果。我且按著現在的舊家庭，想起鼓吹普及他新教育，第一爽利的方法，劈頭打破蟠結家庭的弊竇，使家庭裡頭婦女不知不覺，自然尋味教育兒童的真理，徐徐實行起來，這是無過重大的問題了。然這事非一朝一夕間辦得到，說起來又很累墜，不如就家庭教育裡頭最當

⁷¹ 從一九〇三年開始，商務印書館為中國教科書出版界的龍頭，負責大多數教科書的編纂與翻譯。張元濟延攬一批愛國學社的教員，進行教科的編纂工作，並將新知翻譯進入教科書的內容。其中日文書籍常是他們翻譯引介的對象，有些即便是中國已有的知識內容，例如修身項目，也會藉助日本教材的加持。此現象顯示，日文書籍的新知在此時期，成為中國知識份子轉譯新知的乞靈對象，也是西洋新知輸入中國的重要管道。參見 Joan Judge 著；孫慧敏譯：〈改造國家——晚清的教科書與國民讀本〉（《新史學》12卷2期，2001.6），頁5-8。

注意的，母親心得的事情，講給你們聽聽罷。⁷²

此處首先點出傳播新育兒知識的必要，身為母親的女性，處於這新舊時代的過渡時期，要教養出適應新時代的兒童，則必須要從思想與知識上翻新，變傳統舊母親為現代新母親，才能將傳統家庭改良為現代家庭。〈為母的心得〉一文，不由空泛的學理入首，而多舉養兒案例加以說明，希望能切中女性讀者實際的需要，故羅列「兒童的性情」、「兒童的良善」、「乳母輩的選擇」、「兒童與遊友」、「幼稚園」、「家庭與社會」、「家庭與學校」、「家庭與主婦的教養」與「家庭與衛生」等項，都是改良新母親所需的教養新知。

相較於〈為母的心得〉，蔣維喬在第十二期翻譯的〈育兒法〉一文，較像是照顧幼兒實務操作的指南書，以撫養和誘導兩條主線，提點出養育幼兒時所需注意項目，例如「乳媪不宜用」、「清潔」、「新鮮空氣與陽光」、「衣服」、「睡眠」與「不宜多抱持」等項。第十四期所刊登的競華〈兒童教育話〉一文，則是以通論的方式敘述兒童教育的分期，並強調兒童在進入學校教育之前，家庭教育所應該注意的內容。

《女子世界》中這三篇與兒童教養的文章，其注重點放在母親的改良、乳母的撿擇、友伴的重要、幼稚園的提倡，以及家庭衛生的重視等方面，為中國的育兒法提供了新的視野。母親的育兒知識，自晚清開始以公共媒體的形式更新，當時的報刊上的文章與廣告，開始教導中國母親以科學衛生的方式養育下一代，傳統的母親變為「科學母親」(scientific motherhood)。⁷³ 婦女的育兒知識，不再僅依賴女系親眷的耳提口授，也可藉由著之文字的手冊來按圖索驥，而這些新知識，是來自比中國更文明的國家。西方與日本母親以此科學文明的方式，教養出比中

⁷² 初我(丁初我)譯：〈為母的心得〉，《女子世界》第六期(1904.6)，頁27-28(頁501-502)。

⁷³ 關於「scientific motherhood」理論，則見 Rima D. Apple：'Constructing mothers：scientific motherhood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收入 Rima D. Apple & J. Golden eds：*Mothers and motherhood：Readings in American history* (Columbus：Ohio State University, 1997)，頁90-110。余彥娟在引介 Rima D. Apple 的研究時發現，Rima D. Apple 從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美國「流行雜誌上的廣告與文章、政府宣傳品、流行電影以及學校家事課教材等，發現『科學母親』(scientific motherhood)；強調母親必須聽從專家的意見，才能養出健康的小孩。Apple 發現傳統上女性所擁有做母親的知識逐漸受到貶抑，而科學育兒的權威晉升。到二十世紀初，母親不再是『育兒園的女皇』(queens of the nursery)，而只是科學的奴隸。」參見余彥娟：〈女性主義對母親角色研究的影響：以美國婦女史為例〉(《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20期，2005.12)，頁17。

國優秀的小孩，他們的育兒知識，是中國媽媽們值得學習的。

當小孩呱呱墜地後，如何哺乳成為當務之急。〈育兒法〉主張母親應該親餵母乳，不該假於他人之手，並提出西方醫學來背書，強調母乳中富含小孩成長所需之養份，它物無法取代，且親餵母乳對母親的身體健康也是有幫助的：

蓋小兒食母之乳，乃天然養料，母以自己之乳喂兒，亦天然所生成。小兒不食其母之乳，而食他人之乳，於身體發育不能適宜，母有乳而不喂兒，使其潛耗，於身體亦有礙，此事經西國醫學家考驗，其理確鑿。除非其母本有病，不得已而雇乳媪，否則不宜也。⁷⁴

並且提醒母親，在嬰兒尚未長牙之前，不能以餵食堅硬的食物，以免損傷其腸胃，可以以牛奶、麵粉或米粉當成替代食品；在長牙之後，「則可喂以西國所製極鬆脆易消化之餅餌，取其不費口津，又不費咀嚼」，不會造成其腸胃的負擔，而這些事情，則非母親親為不可。⁷⁵

近世的哺乳觀念，隨著醫學觀念的翻新，與商品廣告的效應，主要可以分為「胸哺」與「瓶哺」兩種主張。「胸哺」乃指以人乳餵食嬰兒，「瓶哺」則指用奶瓶將動物乳汁或其他代乳品餵養嬰孩的方式。西方至十八世紀後，醫學研究認為初乳具有增加嬰兒免疫力的功效，並認為母乳是上帝給予嬰兒最天然的食品，因此不斷鼓吹母親應該親餵母乳，並提出不少的科學數據以為佐證。晚清時期這股風潮也影響中國，如〈育兒法〉即鼓勵母親應當親餵母乳，並以西國醫學研究為其可信賴的基礎。主張胸哺的論述，認為母親親餵不僅符合經濟原則，也能增強嬰兒的免疫力，而且還能增進母親與嬰兒之間的親密度，可謂益處無窮。不過，人乳並非隨處可得，在不得母乳的情況下，近代也出現了不少標榜與母乳一樣營養的替代品，例如牛乳、羊乳與奶粉等，這些販售的廣告，也習慣地找來醫學數據背書。⁷⁶隨著醫學科技的發達，人們對哺乳的知識也漸得擴充也更形完備。

⁷⁴ 竹莊（蔣維喬）譯：〈育兒法〉，《女子世界》第十二期（1905.4），頁 29-30（頁 1061-1062）。

⁷⁵ 竹莊（蔣維喬）譯：〈育兒法〉，《女子世界》第十二期（1905.4），頁 30（頁 1062）。

⁷⁶ 周春燕對近世的哺乳方式加以探討，認為在醫學與商業的雙重影響下，哺乳的行為也開始成為愛國的行為之一。在強國強種的口號底下，兒童是繼婦女之後，另一個備受重視的族群。從晚清以後，中國受到西方哺育觀念的影響，也開始出現呼籲親餵的聲浪，並認為這是母親作為公民身分的一種表現。而伴隨著哺乳商品的多樣化，不同形式的代乳品也出現在中國的市場中，其廣

除了哺乳之外，〈育兒法〉對於照顧幼兒的細節，加以提醒與教育。以衛生與健康的角度，提供具體實務上的幫助。這些照顧嬰兒的方式，有別於中國傳統的養護方式，例如在清潔方面，主張應該要早晚沐浴二次，以維持幼兒的衛生健康：

小兒每早晚，必沐浴二次，取溫水不可用熱水，熱水易使血逆流，必傷腦。用軟手金或海綿，為之洗滌其頭部及全身，滌後用軟巾為之拭乾。小兒頭部不潔，則為將來頭痛之根，身體不潔，則為將來身疾之根，不可不慎也。

77

除了清潔之外，宜多攜幼兒至室外走動，呼吸新鮮的空氣，即使是在室內也要保持空氣流通：

清潔之外，則應多吸新鮮空氣，多受日光。蓋育兒如植花草，然花草不使多見日光，則顏色不鮮，而易枯萎，小兒亦然。故風日晴和，則應使之常常在屋外運動，如陰雨天氣不佳，則在室中，亦應使近窗戶空氣流通之處，惟不可直對風來之向。我國為母者，恒置小兒於房內，閉塞窗戶，最不宜也。⁷⁸

此處蔣維喬使用的「我國」二字，與丁初我〈為母的心得〉中一樣，容易使讀者混淆，究竟使原作者的國家，還是指中國。不過，在中國在照顧幼兒方面，為了確實保護幼兒，常會以衣物包裹幼兒，讓小兒長待至室內，以防風、防濕、防寒，防止小兒著涼感冒，⁷⁹與〈育兒法〉所指稱不宜的情況相似。

而小兒穿著的衣服，則要以柔軟清潔為佳，不可多穿戴飾品，影響孩子的發育成長：

告詞不斷呼籲商品的功效，也成為近世哺乳文化的一大特色。參見周春燕：〈胸哺與瓶哺——近代中國哺乳觀念的變遷（1900-1949）〉（《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8期，2010.12），頁11-36。

⁷⁷ 竹莊（蔣維喬）譯：〈育兒法〉，《女子世界》第十二期（1905.4），頁30（頁1062）。

⁷⁸ 竹莊（蔣維喬）譯：〈育兒法〉，《女子世界》第十二期（1905.4），頁31（頁1063）。

⁷⁹ 熊秉真：《幼幼：傳統中國的襁褓之道》，頁94-96。

小兒衣服，宜清潔、乾燥、輕軟、寬鬆，法蘭絨為最佳，絨布亦可。頭部宜涼，足部宜暖，衣服宜多置數套，日間所用者，至夜則易之。而以易下者置於通風處，使之乾燥，明日仍可使換，稍污則滌之。帽不宜緊而重，我國人愛小兒，喜多裝首飾，壓其頭部，名為愛之，實害之也。⁸⁰

而對於小兒的肢體發展更是須要注意，故其睡眠時要讓他平臥，不宜側睡，以免影響小孩的肢體發育。⁸¹母親在抱持時更要多多注意：

小兒骨格未堅，固不宜常抱持，多抱持則易損腿骨，脊骨易曲，頭易低垂，甚且致疾。總以多睡為宜，然小兒之性，往往不喜睡而喜抱，則宜節制之。抱時務宜留意，使之身體平直不屈曲，或為特製臥具，如西國之有輪者，使臥其中，常常推挽之，出外運動，臥具中墊褥，以溫軟為要。我國所用竹製之坐車，木製之立桶，最不適宜，必革除之。又小兒不宜強之早坐立，強之行步，必順其自然，蓋其骨幹未堅實，早坐立行步，皆害之甚者也。

82

母親對於孩童的身體健康與衛生，具有深遠的影響。〈為母的心得〉即認為母親除了引導孩童的教育之外，還要承擔孩童身體健康的重責大任。家中的衛生包括著各種與身體健康有關的事物，即食衣住各個方面：

吾又想母親以愛兒的緣故，往往任從兒童的喜欲，這是家庭的絕大通病。飲食呀，過度就不能消化。遊戲呀，風日也容易致病。以致日常的用品，玩耍的物件，隨地能夠傷生，調養、防護、禁止、遏絕，種種都是母親的責任，這纔算得真正的愛兒呢！⁸³

而在日常生活中則需要知道正確防護的方法，這種防護法的根本就是家庭衛生，

⁸⁰ 竹莊（蔣維喬）譯：〈育兒法〉，《女子世界》第十二期（1905.4），頁31（頁1063）。

⁸¹ 竹莊（蔣維喬）譯：〈育兒法〉，《女子世界》第十二期（1905.4），頁31（頁1063）。

⁸² 竹莊（蔣維喬）譯：〈育兒法〉，《女子世界》第十二期（1905.4），頁32（頁1064）。

⁸³ 初我（丁初我）譯：〈為母的心得〉，《女子世界》第七期（1904.7），頁34（頁610）。

要先改良家庭的衛生，方能真正從根本改造兒童的身體，故日常家庭生活中的食、衣、住，便是主要的關鍵。

除了要養育健康的中國兒童之外，後天的教育也是不容忽視的問題。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男孩到了三、四歲就開始學前的教育，在知識分子的家庭中通常以識字、做對與口授經書作為兒童知識教育的起點。⁸⁴家庭教育中的教育者，通常是以父親為主，如父親宦遊或早逝，則由家裡其它的男性尊長，例如祖父、叔父或舅父替之，再次則由母親負起教養之責。⁸⁵由現存的蒙書可以發現，其內容大致可以分為五類：集合各類常識的識字書，如《三字經》、《百家姓》與《千字文》等；詩文的背誦選本，如《唐詩三百首》、《千家詩》與《笠翁對韻》等；歷史類的教材，如《蒙求》；博物類教材，如《名物蒙求》；以及道德類讀本，如《增廣性理字訓》與《名賢集》。⁸⁶晚清以前教育孩童的內容，主要偏向人格道德的養成與知識的啟蒙。⁸⁷

中國的蒙學自宋代以後漸成系統，由現存的蒙學書籍中可以發現，宋代的蒙學教育，將重點放在人格道德的養成。不論是司馬光還是朱熹，都主張由幼年時便進行教育，並且以嚴格的方式對兒童進行道德的規訓。宋儒普遍認為以道德的培養為主，而讀書識字則為次要的事情。⁸⁸但到了明清時期，隨著家族長輩對科考功名的重視，蒙學的宗旨變開始產生轉變。科考功名之有無，不僅是個人的榮辱，更是整個家族的興旺的大事，故明清以後蒙學的主旨便以讀書識字為主要取向。至晚清科舉未廢除前，中國兒童的教育大致上以科舉為單一的人生目標，期望兒童能乖乖的在書房讀書，以養成「好靜不好動」的性格。不過要注意的是，雖是以讀書識字為取向的教養，但除了科考相關的書籍之外，其他的雜書有些長輩是不希望孩童浪費時間去閱讀的。明清時期模範兒童的圖像，即是從小坐在書桌前，乖乖讀書，不好動、不貪玩的形象。⁸⁹

傳統的蒙書通常是寫給父親看的，也預設父親為完美的教養者與典範，但新

⁸⁴ 明清時期幼兒的學前的啟智活動，主要的內容為三部分：識字、作對和口授經文，參見熊秉真：〈好的開始：近世士人子弟的幼年教育〉，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頁 218-220。

⁸⁵ 熊秉真：〈好的開始：近世士人子弟的幼年教育〉，頁 222-230。

⁸⁶ 李維石：〈中國古代蒙學的閱讀策略〉（《圖書館》2007.4 期），頁 136。

⁸⁷ 許瑞芳：〈傳統童蒙教育對兒童道德養成教育的啟示〉（《中國德育》，2009.3 期），頁 31。

⁸⁸ 熊秉真：〈好的開始：近世士人子弟的幼年教育〉，頁 206。

⁸⁹ 熊秉真：〈好的開始：近世士人子弟的幼年教育〉，頁 230-235。

的兒童教育書籍則不然。它主要是站在傳遞新知的啟蒙者立場，認為要教育小孩之前，父母必須先要自我教育與改良行為，避免將錯誤的行為與價值觀傳遞給小孩。孩童的本性原如水映萬物，如何刺激變如何反應，容易受外界的影響而產生變化。如果父母能確實知道教育孩童的方法，並且以身作則樹立身教，那麼就算社會風氣不佳，也能避免小孩的性情行為有所偏差：

從來社會腐敗墮落的惡影響，很易蒙被到兒童發育上來。……這時父母的行為，很有些重大關係。譬如一家中父母，有不道德、不公正的舉動，子女自然感化著己身，就像父母的行止。且就如日常細故，亦漸能不知不覺，無意的感覺起來。吾看這樣的家庭感化，更不必論到社會那邊。……吾就想改良兒童的養育，先當改良養育兒童的家庭，把美滿的家庭敵惡感的社會，是沒有不成的。但家庭改造在道德上、言論上，先當以父母之為人，樹立子女的模範，來做一分像一分，走一步進一步，否則未種善因，欲收美果，正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猶緣木而求魚，抱薪而救火了。⁹⁰

家庭教育是一切的根本，而父母則是家庭教育的基礎。父母自身若能確立完整的身教，使兒童在受教之初便能有正確的行為準則與道德規範，在面臨外在社會的不良影響時，也能有所堅持不致混淆。故想要教養孩子之前，父母自身也要有所自覺並以身作則，想要孩子成為何種人，父母必須先要樹立典範。

雖然在家庭教育中，父母都擔任重要的角色，但與傳統的蒙書相比，新教育法在教育小孩的比重上，母親的角色開始受到重視。傳統的蒙學教育中，母親也可擔任知識的啟蒙者，但通常是在父親缺席的情況下，母親的教育才顯得理所當然。但新的教育法中，母親被認為是小孩最常也最早的接觸者，被人為其影響遠超過父親，母親的行為與價值觀會直接的影響幼兒，乃至其後的人格發展：

人無不愛其子，既愛其子，則必教之養之，應之撫養與誘導之理。撫養則關乎之身體，誘導則關乎兒童品性，此皆為母者應盡之義務也。義務不能盡，則為母之道缺而不全。蓋男人恆出外勞動，與兒童最切近者母而已。

⁹⁰ 初我（丁初我）譯：〈為母的心得〉，《女子世界》第七期（1904.7），頁 29-30（頁 605-606）。

兒童成立後之學問與品性，始基端在家庭，所以家庭之教育，專責於母也。

91

婦女在家庭當中不僅擔任母親的角色，也擔任主婦的職務，對於整個家庭的改良站著非常重要的位置。孩童的教育，需要革新，而這種革新的背後，則要有一個新式的家庭方能配合，而一個新式家庭的成立，則不能不仰賴家中的婦女——主婦。〈為母的心得〉針對婦女在家庭中主婦的認知，做了新的詮釋與改進。首先，婦女先要自覺，認清自己在家庭中的重要性，要有一個完美的家庭，則先要有一教養完全的主婦：

今世歐美的女子，沒不受完全的教育，所以女子的能力，不徒是依附於男子，並能扶助男子以行事，又能出來獨立以自營，真正算得是為妻的第一天職哩。我國的女子，不是沒有能力，實是沒有學問，把完全的學問，養成他自治的能力，然後知識也開通，道理也了解。等他日扶助他男子，教育他子女，造成一個嚴重美麗的新家庭，便是今日養育的方針。⁹²

丁初我認為新家庭中的主婦必須受西方那樣的完全教育，養成獨立自治的精神。其言下之意，即將西方主婦作為學習的榜樣，擁有新知識的洗禮，能夠獨立自主，卻又安於自家中擔任妻子與母親的角色，以打造一個完美的家庭為天職。

由於新教育法對於小孩行為影響格外重視，故除了父母以外，與小孩接觸頻繁的乳母也需注意揀選。〈為母的心得〉一文中，認為兒童在成長階段亦受身邊的人事物影響，傳統只對乳母的身體健康與否、乳汁分泌多寡與年紀大小等事加以講究，而對乳母的性情與對兒童的影響不加注意，作者以為是捨本逐末：

選雇乳母的方法，怎樣呢？體質呀！遺傳呀！年齒呀！乳汁分量呀！近來大家都事事注意的。而調查育兒上最要緊的感情，反沒有人講究，明明舍本逐末了。……選雇的方法，果怎麼樣？倘是使他保育女子的，必檢他

⁹¹ 竹莊（蔣維喬）譯：〈育兒法〉，《女子世界》第十二期（1905.4），頁 29（頁 1061）。

⁹² 初我（丁初我）譯：〈為母的心得〉，《女子世界》第七期（1904.7），頁 32（608）。

有和順溫柔的特性，婉婉服從的素態；使他保育男子的，必檢他有活潑運動的精神，慈良愛物的性質。甯遲雇，勿急雇；多選，勿少選。這個雇乳母的關頭，實是養育法上第一重的關係。⁹³

在中國傳統醫書中，對於乳母的選擇，性情雖然重要，「但在不可求全的情況下，最重要的，還是注意其健康狀態」。⁹⁴在〈為母心得〉中不否認乳母的身體健康是重要的，不過卻刻意的加強乳母的性情方是「養育法上的第一重關係」。由乳母的選擇，也可知道在針對不同性別的幼童，所選擇的乳母性情也要有所區別，女童則宜選擇溫和性情的乳母，男童則選擇活潑好動的乳母，遵循的教育原則還是在男女有別的框架底下，女性宜被教育為溫柔內向，男性則需多一點活潑外向的特質。

中國社會中等以上的家庭，雇傭乳母是一件相當普遍的事情，⁹⁵有的家庭甚至每一孩童都有一專門的乳母照顧，這些乳母在孩童的童年中佔有重要的位置，孩童對其的依賴與情感，甚或超過自己的父母。⁹⁶〈為母的心得〉討論選擇乳母的條件，將重點放在乳母行為對孩童的影響。競華的〈兒童教育話〉也重申乳母的重要。在德育方面的養成方面，認為小孩的性情一半來自於遺傳，一半來自於後天的影響，乳母常在幼童身邊，其行為之好壞自會對小孩的行為產生學習的效果：

兒童在三四歲前，耳裏聽著的，眼裏見得的，口裏說出的，沒有一種不是學著乳母的樣。所以乳母是溫柔慈善的，就能養成兒童和藹光明的天性。

⁹³ 初我（丁初我）譯：〈為母的心得〉，《女子世界》第六期（1904.6），頁 32-33（頁 506-507）。

⁹⁴ 參見熊秉真：《幼幼：傳統中國的襁褓之道》，頁 115。熊秉真考察唐代至明清醫書中，對乳母選擇的標準，認為唐代孫思邈《少小嬰孺方》中談及的「乳母法」，主要是針對乳母的身體健康與否為主要考量的標準。但至明代的《寶產育嬰養生錄》中，就增加對乳母性情和德行的要求，但這是最理想的情況下，如在不能兩全其美的情況下，「能供應濃厚乳汁，仍為要旨」。

⁹⁵ 正因為中等以上家庭，雇傭乳母的情況普遍，故〈為母的心得〉中認為乳母的影響，「在下等社會裡很少，中等以上家庭很多。……元來中等以上社會的父母，多做重大的事業，多是素性懶惰，沒有保育兒童的閒工夫，全然把教育的責任，丟在乳母輩上」，所以乳母得揀擇也就格外重要。作者仍不免鄭重呼籲為人父母者，切不可貪一己之便利，而將教養的責任全然委於乳母之手，以免造成難以彌補的影響。見初我（丁初我）譯：〈為母的心得〉，《女子世界》第六期（1904.6），頁 31（頁 505）。

⁹⁶ 在近世作家林海音、張愛玲的自傳性作品中，我們都可以看見奶媽對其童年生活的影響。關於民國以後報刊對於乳母議題的討論，可參見柯小菁：《塑造新母親：近代中國育兒知識的建構（1903-1937）》，（新竹：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頁 100-103。

乳母是陰險凶悍的，就能釀成兒童惡劣卑下的行為，一朝差誤，後悔終身，這便是人生德育上的第一關鍵。⁹⁷

在〈為母的心得〉與〈兒童教育話〉中加以申述乳母對兒童的影響是非常大的，其講述的內容，都是從兒童容易學習仿效的特點入手，如果兒童身邊的乳母行為有偏差，或性情不佳的話，兒童在不知不覺中學習了乳母的態度與性情，作為父母的要嚴加小心才行。

中國傳統蒙學，期待的理想兒童圖像是：不貪玩，安份地在書房讀書，準備未來的科舉考試。根據熊秉真對中國孩童歷史的研究，她認為到了明清時期在「競爭型」的幼教趨勢下，早學成為一個明顯的特徵，「六歲已開始正式教育的頗不少見，甚至有在五歲、四歲之稚齡就被安排入塾從師就學者」。⁹⁸不過，在正式入學堂學習以前，更多的孩童在家中親長自課傳統下，學習簡單的識字、作對與背誦經文，大約在三歲左右家中的智育教育便已經開始了。⁹⁹〈育兒法〉則對兒童過早接觸書本知識提出質疑，主張「讀書宜至七八歲，早讀則傷腦，因腦髓未足也」，¹⁰⁰認為過早讀書，為對幼童的智育發展恐造成揠苗助長的反效果。〈兒童教育法〉認為應當發揮兒童遊戲玩樂的個性，培養運動的興趣，還要引導兒童養成定時運動的習慣：

講到訓練筋肉、調和血脈、消化飲食的利用，莫妙於運動。小兒的天性，更是喜歡活潑的，終日幽囚在家庭裡頭，便易生出各種的惡病，是宜準著一定時刻，或在早起，或在食後，或在傍晚，有父母領導子女，或由兒童結隊成行，任他做著種種快樂的運動，教他種種遊戲的法子，就把練習身體運動精神的意趣，漸漸感入兒童行樂的性情來，則心性自然舒暢，思想自然高尚，身體發育的敏銳，更純任而自然了。¹⁰¹

⁹⁷ 競華：〈兒童教育話〉，《女子世界》第十五期（1905.？），頁 31（頁 1393）。

⁹⁸ 熊秉真：《童年憶往：中國孩子的歷史》（台北：麥田，2000），頁 90。

⁹⁹ 熊秉真：《童年憶往：中國孩子的歷史》，頁 96-109。

¹⁰⁰ 竹莊（蔣維喬）譯：〈育兒法〉，《女子世界》第十二期（1905.4），頁 32（頁 1064）。

¹⁰¹ 競華：〈兒童教育話〉，《女子世界》第十六、十七期（1906.1），頁 28（頁 1498）。

中國傳統童蒙唯恐孩童過於玩樂，而導致學業荒廢，性情上難以收束的結果，故修業之書三申五令的勸導「業精於勤，荒於嬉」，鼓勵孩童坐在書桌前安靜讀書。近代則強調兒童的活潑性情，並以「有益健康」作為論述的依據，強調運動與遊戲不是一種放縱的行為，而是能夠強健身心的活動。從前「好靜不好動」的小書蟲，被期許走出書房，跑向郊外與運動場，成為一個「能靜也能動」的現代小學生。

晚清以後的兒童教育，認為除了家庭之外，兒童還須與朋友、社會等相連結，不應當鎮日埋首書堆，應該走進人群發揚其活潑的個性。〈為母的心得〉中便鼓勵母親應當多帶著孩童接觸人群，進入社會生活裡頭，期望母親能帶著小孩到公園裡，讓小孩和其他的孩童互動，在自然而然的嬉戲裡，學習如何和人相處以及合群的道理：

吾嘗聽見美國幼兒與家庭的關係，很有趣味的。彼國中等以上社會的母親，往往在鄰巷過從的時候，更番攜著自家的子女，與鄰家的兒童結伴往來於公園淺草間，歡然盡半天的遊樂，確是世界上一種的美風哩。這一輩兒童的良友，嬉遊徵逐母親的監督下，相愛忘形相知道故，一般合群公德的萌芽，就從此中徐徐醞釀出來，倘能引用此風於我國家庭上，不但利便於家事上頭，得造成兒童無量的幸福，父兄無窮的愉快，且隱然是自治制度的實地改良社會的最好方法。咳！我國中流以上的社會，相與拘禁束縛其兒童，和樂的家庭勝如無情的牢獄，一想到育兒發達的方法上，狠不幸，狠可憐，把彼國國民的襟度，遂我兒童自由的發育，真正一服對症的妙劑了。¹⁰²

公園是現代西方生活的產物，藉由丁初我的譯文，使讀者在閱讀時可以接觸到一個不一樣的家居生活：父母與小孩有閒暇的時間，可以在公共場所中與其他的家庭進行交遊，這與中國傳統的家庭生活是大不相同的。其次，讓小孩從小習慣與人相處，學習合群的道理，是學習作為未來公民很重要的訓練。晚清知識分子對於中國人缺乏合群美德批評不少，如果小孩能從小灌輸合群的價值，那麼以後成

¹⁰² 初我（丁初我）譯：〈為母的心得〉，《女子世界》第七期（1904.7），頁 27-28（頁 603-604）。

人之後對於社會國家的向心力也就增加，不會過於自私自利，而能進私德為公德。

隨著兒童與外在世界接觸的擴大，父母本身對於兒童行為方面也要詳加注意，特別是對孩童玩伴的選擇要特別留意：

父母保姆以外，最能變化性質，漸染風氣的是朋友。拘謹的父母們，每使兒童閉戶不出，養成種種任性高慢不適社會的性質，使終身無交換的智識，愛群的觀念，這斷非補助教育的善法。但是兒童全無擇交的智識，要在父母代為區別，有益的，宜引之使近，有損的，宜避之使遠。宜為有益的遊戲談話，不宜為有損的誘引徵逐，這是人生初入社會的第一關，不可不慎之加慎呢！¹⁰³

近代對兒童的教育，不主張將孩童閉鎖在家中，反鼓勵家長帶領小孩進入人群當中，早早學習與人相處的合群倫理。既然孩童要與人接觸，對於兒童交友對象的選擇則不可不慎，會帶來不良影響的朋友宜加以避免。競華列舉會帶來不良影響的朋友，例如惡戲之友，常常會有一些妨害公德的行為，像是會在公園裡攀折花木，或是欺負弱小的行為，家長應要避免子女與其接觸；又如惡德之友，品行驕傲、放任、嫉妒與懶惰之人，也應避免與其交往。有趣的是，受到衛生觀念的影響，競華在避免結交的朋友裡，也列入了「宜避免飲食之友」：「兒童食慾很大，在家每難厭足。倘出外遇見徵逐的友朋，便要快意飲食，不但飲食過多，妨礙衛生。」¹⁰⁴也怕因為將錢全都消耗在食物上，容易產生竊盜的行為，故飲食之友也宜避免。

傳統中國對於小孩的教育，大多是依托在各個家庭之中，而〈為母心得〉中則提倡幼稚園，希望能有一群具有專業育兒知識的人，「聚人家無數的兒童，代父母行教育的事權，替學校作預備的科目」，¹⁰⁵其目的是使兒童能在遊戲中學習，做為將來進入學校教育的準備。兒童在長成到一定的年紀之後，便要進入學校裡，接受完整的知識教育，學校教育與家庭教育是一脈相連的，如果學校所遵行的道德，家庭中的父母卻沒有遵行的話，容易使孩童產生混淆與困惱，故家庭也

¹⁰³ 競華：〈兒童教育話〉，《女子世界》第十五期（1905.？），頁32（頁1394）。

¹⁰⁴ 競華：〈兒童教育話〉，《女子世界》第十五期（1905.？），頁33（頁1395）。

¹⁰⁵ 初我（丁初我）譯：〈為母的心得〉，《女子世界》第七期（1904.7），頁28（頁604）。

要進行改革，方能與學校同步進行，使孩童的學習能達到更好的效果。

競華的〈兒童教育話〉一文，則對兒童的教育做了更仔細的剖析。他將兒童的教育歷程分為三個階段：一是家庭教育時期，約為三到五歲的階段；一是幼稚園教育時期，為三、四歲到六、七歲的階段；最後是學校教育的開始，在六、七歲以後。在家教育教育的時期，可以分為智育、德育和體育三方面，在家庭智育方面，主要的施教者是家中的長者，讓小孩在自然而然潛移默化中學習認識事物、基本的語言表達能力，並和幼童玩些玩具以活化幼童的創造力，以為進入幼稚園做準備。¹⁰⁶吹萬曾創作〈幼稚歌唱〉五首，認為歌曲對兒童有潛移默化的功效，簡單的歌詞與聲調，讓孩童在吟唱之時，便能通曉其義。序言中並感嘆「觀日本幼稚園，紀律整齊，一絲不亂，以四五歲小孩而能若此，真覺愛慕難名。吾國現今尚無幼稚園之設，又未易得良教師，亦一大缺點。」¹⁰⁷ 其實當時中國有些地方，已經引進日本的幼稚教育，認為成效卓越，並打算舉辦幼稚園運動會。《女子世界》第六期的記事欄中，便報導的湖北的幼稚園教育：

湖北幼稚園，自開辦至今，不過兩月，保姆教導，已大有成效。日本女教席，皆稱中國孩童向時未受保育之益，今觀此園學生，學習如此之暫，竟能各循軌轍，較外國小學生入園一年者，似有過之。現任大令以稟明端護督，預備舉行幼稚園運動會，使人觀覽，知學堂之益，與新法之善，庶人人有送子弟入學之思想，而教育可普及矣。¹⁰⁸

幼稚園教育是以具有專業育兒知識的保姆來教育小孩，相較於將幼兒分散於各自家庭自行教育，幼稚園教育則能提供更適合小孩教養的環境與知識。在湖北幼稚園的報導裡，更將幼稚園教育提升至國家競爭的範疇，孩子是中國未來的希望，之前中國人之所以不及外國人，皆因後天教育不足的緣故。湖北幼稚園中的孩童，接受專業幼稚教育方兩月便能有此成效，勝過外國小孩一年的成果，如果全中國的孩童，都能接受幼稚園的教育，則中國的未來便是一片光明。

近代的兒童教養法與過往傳統的幼童教育已有所不同，希望小孩能走出家庭

¹⁰⁶ 競華：〈兒童教育話〉，《女子世界》第十四期（1905.？），頁 33-42（頁 1285-1294）。

¹⁰⁷ 吹萬（高燮）：〈幼稚唱歌〉，《女子世界》第十期（1904.？），頁 47-48（頁 903-904）。

¹⁰⁸ 〈記幼稚園〉，《女子世界》第六期（1904.6），頁 84（頁 558）。

進入人群，不再以將小兒閉鎖在家庭中以為保護，反而認為應當多與人接觸，學習群體的生活，自然而然中培養公民生活的基本常識。而衛生觀念的影響，開始改變一些照顧幼兒的細節，期望能夠符合現代衛生的標準，除了能讓小孩發展的更好之外，亦能讓家庭生活的內容，在衛生觀念的引導下，進入現代家庭的範疇，完成中國家庭改良的目標。而這三篇與教育兒童有關的文章，表面上似乎在說明教養兒童的方法，其實是向讀者展現了一個新式母親應當具備的能力，傳統那樣教育兒童的方式已經不適用了，要使家庭的改革能夠成功，主婦的觀念必須先要更新，要先學會新家庭的元素才行，才能用新的方式，教育出一群不同以往的孩童，在這種家庭中成長的孩童，未來便會成為國家改革的新希望。

五、小結

晚清以前婦女家庭知識的傳承，大多依賴女性親屬間的口耳相傳，母親傳授給女兒，婆婆傳授給媳婦，女性長輩依照自己的經驗法則，將其理家的知識傳授家中的女性晚輩。《女子世界》則提供了另一種女性知識傳授的途徑，利用公共報刊將家事知識提高為一種專業，引介西方與日本的新知，以企圖藉由主婦居家知識的更新，讓中國的家庭邁入現在生活。

衛生觀念進入家庭，成為主婦家事的原則之一。依著衛生的觀念了解身體器官的構造與原理，照顧家中成員的健康。《女子世界》以普及衛生觀念為目地，以淺白的對話取代長篇論說，並取現實情況中的案例，將保養身體的方式以條列的方式羅列，讓主婦容易吸收與實踐。

西方與日本的知識進入家庭知識體系中，舉凡飲食、穿衣與居住都受其影響。中國傳統的食衣住，開始與西方的生活習慣結合，知識份子努力灌輸中國主婦符合科學與衛生的居家知識，希望在持續地說解下，讓知識成為一種常識，讓所有的中國主婦能夠將家庭改造為文明的樣貌，朝著新式家庭生活的道路前進。

《女子世界》之後的晚清女性報刊，例如《婦女時報》也開始將與女性相關

的育兒與家政知識加以引介。¹⁰⁹乃至民國以後的《婦女雜誌》，也開闢專門的欄目傳遞新的育兒知識。¹¹⁰家政知識不再是各家零散的經驗傳承，而逐漸成為一個理論化、系統化的專門知識。

¹⁰⁹ 關於《婦女時報》中育兒知識與家政知識的部分，可參見邱俊明：《「家有賢母，室有良妻」：《婦女時報》（1911-1917）家庭教育討論初探》（台北：臺灣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10）之論文。

¹¹⁰ 參見池賢淑著；趙吉譯：《〈婦女雜誌〉（1915-1931）中出現的有關兒童的論說——與《新女性》（日帝治下的朝鮮）比較》（《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2期，2004.12），頁257-277。

第四章 出走閨閣：婦女詩文創作的轉向

一、前言：批風抹月誠可罪

梁啟超在 1896 年的《變法通議》一書中，討論關於女學的部份時，對於女子無才是德的觀念提出批判，也對古代所謂能批風抹月的才女不以為然：

人有恆言曰，婦人無才即是德，此謬言也。世之瞽儒執此言也，務欲令天下女子，不識一字，不讀一書，然後為賢淑之正宗，此實禍天下之道也。古之號稱才女者，則批風抹月，拈花弄草，能為傷春惜別之語，成詩詞集數卷，斯為至矣。若此等事，本不能目之為學，其為男子，苟無他所學，而專欲以此鳴者，則亦可指為浮浪之子，靡論婦人也。吾之所謂學者，內之以拓其心胸，外之以助其生計，一舉而獲數善，未見其於婦德之能為害也。¹

對於梁啟超來說，只知批風抹月不足以貴，即使是男子如果專務此事，也只能以浮浪子弟視之，而婦女作家的傷春惜別之語，對現實的生活無益，而主張婦女也應當講究實學：

今中國之婦女，深居閨閣，足不出戶，終身未嘗見一通人，履一都會，獨學無友，孤陋寡聞，以此從事於批風抹月，拈花弄草之學猶未見其可，況於講求實學，以期致用。²

梁啟超以實學的角度，批評明清以來的婦女文學，認為其關注自身處境而傷春悲

¹ 梁啟超：〈變法通議·論女學〉，梁啟超著；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頁 31。

² 梁啟超：〈變法通議·論女學〉，《梁啟超全集》，頁 33。

秋，對於社會國家助益不大，故在如此的角度之下，婦女文學的內涵也必須有所改變，而專務詞藻批風抹月的作品，成為晚清文人揚棄的部份。³對他們而言，女性不僅要受教育，所受的教育還必須是有關國計民生的實學，女子應當走出閨閣，不宜只在閨房中多愁善感暗自垂淚。不僅是梁啟超等男性知識份子，身為女性的呂碧城也說過類似的話，⁴晚清時期開始對明清的才女文化進行思考，並加以重新評價。

如果批風抹月的內容已為當時有志之士所厭棄，哪麼詩歌的內容到底應當作何轉變呢？不只是針對婦女文學，梁啟超對於當時的詩歌內容與形式，提出詩界革命的呼求。他在 1900 年的《清議報》中提及，新詩必須具有三長：「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語句，而又須以古人之風格入之，然後成其為詩」。⁵這種新意境、新語句和古人風格的融合，其實在梁啟超提出詩界革命之前，黃遵憲等人便已經開始嘗試，之後隨著時代風潮之影響下，晚清的詩歌的內涵也產生更大的轉變。

《女子世界》中闢有文苑（第十三期後改為「文藝」）專欄，專門刊載當時知識份子的詩歌創作。⁶其中又分為「因花集」與「攻玉集」，按照作家性別加以分類，「因花集」通常刊載的是女作家的詩詞創作，「攻玉集」則是刊載男性作家的詩詞作品。⁷面臨國家危亡的關口，女詩人們在投稿的過程中，詩文的創作不論在內容還是形式方面，產生了何種轉變？這是本章關注的要點之一。首先，《女子世界》以月刊的形式，刊載當時女作家的作品，其作品得以以即時的方式出版，

³ 胡纓認為梁啟超之所以會批評傳統才女，其原因有二：「首先，『才女』的形象是與少數的特權文人家庭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而現代國家要求對其公民（的母親）實行普遍教育；其二，傳統才女的才華似乎是『無用』的，它們與傳統的高等文化教養緊密相關，因此與建設現代中華民族所需的實踐的，『有用』的才能差距甚遠。」見胡纓著；龍瑜成、彭珊珊譯：《翻譯的傳說：中國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頁 9。

⁴ 在《大公報》1905 年 5 月 11 日中有〈讀碧城女史詩詞有感〉一文中，轉述呂碧城對其女性友人說：「吾中國古亦多才女，而惟以吟風弄月，消耗其歲月者。蓋上無提倡實學之舉，故皆以有用之精神，耗於無用之地。今國家如提倡女學，將來女界之人才，當必可觀，此所謂時勢造英雄也。」

⁵ 梁啟超：〈汗漫錄〉，《清議報》第三十五冊（台北：成文書局，1967），頁 2281。

⁶ 《女子世界》之後，有的婦女報刊也陸續增設「文苑」的欄目，例如民國時期重要的婦女報刊《婦女雜誌》也設有「文苑」的欄目。胡曉真便以《婦女雜誌》中「文苑」欄的婦女作品，企圖勾勒出從傳統才女到新女性的軌跡。見胡曉真：〈文苑、多羅與華鬢——王蘊章主編時期（1915-1920）《婦女雜誌》中「女性文學」的觀念與實踐〉（《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2 期，2004.12），頁 189。

⁷ 根據現存的《女子世界》來看，第一期的「文苑」只有「學校唱歌」的部份，第二期開始增設「因花集」，第三期開始刊載「攻玉集」，第四期則因花集與攻玉集同時並列於「文苑」的欄位之下。之後除了第六期、第十二期與第十三期只刊載因花集，第十一期與第十四期只刊載攻玉集外，其他期則為因花集與攻玉集並置的情況。

而不用等集結成冊之後方能呈現在讀者面前，因為報刊的特殊形式，故晚清的女詩人的創作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最明顯的就是能藉由報刊出版與當時人事產生立即性的聯繫，通過閱讀與創作建立起超越血緣與地域的共同體。

其次，明清才女常面對的「內言不出」的困境，在晚清女性作品中逐漸消解，在《女子世界》中可以看見女作家們將自身經歷暴露在公眾的讀者底下，除了外在的生活遊歷之外，更多的是屬於心靈層次的感懷，讓讀者藉由閱讀她的作品，參與了她的心路歷程。對晚清的女作家而言，這是一種新的嘗試，這種嘗試的過程中，女作家們又在訴說什麼呢？而這些話語，又是在何種背景底下說出的呢？亦是本章要討論的要點。再次，梁啟超的詩界革命宣言，開啟晚清詩壇的變革，在《女子世界》的女性作品中，開始使用新思想與新名詞來傳達她們的思想，讓婦女文學在內容也有了不同的內涵，而這種質變的內容為何呢？最後，《女子世界》在第二、三期後，曾公開為〈女學文叢〉一欄徵文，而從現存的文獻中可以看到，參與投稿的女作家大多以新學堂的女學生為主，在《女子世界》中我們看到女作家的身分隱然出現一種交接的態勢，在詩文不同的創作底下，婦女文學的內涵也悄然轉變。

二、眾聲喧嘩：對話群體的擴大

中國明清時期，一些書香世家亦讓家中的女性接受教育，使得明清以降出現了不少閨媛才女。明清才媛的作品，大都藉由家族中男性文人的力量，方能將其刊刻出版。⁸明末才女的結社大多是屬於「居家式」的詩社，通常是以家族的女

⁸ 鍾慧玲認為「清代士大夫家庭除了重視女子的教育之外，多能主動地將閨幃之作結集出版，呈諸於世，而印刷業的發達，適足以便利其刊行。因此，清代婦女作品繁富，得力於家庭的裒輯付梓可說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見鍾慧玲：《清代女詩人研究》（台北：里仁書局，2000），頁102。曼素恩也認為，清代女性作品的刊刻，家族扮演重要的角色，「盛清社會的一個奇特之點會給熟悉西方女性史的讀者留下極深的印象：這就是女性著作的出版乃至家族在刊印出版中扮演的角色所具有的重要性。刊刻的文本，以稿本、抄本或雕版印刷的形式，從一個家庭傳到另一個、從另一個作坊傳到另一個作坊，為盛清時期的知識女性提供了一種獨特的空間，這種空間既存在於家庭的私生活之內，也存在於高文化層次的公眾生活之中。」見曼素恩（Susan Mann）著；定宜莊、顏宜葳譯：《綴珍錄：十八世紀及其前後的中國婦女》（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頁10。

性親屬為對象，作品的流通亦已家庭內為主。⁹至清代女性的結社，則由血緣關係擴大到地緣關係，例如康熙年間的蕉園詩社，除了徐燦以外，皆為浙江錢塘人；乾隆年間的清溪詩社，其成員則皆為江蘇吳縣人。¹⁰女性的創作的形式有詩、詞、戲曲與彈詞，作品預期的讀者亦為社團與家族中的女性，或是藉由通信聯繫的女性群體。¹¹婦女作家互相分享生活的經驗，與文藝上的見解，作品的創作乃是為了與女性群體分享，作品中的情感即使如實呈現，也不違反「內言不出於閨」的條規，女性群體的創作與分享，形成了一種「想像的閨秀閱讀社群」。¹²

這種明清才女的想像社群，到了晚清以後，藉由報刊對大眾的開放，女性作品的對話群體也得到了開放。《女子世界》中專門替女性開闢了「因花集」與「女學文叢」兩個專欄，鼓勵女性創作投稿。「因花集」以詩詞為主，「女學文叢」則是刊登文稿。關於投稿的女作家的生平，大多僅能從詩詞中的署名、或詩後所加的附註，得以了解女作家的零星資料，關於其生平的詳細資料，大多是付之闕如的。在「因花集」發表作品數量較多的三位女作家——趙愛華、汪毓真與呂逸初，除了呂逸初之外，其他兩位的生平經歷則所知有限。

⁹ 高彥頤以沈宜修所組的女性詩社為例，「沈宜修主持了一個非正式的女性社團，這個社團的組織聚會、出游或交換詩作。作為『家居式』女性社交網的一個例子，這一詩社逐漸圍繞著兩個家族的婦女而形成——沈家和葉家。……這個群體的中心是宜修、她的三位長女、她的堂姊妹和表姊妹兼好友張倩倩。我們還可以在一些詩歌題詞中找到其他成員的蛛絲馬跡，這些成員包括沈家主要房支的親戚——宜修的姊妹、兄嫂弟媳、堂姊妹、姪女、姑母和族姑——一個大約十五人的小團體。」見高彥頤（Dorothy Ko）著；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頁 215。

¹⁰ 鍾慧玲：《清代女詩人研究》，頁 175-181。

¹¹ 魏愛蓮（Ellen Widmer）由《尺牘新語》中發現，中國十七世紀的女作家王端淑、吳山、黃媛介、黃德貞等人，都曾藉由書信的往來與其他女作家保持聯繫。魏愛蓮認為：「《尺牘新語》顯示閨秀作家彼此關照支持。女性的家庭式詩社也藉書信與離家的成員抱持聯繫。來自異地的閨秀，常經由男性贊助人而結識。自然而然地，這種聯結分散各地女性的文藝網，也正是男性結社與外界社會的交流路線。無論如何，閨秀名媛之間的重要情誼很快就形成一股勢力，由這種關聯而發展的關懷，不但維繫女子創作的動力，也提供了心靈的慰藉。一如男性社團經由跨越地域的聯繫而加速擴展，女性集社也能凌越時空的距離而建立個體間的情誼。」參見魏愛蓮著；劉裘蒂譯：〈十七世紀中國才女的書信世界〉（《中外文學》22 卷 6 期，1993.11），頁 67。

¹² 明清的才女們也以韻文的方式創作小說，形成僅供閱讀的彈詞小說。胡曉真認為「彈詞小說的文義雖然尚淺，不必是『才女』才能閱讀，但因文本處理的對象是有能力以文字形式表達自己觀點的女性讀者，因此仍屬菁英階級的『閨秀』，而作者心目中預期的『知音』讀者也正是屬於這個階層的女性。這些相對少數的女性讀者於是可能在心理層面上，隱約形成一個定義模糊的『閱讀社群』（reading community）。」這些閱讀社群有時並沒有固定的組織與定義，其對話的方式，除了面對面的接觸之外，還通過寫作來進行，於是「讀者社群中的女性之間便形成一種特殊的文字緣分（textual relationship），而所謂『社群』的意義，更完全是『想像性』（imaginary）的。」見胡曉真：《才女徹夜未眠：近代中國女性敘事文學的興起》（台北：麥田出版社，2003），頁 24。

表 3-1 《女子世界》中趙愛華、汪毓真與呂逸初之作品列表

作家	作品
趙愛華	<p>〈讀女子世界有感〉(第四期)、〈暮春雜感〉(第六期)、〈保種歌〉(第六期)、〈新翻子夜歌〉(第八期)、〈讀史偶成〉(第八期)、〈庚子感事詩十首之五〉(第九期)、〈秋風颯颯秋月娟娟夜靜更闌讀風洞山傳奇不盡興亡之感〉(第十期)、〈鳳凰台上憶吹簫 癸卯過金陵〉(第十期)、〈甲辰除夕書懷〉(第十二期)、〈乙巳新感情〉(第十二期)、〈示滬上兩妹〉(第十二期)、〈祝第二年女子世界〉(第十三期)、〈塞下〉(第十三期)、〈題素心蘭〉(第十五期)、〈過江〉(第十五期)、〈春夜〉(第十五期)</p>
汪毓真	<p>〈祝女子世界〉(第六期)、〈見女子世界徵文以女中華命題愧不能文詩以備賸〉(第六期)、〈讀女學報第四期女界近史漫題四絕〉(第六期)、〈有感〉(第六期)、〈箴女界〉(第七期)、〈觀魚有感〉(第八期)、〈讀東歐女豪傑感賦〉(第八期)、〈女國民〉(第九期)、〈悲秋·酒泉子〉(第九期)、〈悲時〉(第十期)、〈讀同情夢傳奇漫題其後〉(第十二期)、〈暗香〉(第十二期)</p>
呂逸初	<p>〈憂國吟〉(第七期)、〈題女子世界俠女傳後〉(第八期)、〈文明女塾偶作并呈經理韓君〉(第八期)、〈寄張竹君女士〉(第十三期)、〈感事次蘊華妹原韻〉(第十三期)、〈乙巳三月聞芑荃子有日本之游率成一律誌別〉(第十三期)</p>

趙愛華與汪毓真同為江蘇常州人，趙愛華別署「雲溪女士」，汪毓真為「悟因女士」，兩人都曾擔任《女子世界》的調查員。¹³在數量上，趙愛華發表的詩詞最多，一共有十六首；汪毓真居次，一共有十二首；呂逸初則為第三，在「因花集」一共發表了七首作品。呂逸初為浙江石門人，又名呂筠青，號韻清女史，曾任石門文明女塾之教員，為浙江有名之女詩人徐自華之義妹兼詩友，¹⁴《女子世界》第十二期曾刊登其攝影小照。



雖然無法得知《女子世界》中大多數女作家的詳細資料，但由其所署之籍貫大體可以歸納女作家所分布的地域，主要還是以江、浙為主，例如趙愛華、汪毓真、秦浩、許玉、莫飛虎、佩蘅、吳弱男、周紅梅、曾競雄、湯雪珍、陳竺湖等人，皆為江蘇人；浙江則有丁志先、呂逸初、萬昭平、單士釐、蔣韞玉、蔣韞華與徐蘊華等人。除了江、浙以外，廣東有杜清持、張肩任、康同璧、同怙、彭維省、彭維點與劉瑞平及其姊妹等人；湖

¹³ 在《女子世界》第四期的目錄後，曾刊有一啟示說明《女子世界》的調查員有「張堰高時若君、廣東杜清持女士、常州趙愛華女士」。到了第六期的啟示中，則增加了「常州汪毓真女士、常熟俞九思君、石門韓靖齋君、香山劉瑞平女士」。這些調查員主要負責將各地與女學有關的文件、狀況、論說、詩歌、新聞或攝影等，傳達至《女子世界》的編輯處，女子世界社則以出版的《女子世界》贈本作為稿酬。其中趙愛華、杜清持、汪毓真與劉瑞平等四位女性，也常在《女子世界》上發表詩歌與文章。

¹⁴ 徐自華（1873-1935），字寄塵，號懺慧，浙江石門人。在秋宗章〈記徐寄塵女士〉一文中提及：「女士同懷姊妹凡二人，俱穎慧能詩，有不櫛進士之譽。其尊人杏伯先生，風流蘊藉，有名士氣。嘗于所居月到樓中，授女士以昆曲，杏伯先生挾笛，女士與義妹呂韻清合譜《賞秋》等闋，絲竹達旦，不亞霓裳風景。女士從姊蘭湘，為從父蓉史先生季女，長女士一歲，從妹學詩，互相酬唱，年二十一而亡。……女弟蘊華，有《雙韻軒詩草》，亦清麗可誦。」見秋宗章：〈記徐寄塵女士〉，收入徐自華著；郭延禮編校：《徐自華詩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233。徐自華與其堂姊徐蘭湘、義妹呂逸初三人，常有詩歌酬唱，在徐自華的詩集中，便可以看到許多與呂逸初相關的詩歌，例如〈和蘭湘姊偕韻清女史遊西湖詩原韻〉、〈和韻清韻寄蘭湘姊〉、〈和雲間詞客偕韻清女史同遊西湖鏡清樓小酌題壁詩即次原韻〉與〈和雲間詞客留別韻清女史原韻〉等詩。關於呂逸初的確切生卒年，囿於資料有限無從得知，但從呂逸初與徐自華、徐蘊華（1883-1961）姊妹唱和的詩歌中可以得知，她的年齡應當是介於兩姊妹之間的，在《女子世界》第十三期刊登了呂逸初〈感事次蘊華妹原韻〉，可見她是比徐蘊華年紀稍大的，生年應當是在1873-1883之間。

南有鄭家佩、何承徽與張昭漢及其從妹張振亞、張駕美、張宏楚。¹⁵而女作家的身分，有的為學堂的女教習與女學生，¹⁶她們擁有傳統詩詞的書寫能力，又或多或少受到新思潮的啟蒙，並且擁有閱讀《女子世界》的機會與能力。當《女子世界》公開徵文時，她們主動、或經由男性親友的引介，將自己的作品藉由《女子世界》展示於世人面前。

報刊成了女作家們發表作品的新園地，作品在創作後不久，便能藉由報刊公諸於世。女作家們在發表的同時，亦以報刊的全體讀者為預期的對話群體，只是《女子世界》以女讀者為號召，故形成女作家們在創作時，有時既以全體同胞為訴求，又不忘以女界的群體為想像的共同體。以《女子世界》的出刊為例，女作家們普遍肯定這些男性編輯對於女性啟蒙的努力，趙愛華寫了兩首關於《女子世界》的詩歌，其一為〈讀女子世界有感〉：

一紙風行擴我聞，我心如擣復如焚。同胞努力從今始，輸送文明倡合群。
如錦如荼新舞臺，青年愛國會名才。蛾眉傳遍平權呪，七寶莊嚴面面開。
悱惻芳慈大感悟，斜陽祖國悵前途。流黃歲月閒拋擲，機上醒獅肖畫圖。
熱血精忱一例紅，女權爭復亦英雄。釋迦彈指滄桑變，會供香花祝大同。
歐雲亞雨隔天涯，昨夢羅蘭信不差。睡起碧幢偶有觸，眼前羞見自由花。
專制魔王擅惡名，東西金鼓震皇城。如何一片中原土，盡起春蠶食葉聲。

17

¹⁵ 張昭漢（1884-1965），後改名為張默君，湖南湘鄉人，母何承徽。「早年先後參加同盟會與南社。肄業上海務本女校師範科、聖約翰女子書院文科。辛亥革命時，赴蘇州說總督程德全起義，創辦《大漢報》。之後，倡女子北伐隊，發刊《神州女報》，創辦神州女校，為首任校長。1918年赴美，入哥倫比亞大學專攻教育學。1920年回國，任上海《時報》副刊《婦女周報》編輯，江蘇省立第一女子師範校長。1927年以後，任杭州市教育局長、考試院考選委專員、立法委員。1935年當選國民黨中央監委。1936年邵元沖死後，一意於詩文著述。1947年任考試院委員、國史館名譽編輯。去台後任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在台北逝世。」見陳玉堂：《中國近代人物名號大辭典》（杭州：浙江古籍，1996），頁647。關於張昭漢與張駕美、張振亞、張宏楚的關係，則由柳亞子的敘述中可以得知：「原來，天放在『自治學社』以外，另外又辦了一個『明華女學』，校址就在他的家裡，也分高級班、低級班兩種。高級班的領袖，就是濟扶。還有湘鄉張伯純的女兒、姪女宏楚、駕美、振亞三人，他們都是默女士的姐妹行，默君此時則在上海“務本女學”讀書。」見柳亞子著；柳無忌、柳無非編：《柳亞子文集（自傳·年譜·日記）》，頁191-192。

¹⁶ 由現存的資料可以得知，其身為女教習的有呂逸初（石門女塾）、萬昭平（宗孟女學堂）、杜清持（廣東女學堂）等；女學生則有張肩任（廣東女學堂）、孫漢英（奉化女學堂）、何亞希（務本女塾）、顧志堅（城東女校）、朱趙超（城東女校）、廖斌權（嘉定普通女學校）、張駕美（明華女學校）、張昭漢（務本女塾）、張振亞（明華女學校）、張宏楚（明華女學校）。

¹⁷ 趙愛華：〈讀女子世界有感〉，《女子世界》第四期（1904.4），頁51（頁325）。

藉著《女子世界》的出刊，趙愛華認為輸送文明、提倡平權的時機已然到來，全體同胞應當在這新舞台上一展長才。在她的詩作中以「同胞」、「青年」與「娥眉」為呼求，她在面向全體同胞的同時，又將關注點集中在婦女身上，認為女界中人在這特殊的時刻，不應拋閃黃金歲月，而應當爭復女權，學習西方羅蘭夫人的榜樣，爭取自由為國家盡一份心力，不讓各國蠶食中原土。她在《女子世界》出刊滿一年之後，又寫了一首〈祝第二年女子世界〉更對女界的未來寄予厚望：

璀璨光華次第通，救時端賴女英雄。鐘聲警破香閨夢，筆陣排清孽海風。
萬斛思潮噴浪碧，百般舌血燦花紅。君看女界英明日，大好江山復漢中。

18

同為《女子世界》調查員的汪毓真，也有一首〈祝女子世界〉：

諸君法力自無邊，一杵鐘聲響大千。甘露徧輸紅粉隊，慈航普度火坑蓮。
掃除魔障便成佛，爭得人權不羨仙。百兆裙釵齊稽首，大同世界自由天。

19

另一金陵女子陳竺湖也有一首〈頌女子世界〉：

女界光騰萬丈紅，沈沈黑獄倩君通。自由平盡參差級，普及文明一體同。
光輝祖國女英雄，瑪尼批茶現亞東。喚醒釵裙二萬萬，香魂同沐自由風。

20

這幾首關於《女子世界》的詩歌，都借用「鐘聲」、「喚醒」等，具有啟蒙意象的字眼，來讚揚《女子世界》對於女性解放的努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她們以同為婦女的立場讚揚《女子世界》，在面向全體讀者的同時，則又刻意聚焦向那「女

¹⁸ 趙愛華：〈祝第二年女子世界〉，《女子世界》第十三期（1905.？），頁 61（頁 1191）。

¹⁹ 汪毓真：〈祝女子世界〉，《女子世界》第六期（1904.6），頁 63（頁 537）。

²⁰ 陳竺湖：〈頌女子世界〉，《女子世界》第九期（1904.9），頁 49（頁 817）。

界二萬萬的裙釵同胞」。她們肯定《女子世界》啟蒙女界的貢獻，並向女性讀者呼告訴求，要積極走向文明，學習西方的批茶（Harriet Beecher Stowe，1811-1896，現譯「史托夫人」）²¹與羅蘭夫人（Marie-Jeanne Phlippon Roland，1754-1793），²²追求女界的解放與自由。女性讀者通過對《女子世界》的即時閱讀，產生了一個閱讀群體，亦即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謂的「想像的共同體」，²³通過閱讀文本所建立起來的想像共同體。以公共的報刊成為中介，使不同血緣與地區的女性，藉由閱讀與創作互相傳遞內在的思想。而在《女子世界》的有意啟蒙女界的企圖下，通過《女子世界》女性因擁有相同的思想而被串聯在一起，形成一個得以振興女界的女性群體。

期刊的開放性與即時性，使得作者與讀者、男性與女性，都可以擁有一個公開的平台，對同一部作品進行討論，而這些討論的內容，又同時對公眾開放。例如以虛無黨蘇菲亞為主角的《東歐女豪傑》，在《女子世界》中便刊載了與其相關的回應。在第四期中就有《東歐女豪傑》的作者嶺南羽衣女士²⁴的〈東歐女豪傑中作〉：

磊磊奇情一萬絲，為誰吞恨到娥眉。天心豈厭玄黃血，人事難憑黑白棋。
秋老寒雲盤健鶻，春深叢莽殪神魑。可憐博浪過來客，不到沙丘不自知。
天女天花悟後身，去來說果腹談因。多情錦瑟應憐我，無量金鍼試度人。
但有馬蹏懲往轍，應無龍血灑前塵。勞勞歌哭誰能見，空對西風淚滿巾。

²¹ 晚清知識界所熟知的「批茶」，其實便是美國女作家 Harriet Beecher Stowe，她的名字在晚清另譯成「斯土活」與「海麗愛德斐曲士」，因林紓將其小說 *Uncle Tom's Cabin* 翻譯為中文的《黑奴籲天錄》，故使批茶以解放黑奴的形象在中國知識界中流行。見夏曉虹：〈誤譯誤讀與正解正果——批茶女士與斯托夫人〉，收入《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頁 181。

²² 因梁啟超之〈近世第一女傑羅蘭夫人〉一文，推崇羅蘭夫人為法國革命之母，使得羅蘭夫人在晚清知識界聲名大噪。在之後的小說與詩歌中，羅蘭夫人也常成為取材的對象。見夏曉虹：〈接受過程中的演繹——羅蘭夫人在中國〉，收入《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頁 189-190。

²³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分析印尼共產主義者馬司·馬可·卡多迪克羅摩的小說《黑色的三寶壠》時言：「馬可的“我們的年輕人”的用法，因其新穎，卻意指一個屬於印尼的讀者群體的青年，而這又隱含著他是一個出生印尼的『想像共同體』的一員之意。」參見本尼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頁 29。

²⁴ 關於嶺南羽衣女的真實身分，是學界爭論的一個課題。五〇年代以前，研究晚清的學者，如阿英大多認為是張竹君；不過，近來的研究則傾向是康有為的學生羅普所作。參見胡纓：《翻譯的傳說：中國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頁 164-165。

身為小說的作者，嶺南羽衣女將自己創作的感受與心得，藉由報刊與讀者分享。詩中對小說人物的愛情遭遇寄予同情，為國事奔走犧牲性命引人無限感慨，作者欲以小說啟蒙讀者，希望長歌痛哭現雖只對西風灑淚，但仍對後人寄予厚望。在嶺南羽衣女士的詩後，附上了馬君武與冶民的唱和詩，對於嶺南羽衣的回應，在《女子世界》中是由這兩位男性開始的。馬君武寫了兩首詩歌來回應嶺南羽衣女：

憔悴花枝與柳絲，為誰顰斷遠山眉。競爭未淨六洲血，勝負猶懸廿世紀。東海雲雷驚唾蟄，北陵薜荔走山魑。遠聞錦瑟魂應斷，沉醉西風不自知。辛苦風塵漂泊身，人天歷歷悟前因。飛揚古國非無日，巾幗中原大有人。明媚河山愁落日，倉皇戎馬泣飛塵。聞君憂國多垂淚，為製絞綃百幅巾。

憂國心繁亂似絲，更無閒筆畫新眉。豺狼毒灑全球血，鸚鵡危翻一局棋。從古愛情縫宇蛤，自由空氣戰妖魑。睡獅無賴呼難醒，浩蕩奇愁莫我知。風雲叱吒女兒身，入世原來未斷因。鈎爪鉅牙專制虎，翠鬟紅袖慧心人。好磨鐵馬金戈氣，誓洗泥犁黑獄塵。寥寂江山天不管，杜鵑啼淚搵羅巾。

26

冶民的唱和則為：

莽莽神州似亂絲，誰知巾幗愧鬚眉。絞枯愛國千行淚，收拾情天一局棋。未死春心猶裏簡，已灰俠首為投魑。寶鞘龍劍今何在，此事當年聶姊知。二十紀初現在身，苦將往果證來因。精禽銜石沈冤海，杜宇啼枝訴恨人。古國殘魂還中酒，百年芳夢總成塵。傷心祇示編遺史，豈獨紅顏為濕巾。

27

²⁵ 嶺南羽衣女士：〈東歐女豪傑中作〉，《女子世界》第四期（1904.4），頁 51-52（頁 325-326）。

²⁶ 君武：〈和羽衣女士東歐女豪傑中作〉，《女子世界》第四期（1904.4），頁 52-53（頁 326-327）。

²⁷ 冶民：〈和羽衣女士東歐女豪傑中作〉，《女子世界》第四期（1904.4），頁 53（頁 327）。

馬君武與冶民的詩歌，回應嶺南羽衣女的〈東歐女豪傑中作〉一詩。藉著詩歌的唱和，他們和嶺南羽衣女進行一種公共交往的對話，讚許小說作者對女界的努力，當嶺南羽衣女說「勞勞歌哭誰能見，空對西風淚滿巾」時，馬君武的詩中則回應「聞君憂國多垂淚，為製鮫綃百幅巾」，安慰著嶺南羽衣女必有同志相伴。冶民則以古往今來的憾事為例，藉以寬慰嶺南羽衣女的浩歎古今皆然。

除了男性作家對嶺南羽衣女士的回應之外，女作家也對《東歐女豪傑》的閱讀發表觀後感。在第六期一位署名「廣東同怙女士」寫了一首〈甲辰春夕獨坐挑燈偶讀羽衣女士東歐女豪傑唱和詩神韻魄力迥異尋常喚起國魂斷推此種一韻感和〉：

女兒難解是情絲，翻歎從前學畫眉。大地山河空色界，半生心力誤琴棋。
從軍畢竟限戎馬，拔劍由為斬魅魑。泣血鴉啼春夢裡，國魂叫醒又誰知。
勞勞濁世卅年身，五嶽歸來證夙因。河海澄清如有日，英雄巾幗豈無人。
餞春南海思前渡，破浪東瀛步後塵。其奈哥哥行不得，望風懷想淚沾巾。

28

同怙女士在詩後自言經歷：「予年一十五，即隨侍先廉訪公宦遊燕齊隴豫間，今又到大江南北，迴憶登泰華，渡黃河，歷滄海，宇內山川，幾經遊足。卒不得一涉重洋為恨，現擬囑兒子遊學東方，余亦隨後至焉。」²⁹如果以明清才女的標準來看同怙女士的遊歷，其遊歷的範圍可謂不小。但以晚清前衛女性的標準來看，則知當時的有志女性以出洋遊歷為可貴，就經濟效益來考量，日本常成為遊學的首選，主要也是遊日有其便利性。首先，在距離上比歐洲與美洲近的多；其次，在費用上也比較便宜；再則，日本語言較西方語言學習上較為便利；最後，則是日人已將西方的學問，去蕪存菁的汰選，中國人可藉由日人的擇選，在短時間內吸取西方學問的精要之處。³⁰而在甲午戰後，留日的風氣大盛，乃因日本的經驗

²⁸ 同怙：〈甲辰春夕獨坐挑燈偶讀羽衣女士東歐女豪傑唱和詩神韻魄力迥異尋常喚起國魂斷推此種依韻感和〉，《女子世界》第六期（1904.6），頁 67（頁 541）。

²⁹ 《女子世界》第六期（1904.6），頁 67（頁 541）。

³⁰ 張之洞認為遊學東洋較西洋為便利：「至游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一路近省費，可多遣；一去華近，易考察；一東文近於中文，易通曉；一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於此。若自欲求精求備，再赴西洋，有何不可？」

對於中國而言是無可取代的，日本之前也是被西方侵略的國家，但在五十年的努力之後，則一躍成為能夠侵略中國的國家，由被侵略到侵略的轉變，給予當時積弱不振的中國相當的衝擊，間接促成了晚清留日風潮的興起，由同怙女士自恨迄今未遊日本，與鼓勵兒子前往日本留學的經驗便可知道。同怙女士的詩歌，與馬君武、冷民對嶺南羽衣女的回應稍有不同，其詩中多了自身女性經驗的書寫，由閱讀的過程引發對自身處境的反省。情絲、畫眉與琴棋是閨閣女子生活的尋常事物，但同怙以現今國家的存亡為考量，以為閨中婦女多為這些事物所耽誤，應當喚起國魂，拔劍斬魑魅才是。

《女子世界》的調查員汪毓真也寫了一首對《東歐女豪傑》的讀後感想，收錄在《女子世界》第八期當中：

慷慨蘇菲亞，身先天下憂。馳驅千斛血，夢想獨夫頭。生命無代價，犧牲即自由。可憐天縱傑，不到亞東洲。³¹

針對《東歐女豪傑》中的主角蘇菲亞進行評論，將西方的女傑放置於一個崇高的位置，用中國語境中「先天下之憂」來讚美。蘇菲亞呈現的是一個成仁取義的典型，令人惋惜的是，中國沒有像蘇菲亞這樣的女英雄。

這一連串對《東歐女豪傑》的回應，藉助期刊的即時刊載的特殊形式，使晚清讀者能立即的對作品進行品評，馬君武等著名男性所寫的宛若「權威性的書評」，³²而這些女性讀者的回應，則建立了一個女性共同體，胡纓以同怙女士為例：

她將自己的閱讀活動定位在一個孤獨的背景中，在那裡，她與其他文化的

見張之洞：《勸學篇》，收入張之洞著；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頁 9738。包天笑在其《釧影樓回憶錄》中也比較了留日與留歐美之便利性，其言：「自從中日戰事以後，我們覺得日本國雖小而比我們強，於是許多新學家，及政府裡有些自命開通的人，都願意派子弟到日本去留學。留學自然最好到歐美去，但是到歐美去，一則路途遙遠，二則費用大，三則至少外國語有了根底。到日本去，就是路近，費省，即使不懂日本話，也不要緊，因日本與中國為同文之國，有文字可通，便省力得多了。」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 上》（台北：龍文出版社，1990），頁 185-186。

³¹ 汪毓真：〈讀東歐女豪傑感賦〉，《女子世界》第八期（1904.8），頁 69（頁 747）。

³² 胡纓：《翻譯的傳說：中國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頁 157。

女性讀者／作者交流。從而，她在流行刊物上的文本化存在進一步建立起了圍繞著這個文本的共同體，一個被認定為女性的共同體。一種類似的“才女文化”在晚清以前已經存在很久了，其特徵常常是血族關係（母女和女性親戚）和家庭日常生活背景。雖然《東歐女豪傑》文本內外的詩歌聲音都延續著這個女子文化共同體的傳統，但它現在被新聞／小說化與——處在公共舞台聚光燈下的話語——中和了。由詩歌寫作所表現的傳統女子文化現在進入了公眾領域，對一切能讀會寫的人開放。借助於這一新的媒介，新女性共同體超越了血族關係和地區關係，擴展成了一個基於文化教養的潛在的更大共同體。即使文化教養這一先決條件本身仍然嚴重阻礙了對這一對女性共同體的參與，就像過去幾百年中的情況一樣，但大眾媒介這一重要存在還是使得讀者和作者日益聯繫起來，縱使他們之間遠隔千里。³³

藉由報刊的開放性，傳統的閨秀群體被擴大了，女性的作品藉由報刊向擁有閱讀與書寫能力的讀者開放，不再僅以血緣與地區為串聯的基礎，而是擴大為擁有文化教養的共同體。凡是擁有相同知識教養的女性，通過閱讀作品，都能進入這女性共同體內，進行意見與思想的交互傳遞。而這對話交往，不僅存在於讀者與讀者之間，更因報刊的即時性，作者與讀者的對話也持續進行著。

因著期刊的接續出刊的特性，使得讀者在閱讀他人的作品後，能將自己的意見發表在稍後出版的期刊中，藉由期刊與原作者進行一種意見的交換與交流。女性之間唱和的作品，在明清才女的作品中俯拾即是，除了藉由出版後被公開以外，大多只存在於女性私人的交往之中。但到了晚清的報刊中，女作家藉由報刊與其他婦女進行唱和，藉由詩歌交換意見，並即時的公諸於世人面前，讓其他的公眾讀者一同旁觀兩人的對話。在十五期中蔣韞玉有一首〈秋夜書懷〉，自抒其身處新舊交替的時代，關切的焦點由閨閣進入家國，漸次啟蒙的歷程：

年華三八夢中馳，虛擲黃金不自知。熱血漸傾新學說，彩毫懶畫舊蛾眉。
玉繩星炯蟾蜍歛，金井欄寒絡緯悲。天下興亡儂有責，蕪香懺誨作英雌。

³³ 胡纓：《翻譯的傳說：中國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頁 158。

碧天耿耿澹銀河，太息裙釵荊棘多。幸有愛根迴大劫，恨無慧劍斬群魔。
浣紗石上吳成沼，漂絮城前楚逝波。留得支那好模樣，舞臺肩荷木蘭戈。

34

蔣韞玉自言二十四的生活，生活在蒙昧之中，虛擲的黃金的歲月而不自知。女子在閨中的生活，被認為是一種虛擲光陰的象徵，「畫眉」原是閨房之樂的趣味，但是此時卻應將熱血頃注於新學說當中，「懶畫舊蛾眉」即象徵一種女性生活樣貌的轉變，將原本虛擲在裝扮的時間，用來增長新知識。仰望星空寂寞欄杆，想的再也不是閨愁，而是國家興亡的責任。對於當時的女性而言，投身為英雌總有許多現實的限制障礙，但總期許自己能奮起擺脫柔弱的閨閣形象，成為能肩荷戰戈的女英雄。

蔣韞玉的〈秋夜書懷〉引起漢蘇女士的回應，《女子世界》第十六、十七期，刊載了兩人藉由詩歌往來對話的作品。漢蘇女士〈秋夜書懷步韞玉原韻〉：

仰天長嘯意飛馳，嫠恤宗周知未知。癡絕凌波作蓮步，會須巾幗駕鬚眉。
胡笳嗚咽憑誰聽，漢月淒涼止獨悲。收復人權歸自立，迷離安辨我雄雌。
捲簾惆悵望黃河，對此茫茫淚點多。剩爾俠情扶種類，莫將慧質喂妖魔。
西風颯颯愁無賴，東海沉沉水不波。擷取蕙蘭勞遠贈，勗哉姐妹勿操戈。

35

漢蘇藉由詩歌和蔣韞玉進行對話，對於其對國事之憂心，是抱著贊成與期許的。漢蘇自己對於女界的墮頹與國事之衰落憂心不已，讀了蔣韞玉的詩深覺其為知己，故想擷取蘭蕙相送。回應一首猶不能盡其意，漢蘇接著又寫了〈再疊韞玉秋夜書懷韻〉：

忍看滿地虎狼馳，好似先知覺後知。木葉吹殘真慘目，火星不息動燃眉。
夢為精衛心難死，身化蜉蝣境可悲。獨立空庭歌出塞，爭雄遮莫守其雌。

³⁴ 蔣韞玉：〈秋夜書懷〉，《女子世界》第十五期（1905.？），頁 54（頁 1416）。

³⁵ 漢蘇：〈秋夜書懷步韞玉原韻〉，《女子世界》第十六、十七期（1906.1），頁 65（頁 1535）。

憑卿說法口懸河，永讀新詩感慨多。落日哀嗚荒塚鬼，風狂飛現老妖魔。
似聞蓄艾求三載，又見汪洋起一波。逐客令嚴未開放，令儂終夜舞天戈。

36

此處的「逐客令」，應指的是「華工禁約」，漢蘇不無失望的以為，現實的衝擊總是來得又急又猛，如果總是要如同三年蓄艾般的等待，面對這一波波的挫折，國家的崛起是否會成為一種空想。蔣韞玉也寫詩回應漢蘇，其〈疊秋夜書懷韻答漢蘇女士〉：

十二時中腦電馳，特權恢復幾人知。長江戰鼓逃金虜，海曲俠情聚赤眉。
顧影卻憐烏兔逝，撫心還憶甲申悲。漢蘇思想何超絕，喚起天風一轉雌。
欲憑敏腕挽山河，爭奈閨中雌伏多。證出羯磨知慧業，鍊成涅伏制天魔。
難忘賊踵踞華壤，大好官家付綠波。日薄崦嵫心惻惻，與卿同奮魯陽戈。

37

「甲申悲」指的是崇禎自縊之事，此處點出明代的陷亡，呼喚著女子應當也要為收復河山盡一份力。蔣韞玉讚賞漢蘇的思想超絕，但可惜的是現在女子多在閨中雌伏，尚未集結成強大的力量。雖然如此，蔣韞玉也仍想與同心的志士們，一起為國事貢獻心力。這種同志關係，即是所謂藉由閱讀而形成的想像共同體，如果在讀者讀詩的當下，產生與蔣韞玉、漢蘇相同的認同，則同志關係已然成立。蔣韞玉對漢蘇說「與卿同奮魯陽戈」，這個「同」自然也包括閱詩的讀者們。漢蘇接著又回應蔣韞玉，其〈三疊韞玉女士秋夜書懷韻〉：

紛紛暮夜競驅馳，說甚天知與地知。變幻難描真實相，淺深還畫入時眉。
六朝金粉寒蟲泣，四野銅駝秋士悲。儂是慈悲解憂國，算來鶴立異群雌。
何當仗劍度遼河，快斬仇頭萬級多。拋卻紅妝除病態，打開黑獄斷狂魔。
羊腸獨自行危地，馬革相期作伏波。漫道國殤無我分，女兒也要執干戈。

³⁶ 漢蘇：〈再疊韞玉秋夜書懷韻〉，《女士世界》第十六、十七期（1906.1），頁 65（頁 1535）。

³⁷ 蔣韞玉：〈疊秋夜書懷韻答漢蘇女士〉，《女士世界》第十六、十七期（1906.1），頁 65-66（頁 1535-1536）。

漢蘇讚許蔣韞玉是「慈悲解國憂」，具有鶴立群雌的能力。她對現今猶在浪費心力於「畫眉深淺入時無」的閨中女子呼喊，國事並無男女之別，現今情勢之危急，女子也應當實際手執戰戈對國家貢獻一己之力。蔣韞玉〈再疊秋夜書懷韻答漢蘇女士〉：

爭嘗佳鬻虎狼馳，正值獅兒睡未知。慘睹半邊禪子髮，空思八采帝堯眉。
 灌澆鮮血春林茁，萎頓濃霜秋草悲。柱下譚言儂未信，知雄漫欲守其雌。
 悵望神皋禹九河，犬羊蟠踞歷時多。瑤宮春暖凝絲竹，遼海霜寒嘯鬼魔。
 徒有丹毫排小醜，更無赤手挽狂波。目繫心構新天國，祇有中宵枕雪戈。

39

蔣韞玉運用了「睡獅」的意象，來代指中國。⁴⁰中國處於昏睡未醒的狀態，女界中的同胞也大多安於現狀不思振作。然已覺醒的自己和漢蘇眼見此情況，也唯有枕戈待旦的堅持下去，並朝著夢想中的新世界前進。

漢蘇與蔣韞玉的借詩歌進行對話，表面上似乎只是兩人的對話，但其實兩人的作品中，都以其他的「女界同胞」為預設的讀者。兩人藉由《女子世界》將作品呈現於公眾之前，在寫作的同時，便預期其他公眾讀者的存在。兩人在唱和的作品中，互相讚賞對方的思想前衛，為先知先覺者，如果其他讀者在讀到她們的詩作時，亦能有心有戚戚焉的感覺，則是她們的知己，一起「同奮魯陽戈」的同志。這些讀者便和漢蘇、蔣韞玉一樣，同為已具新思想之女性，而另一類仍在閨中討論「畫眉深淺入時無」的女子，則是需要被啟蒙的對象。女性共同體的集結條件，除了具有知識能力之外，更重要的必須具有新思想，認知到新時代女性對

³⁸ 漢蘇：〈三疊韞玉女士秋夜書懷韻〉，《女子世界》第十六、十七期（1906.1），頁 66（頁 1536）。

³⁹ 蔣韞玉：〈再疊秋夜書懷韻答漢蘇女士〉，《女子世界》第十六、十七期（1906.1），頁 66-67（頁 1536-1537）。

⁴⁰ 楊瑞松以為中國近代的「睡獅」意象，乃是結合「中國先睡後醒論」與梁啟超的〈動物談〉，將「睡」與「獅」兩種概念相結合，原是具有高度貶義的詞彙，在近代的發展中卻逐漸成為與「黃禍」相似，代表中國即將被喚醒的預言。參見楊瑞松，〈睡獅將醒？：近代中國國族共同體論述中的「睡」與「獅」意象〉（《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30 期，2008.12），頁 87-118。

國家的盡心盡力的責任。

女作家之間可以藉由報刊進行公開的回應，男性作家與女性作家亦可藉由報刊的形式來公開唱和。《女子世界》中一部分的女作家為女學堂中的教席，她們多了一種藉由學堂而建立的人際關係。以呂逸初為例，她為石門文明女塾的女教員，得因工作而結識其他辦學的男性，擴大自己的人際關係，她與韓靖齋的交遊即是如此。韓靖齋是石門文明女塾的經理，也是《女子世界》的調查員之一，他自己對於呂逸初的推崇以詩作表達，並且投稿至《女子世界》將以公開，其詩〈贈呂逸初女士〉：「沈沈女學千年晦，解擅才華便軼群。願君脫離文字海，國民肩擔與平分。」⁴¹詩中稱揚呂逸初才華出眾，並肯定其脫離舞文弄墨創作的空言，而實際地投身學務從事教化國民的事業。《女子世界》第八期中則刊登了呂逸初寫給韓靖齋的〈文明女塾偶作並呈經理韓君〉：「問字齊褰絳帳紗，吾鄉女學喜萌芽。從今大地春風裏，栽遍文明自在花。樓臺近水畫難成，東望郊原得氣清。夜半推窗仰天象，文光正映女星明。」⁴²表達對於石門開設文明女塾的喜悅之情，並寄望將來的女界能夠更加自由與文明。

明清時期的才女交往，大多以血緣與地區性的連結為主。但在晚清以後，藉由公共的報刊，女性作品的對話群體得以擴大，開始超越血緣關係與地區群體，面向報刊的其他讀者。通過對公共出版品的討論，例如《女子世界》與《東歐女豪傑》，女詩人與其他讀者，特別是與她同樣身為女性、具有相同處境的讀者，藉由共同閱讀串連起女性共同體的集結。報刊的即時出刊，也讓作家與讀者、男性與女性之間的意見，能夠得到一種即時的交流，其對話的內容，不再是以私下的方式進行，而是以公開的形式呈現於世人面前，進行著公開的交流與對話。

三、閩中論爭存：婦女詩歌內容的轉變

明清時期的才女徘徊於「內言不出閩」的規訓，大多在死前留有焚稿的遺言，或者在死後才經由家中的男性家以集結出版；即便是女作家在世時決定出版，也

⁴¹ 靖齋：〈贈呂逸初女士〉，《女子世界》第七期（1904.7），頁 65（頁 641）。

⁴² 呂逸初：〈文明女塾偶作並呈經理韓君〉，《女子世界》第八期（1904.8），頁 68（頁 746）。

通常會經歷不少的掙扎。⁴³李國彤分析明清女作家常徘徊在婦言的閨訓與立言的渴望中，對於能詩的女作家，這是種痛苦的抉擇：

女作家對於結集出版的困惑也源自女教中的雙重觀念。一方面，“內言不出閫外”的女子之道迫使女作家只能將心血付之一炬；另一方面，詩書之教啟蒙了她們聰慧，閱讀和創作又賦予了她們歷史使命感，她們懷才不遇，於是有了不平之鳴，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彙入歷史長河。雖然她們在序跋中表示了自己在創作和出版中曾受女教困惑，但其最終出版著作之舉表明了她沒有屈從女教的束縛。儘管其文集以“繡餘”、“紅餘”、“焚餘”命名，她們還是將“婦言”推出了內閫，並坦言等待採王風者將其作品納入彤史。⁴⁴

但至晚清的《女子世界》中，我們看到的是當時的閨媛才女，開始積極的參與報刊的投稿，將自己的作品勇敢的呈現在世人的面前。詩作中除了參與公共議題的討論之外，另一方面也開始將原屬於私領域的生活經驗、心路歷程與女性親友之間的私密唱和，藉由報刊的形式供於世人閱讀，積極衝決內言與外言的界線。

在《女子世界》中有許多「寫所志」與「感懷」為題的詩歌，女作家因外在事物的影響，而內在心情亦隨之動搖，她們的感懷內容有著對國仇家恨的悲秋情懷。趙愛華在讀《風洞山傳奇》之後興起對家國興亡之感，而寫了一首〈秋風颯颯秋月娟娟夜靜更闌偶讀風洞山傳奇不盡興亡之感〉：

諸臣骸骨葬巖隈，祭霸荒阡哭幾回。只把禪關終日掩，墓門風雨不勝哀。
草沒離宮玉座青，英雄兒女久飄零。瞿張已殉紺珠死，舊事淒涼不可聽。
故國山河伴夕陽，華嚴身世悼滄桑。南都本是傷心地，帝子風流又福王。
哀哀天竺弔遺民，哲學云亡國亦淪。放眼金甌拼一哭，釋迦同是可憐人。
禪林黃葉亞銅駝，如此秋光可奈何。賸水殘山感浩劫，袈裟冷落淚痕多。

⁴³ 關於女性焚稿的情況，可參見張蓮波：《中國近代婦女解放思想歷程》（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6），頁9。

⁴⁴ 李國彤：〈明清婦女著作中的責任意識與“不朽”觀〉，收入燕京研究院編，《燕京學報·新二十期》（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頁16-17。

昨聞野史話興亡，老衲相逢淚幾行。漫說中原猶逐鹿，漢兒沒靨竟胡裝。
前皇典制拋遺久，華語奴顏不自知。辮髮年增麤似尾，何人重解漢官儀。
夜深猶憶前朝事，彷彿南柯一夢中。唱徹賀蘭山下曲，有人填補滿江紅。

45

《風洞山傳奇》雖在光緒三十二年（1906）才由小說林正式出版，作者自號「長洲呆道人」，實為吳梅之化名。⁴⁶但在1904年趙愛華寫作的同時，《風洞山傳奇》便以連載的方式在《中國白話報》第四期到第六期刊登，⁴⁷趙愛華所看到的，應是《中國白話報》所刊載的內容。《風洞山傳奇》講述南明福王逃難至桂林時期，其身旁諸將因兒女親事產生嫌隙，導致遭清兵剿滅，瞿式耜與張同敞抵死不降清朝，福王則投海身亡。劇中王開宇與于紺珠自幼訂親，不料紺珠之父于元燁趨炎附勢悔婚，另將紺珠許字滇營三將中趙印選之子趙伯談。因這兒女親事導致王開宇之父王永祚與趙印選有嫌隙，後來南明軍隊不敵清軍強大兵力圍攻，瞿、張殉節，舊日幕僚楊碩父收瞿、張屍骨葬於風洞山下。紺珠則隨父逃難而遭清兵俘虜，為保全名節自盡身亡，看守兵士忙亂中將其屍首拋棄於風洞山華嚴寺後。王開宇因看破世事於華嚴寺剃度出家，一日聞寺後喧鬧，前往察看僅見一女屍，於女屍衣袖中書信，方才得知其為他未過門之未婚妻于紺珠，並收葬其屍首於寺後。趙愛華在讀了《風洞山傳奇》後興起種族情懷，認為到現今為止，中國仍處於異族統治之下，對於劇中人物的悲涼其心有戚戚焉。面對國人的身著滿清服飾，薙髮留辮甘於俯首稱臣的行為，只希望有朝一日能有人如岳飛一般驅逐韃虜，恢復漢家山河。

趙愛華的詩歌中，充滿著漢族的民族主義思想，藉著對南明顛覆之興亡感嘆，道出恥於滿族統治，期望恢復漢族正統的心情。趙愛華常藉由詩歌訴說這樣的種族主義思想，在她的〈甲辰除夕書懷〉中亦有：

⁴⁵ 趙愛華：〈秋風颯颯秋月娟娟夜靜更闌偶讀風洞山傳奇不盡興亡之感〉，《女子世界》第十期（1904.？），頁50（頁906）。

⁴⁶ 吳梅（1884-1939），曾創作《風洞山傳奇》與《顧曲塵談》，後應蔡元培之邀任教於北大，其作《中國戲曲概論》為後來戲曲研究奠定基礎。參陳平原：〈中國戲劇研究的三種路向〉（《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3期），頁8-9。關於《風洞山傳奇》之出版資料，可參考樽本照雄編；賀偉譯：《新編增補清末民初小說目錄》（濟南：齊魯書社，2002），頁162。

⁴⁷ 樽本照雄編；賀偉譯：《新編增補清末民初小說目錄》，頁162。

洞門畫燭逐年新，又聽菱花占好辰。大陸何人重鑄錯，東方有主更沉淪。
井隅星象明如月，溫帶風光早得春。臘鼓聲中悲鼙鼓，忍持杯酒說幽民。

48

這首詩巧妙的將閨情與種族情懷結合，詩以新年家中景象開頭，「畫燭」、「菱花占」原是女子閨情作品中常見之題材，但趙愛華這首詩，接下來所寫的既不是卜歸人，也不關愛情愁思，反而筆鋒一轉寫及大陸沉淪與戰爭頻仍，自己在歡慶的日子裡擔憂的卻是國事紛亂。

隔年的新年，她又創作了一組〈乙巳新感情〉的詩作，進一步對當時的許多現象加以嗟嘆，並在詩末加上附註以表明詩中題旨：

美人嗟遲暮，之子不可期。迢迢天一方，長歌欲贈誰。(嗟朝右之無人也)
惜春無限好，楊柳又成絲。江上風波惡，問君何所之。(嗟志士之去國也)
舊時人不見，燕子故飛飛。門巷斜陽冷，欲歸何處歸。(嗟國土之淪亡也)
故國一何悲，問君君不知。東風長蘭蕙，采采寄相思。(嗟知己之難得也)
絃歌隨流水，春月隔窗紗。惆悵大隄女，不如洛陽花。(嗟女子之無教也)
啼鴉聲聲急，山城落照中。桃花真薄命，愁雨復愁風。(嗟外夷之凌虐也)
一片銷魂水，寒禽酣正酣。橫塘人似改，無計說江南。(嗟小人之在位也)
江草江花路，朝朝風雨狂。屏山橫六曲，閒夢憶金堂。(嗟國恥之難雪也)

49

此組詩如果不看詩後題註，則會發現其詩中情調似為懷人憶遠之嘆，但趙愛華刻意的在詩後加上自己嗟嘆的原意，讓讀者在閱讀時，能得知其詩後的象徵意義，並能判讀其詩之真義，而不是只以閨情的窠臼來看待她的作品。乙巳新年趙愛華藉詩歌表達她對時局的關切，對於國家局勢、女子處境與知己難得等發出嗟嘆，看不出詩人新年新希望的振奮，反而看到身為女子對時局的憂心。

⁴⁸ 趙愛華：〈甲辰除夕書懷〉，《女子世界》第十二期（1905.4），頁 60（頁 1092）。

⁴⁹ 趙愛華：〈乙巳新感情〉，《女子世界》第十二期（1905.4），頁 60（頁 1092）。

晚清女詩人雖不免仍身處閨閣之中，但藉由公共刊物的傳播開始接觸時事，其作品的內涵亦逐漸改變。孫康宜在研究明清才女文學時發現，家務的內容常是明清才女詩歌的題材：

一般說來，明清女詩人突破了傳統女性詩詞的閨怨和棄婦的狹隘內容。她們把注意力移到日常生活中的種種親身體驗，而且十分真切地寫出了個人得自觀察的情景及靈感。從刺繡、紡織、縫紉到烹飪，直到養花、撫育，所有一切有關家務的詩作都構成了明清婦女詩詞的新現象。⁵⁰

孫康宜認為明清才女的作品中，便已逐漸突破閨怨與棄婦的題材，而將日常生活的女性生活經驗，與自己生活經驗的感悟，加入詩歌的創作當中，題材較之前的女性作品擴大。如此看來，《女子世界》中的晚清女詩人，在題材上則又加入了新的內涵，即是將國家的救亡圖存，與自身欲對國家貢獻一己之力的想法。且不僅是自己私下創作的作品如此，連與女性親友之間的贈答與唱和的作品也是如此，救亡圖存的大論述，成為《女子世界》中女性詩歌創作的主流話語。

明清姐妹才女之間，常藉由詩歌贈達來傳遞情感，其內容大多與自身的婚姻遭遇與女性生活經驗相關。⁵¹不過，在《女子世界》中所看到的姐妹詩作，其內容以不同於之前的明清才女。在第十二期中趙愛華寫了一首詩歌，寄贈在上海的兩位妹妹，以詩歌代替書信傳達姐妹之間的話語：

錦繡江山織手擎，蛾眉聲價豈徒名。文明花照鴛鴦水，羞煞扶桑富士櫻。
漢家巾幗辱胡官，不信神州光復難。十五盈盈誰得似，月明榆塞夢羅蘭。

52

⁵⁰ 孫康宜：〈走向「男女雙性」的理想——女性詩人在明清文人中的地位〉，《古典與現代的女性闡釋》（台北：聯合文學，1998），頁 79-80。

⁵¹ 明清的才女之間的交往，通常通過交換詩作來維持，尤其是當其因為嫁人分隔兩地之後，詩作的交換，使女性在自身的私人友情上，掌握的發聲權，參見高彥頤，《閨塾師：明末清出江南的才女文化》，頁 220-221。而這些女性的作品中，「展現了女子人生歷程中付出的感情代價：雙足被纏，童年的嬉戲痛苦地結束、與父母手足的心碎別離、在陌生宅院的陌生家庭中突如其來地與一個陌生人開始兩性間的親密接觸、還有分娩和喪子的苦痛。」引自曼素恩著：《綴珍錄：十八世紀及其前後的中國婦女》，頁 80-81。

⁵² 趙愛華：〈示滬上兩妹〉，《女子世界》第十二期（1905.4），頁 61（頁 1093）。

姐妹之間的詩歌，不再以自身的婚姻處境為關注焦點，而是以國家興亡相互來期許。詩中出現革命的思想，以漢胡對立，光復神州成為女性交談的議題，並以羅蘭作為學習的榜樣。

同樣是姐妹贈答的作品，蔣韞玉與蔣韞華姐妹在《女子世界》第十五期中，各有一首以姐妹為對話對象以言志的詩作。蔣韞玉的〈與韞華韞章二妹言志而作〉：

閨中姊妹論爭存，羅帕頻沾熱淚痕。國恥需滂大小腦，願將敏腕繡軒轅。
妬花風蝕百花殘，脩竹亭亭耐歲寒。起起速排倚賴性，奮身一躍上強壇。
陡激秋閨鐵石肝，無聲劍影逼人寒。亞洲女傑勝歐傑，不拜羅蘭拜木蘭。

53

由詩中可知，國家存亡的課題，成為閨中姐妹的對話內容。面對國家的喪權辱國，閨中女子也潸然淚下，但是哭泣無濟於事，唯有女子奮起擺脫依賴的劣根性，方能勝過西方的羅蘭夫人，成為東方的木蘭。其妹蔣韞華⁵⁴（1883-1909）亦回應〈偶成三絕示二姊四妹〉：

曙光未現雞聲苦，春意初酣鳥語喧。一輩英豪遭過渡，祇憑腦血動乾坤。
乾坤傾折乏神媧，三百年來毒霧霾。倘得乘風馳大陸，堂堂旗鼓出吳娃。
天賦人權屈不伸，年來只覺翠眉頰。黑罡風起搖天柱，忍作神州袖手人。

55

⁵³ 蔣韞玉：〈與韞華韞章二妹言志因作〉，《女子世界》第十五期（1905.？），頁 54-55（頁 1416-1417）。

⁵⁴ 徐自華有〈弔蔣韞華女士〉詩，其序中對蔣韞華的身世經歷，有詳細的介紹。其云：「女士名璇，字韞華，浙之嘉善人。姐妹四人，女其三也。幼聰慧好學，書算之事，靡不了了。長適同里許光烈。時滬上女學日盛，女艷羨之，商於夫，負笈啟明女校，習美術。光烈有兄曰嘉明，素無賴，尤仇視學界，因誣女不貞，以坐女之戚沈某。光烈信之，以書促女歸。女不可，光烈憤，嘉明益得計。日置於蔣之門，而嗾弟控之官，且遍播榜書以實之。女聞狀，慮驚寡母，罷學歸依。自更其字曰『堅冰』以明志。居恆鬱鬱，泣語人曰：『人生恃名譽耳！名之被玷，何以生為？』至是作遺書四通，別其母及兄妹，遂吞金約指而死。年二十六，時宣統元年閏二月二十九日也。」見徐自華著；郭延禮編校：《徐自華詩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 137。

⁵⁵ 蔣韞華：〈偶成三絕示二姊四妹〉，《女子世界》第十五期（1905.？），頁 55（頁 1417）。

晚清時期「女媧」常成為女性詩歌中題詠的對象，⁵⁶面對漢族江山淪為異族統治，蔣醞華自許若能趁勢而起，女子也應對國家的淪亡出一份心力，豈忍作袖手旁觀之人。

女子不僅在心靈上不再以閨情為念，在行動的空間上也被期許離開閨門。女性走出閨門，在《女子世界》中是被稱許的一種價值。杜清持在〈論游歷閱報為女子立身之要務〉一文中，主張女子如果要自我改造的話，要從閱報與游歷做起，閱讀報紙可以達到一種心靈上的旅行，即「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的效果；但實際的遊歷四方，不論遠近，則都能有增廣見聞之效：

閱報之益，固貴能激動文明思想矣。……故欲求為達此思想之義務，則莫若游學，游學之益，愈遠愈廣，愈久愈多。……我輩今日不欲脫離奴隸圈則已，否則必先造人格；必欲造下乘之人格則已，否則不能不游學，以養成造人格之材料。以屋內之人談門外之事，其真偽相去，不待智者可知。游學之遠近，當視資斧多少以為比例，然不必遽言歐美，或東洋亦可。然不必遽言東洋，或由縣而郡、而省會亦何不可。即使出里門一步，亦無不可謂之遊學，何也？其眼界進一步，知識亦進一步矣。我輩今日欲求平權、平等，斷不能不從廣交遊、長智識做起，而游學實又為其先聲也。近者上海湖湘，翩翩東渡，著女子游學之先鞭矣。吾粵女子，不乏有志有力者，其並駕齊驅無讓人獨步也。⁵⁷

杜清持的這段話，代表了《女子世界》中的知識份子對於女子走出閨門的基本看法。女子被期許能走出家門，進入社會、國家與世界，切身的感受世界潮流的脈動，有些父親更以身作則的將女兒送出家門，期待她們能有一番作為，例如韓靖齋寫了一首〈水調歌頭〉下註「送女兒至滬習手工舟中口占」，是韓靖齋送女兒

⁵⁶ 李又寧認為：「神話中的女媧，特別是廿世紀初葉我國婦女崇拜歌頌的一個對象，燕斌以『煉石』作她的筆名，表示她是以女媧自比。」參見李又寧：〈中國新女界雜誌的創刊及內涵——中國新女界雜誌重刊序〉，收入李又寧、張玉法編，《中國婦女史論文集·第一輯》（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1），頁224。

⁵⁷ 杜清持：〈論游歷閱報為女子立身之要務〉，《女子世界》第十六、十七期（1906.1），頁119-120（頁1589-1590）。

韓平卿前往上海，進孟广夫婦創辦的自立手工傳習所時所寫：

又指綠波遠，同上木蘭舟，在家原是作客，莫漫賦離愁。知否羅蘭愛國，
又若批茶拯俗，彼獨有何求，一樣女兒事，努力企前脩。

除奴性，先自立，記心頭，男兒薄倖，何用夫婿羨封侯。多少名門淑媛鑄
錯，老天不管，自取更何尤，解道女兒苦，一息肯優游。⁵⁸

這是韓靖齋送女兒韓平卿到上海學習時，為詩期望女兒能學有所成的作品，詩後還附有俗語解說，解說此詞的原意。⁵⁹其解說雖不離中國傳統家庭的思想，將女子視為客人，唯有出嫁之後的婆家方為「歸」宿。但不同的是，韓靖齋勸勉女兒離家到上海要好好學習，認為古往今來才女多嫁薄倖男兒，女兒當以此為戒，應當珍惜學習自立的機會，以免將來不得不依賴男子時方才後悔莫及。

藉由晚清各國交通聯絡之便，女子有機會能夠出門或出國遊歷，並將其所見所遊所感藉由報刊公諸於眾。晚清時期女性旅遊最具代表性的應屬於單士釐

(1858-1945)⁶⁰，《女子世界》中也收錄了她的旅遊詩作。單士釐隨著丈夫在日本鎌倉遊歷，將日本的所見所聞，發而為詩〈二十世紀之春偕夫子居日本鎌倉日

⁵⁸ 靖齋：〈水調歌頭 送女兒至滬習手工舟中口占〉，《女子世界》第十期（1904.？），頁46（頁902）。

⁵⁹ 詞後的俗語解說，其文為「這首詞兒，名為水調歌頭，是靖齋送女兒到上海手工傳習所時候做的起頭兩句說上船的情景，下兩句說女兒在父母家中，原是客人一般，不必道出門苦。羅蘭夫人、批茶女士這兩箇，或是看了國家可愛的很，或是風俗不好，要挽救他，是為著甚麼，想他也是女兒，要學他也不難。下半闕說全靠別人作主，便是奴才。要除去奴才的性質，先要自立，這句話要記牢。薄倖，是沒良心，嫁了沒良心的男子，雖然是封侯拜相，也不必羨慕他。你看世上好人家的兒女，配錯了不好的男子，天也不來管你，因為你自己不能自立，還怪著那個呢。若是心裡曉得做女兒的苦楚，便一刻不肯錯過光陰了。」但並未註明此解說作者為何人，其主要的的作用即為解釋這首〈水調歌頭〉的意思。見《女子世界》第十期（1904.？），頁46-47（頁902-903）。這首〈水調歌頭〉後來以引起孟广唱和，詞中感嘆自己失去女兒的落寞，於是韓靖齋讓在自立女工傳習所學習的韓平卿成為孟广的義女，事見於俞樹萱：〈女子自立集序〉，《女子世界》第十一期（1905.2），頁77-78（頁1019-1020）。這一場收義女的儀式，得到當時不少人的迴響，在《女子世界》中即有一些人讚許此一行為，例如柳亞子〈讀孟广得韓女士平卿為義女之作和其原韻〉（《女子世界》第十一期（1905.2），頁57（頁999））、劍公（高旭）〈和孟广得義女之作〉（《女子世界》第十六、十七期（1906.1），頁71（頁1541））。

⁶⁰ 關於單士釐的生卒年，目前有兩種說法：一是1856-1943，見鍾叔河〈第一部女子出國記〉一文，收入於鍾叔河編，《走向世界叢書》中《癸卯旅行記·歸潛記》（與康有為《歐洲十一國遊記二種》、梁啟超《新大陸遊記及其他》合刊，長沙：岳麓書社，1985），頁658；一是1858-1945，單士釐的姪兒錢秉雄與錢三強曾撰文〈回憶伯母單士釐〉，其中紀錄其生卒年為1858至1945，其為單士釐之親族，對於其生卒之年應有較為準確的紀錄，固本文採用此說，參見錢秉雄、錢三強，〈回憶伯母單士釐〉，收入單士釐著；陳鴻祥校點：《受茲室詩稿》（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6），頁1。

游各名勝地作)：

誰識偕游樂，襟懷自灑然。孟光輸此境，徐福說當年。世亂甯紆綬，風迴肯返船。琳宮饒古物八幡宮有寶物貯藏所陳以七百年前鎌倉幕府物為多，銅像對青蓮有六百五十年前大銅佛穴腹如屋梯升至首則兩階起腦後焉。水碓臨溪急，茅亭隔岸偏。購圖探勝蹟，杖策步層巔。壯麗三橋館，清寒十井泉。樹高根絡石，海闊浪浮天。拾貝循砂瀨，飛鴉破溟煙。不辭歸路遠，松月現娟娟。⁶¹

根據她在《癸卯旅行記》中記載，她在光緒二十五年（己亥，1899）第一次隨丈夫錢恂前往日本，之後在庚子（1900）、辛丑（1901）與壬寅（1902），每一年都曾前往日本。⁶²這首遊歷鎌倉名勝的詩作，是在辛丑年所寫的。⁶³單士釐詩中自然流露出，夫婦同遊日本名勝的快樂，相較於古代夫婦「畫眉深淺入時無」的閨房之樂，錢氏夫婦登覽古蹟並分享旅途之樂，是中國傳統夫婦所罕見的。單士釐因丈夫的出使，而得以遊歷各國，並慶幸自己不同於其他中國女子有「病足」之艱，⁶⁴能行動自由的進出國內外。

⁶¹ 單士釐：〈二十世紀之春偕夫子居日本鎌倉日游各名勝地作〉，《女子世界》第十六、十七期（1906.1），頁 67（頁 1537）。

⁶² 她在《癸卯旅行記》序言中說：「回憶歲在己亥（光緒二十五年），外子駐日本，予率兩子繼往，是為予出疆之始。嗣是庚子、辛丑、壬寅間，無歲不行，或一航，或再航，往復既頻，寄居又久，視東國如鄉井。」由於多次進出日本，當癸卯年她再次到日本時，竟有回鄉般的熟悉感。《癸卯旅行記》主要記載單士釐在 1903 這一年，由日本出發，經朝鮮、海參威到達俄國，她將這一路的所見紀錄下來，對於日本、朝鮮與俄國的政治、社會與文化，都有所感觸。見錢單士釐，《癸卯旅行記》，頁 684。以單士釐與《癸卯旅行記》為研究對象，學界已累積了不少的成果，如 Elle Widmer "Shan Shili's Guimao luxing ji of 1903 in Local and Global Perspective"，收入胡曉真主編：《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1），頁 429-466；姚振黎：〈單士釐走向世界之經歷——兼論女性創作考論〉，收入范銘如主編：《挑撥新趨勢：第二屆中國女性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臺灣學生書局，2003），頁 257-295；陳室如：〈閨閣與世界的碰撞——單士釐旅行書寫的性別意識與帝國凝視〉（《彰化師大國文學誌》13 期，2006.12），頁 257-282；羅秀美：〈流動的風景與凝視的文本——談單士釐（1856-1943）的旅行散文以及她對女性文學的傳播與接受〉（《淡江中文學報》15 期，2006.12），頁 41-94；顏麗珠：《單士釐及其旅遊文學——兼論女性遊歷書寫》（中壢：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鹿憶鹿則以單士釐 1910 年的《歸潛記》，討論她在晚清神話學上的貢獻，參見鹿憶鹿：〈單士釐與拉奧孔——兼論晚清學者的神話觀〉（《興大中文學報》23 期增刊，2008.11），頁 679-703。

⁶³ 《癸卯旅行記》三月六日（陽曆四月三日）條記載：「辛丑寓居鎌倉，游建長寺則攀樹陟巔，賞金澤牡丹則繞行湖孺，恆二三十里。」見單士釐：《癸卯旅行記》，頁 697。

⁶⁴ 單士釐《癸卯旅行記》中言：「中國婦女向以步行為艱，予幸不病此。當在東京，步行是常事。……然在中國，則勢有所不能。此硤石為幼年生長地，今已老，鄉黨間尚不以予為非，故特以步行風同里婦女。」頁 697。

除了單士釐之外，康同璧（1881-1969）⁶⁵也曾隨父親康有為遊歷印度，並寫詩給梁啟超說明自己遊歷之感，其詩〈游印度寄飲冰子〉云：

舍衛山河歷劫塵，布金壞殿數三巡。若論女子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
靈鷲高峰照暮霞，淒迷塔樹萬人家。恆河落日滔滔盡，祇樹雷音付落花。

66

並於詩後自言：「侍大人游舍衛祇林，壞殿頽垣，佛法已劫。然支那女士來游者，同璧為第一人矣。」⁶⁷康同璧陪同父親一起遊歷印度，來到佛教的發源地，⁶⁸康同璧遙想古往今來中國有多少人到這西天來取經，但是他們都是男子，身為女子來到西土的自己是從古到今第一人，其中不無傲視群雌的意味，而這「我是支那第一人」也成為康同璧日後的標誌。⁶⁹

明清時期的才女雖也偶有出遊之舉，高彥頤分析明末清初婦女的遊歷，大致可以分為「從宦遊」、「賞心遊」與「謀生遊」三類。⁷⁰由康同璧與單士釐的經歷，可以看到時至晚清，女子遊歷外國或留學的類型：早期還是伴隨著男性家人，有時是父親，有時丈夫或兄弟，一起遠赴異地。後來隨著風氣漸開，也有女子獨自赴日留學的例子，例如秋瑾便是在與先生決裂後，無任何男性親友的陪同下，獨自前往日本留學。⁷¹

⁶⁵ 根據《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傳略》中紀錄：「康同璧，字文佩，號華鬢，廣東南海人。康有為次女。早年赴美國留學，先後入哈佛大學及加林甫大學，畢業後回國。歷任萬國婦女會副會長、山東道德會長、中國婦女大會會長。……康同璧擅長詩詞書畫。她的畫勾勒精妙，情趣天然，筆法蒼古清雋，有深厚的功力。……晚年還從事康有為遺著整理工作，出版的有《康南海先生年譜續編》、《萬木草堂遺稿》等。」見中央文史研究館編：《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傳略》（北京：中華書局，2001），頁 22。

⁶⁶ 康同璧：〈游印度寄飲冰子〉，《女子世界》第四期（1904.4），頁 54（頁 328）。

⁶⁷ 康同璧：〈游印度寄飲冰子〉，《女子世界》第四期（1904.4），頁 54（頁 328）。

⁶⁸ 梁啟超《飲冰室詩話》中言：「康南海之第二女公子同璧，挈精史籍，精通英文。去年孑身獨行，省親於印度，以十九歲之妙齡弱質，凌數千里之莽濤瘴霧，亦可謂虎父無犬子也。」參見《飲冰室詩話》（台北：臺灣中華，1957），頁 2。

⁶⁹ 康同璧晚年曾對章伯鈞說道：「毛主席和我第一次見面，便翹起大拇指說『我是支那第一人。』我聽了，非常吃驚。沒想到他見到我，就馬上背誦出我十九歲獨自登上印度大吉嶺時寫的詩。」引自張詒和：《最後的貴族》（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頁 180。

⁷⁰ 高彥頤：〈「空間」與「家」——論明末清初婦女的生活空間〉（《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3 期，1995.8），頁 21-50。

⁷¹ Joan Judge 發現晚清中國留日女學生，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 1901 年到 1905 年，日本學校剛開始特別針對中國女性設計課程。這段期間的留日女學生，大都跟著丈夫、兄弟或者父親出國，例如何香凝在 1902 年因丈夫廖仲愷入東京早稻田大學就讀，而隨侍在側；方君瑛與他

由《女子世界》中這些女性抒懷、唱和與遊歷的詩作，我們看到女詩人們對於時局的關心，以及投身國事的企圖，一時之間，當國族的聲音凌駕一切的同時，閨閣中的話語似乎在這些女作家的詩作中消失了。傷春的閨怨愁思，被悲秋的國仇家恨所取代，國族的話語取代了閨中的話語，至少在《女子世界》所輯錄的詩作中，可以看到女性的詩詞創作的內容充斥了豪放的風格。

根據孫康宜的研究，在清初的徐燦詩詞中，就已經具有豪放的風格。徐燦身處易代之時，她刻意選用〈滿江紅〉、〈永遇樂〉等容易與豪放風格連結的詞牌，用陰柔的文字展現故國情懷的豪放風格，超越了「閨閣詞人的格局」。⁷²而在《女子世界》中的女性作品，因體認國家在危急存亡之秋，女子不應在深居閨房，在社會期待與愛國心的驅使下，豪放的風格幾乎滲入各種文類，不僅詞，詩、曲、文和小說都是如此。晚清的女作家並不希望能成為男子，反而是體認到女性亦能為國事盡心盡力，在肯定女性的性別後，再鼓勵女子應當超越男子，以開創一輝煌的女子世界。

在《女子世界》中的女性詩歌中充斥著國族情懷，不可諱言其與《女子世界》男性編輯群的喜好相關。丁初我在〈說女魔〉中便指出中國女性困於「情魔」，僅將愛情的關注點放置在男女愛情上，故容易「因愛而生愁，由愁而生恨」或者「由愛而生瞋，由瞋而生妬」，在這樣的小情小愛中消磨餘生，而不知轉化男女小愛為對國家之大愛。⁷³丁初我對女性文學內涵喜愛的偏好，也可以由他對呂碧

的兄弟方聲洞同住；1903年陳擷芬與其父陳範在蘇報案之後，由上海前往日本。這時期的留日女學生儘管大多來自江蘇和浙江，不過也有別的地方的，例如何香凝來自廣東，方君瑛來自福建而陳擷芬則來自湖南。第二階段是1905到1907年，這時期開始有官派的留學生，例如湖南等地方政府，開始有派遣成群的學生前往東京。唐群英、王昌國和張漢英，他們是早期的共和黨員，也是湖南派遣的第一批學生。在這段時間也有不少自費留學生，而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的課程專門設計給中國的女學生們。在這段時期中國留日女學生，開始進入社會與政治運動。第三階段是1907到1911年，這段時期的留學生大多是獲得政府支持公費生和自費學生。男性留學生的高峰期是1905和1906年，女學生則是1907到1910年。根據日本外務省的記錄，1907年有139位中國女留學生在日本，1908年有126位，1909年有149位，1910年有125位。1908年以後中國留日學生對於政治活動的參與日漸加溫，直至1911年的辛亥革命。秋瑾在1904年7月12日抵達神戶，身邊沒有男性的家族成員，而是和一個日本女子服部繁子。見Joan Judge “Beyond Nationalism: Gender and the Chinese Student Experience in Japan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收入羅久蓉、呂妙芬主編：《無聲之聲Ⅲ：近代中國的婦女與文化》（台北：中研院近史所，2003），頁362-363。其他關於留日女學生的研究，亦可參考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2010），頁39-45。以及實藤惠秀著；譚汝謙、林啟彥譯：《中國人留學日本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3），頁52-57。

⁷² 孫康宜：〈陰性風格或女性意識？——柳如是和徐燦的比較〉，收入《古典與現代的女性闡釋》，頁124。

⁷³ 初我（丁初我）：〈說女魔〉，《女子世界》第二期（1904.2），頁2-3（頁88-89）。

城三姊妹作品的評論中看出。三姊妹之中，特別是呂碧城的作品被認為「尤富新思想，無中國社會婦女習，一腔悲憤，發為高歌，愛國精神，純潔高尚」。⁷⁴呂碧城當時方才二十出頭，其創作之〈書懷〉、〈和鐵花館主人見贈韻〉、〈舟過博海口占〉等作品，丁初我屢屢讚嘆「胸中鬱勃瑰磊之氣，發此豪爽之音，讀之幾忘為兒女之作」，⁷⁵或云「胸中固積有一腔憂世救民之熱血，心之所蘊，發之為聲，激昂志氣，流溢於文字間，使讀者一開卷而興起其國民之思想，文字之感人深矣」。⁷⁶丁初我認為呂碧城作品突出之處，即在其詩詞之中沒有小兒女情懷，而其「深閨有願作新民」的志向，正符合當時男性知識份子對女性的期待。丁初我以這樣的立場來觀看女性文學，「因花集」中的擷選標準，自然也和他所強調的國家民族的主流價值有關。

不過，也不可忽略的是，女子在時代洗禮與新知識的啟蒙下，基本上也肯定國族大義匹婦亦有責，主動在創作中將國族話語凌駕於閨中情懷之上，就連在沿用古時以閨情為訴求的「子夜歌」時，也傾向將創作的基調加以改變。子夜歌為樂府舊題，屬於吳聲歌曲的類別，《樂府詩集》中言：「《唐書·樂志》曰：『《子夜歌》者，晉曲也。晉有女子名子夜，造此聲，聲過哀苦』」。⁷⁷趙愛華之〈新翻子夜歌〉，即一改子夜歌閨房愛情的基調，將其新翻為類似鼓吹曲的從軍歌：

纍纍漢家營，煌煌帝國旗。不是沙場死，羞歡非可兒。
不言從軍苦，偏說從軍樂。願掬銀河水，為歡磨霜鏑。
儂看北江流，甯看西塞月。塞月照汗青，江流寒徹骨。
剪髮壯歡貌，瀕行睨而視。漠南繫頸還，為歡訣生死。
歡如戈頭鐵，儂似旛面花。西風吹萬幕，殺敵亂如麻。
尅日殲胡兒，胡兒非歡敵。薄言奏凱旋，漢族復生色。
胡馬塞下遁，雷鼓撼天地。歡小諳軍書，身家何足計。
石象笑銅駝，故宮三十六。間煞好蠻箋，貽歌著光復。⁷⁸

⁷⁴ 初我(丁初我):〈中國之女文學者〉,《女子世界》第十六、十七期(1906.1),頁51(頁1521)。

⁷⁵ 初我(丁初我):〈中國之女文學者〉,《女子世界》第十六、十七期(1906.1),頁59(頁1529)。

⁷⁶ 初我(丁初我):〈中國之女文學者〉,《女子世界》第十六、十七期(1906.1),頁58(頁1528)。

⁷⁷ 郭茂倩:《樂府詩集》(台北:里仁,1981),頁641。

⁷⁸ 趙愛華:〈新翻子夜歌〉,《女子世界》第八期(1904.8),頁67(頁745)。趙愛華的〈新翻子夜歌〉引起吹萬(高燮)與勉後的回應,高燮寫了〈讀趙愛華女士新翻子夜歌好好為效作四首〉:

趙愛華將〈子夜歌〉翻寫為讚揚從軍樂的情調，作品中不見「婉伸郎膝上，何處不可憐」的旖旎情態，反而是勸君趕赴沙場，為國家與民族奉獻心力的殷殷期盼。為了國家生離死別，是一種壯烈的犧牲，若是為了兒女情懷，而導致英雄氣短是為人所輕視的。

有趣的是，我們在《女子世界》中幾乎看不到女子寫閨房之樂的詩作，但卻在男性作家的作品中看到了。《女子世界》主要輯錄男性作家作品的「攻玉集」中收錄了三首以〈新艷體詩〉為題的詩作，他們按照艷體詩的慣例，以女子的口吻擬寫閨中之樂，如劍豪〈新艷體詩〉：

歡意自憐儂，勸儂勿纏足。阿母不教鬆，依舊蓮鈎曲。
挂起百葉窗，窗外月如水。月下倚歡肩，泥講新聞紙。
聞歡昵倭娘，儂比倭娘好。不信但看儂，插鬢珠花繞。
飲歡加非茶，忘卻調牛乳。牛乳如歡甜，加非似儂苦。
歡才人不如，幾日通靛寄。為問蟹行書，可有鴛鴦字。⁷⁹

劍豪的這首詩，雖以舊題為名，不過在情調上加入了新的元素。詩中可以看見一個纏足的中國女子，在月下依偎著丈夫，聽著丈夫解說報紙上的新聞。在聽聞丈夫移情別戀日本婦人時，心中惶惑與不安的心情，但自己不解外文，也不能判讀丈夫的書信當中，是否有外遇情書的無奈。這首詩融合了多元文化的生活，正是

「胡騎滿中原，誰當滌氛垢。君死作鬼雄，妾願為君守。勉力勤國事，妾身君勿繫。殺取胡兒血，出祭軒轅帝。生遭亡國痛，富貴安可羨。如覓虜廷封，歸來唾君面。空閨無所事，聊究漢民族。徵編保種詩，獻作軍歌讚。」見《女子世界》第十期（1904.？），頁45（頁901）。勉後則寫了〈趙愛華女士著新翻子夜歌佳絕友人吹萬亦有是作與趙亞戲為效作十四首愧未逮也〉：「隆隆礮火聲，霍霍鋼刀影。如此好生涯，男兒中宵警。歡挽綠沉槍，儂投赤十字。同是俠肝腸，分飛入胡地。不為麒麟畫，不卜公侯卦。難泯種族心，扶破軀殼界。避北羞金閨，珍重雙珠淚。不裹馬革尸，須展摩天翅。奮起蓬桑志，慷慨與歡訣。願移兒女情，裝嚴自由血。猛氣吞羶腥，國恥者番雪。擒賊不擒王，歡勇未卓絕。鑿破凶門出，猛戰虜氣奪。一楯載身行，媲美斯巴達。瀘水渡初夏，崑崙入元夜。輕騎倒幕庭，飛將從天下。花驄摩虜壘，剛彈左右射。飽喋單于血，歸餐牛心炙。昔戎虜氣惡，寢饋倚寒鞞。今無虜騎影，拔劍一長嘯。購物須代價，破敵妖氛罷。拚此鐵頭顱，國旗爛東亞。凱歌高入雲，血痕征鎧染。為歡卸征鎧，摩娑金創點。青塚千年恨，茹痛徧女界。歡今殺敵歸，儂心大快快。國仇深復深，人心死未死。揮淚譜新歌，聊擬排外史。」見《女子世界》第十五期（1905.？），頁59-60（頁1421-1422）。這兩首回應的作品，也都跟隨趙愛華的改寫，將《子夜歌》的閨情基調，變為鼓勵從軍樂的內容。

⁷⁹ 劍豪：〈新艷體詩〉，《女子世界》第十一期（1905.2），頁57-58（頁999-1000）。

晚清現代化生活體驗的最佳寫照，讀報紙、喝咖啡與通曉外文，都為傳統的艷體詩，增加了新鮮感。內容雖不脫閨怨，但詩歌所營造的情調氛圍卻大不相同。

亞俠的〈新艷體詩〉與劍豪的又大異其趣，詩中看到的一個裝著西服的中國女子，自言其與傳統女子是不相同的：

不是楚宮女，如何競瘦肥。效顰西子態，腰細不勝衣。
生小諳西俗，忙中禮數全。纖纖金約指，握手示殷拳。
束體中衣窄，禁郎幾依偎。內重珠紐密，妥貼可身材。
妾喜西洋畫，相看總是春。入深還出顯，弄色太撩人。
妾繡回文錦，郎繙西字書。書中有花使，想較妾難如。⁸⁰

亞俠這首艷體詩中，以一個西化的中國女子為主人翁。詩中所描繪的女子形象，由深諳西俗、穿著窄衣與喜西洋畫，一個「中體西用」的女子躍然紙上。不過，屬於中國傳統的一面並未消失，藉由「妾繡回文錦」一句帶出，就算丈夫通曉西文翻譯，但自己也不差，就算書信中有勾花使者，但和這中西合璧、內外兼美的女主人翁相比，女主角則更有自信的認為，自己略勝一籌，因自己兼有東方與西方的特質。亞俠詩中的女主人，其實正是許多晚清知識分子理想女性的表徵，擁有新知識與新思想，卻仍然保有中國傳統女性的某些特質。

勉後的〈新艷體詩〉則寫的更加露骨而大膽的，將男女在閨房之中的肢體接觸直接敘述：

少小嗜說部，腹中知幾許。一笑投郎懷，同看茶花女。
屏卻鉛華氣，猶存嫵媚容。新涼初罷浴，中襯汗衫紅。
儂手軟如棉，難禁郎一握。儂吻淡如水，尚堪與郎接。
儂今肯解纏，郎情更覺好。始信郎愛儂，不比花與鳥。
買得珊瑚杯，滿盛葡萄酒。顧郎還問郎，醉人如儂否。⁸¹

⁸⁰ 亞俠：〈新艷體詩〉，《女子世界》第十一期（1905.2），頁58（頁1000）。

⁸¹ 勉後：〈新艷體詩〉，《女子世界》第十五期（1905.？），頁60（頁1422）。

詩中女子從少時看小說，到現今與情人同看《茶花女》，即知此女在閱讀的品味上以較傳統不同。不愛濃妝豔抹、解放纏足，符合晚清知識分子對於女子自然美的期待。這幾首艷體詩，雖然仍以閨房之樂為創作的主體，但詩中女性的形象與閨房生活的情趣，已經呈現一種中西合璧的新樣貌，與傳統的艷體詩大異其趣。

在《女子世界》中男性作家能如此大膽的創作閨房之樂，而女子卻被期望寫作國家大事，主要是中國文學傳統中，男子即便作閨音，⁸²也會當成是一種國族的譬喻，正如孫康宜說的「性別面具」。⁸³男子原被允許參予國事討論，他們的詩作常會關注國計民生，偶而寫作閨房之樂的艷體詩，而且此艷體詩已從傳統的情調跳脫出來，為一「創新」的艷體詩，融合了異國的元素在其中，就內容而言，也達到新內容與新意境之詩界革命的宗旨，故反被收入在「攻玉集」中展現與舊詩不同的新情調。

以「因花集」中的女性詩詞為觀察點，可以發現閨中話語在女性詩詞中逐漸隱去，取代的是女性對於國家興亡的急切感。國族的話語成為女性作品中的新主流，不將關注點放置於家庭與家務中，晚清女性作家不僅嘗試將視野移往閨房之外，有的甚或付諸行動，開始遊歷四方或留學，開始認識世界與自身的處境，並將所見所感發而為詩詞，一切以國族興亡為主要思考的重點，女性作品中閨怨愁思頓時隱沒，這是《女子世界》男性編輯群的期待，也是女作家在時代影響下所展現的主要關懷。

四、新格調運新理想：歌體詩的寫作

⁸² 張曉梅將中國文學中的男扮女裝的現象，稱之為「男子作閨音」，「所謂的「男子作閨音」，簡單地說，是指男性詩人（創作主體）代女性（抒情主體）設辭，假托女性的身份、口吻創作詩篇而言情抒懷的一種詩歌體式」，其主要的內容大多為書寫閨情、閨怨與閨思。見張曉梅：《男子作閨音——中國古典文學中男扮女裝現象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頁13。

⁸³ 孫康宜認為中國傳統讀者在閱讀情詩時，常會以性別的方式進行闡釋，如果男性作家以擬女姿態所寫的情詩，情詩常被理解為一種家國君王的寄託，成為一種政治表演，中國男作家也慣常以這種「性別面具」（gender mask）的手法進如創作。參見孫康宜：〈性別的困惑——從傳統讀者閱讀情詩的偏見說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第6期，1998.8），頁113。例如身處易代之際的吳梅村，在他的詩歌與戲曲中，便藉由「面具」的使用，讓自己隱遁在面具之後，而能自由的振筆直書，一方面能紓發己懷，另一方面又能藉此躲避文字獄的夾殺。參見孫康宜：〈隱情與「面具」——吳梅村詩試說〉，收入樂黛雲、陳珏編：《北美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名家十年文選》（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6），頁224。

在《女子世界》的文苑欄中，創刊號中僅有「學校唱歌」一類，收錄了「醒世歌」、「樂群歌」與「旅行歌」等，在第二期方才新增「因花集」，收錄女性作家的詩詞，第三期出現「攻玉集」，刊登男性文人的作品。在創刊號的「學校唱歌」之前，收錄者特別說明：「聲音之道，足以合洽性情，宣解鬱抑，故東西女學校中，皆列音樂一科。吾國校課，此風闐如，亟錄務本、愛國二女學校課本，以諗海內任教育者。」⁸⁴有時在《女子世界》的學校唱歌中，我們還可以看到譜曲的現象，附上了簡譜，讓讀者在閱讀之後，能自行跟隨著音符傳唱。根據徐珂《清稗類鈔》的紀錄：「唱歌，亦稱樂歌。光緒時，由學部奏定為學校教科之一，男女皆有之，所以發生徒音樂上審美之感情，而涵養其德性者。歌辭深淺之程度，以所在學級之國文科為準。」⁸⁵丁初我等人對於歌曲的提倡，主要還是站在啟蒙的角度，認為歌曲的傳唱有助於思想的流傳，其影響力不容小覷：

樂歌者，所以平心，所以移性者也。現今學界之風潮，既由浮動而趨靜穆；學界之事業，復由言論而進實行，種種科學發達之精神，尚武激昂之志氣，將於唱歌一科中繫之。……女子之感情，獨多於男子；女子腦筋之靈敏，心思之靜細，突過於男子。吾國中之舊美術，女子猶得占其一部分。苟於閨閣拘禁之中，而一試其易性移情之用，則雖入學無權利，出入不自由，而一唱百合，感情相深，其結果之良，即為女子音樂會之影響。⁸⁶

丁初我認為歌曲能成為一種啟蒙的工具，善用它的特性，將一些有用的思想新知便入歌詞中，在譜上簡易的旋律，在傳唱的過程中，能讓不識字的人，也能接收新思潮。特別是向女性宣揚新思想時，在識字不普遍的情況下，藉由歌曲的朗朗上口容易流傳的特性，其影響應較書面文字更大。

歌曲的啟蒙作用，早在梁啟超與黃遵憲（1848-1905）在1902年籌辦《新小說》時便已經注意到了。⁸⁷梁啟超在籌備《新小說》之初，黃遵憲曾寫信建議梁

⁸⁴ 《女子世界》第一期（1904.1），頁51（頁59）。

⁸⁵ 徐珂編：《清稗類鈔·音樂類》（上海：商務印書館，1917），頁9-10。

⁸⁶ 初我（丁初我）：〈記常熟公立校發起音樂科事〉，《女子世界》第八期（1904.8），頁7-8（頁685-686）。

⁸⁷ 李開軍認為，啟蒙的主題在傳統的民間歌謠中是少見的，但梁啟超與黃遵憲等人開始將啟蒙的意識，以大眾較為熟悉的歌謠呈現，便是希望將新思潮有效的傳佈。這也「體現了晚清『雜歌

啟超，在《新小說》中增設「雜歌謠」的欄目：

報中有韻之文，自不可少。然吾以為不必仿白香山之《新樂府》、龍西堂之《明史樂府》。當斟酌於彈詞粵謳之間，或三、或九、或七、或五、或長短句、或壯如隴上陳安，或麗如河中莫愁，或濃至如焦仲卿妻，或古如成相篇，或俳如俳伎辭。易樂府之名而曰雜歌謠，棄史籍而采近事。至其題目，如梁園客之得官，京兆尹之禁報，大宰相之求婚，閩人子之納職，候選道之貢物，皆絕好題也。此固非僕之所能也，公試與能者商之。吾意海內名流，必有迭起而投稿者矣。⁸⁸

黃遵憲自己在創作中，也將這種歌謠的理念付諸實踐，撰寫了許多以「歌」為題的作品，例如〈聶將軍歌〉、〈軍中歌〉、〈山歌〉、〈豐湖權歌〉、〈出軍歌〉、〈旋軍歌〉、〈幼稚園上學歌〉、〈小學校學生相和歌〉等。黃遵憲將他的創作，稱為「新體詩」，而此新體詩有三難——擇韻難、選聲難與著色難。他以日本新體詩為例來說明，日本的新體詩，「其於舊和歌，更易其詞理，未必創調也」，⁸⁹可知黃遵憲的新體詩，即是在舊漢歌的基礎上，加上現在的思潮與語彙，成為一種富有時代意義的新體詩。

梁啟超也認同黃遵憲對此新體詩的提倡，甚至認為中國人之所以缺乏尚武精神，也與中國缺乏樂歌有關。⁹⁰關於音樂與文學之關係，他認為中國傳統的詞章原帶有音樂性，只是音樂隨著時代漸闕，只徒留下詩詞，後世創作詩詞時導致文學與音樂分流：

謠』實驗與 20 世紀 20 年代前後歌謠學運動之間旨趣上的差異。晚清的菁英知識份子如黃遵憲、梁啟超等，主要利用民間歌謠的形式因素，承載自己對社會現實、國家命運的思考，說白了是對歌謠形式的利用；而後來歌謠學運動，則更多是回歸到民間歌謠本身。……主要落實在了對歌謠進行學術研究這一方面。」見李開軍：〈歌謠與啟蒙——以晚清《新小說》雜誌的“雜歌謠”專欄為中心〉（《民俗研究》2005.1 期），頁 133。

⁸⁸ 黃遵憲：〈致梁啟超函〉（1902.9.23），黃遵憲著；陳錚編：《黃遵憲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432。

⁸⁹ 黃遵憲：〈致梁啟超函〉（1902.11.30），黃遵憲著；陳錚編：《黃遵憲全集》，頁 438。

⁹⁰ 梁啟超《飲冰室詩話》：「中國人無尚武精神，其原因甚多，而音樂靡曼亦其一端，此近世者所同道也。昔斯巴達人被圍，乞援於雅典。雅典人以一眇目跛足之學校教師應之，斯巴達人惑焉。及臨陣，此教師為作軍歌，斯巴達人誦之，勇氣百倍，遂以獲勝。甚矣！聲音之道感人深矣。吾中國向無軍歌，……此非徒祖國文學之缺點，抑亦國運升沈所關也。往見黃公度〈出軍歌〉四章，讀之狂喜，大有含笑看吳鉤之樂，……即文藻亦二千年所未有也。詩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極矣。吾為一言以蔽之曰，讀此詩而不起舞者，必非男子。」（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57），頁 34-35。

若中國之詞章家，則於國民豈有絲毫之影響耶？推原其故，不得不謂詩與樂分之所致也。……至於今日，而詩詞曲三者，皆成為陳設之古玩，而詞章家真社會之蝨矣。頃讀雜誌《江蘇》，屢陳中國音樂改良之義，其第七號已譜出軍歌、學校歌數闕，讀之拍案叫絕，此中國文學復興之先河也。……近年來愛國之士，注意此業者，漸不乏人，而黃公度其尤也。

91

梁啟超認為欲振興中國詩界，「詩樂合一」是相當重要的步驟，將新思想融入歌詞當中，最後再譜曲便宜傳唱，讓新思想隨著歌曲的流傳散佈，不僅能影響更多的人，也可為中國的詩歌尋繹出一條新的道路，可以與時代新思潮相容的新詩體式。

梁啟超、黃遵憲提倡之後，晚清文人對於「歌」的創作也有相當的重視。《女子世界》中學校唱歌與攻玉集、因花集並列，應當也是在這樣的氛圍下有的安排。在《女子世界》中「學校唱歌」原是針對在學的女學生所收錄的簡單歌曲，剛開始並沒有譜曲，僅僅只有歌詞，連作者也沒有註明，例如第一、二期中所收錄的幾首歌曲。隨著第二期增設了「因花集」，第三期增設「攻玉集」後，接下來則不見「學校唱歌」一類。歌體的創作，則散見於因花集與攻玉集中。至第十期出現的「唱歌集」，正式將學堂樂歌一類分出，所收錄的歌曲都附上簡譜，讓讀者可自行傳唱，例如第十期收錄的〈女學生入學歌〉、〈黃菊花〉、〈甲辰秋開校歌（上海城東女校）〉與〈復權歌〉等。⁹²不論是否譜曲傳唱，龔喜平將晚清民初此類以歌為題，或可譜曲的詩體，稱為「歌體詩」：

它是吸收和融合傳統歌行體、民間歌謠、日本新體詩、西方譯詩、學堂樂

⁹¹ 梁啟超：《飲冰室詩話》，頁 47-48。

⁹² 見《女子世界》第十期（1904.？），頁 53-56（頁 909-912）。這幾首歌曲都附有現代音樂的簡譜，讓讀者可以按其音調與節奏自行歌唱。關於中國簡譜的輸入，曹萬生與尹海燕發現，梁啟超在《飲冰室詩話》中「多次提到留日音樂家曾志忞正是第一個將西方簡譜傳入中國的人。1903 年，曾志忞在留日江蘇同鄉會於東京編輯出版的中文雜誌《江蘇》第六、七期發表《樂理大意》一文，介紹西洋樂理知識，並以簡譜與五線譜對照形式刊登了《練兵》、《春游》等六首歌曲，這被認為是目前所見中國人使用簡譜最早的紀錄。」參見曹萬生、尹海燕：〈論晚清現代漢語詩歌音樂性之濫觴〉（《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3 卷 4 期，2009.7），頁 122-123。

歌諸方面因素而成的一種介於舊詩與新詩之間的過渡形式。……從詩歌形式來看，歌體詩已能自成模範，衝破格律，句式自由，語言通俗，特別是在節奏韻律、句式語序方面有所突破，有所創造，部分打破了五、七言的體制和律絕的韻律，或長篇巨篇，或重章疊唱，節奏舒展，語勢自然，韻散雜揉，文白相間，其韻句不甚艱深，其散句多用口語，語言表現極少用典，呈現出一種自由化、通俗化、散文化、口語化的傾向。⁹³

這一類的歌體詩，相較於絕句、律詩與詞，在格律上較為自由，句式也較為靈活，長短句不一。以現存的歌體詩來看，確實呈現出較為口語化的傾向。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其通俗口語的傾向，會根據寫作的目的地而有程度上的不同。如果是為學堂樂歌所創作的歌詞，通常會為了配合學生的程度以及吟唱的需要，在歌詞的撰寫上會更加淺白，產生「言文一致」的現象，盡量讓以白話的方式創作歌詞，讓初具閱讀能力的學生容易理解；⁹⁴而另一類的歌體詩，是一般文人為了抒發己懷，將新思想與新詞彙運用到歌行體中，通常篇幅較長，辭句也較文言，不過和格律嚴謹的絕律相比，還是較淺白易懂。

在「因花集」中的女詩人，也開始採用在句式較為活潑的歌體詩，來表達自己的想法。因著歌體詩自由的句式，更方便將一些新的思想蘊含其中，趙愛華的〈保種歌〉即利用較為靈活的句式，容納對「保種」觀念的訴求：

支那女子二萬萬，廢足傷身如木偶。猛虎毒狼，攫我堂堂帝國神州土。哀我同胞，日日恬恬不知恥。紅人既虜，黑人夷，轉瞬迫我黃軒子。我亦國民一份身，忍令碧眼紅髯，侮虐吾華一此至。天演公理不可逃，衛我金湯甘一死。君不見，南窗下，黃白兩蟻戰最劇，白蟻飢如虎，黃蟻惶如鼠，

⁹³ 龔喜平：〈秋瑾的「歌行體」創作與中國近代詩體變革〉（《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37卷2期，2000.3），頁22。

⁹⁴ 嚴鳳、翁曉宇認為：「學堂樂歌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主流歌詞與少年兒童的學習緊密結合。這一特點源於20世紀初日本提倡的『言文一致』活動，要求把兒童的日常生活語言和形成文字的學校歌曲統一起來，而不應把歌詞寫成兒童難以理解的古風化的語言。中國留學生們這一思想帶回中國，使中國的樂歌在一開始就強調『言文一致』和適應兒童需要。」見嚴鳳、翁曉宇：〈學堂樂歌在中國近現代音樂教育中的作用及意義〉（《福建論壇（社教科學版）》2004.9期），頁67。郭延禮與武潤婷也認為：「『言文合一』是近代文論家與作家共同關心和探討的一個問題。」見郭延禮、武潤婷：《中國文學精神·近代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3），頁204。

日銜泥土固藩籬，日獲生蠅報其主。一朝躍出勢力圈，黃種日強，白種殫。天地之性，人為貴，可以人而不如蟻。噫吁嘻！白浪滔天，黃雲捲地，亞東大陸龍蛇起，振我女軍人，灑我頸中血，前有木蘭是我師，敢告同仇從此始。⁹⁵

整首歌傳達對於種戰的危機感，以一種白話的方式撰寫，沒有艱深的用典與字詞，能讓稍具文學能力的讀者，亦能直接明白其歌中的意涵。並以黃蟻與白蟻的譬喻，將西方白種人之侵略，與東方黃種人之奴役醜態，深刻的表達出來。歌末並深切期許女性讀者，振奮精神以花木蘭為師，讓黃種人得以繁衍，免去亡國滅種的命運。

晚清隨著新思潮的輸入，許多的新詞彙也應運而生，用來表稱新的概念。⁹⁶在《女子世界》中女詩人的創作中也可見到，她們紛紛開始加入新的辭彙，讓晚清的女性詩作在形式上也給人耳目一新之感，例如《女子世界》第九期刊登的宋淑姿〈女界沉沉徐圖恢復哀耗傳來又為頓挫挽詩兩絕以明夙志姑隱其名知者自知〉：「未受完全新教育，不能牢握自由權。可憐劣敗歸天演，光復遑爭一著先。文明基礎國民母，徒擅名譽在譯編。放眼女權銷鑠甚，涅槃狀況日新鮮。」⁹⁷便將「自由」、「天演」、「國民母」與「女權」等新詞彙，加入詩歌創作當中。歌體詩歌因格律更為自由，以及長短句的彈性使用，使女作家們在創作時更容易加入新的詞彙。以汪毓真〈女國民歌〉為例：

昨夕何夕兮，斜陽西沉。今夕何夕兮，旭日東升。光華旦復旦，照我新乾坤。新乾坤須整頓，好男兒睡未醒，女國民要自警，物競之道優者勝，同心戮力且併命。萬鬼卻步百魔擯，毋謂人難，企野蠻進文明；毋謂時難，為人治勝天行。女國民，汝不知，我曹二千萬里四百兆人，何令歐戈美馬

⁹⁵ 趙愛華：〈保種歌〉，《女子世界》第六期（1904.6），頁 67-68（頁 541-542）。

⁹⁶ 近代新語詞的增加，可以由四個方面觀察：第一，新觀念的輸入，傳統語詞不敷使用，故進而創造新名詞以表義；第二，中西交流的機會增加，留學生與駐外使節帶回新名詞；第三，西方傳教士為翻譯西方《聖經》的需要，亦輸入新名詞；第四，藉由轉譯日文書籍，而直接採用日文漢詞的情形。參見郭延禮、武潤婷：《中國文學精神·近代卷》，頁 213-214。

⁹⁷ 宋淑姿：〈女界沉沉徐圖恢復哀耗傳來又為頓挫挽詩兩絕以明夙志姑隱其名知者自知〉，《女子世界》第九期（1904.9），頁 50（頁 818）。

爭相陵，屈指同胞半女子，患難相同榮辱均。女國民，汝不聞，馬尼他纖手立功業；汝不聞，瑪利儂熱血拯溺焚，顛趾同形腦同質，不過東西異地種異群。女國民，汝何長他人志氣，減自己之才能。亡羊補牢尚未晚，今不努力痛陸沈，興亡豈獨匹夫責，自由權利貴自爭。焚香萬炷祝萬遍，願卿掃除亞東大陸風雲劇，還我光華燦爛之乾坤。⁹⁸

自譚嗣同和夏曾佑開始，就嘗試在中國的舊體詩中加入新詞彙，只是譚、夏二人提倡的「新學詩」，在嘗試之初不為一般文人所喜。⁹⁹至黃遵憲將新名詞融入傳統詩詞，獲得梁啟超等知識份子的贊同，取得較高的藝術成就，詩歌中使用新名詞的情況也愈見普遍。¹⁰⁰趙愛華的〈女國民歌〉將晚清有關婦女運動的新詞彙，例如「女國民」、「物競」、「自由」與「權利」等，放入歌體詩歌當中；甚至連音譯之人名，如「馬尼他」與「瑪利儂」，¹⁰¹也直接植入歌詞內，因著歌體詩歌無格律上的限制，故能將這些新詞彙直接使用。

除了趙愛華與汪毓真這一類原能創作古典詩詞的女作家之外，「因花集」中還有另一群初上學堂的女學生，也喜歡用歌體詩歌來創作，主要是因為歌體詩沒有嚴格的格律規定，讓初具文學能力的女學生容易寫作。例如《女子世界》第十期，刊登了蔡愛花¹⁰²的〈菊花歌〉：

⁹⁸ 汪毓真：〈女國民歌〉，《女子世界》第九期（1904.9），頁 51-52（頁 819-820）。

⁹⁹ 譚嗣同與夏曾佑的新學詩，嘗試以西方譯詞與佛教詞語入詩，常導致詩義難解。陳子展認為：「他們這類新詩料，在舊派文人看來，自然既不如自然界風雲月露的空靈，又不如《詩》、《騷》、《爾雅》裡草木蟲魚的典雅，更不比社會間忠孝節義的有關名教。它的好處，就是新奇，不腐臭，不庸濫——本來他們這種運動，是對於腐臭庸濫的詩界而生的一種反動。只因這種詩不過填入幾個生硬的新名詞，略具一點幼稚的新理想，取材既然狹隘，人家又不容易懂得，他們的詩界革命運動自己停頓下來了。但是我們要了解他們是生在外來學術輸入中國不過一點半滴的時候，盡其最善之力，只能做到如此。」見陳子展：《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頁 153。

¹⁰⁰ 李開軍：〈「詩界革命」中「新名詞」地位消長原因之分析〉（《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2期），頁 9。

¹⁰¹ 馬尼他（Anita Garibaldi, 1821-1849），為義大利統一運動中名將加里波底（Giuseppe Garibaldi, 1807-1882）之妻，晚清文獻中有時亦稱「加釐夫人」，例如《女子世界》第三期中競廠〈詠世界十二女傑〉中的「加釐夫人」：「海鑑情人窺遠鏡，天南地北締奇緣。煙騰火激共生死，獨奈蒼穹不假年。」（頁 63）即是在頌揚馬尼他的事蹟。瑪利儂（Marie-Jeanne Phlippon Roland, 1754-1793），即是晚清小說與詩歌中多所讚揚的「羅蘭夫人」（Madame Roland），夏曉虹發現除了羅蘭夫人和瑪利儂之外，「朗蘭夫人」、「烏（毋）露蘭」與「瑪利」等，也都曾是羅蘭夫人的不同譯名，參見夏曉虹：〈接受過程中的演譯——羅蘭夫人在中國〉，頁 187。

¹⁰² 在《女子世界》第十一期中，還特別報導的蔡愛花的放足創舉。在〈記事·內國〉「放足紀念」條中記載：「埭溪蔡君綠農於去年十一月十五日，借發蒙女課堂，為其妹愛花開一放足紀念會。男女來賓凡二十人，先由蔡愛花女士，痛陳纏足之害，於今日為始，決計解纏；次由發蒙教習許

秋風涼，菊花香；秋風狂，菊花黃。菊花香又香，菊花黃又黃，不怕秋風，
不怕霜。黃種強，黃種強，我亦黃花，愛花黃。¹⁰³

歌後附有說明：「愛花女士為蔡綠農之妹，甫受教育，思想已甚發達。讀是歌，
民族精神溢於詞，足窺女士立志矣。」¹⁰⁴其兄蔡綠農依著她歌中的意涵，加以擴
寫為一首篇幅較長的歌體詩歌：

秋風涼，菊花香；秋風狂，菊花黃。菊花香又香，菊花黃又黃。菊花氣概
正軒昂，滿身披甲色全黃，欲與秋風戰一場。不怕雨，不怕霜，不怕秋風
狂復狂。我亦黃人愛花黃，黃人世界堂堂堂。黃種強，黃種強，始祖黃帝
拓全疆，奪得黃河好地方，黃河流水到今黃黃黃。¹⁰⁵

蔡愛花受兄長蔡綠農的影響，進入學堂讀書、解放纏足，初具文學能力的蔡愛花，
選擇歌體當作創作的載體。她以黃花與秋風起興，藉秋風（西風）的淒冷顯示黃
菊花的不畏風霜，並藉黃色引申黃種，自己亦為「黃花」（黃花閨女），期許自己
學習黃菊花之不畏西風吹折。蔡綠農在蔡愛花的基礎上加以改寫，更加強調種族
戰鬥的意思，又使用了許多疊字，增添唸讀之中的韻律感。

歌體詩歌有著傳唱的性質，即使沒有譜曲，因韻散相間讓人唸唱時，自然會
產生一種簡單的節奏，有利於記憶與流傳。女學生們也可以將自己的新思想，以
簡單的字句表達出來，藉由長短句與疊章、疊字的使用，產生一種唸唱的音律感。
奉化女學堂孫漢英創作的〈女子四勿歌〉，即以直言白話、疊章復沓的方式，將

則華，致賀會主，並勸在座諸女生，繼起解纏，光復故體，勸會主當哀憐同群，轉相勸解，以冀
普渡眾生，同出火坑；次由蔡綠農登壇，嘉勵會主，以動人羨慕心。并示諸男學生，以後切不可
娶小足婦為妻，演畢，由教習許則華，率全校男女學生及來賓，高唱放腳歌者三，乃散會。」，
頁 73（頁 1015）。高彥頤根據《警鐘日報》的紀載來分析，認為蔡愛花與蔡綠農兄妹所舉辦的這
場「光復故物」的發足宣誓，就像是宗教的證道大會，「雖無佈道情節，卻有相繼演講的場面；
雖無聖詩吟唱，卻有頌讚送足喜樂的歌曲。雖然蔡愛花並非向上蒼告解她的罪愆，但卻指稱了一
項施加在她身上的罪行。」見高彥頤著；苗延威譯：《纏足：「金蓮崇拜」盛極而衰的演變》（南
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頁 55。

¹⁰³ 蔡愛花：〈菊花歌〉，《女子世界》第十期（1904.？），頁 52（頁 908）。

¹⁰⁴ 《女子世界》第十期（1904.？），頁 52（頁 908）。

¹⁰⁵ 《女子世界》第十期（1904.？），頁 52（頁 908）。

改革女性的思想放入歌體詩創作當中：

勿勿勿！女同胞，切勿信念佛。和尚本為民間賊，梁皇水陸，都是騙銀錢。
妄設輪迴把你嚇，讀書明理真功德。女同胞兮，自今伊始，勿念佛。
勿勿勿！女同胞，切勿去裹足。傷筋斷骨遭慘毒，筍織蓮瓣，都是娼家言。
淫風流行此最惡，讀書明理樂莫樂。女同胞兮，自今伊始，勿裹足。
勿勿勿！女同胞，切勿愛修飾。珠玉脂粉件件撒，淡妝濃抹，都是畫中人。
妖嬌祇取男兒悅，讀書明理求自立。女同胞兮，自今伊始，勿修飾。
勿勿勿！女同胞，切勿收拘束。張大女權在今朝，抑陰扶陽，都是專制家。
復我自由妄談絕，讀書明理要崇實。女同胞兮，自今伊始，勿拘束。¹⁰⁶

孫漢英身為奉化女學堂的學生，將自己認知到的新思想放入歌詞當中，其中列舉女子的迷信、纏足、裝飾與卑抑等四項弊病，期許女子從今開始徹底改過，不再過的無知與怯弱的生活。採用《詩經》式的疊章複沓，每一章的基本句式相同，僅更易中間數句之內容，方便歌曲的吟誦與記憶，達到傳遞思想的目的。

歌體詩的創作門檻不高，有時就連兒童也能即興創作，《女子世界》第十四期在論說欄的後面，就收錄的一首九歲女孩褚娥即興創作的禁用美貨的歌體：

聽聽聽，聽我歌，大家不必道囉嗦。我父日日言，禁美貨。我母日日講，恨美貨。諸人皆說恨美貨，我也時時恨美貨，就拿林文煙香水來打破。母親見了大發怒，我父曉得大讚我。大家以我為奇貨，說我此事該應做，因為美禁華工律太苛。告姊妹，勸弟哥，大家不用美國貨。全國兒童學了我，不怕美國鎗炮多，使他貨色無銷路，工商無了行業做，不怕美人不講和。諸公聽，莫笑我，仔細想想定不誤。

記者在歌後記云：「這首歌，是一位嘉興府裡支亞館主人的女兒叫做褚娥做的。支亞館裡，天天會議抵制美約的事。有一天該女孩忽然將室內林文煙香水三瓶，全行打破。大家呵叱他，女孩憤憤道：『天天議禁美貨，這不是美貨呢？』大家

¹⁰⁶ 孫漢英：〈女子四勿歌〉，《女子世界》第八期（1904.8），頁 69-70（頁 747-748）。

咤為奇事。彼又自吟自笑，做出這首歌來。歌裡頭多是原本，不過潤色了一二句。大家想想，九歲的女孩子能這樣，可敬不可敬麼！」¹⁰⁷記者的紀錄中，強調了九歲的小女孩能有如此的行為實屬不易，再加上歌體詩的創作，讓女孩的行為更增添傳奇的色彩。歌體詩在自吟自笑之中完成，採用三言、五言、七言的長短句交錯，使歌體詩有時讀起來偏向散文而不像詩。

歌體詩因其沒有嚴格的格律規定，而且句式靈活長短不拘，在晚清這新思想與新名詞迭出的時刻，受到不少創作者的青睞，例如秋瑾便創作了不少歌體詩，有〈寶刀歌〉、〈寶劍歌〉、〈勉女權歌〉等。¹⁰⁸歌體詩的風格，根據創作者的文學能力，所呈現出的雅俗差異頗大。有的與舊式歌行體較為相近，但容納了新的詞彙與思想，形成晚清歌體詩歌的特殊風格；有的則以啟蒙為主，或者創作者的文學能力有限，而以淺白的語言創作，讀起來頗有後世散文詩的味道。

五、從閨媛才女到女學生：女作家的世代交替

《女子世界》在第二期與第三期後，分別刊載了「女學文叢」的「懸賞徵文」，其中以〈女中華〉與〈急救甲辰女子之方法〉為題目，不拘論說、白話與傳奇體例，入選甲等即有十元獎金，甲等與乙等的文章並會刊登於女學文叢之中，希望女子能踴躍投稿。大慈在第十一期中，又再次呼籲女性投稿女學文叢：

本報的宗旨，是要和各位姐妹們，調換些智識，講究些德行，改除些陋習。我們做報的，固然要格外留心，勉力的出報，改良些體例，使閱報的滿意，更要請看這報的，不要說他們是空議論，和我們不相干涉。我們的話，姐妹們以為是的，便請照著行去；不是的所在，也要望各位見教，就是罵幾

¹⁰⁷ 《女子世界》第十四期（1905.？），頁 20（頁 1272）。

¹⁰⁸ 林逸：《清鑑湖女俠秋瑾年譜》（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頁 44、46、109。關於秋瑾歌體詩的研究，可參考龔喜平：〈秋瑾的「歌體詩」創作與中國近代詩體變革〉（《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37 卷 2 期，2000.3），頁 21-25；林俊宏：《晚清革命思潮與民間文學傳播之研究——以陳天華、秋瑾為探討中心》（花蓮：花蓮教育大學民間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中〈喚醒國魂之詩歌〉一節，頁 81-96；龍美雯：《秋瑾詩詞研究》（中壢：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中「歌行體形式技巧與特色」一節，頁 80-87。

句，也令人感激不盡的哩！況且我們報裡頭，本有女學文叢一門，倘有新議論、新理想，便請寄到報館裡來，果然是絕妙的、簇新的，我們定然佩服，代為登報啊！¹⁰⁹

大慈的這段話，除了說明《女子世界》的辦報宗旨之外，也可看出其編輯群對於女子投稿的基本立場與女學文叢欄位的設立目地。「因花集」主要刊登女性的詩歌創作，「女學文叢」則是刊登女性的議論散文的作品。報刊刊登女性論說文，雖不是由《女子世界》開始，¹¹⁰但《女子世界》編輯群的鼓勵態度，使得女性的議論也能有一個發聲的園地。

在懸賞徵文發表後，從第五期開始《女子世界》就刊載入選的文章。有趣的是，第六期的因花集中，汪毓真寫了一首〈見女子世界徵文以女中華命題愧不能文詩以備勝〉：

繡閣深閨盡日間，國家休戚兩無關。而今鐵鎖重重啟，我願蛾眉濟世艱。
招復女魂鑄人格，鑿開混沌造乾坤。會看滿樹桃花影，映出中華獨立旂。
轟轟烈烈女軍人，湧現慈雲萬億身。發大慈悲施願力，勉求幸福畀吾民。
熱心噴湧諸色界，纖手撐扶大劇場。慧劍一揮魔鬼滅，家家頰首拜紅妝。

111

汪毓真以詩代文講述自己的想法，詩中意涵恰能代表晚清女子轉變的歷程。傳統女性以「繡閣深閨」為主要活動的空間，關注的焦點也集中在一身一家之幸福，國家的盛衰興亡與其是不相關的；但身處晚清這過渡時期，女子有機會能衝破閨門迎向世界，身負「濟世」的責任，拋棄病懨懨的柔弱氣息，化身為手持慧劍開創新局的女軍人。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汪毓真的作品常見於「因花集」中，一位善於作詩詞的才女作家，卻感嘆自己能詩不能文。汪毓真的感嘆，讓人不免好奇，

¹⁰⁹ 大慈：〈恭賀新年〉，《女子世界》第十一期（1905.2），頁19-20（頁961-962）。

¹¹⁰ 在《女子世界》之前，即有裘梅侶、康同薇與陳擷芬等人以報刊為媒介，將自己的論說文發表於公眾之前。見羅秀美：〈從閨閣詩人到公共啟蒙者——以近代女性報刊中的論說文為主要視域〉（《興大中文學報》22期，1997.12），頁7-9。

¹¹¹ 汪毓真：〈見女子世界徵文以女中華命題愧不能文詩以備勝〉，《女子世界》第六期（1904.6），頁63（頁537）。

在《女子世界》「女學文叢」欄中那些能文善道的女作家，其身份與學養的背景為何？故能在這新舊過渡的時代，掌握論說文的書寫能力，適時地將自己的意見傳達。

在女學文叢當中作者的署名方式，與「因花集」中其著重點有些不同。因花集的女詩人，常以姓名上附加籍貫來署名，例如常州女士趙愛華、石門女士呂逸初等，與地域的聯結是其署名的特色，只有少數幾人會特別註明其年齡，特別是十幾歲的少女，例如十八歲的丁志先與十三歲的陳若蘭；女學文叢中的署名，除了註明籍貫之外，大多還會標舉作者的年齡與學堂名稱。不論在「因花集」還是「女學文叢」中，編輯群所標示的年齡，除了阮肅容為四十歲以外，其他則多為十八歲至十三歲之間。這種對於少女年齡的特別關注，或可從靈石的〈讀肄業日本同文學校中國少年女子之文章〉一詩中窺見一二：

妙齡十三四，偏爾善詞修。志氣凌霄漢，風潮渡亞歐。莫欺老帝國，漸上少年頭。巾幗有如此，男兒寧不羞。¹¹²

此處以「老帝國」與「少女／少年中國」相對比，其實承接著是晚清國族想像中的少年論述。翠微女士在〈志士之對待女子〉中亦言：「今之策中國者，莫不曰是在少年。少年中之期望，將來為中國之主人翁者。」¹¹³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一向崇尚「敬老尊賢」、「老成持重」，年長成為一種生活經驗與智慧的象徵，但至晚清開始風潮為之一變，開始對「少年」賦與「新生」與「希望」的象徵。梅家玲認為，晚清由梁啟超開始，因受到日本志賀重昂與德富蘇峰的影響，將日本對青／少年的國族想像引進中國，使晚清的少年懷抱希望，認為其代表的一種對新國家的未來憧憬，其風潮所及，不僅對少年加以重視，也有不少作家開始使用「少年」署名，例如「同是少年」、「鐵血少年」等。¹¹⁴

不僅靈石對於少年懷抱希望，《女子世界》的其他記者與女性作家也對少年

¹¹² 靈石：〈讀肄業日本同文學校中國少年女子之文章〉，《女子世界》第九期（1904.9），頁56（頁824）。

¹¹³ 翠微女士：〈志士之對待女子〉，《女子世界》第三期（1904.3），頁80（頁254）。

¹¹⁴ 梅家玲：〈發現少年，想像中國——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的現代性、啟蒙論述與國族想像〉（《漢學研究》19卷1期，2001.6），頁255-260。

的救國啟蒙意象深信不疑。在《女子世界》第二期方才新增的「因花集」，收錄的第一首作品，即為仁和女士丁志先的〈少年歌〉。記者並在丁志先〈世態〉一詩後，記者附上她的小傳：「丁女士為上海務本女學生，穎慧幼學，極富愛國思想。癸卯，女年十有八，以十月五日，疾卒於仁和里廬。時東事方急，女士憂憤甚，臨終前大聲呼曰：「余無他繫念，最不能忘者，國事耳。此生不能死國，我死實有憾。」嗚呼！愛國如女士者，鮮矣！天不永年，志未得一日遂，茫茫逝水，芳魂來蘇，破碎篇章，聊揚熱血。」¹¹⁵根據記者在其詩後所附加的小傳可知，其為上海務本女塾的學生，十八歲時就過世了，過世前仍心念國事，並以未能以身報國為憾。《女子世界》並特別收錄她的〈少年歌〉，以加強證明她想投身國事的心願：

我為中國人，要曉中國事。強鄰今四逼，國亡可立俟。嗟我中國四百兆人，真可憐，同在夢中顛倒顛。今日時勢有何望，惟望少年中國之少年，少年中國之少年，賴爾立身保種解倒懸。為英雄兮亦少年，惟奴隸兮亦少年，英雄奴隸一任自擇而為焉。我雖年幼無所知，聞說將為奴隸，清夜憤不眠。奴隸兮奴隸，我願舍死脫此惡孽之糾纏。¹¹⁶

不同於明清才女在閨房中的暗自嗟嘆，感歎婚姻不幸與命運不公，晚清的女性詩作中，女性開始將眼光離開閨房，望向國家時事，雖然在實際的行動上不一定能付諸行動，但對國事的關心卻是不落人後的。丁志先在臨終前仍高聲大呼，「余最繫念、最能忘者，國事耳。此生不能死國，我死實有憾」，雖不知此事的真實性有多少，但《女子世界》的記者刻意將此大書特書，有意突顯十八歲女學生丁志先的愛國心，其中對於女性讀者的教化意義，應該才是這小傳最主要的目的。由丁志先的詩歌中，也可看出對於少年救國的期待。《女子世界》對於投稿女學生年齡的標示，其在製造一種「少女中國」的氛圍，讓讀者在閱讀到報刊時，能感受到一種新生的希望——年輕女子被啟蒙了成為國民母，則中國的未來必然是光明的。

¹¹⁵ 《女子世界》第二期（1904.2），頁 59-60（頁 145-146）。

¹¹⁶ 丁志先：〈少年歌〉，《女子世界》第二期（1904.2），頁 59（頁 145）。

除了註明年齡以外，在「女學文叢」中如果文章的撰寫者為女學堂的學生，則編輯者也會特別標註。投稿女學文叢的學堂，主要有務本女塾、城東女校、廣東女學堂與明華女學校的學生。明清才女的聯繫，大多以血緣或地緣關係為主，晚清的女作家連結，則多了一個學緣關係。在《女子世界》的女學文叢中，出現了血緣關係的姐妹、或堂姊妹，在同一地區的女學堂就讀，女性人際網絡中有可能疊合了血緣、地緣與學緣的多重關係，例如張昭漢的堂妹張駕美、張宏楚與張振亞，既是姊妹，又是同學關係。從晚清以後，由「學堂」的同學、師生所聯繫起之學緣網絡，成為女性作家人際關係中不可少的脈絡，女性同學之間的思想啟蒙，甚或大過其家庭成員所給的影響，例如與張昭漢同讀過務本女塾的曾寶蓀，就曾言自己的排滿思想，主要是受到張昭漢的影響。¹¹⁷

女性作家的詩文能力，依照其生長環境與學養過程之不同，而隨人各有差異。「因花集」中的多產作家汪毓真自言「能詩不能文」，但在「女學文叢」中出現的女學生，則有「能文亦能詩」的例子，例如《女子世界》第十五期刊登張昭漢〈原情〉與〈說愛〉二文，同期的「因花集」中也刊登了〈撫念時艱悲憤不能自己援筆書此以當哭〉、〈聞粵東某女士創辦一女報命名女鏡喜而有作〉與〈大陸將沉作此自勵兼以勉某某諸同志〉三首詩歌。以張昭漢的為例，她文學能力的養成，在未入新式學堂前就已經開始了。她出身於書香世家，父親張伯純期望她能「光大漢族」，故將其取名為「昭漢」；母親何承徽亦出身詩書傳世之家，張昭漢的知識啟蒙與文學訓練即是由母親開始的。¹¹⁸她在〈默君自傳〉中言：

¹¹⁷ 曾寶蓀（1891-1978），湖南湘鄉人，為曾國藩之曾孫女，少年時先後入晏摩、務本與杭州女師就讀，後留學英國。返國後，在湖南創辦藝芳女校。1949年後與堂弟曾約農來台，姐弟二人均投身教育界，曾寶蓀曾任東海大學董事，曾約農則任東海大學校長。她在回憶錄中曾說：「我在宴摩氏女校時間不久，次年便與大姐四妹寶菡（七叔次女）入上海西門務本女學校，在這裡我還有表妹李懿康及湖南同學幾人。其中最佼佼的是張默君——那時他名叫張昭漢——她比我高了好幾班，她是師範二年，我是高小二年，但我們很講得來。一則因為都是湖南人，二則是我們的思想都很新穎，她灌輸我的革命排滿思想不少。」後來她入杭州女師就讀時，於中文書籍喜讀《明儒學案》、《黃梨洲文集》與《飲冰室》等書，亦認為是受張昭漢的影響。見曾寶蓀：《曾寶蓀回憶錄》（台北：龍文出版社，1989），頁24-25。

¹¹⁸ 《女子世界》中亦曾刊登何承徽的詩作，其詩〈天足會〉：「人生受諸天，身受諸父母。男女等所同，戕賊孰歸咎。纏足始何人，作俑必無後。歐羅誇細腰，非洲石壓首。舊俗成三刑，支那甚矣醜。婦女伊何辜，廢疾如械杻。氣衰精血枯，生子安能壽。一旦盜賊驚，兵刃相坐受。戕生開殺機，諱淫亦含垢。玩好花鳥飾，服役牛馬走。抑陰極不平，荼毒皆怨耦。女學曠不聞，母儀世安有。人種難繁昌，由此魔習扭。懸禁思國初，戒會多持久。重典懲其殃，匡扶望我后。興國以智民，女教先導誘。大願救眾生，天足功不朽。」見何承徽：〈天足會〉，《女子世界》第十五期（1905.？），頁53-54（頁1415-1416）。這首詩將晚清民初廢纏足運動的核心思想包含其中，首先，先言男女平等，女性何辜獨受纏足之苦。其次，則言纏足之害，女子容易氣血衰弱，不能生出強

予逢周晬，先妣抱之案前，予縱身就盤，一手拈毫，一手攫劍，雀躍四顧，大笑高呼。先考睨而笑曰：「真虎女哉！」時予已漸漸牙牙學語，嘗於提攜中視廳堂楹帖屏條間自可數十；歲餘，母以方紙塊寫日常簡易字教之，二歲已德五、六百字。……四歲讀唐詩三百首，兼學作聯語，一日先妣出「一片月」三字令對，予立應曰：「五色雲」。……嗣後先考暨諸叔知三言無以難我，乃徐出四、五、六、七言試之，亦頗有雋句，往往使諸叔父相顧失色，自嘆不如；蓋其時諸叔胥十餘齡少年耳，予四至六、七歲所作聯語，竟蔚然成秩。先妣為題簽曰：「寶螭墨戲」。¹¹⁹

由此可看出，張昭漢具有寫作詩詞的能力，與其母親的啟蒙教育有關。何承徽自幼受家學影響，髫齡「所為詩以瑰奇驚夙儒」，¹²⁰後在張昭漢幼年時，也進行詩歌教育。何承徽與張昭漢之間的母女關係，與明清才女家庭教育中詩歌能力養成是相似的，不同的是，張昭漢後來進了新氏學堂，開始接受更廣泛的知識內容，包括英文、格致與藝術等各各不同領域的學問，其知識養成的背景與內容，已與明清時期的閨媛才女截然不同。

《女子世界》的女學文叢，由第二期開始就出現女學生的作品，第十期以後另闢「雜俎」與「社會」兩欄目，收錄女學生批評社會風俗的作品。這些女學生們站在新舊時代的交接點，一方面面向新的時代，期許自己接受新思潮，成為新女性；另一方面面向過去的舊時代，對於自己之前的中國女性生活的陋習進行批評。在自我期許為新女性方面的言論，基本上與《女子世界》社說中的文章主旨相同，主要在鼓勵興女學、提倡女權，要女子努力學習，成為德、智、體三育兼備的國民母，為國家民族盡一份心力。

壯的下一代，而在面臨危急的情況，纏足婦女也常因逃避不及遭遇危險。最後，則提出解決之道，要開設女學促進女子的思想改造，並同時解放纏足，來解救眾女子們。

¹¹⁹ 張默君：〈默君自傳〉，收入李又寧編：《近代中華婦女自敘詩文選》（台北：聯經文化事業，1980），頁 239-240。

¹²⁰ 張默君：〈先妣何太夫人儀孝老人行述〉，收入李又寧編：《近代中華婦女自敘詩文選》，頁 250。

六、小結

當傳統深居閨門吟風弄月的才女，所寫作的作品遭到批評，在《女子世界》的「因花集」中，我們可以看到一群受過傳統詩文教育的閨媛才女，開始將她們的眼光移出閨房，面向國家與世界，用她一貫熟悉的詩歌形式，開始對當時她們的所聽所聞進行發言。《女子世界》中的女性作品，漸漸呈現出不同於披風抹月的傷春情，而開始將視線移出閨閣望向國家社會，對當下發生的新聞事件，進行評論與自我聲音的書寫，也對公共出版品，進行關切與對話，開始參與公共輿論。創作內容逐漸跳脫個人閨閣情愛，女子開始對國家存亡與自身的貢獻進行關注。

晚清面對啟蒙的急切需要，以及新思想與新名詞的出現，女性詩歌在形式與內容上也都有改變。歌體詩的創作，其自由的體式，可以將新名詞加入，而不在乎有違格律；其淺白的語言與長短的句式，在念唱之間自然產生一種律動，使人容易記憶而朗朗上口，有助於歌體的流傳，也容易使歌體詩中的新思潮得到散佈。晚清不少女作家都藉由歌體詩的創作，除了抒發自身的情感之外，也將女界啟蒙的新思想注入其中，使人聞其歌而知其意。

隨著女學的興起，女性作家的學養背景也逐漸改變，「學校」成為女作家們知識養成的場所，也成為她們擴展人際網絡的重要管道。學校成為女子走出閨門進入社會時，重要的過渡場所，也使女學生創作群體呈現出與明清才女不同的風貌。這些女性作家們努力讓自己的聲音，加入以男性為主導的報刊詩文創作，開始加入公共議題的討論，讓女性的聲音逐漸也能為世人所聽聞。

第五章 拋棄文弱：婦女典範的建立

一、前言

在《女子世界》第一期的「學校唱歌」中收錄的一首〈醒世歌〉，其中有「近追日本遠歐美，世界文明次第開」的句子，¹中國要脫離野蠻進入文明，首先就要向先進國家學習吸取經驗。晚清知識分子對於柔弱的中國婦女不甚滿意，期望婦女走出閨門，進入學堂增長智識，養成強健的體魄，與先進國家的婦女並駕齊驅在這錦繡的地球之上。

西方婦女典範的事蹟，藉由晚清知識分子的譯介，開始進入中國的言論場中。晚清知識分子對於西方婦女典範的認識，與其它新知識的途徑相同，亦是透過日文翻譯文中介。日本東京民友社在 1898 年出版了德富蘆花（1868-1927）的《世界古今名婦鑑》，書中介紹的三十幾位西方與日本的女性，後來藉由晚清知識分子的零星譯介，這些女性通常為晚清知識界所熟識，例如梁啟超在 1902 年發表的〈近世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除了文章開頭和結論的「新史氏曰」之外，其正文的內容幾乎為《世界古今名婦鑑》中「佛國革命の花（ローラン夫人の傳）」的翻譯。²至 1903 年中國的出版界出現了三部西方女性的翻譯著作，分別為 2 月份出版趙必振翻譯的《世界十二女傑》，作者為日本之三上寄鳳；5 月份出版的《世界十女傑》，不知作者為何人，僅見《蘇報》1903 年 5 月 31 日刊登期出版廣告；半年後則有丁初我翻譯之《近世歐美豪傑之細君》，《女子世界》第二期也曾刊登其廣告。³亦在 1903 年出版的《女界鐘》，金天翮在結論的部分列舉了女子應

¹ 《女子世界》第一期（1904.1），頁 51（頁 59）。

² 關於德富蘆花《世界古今名婦鑑》對於中國晚清女傑書寫的影響，參見夏曉虹：〈《世界古今名婦鑑》與晚清外國女傑傳〉（《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6 卷 2 期，2009.3），頁 35-38。

³ 夏曉虹曾著力研究晚清女性傳記的出版情況，並認為「1903 年充分地演繹成『西方女傑傳記』出版年」。晚清女性傳記，除了散見於文人的文集與報刊的專欄外，1903 年開始出版女性傳記的專著，如 1903 年的《世界十二女傑》、《世界十女傑》與《近代歐美豪傑之細君》，1904 年又有楊千里所編纂之《女子新讀本》，1906 年則有《外國列女傳》與《祖國女界偉人傳》等。參見夏曉虹：〈晚清女性典範的多元景觀——從中外女傑傳到女報傳記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6 年 3 期），頁 20-21。

當師法的對象：

善女子，誓為緹縈，誓為木蘭，誓為聶姊、龐娥，誓為海曲呂母，誓為馮嫺，誓為荀瓘、虞母、梁夫人、秦良玉，誓為越女、紅綫、聶隱娘；善女子，誓為批茶，誓為娜丁格爾，誓為傅萼紗德夫人、蘇秦流夫人，誓為馬尼他、瑪利儂、貞德、韋露、蘇菲亞，此皆我女子之師也。⁴

這份名單所列舉的中外女性，基本上可以看做是晚清婦女典範的簡易列表。在《女子世界》中的文章與詩歌中，上列表中的女性典範幾乎都曾被提及，例如丁初我在〈女子世界頌詞〉所提到的中國女性典範，以及競厂、汪毓真等人的詩歌，所提到的婦女典範大抵與其相似。

繼《女界鐘》後出刊的《女子世界》，其編輯群也認為當時的中國婦女需要多方學習，故開闢「傳記」一欄，⁵也提供女性讀者學習的典範。較為特別的是，在十七篇的傳記中，有九篇以西方女傑為傳主，其它八篇則以中國女性為傳主的情況，夏曉虹認為這種情況，與當時《世界十二女傑》與《世界十女傑》等西方女性傳記的出版，《女子世界》男性作者對於西方女性典範大軍壓境所產生的焦慮有關：

《女子世界》的調整眼光向內轉，應該也與《世界十二女傑》與《世界十女傑》出版在前有關。外國女性典範既已足敷應用，受其刺激，本國女傑傳統的重建自亦不容再緩。於是，祖國女界偉人有了在《女子世界》傳記欄中集體亮相與精彩表演。⁶

晚清知識分子常將國勢的衰落，歸因於中國主文不尚武的風氣，⁷陳平原認為晚清對於遊俠、豪俠的追求，是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下發展的。⁸在這八篇的中國女

⁴ 金天翮：《女界鐘》，頁 82-83。

⁵ 自第十三期起，將「傳記」欄改為「史傳」欄。

⁶ 夏曉虹：〈晚清女性典範的多元景觀——從中外女傑傳到女報傳記欄〉，頁 34。

⁷ 陳平原：〈晚清志士的游俠心態〉，收入許紀霖主編：《20 世紀中國知識份子史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頁 196。

⁸ 陳平原從晚清知識分子常以「俠」字命名與以盧梭為榜樣的現象，認為「重新詮釋游俠形象，

性典範傳述中，分別對花木蘭、秦良玉、梁紅玉、紅線、聶隱娘與明末時的一些女性特別加以介紹，讚揚其做為女軍人與女遊俠的事蹟，可以明顯看出《女子世界》編輯群尚武的傾向，崇尚有勇氣、有武功的，揚棄文弱、病弱的。

《女子世界》除了「傳記」欄之外，其「記事」一欄則以報導的方面，向女性讀者介紹西方與日本女性生活的現況。一般討論婦女典範時，容易側重於傳記欄中的記述，而忽略記事欄中看似零散，卻有意建構起來的對西方與日本現時女性的生活報導。故本章討論《女子世界》中婦女典範的建立，除了說明丁初我等人在「傳記」欄中對特殊成就女性的記述之外，也借助「記事」欄的報導，企圖建構出《女子世界》的編輯群，對於中／西、古／今女性典範的建立。首先，要了解《女子世界》如何將西方與日本女性介紹給中國女性讀者，並樹立何種美德要中國女性與之學習；其次，則是分析在過度介紹揚頌西方女傑的焦慮下，《女子世界》中的男性作家開始企圖建立漢族女性典範的系譜，其中那些女性被提出討論與描述，其篩選的標準又為何。最後，則是藉由「記事」欄中對於晚清當時女性的介紹，剖析哪些「女界明星」成為中國女界未來的希望。

二、遠紹歐美：西方美人圖

至晚清以後，知識分子對於中國傳統婦女的道德價值進行思考，認為女性指關懷一己一家之成就是不夠的，而要將重心移轉至國家民族的大義，應要捨棄私情為國家民族貢獻心力。而這種「捨私為公」對社會貢獻的表現，也成為知識分子在引介西方女性典範時的標準。《女子世界》中對於西方女性的介紹，一共有〈軍陣看護婦南的拏爾傳〉、〈英國大慈善家美利家阿賓他傳〉、〈記俄女恰勒吞事〉、〈婦女界雙璧〉、〈女文豪海麗愛得斐曲士傳〉、〈女刺客沙魯士格兒垤傳〉與〈革命婦人〉七篇文章，由觚庵、徐念慈（1875-1908）⁹、蔣維喬與丁初我等人

此乃游俠浮出歷史地表的必要前提。盡管此前（宋至清中葉）也出現過一些游俠詩文，但像晚清志士們那樣真把它當回事、真把它作為改造社會的重要力量，尚屬首創。因此，游俠的復出，首先必須正名：務使世人相信游俠不只是借文報仇，更重要的是捨生取義，完全值得志士們推崇和效仿。」見陳平原：〈晚清志士的游俠心態〉，收入許紀霖主編：《20世紀中國知識份子史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頁184。

⁹ 徐念慈（1875-1908），江蘇昭文（今常熟）人，別號覺我，亦署東海覺我，為晚清時期有名之

執筆。

表 5-1 《女子世界》所列之西方女性典範

原名、生卒年	《女子世界》譯名	事蹟
Frances Willard 1839-1898	扶蘭斯德孃	美國人，教育家與女權參政運動者
Harriet Beecher Stowe 1811-1896	海麗愛德斐曲士	美國文學家
Charlotte Corday 1768-1793 (Marie-Anne Charlotte de d'Armont)	沙魯士格兒垵	法國革命大革命時期刺殺激進派領袖馬拉（Jean-Paul Marat）的女革命家
Florence Nightingale 1820-1910	南的緞爾	英國護士
Mary Carpenter 1807-1877	美利加阿賓他	英國慈善家
Margaret Roper 1505-1544	孟加列·羅巴	英國人，Thomas More 之女，William Roper 之妻，不畏死為父收葬

這些女性都符合「捨私為公」的標準，有忘卻一己之幸福，將財產全數投入公益的慈善家；有不貪戀生之可貴，而「殺身以成仁」的女刺客與女革命家；亦有不宣小情小愛，藉由描述社會黑暗面而引發社會關注的文學家。這些男性作家企圖藉由對西方女性的描述，對中國女性建立不同以往的女性典範，讓女性的生存價值呈現其它的樣貌。

翻譯家。著有《新法螺先生譚》、《海外天》、《黑行星》、《美人妝》等書。參見陳玉堂：《中國近代人物名號大辭典》，頁 1029-1030。

觚庵（1860-1918）¹⁰以〈軍陣看護婦南的拊爾〉一文，介紹英國護士南的拊爾（Florence Nightgale, 1820-1910，現譯「南丁格爾」）的事蹟。觚庵創作此文之時，正值日俄戰爭期間，他有感而發認為中國女子應當學習南丁格爾，勇敢投入戰爭貢獻心力：

今者日俄起戰爭，兩國之女子，發大願，投身赤十字會，隨往戰地，看護負傷軍人，盡國民母之責任者，不知凡幾。獨我中國東三省之土地，任人蹂躪；東三省之人民，膏人兵刃。我同胞男子中有國家思想，當此危急存亡之秋，奮發自強，以救燃眉者，殆不一見，何論於女同胞？雖然，苟無取鏡之資，曷為觀感之助，茲將赤十字會始祖南的拊爾歷史，介紹我同胞，我二萬萬女子，可以興矣。¹¹

觚庵因為日俄戰爭期間，日本與俄國的女子都藉由參與紅十字會當護士的方式來報效國家，讓我不禁思索日本與俄國在中國的土地上打仗，但國人卻無動於衷，他想藉由南的拊爾的例子，提供中國女子在戰爭中，除了當軍人之外的另一種為國家貢獻心力的方法——成為看護婦。在觚庵的敘述中，南的拊爾生長於英國的富裕家庭，父親擔任英國的國會議員，母親則為鄰里間有名的慈善家，南的拊爾雖生活在這錦衣玉食的環境，卻無任何驕縱習氣，反而自年少起便將自己的零用錢捐助給貧困之人，展現其善良之秉性。後來前往德國，進入護理學校就讀，學習護理的專業知識。學習二年畢業後，回到英國倫敦，正好倫敦罷立街之看護學校經濟拮据，南的拊爾遂捐家產以資助，讓看護學校得以繼續經營。後正逢歐洲的「病夫之國」土耳其被俄國入侵，¹²英法兩國相繼出兵援救，1854年南的拊爾

¹⁰ 俞明震（1860-1918），字恪士，號觚菴，浙江山陰人。譚正璧《中國文學家大辭典》中言：「明震工詩，吟甚苦，自言成一詩或至終夕不眠，甚且病眩，故所作不多，著有《觚菴集》傳于世。」見譚正璧《中國文學家大辭典》（香港：香港文史出版社，1961），頁1740。

¹¹ 觚庵（俞明震）：〈軍陣看護婦南的拊爾傳〉，《女子世界》第五期（1904.5），頁19（頁391）。

¹² 根據楊瑞松的研究，「病夫之國」（Sick Man）最早是指土耳其，「土耳其的前身，亦即鄂圖曼帝國鎮，從19世紀中葉起，就因為其國力衰敗，屢為西方列強所欺且欲振乏力，而相傳為其強鄰的俄皇尼古拉斯（Tsar Nicholas I）在1853年間譏為『Sick Man of Europe』，而此一形容也在西方廣為流傳。換言之，在西方公共論述以『Sick Man』形容19世紀末時國立衰敗，積重難返的中國之前，土耳其因為其類似的處境，早已成為西方公共輿論中知名的『Sick Man』。」見楊瑞松：《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台北：政大出版社，2010），頁28。

遂與三十四位護理人員前往戰場救護傷患，而聲名大噪於英國。戰後返回英國得到女王的接見，並予贈二十五萬金磅，南的緝爾以其所得之獎金，創辦看護學校培養護理人員。相較於丁初我對中國女性拜金、自私之「女魔」的認識，¹³ 觚庵所展現之南的緝爾的人格特質，則有不愛私財，將一己之財富移向公益，建立看護學校以幫助傷患；有慈悲心，不僅僅是佈施貧苦人家之行為而已，而是發揚其慈悲心，以其專業知識貢獻救助傷兵；有愛國心，在國家面臨戰爭的時刻，不耽於個人的逸樂而只想勇往戰場貢獻心力。觚庵想藉南的緝爾之事蹟，讓中國女子能見賢思齊，在日俄戰爭期間，期望中國女子亦能有如南的緝爾之行為。

丁初我等人認為中國女子視野不廣，雖有慈悲之心，都通常都僅僅只於一家之內，或鄰里之間，甚至以為只要虔誠禮佛、念佛吃齋，就算是有慈悲心腸。¹⁴ 針對女性慈悲心的推及，他們在介紹西方女性時，也努力想中國婦女展現不同視野的慈悲心，讓中國婦女認知要從小愛推及之大愛，方才是慈悲心的發揚。除了南的緝爾之外，徐念慈（覺我）接著引介英國的慈善家美利加阿賓他（Mary Carpenter, 1807-1877）。徐念慈自言之所以要向中國女性讀者介紹美利加阿賓他的原因：

女子之富於愛情，甚於男子，此特別之美德，固合古今中西而同然者也。然吾繹彤史所載，……其對於家庭也，或以孝道著，或以守貞名，或以節烈顯，亦已屢指難計。至於疚心社會，忍耐刻苦，受文明之教育，為婦女之模範，排斥圈笠主義，表見其慈善心腸，舉世仰之如菩薩、如慈母者，殆不一見。嗟乎！我青史其不光矣。余讀英國大慈善家美利歷史，其心狀之溫雅，言行之柔和，精神之活潑，魄力之雄偉，有足為吾女子社會一絕大之記念，一絕好之標本者，是不可不以之告我同胞。¹⁵

他認為中國傳統的女性典範，有的以孝順名世，有的以守貞、守節得到封賞，但這些成就都僅止於一家之榮耀，而缺乏擴及社會其它群體的同受其利益。他想藉

¹³ 初我（丁初我）：〈說女魔〉，《女子世界》第二期（1904.2），頁4-6（頁90-92）。

¹⁴ 初我（丁初我）：〈哀女種〉，《女子世界》第六期（1904.4），頁2（頁476）。

¹⁵ 覺我（徐念慈）：〈英國大慈善家美利加阿賓他傳〉，《女子世界》第六期（1904.6），頁17-18（頁491-192）。

由美利加阿賓他的傳記，向中國婦女展現「慈悲」的典範。根據徐念慈的敘述，美利加生長於牧師的家庭，從小便十分聰慧，舉凡繪畫、裁縫、音樂與舞蹈樣樣精通。十七歲時便立志成為女教師，二十歲時開始執教鞭。後受印度之拉齊耶·拉姆莫哈（Ram Mohan Roy, 1772-1833）與美國牧師徐學雖夫·搭加阿孟（Joseph Tuckerman, 1778-1840）影響，二十五歲後決心從事救助貧民的公益活動，並組織有心慈善的婦人，一同組成「婦人協力會」（Working and Visiting Society）。她認為要讓貧民脫離貧窮最好的方式，就是接受完整的教育，於是她在貧民區開辦學校，並為行為有偏差的少年，創辦少年感化院，將他們導向正途。

以一人之力投身於公益者，除了南的緝爾與美利加阿賓他之外，《女子世界》中還介紹了美國「萬國婦人矯風會」（Woma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簡稱WCTU）的會長扶蘭斯德（Frances Willard, 1839-1898）。¹⁶對於扶蘭斯德的事蹟，丁初我將重點放在對於禁酒運動的提倡。扶蘭斯德幼時在家庭中受母親的影響，開始接觸文學，平日家居也與母親一同討論文學並以創作為娛樂。二十歲於女子大學畢業以後，以一己之能力獨自營生，故擔任女教師的工作。至三十五歲，捨棄教職開始致力於禁酒運動的推展。丁初我對於扶蘭斯德捨棄穩定薪資，投身公益的行為大加讚賞：

但此全屬犧牲個人之事業，俸給無一定。普通女子而處此，必眩榮利而去苦惱矣。扶孃顧慕虛榮，耽安逸之尋常女子哉，直毅然辭紐約之教席，而就任婦人禁酒會會長之職。……而論其俸給，則街頭乞人兒之不若。有時空乏飲食，陷於貧民窟之悲涼；有時勞役形骸，親為畜生道之力作，以負此最高貴之虛職，而終日出沒於最窮乏之生涯中。「不入地獄，誰度眾

¹⁶ 丁初我在《女子世界》第十二期發表了〈婦人界之雙璧〉，以分別以「刑場之白董」與「黑夜之明星」的標題，介紹孟加拉·羅巴（Margaret Roper, 1505-1544）與扶蘭斯德孃兩人。孟加拉·羅巴為英國爵士多馬士摩亞（Thomas More, 1478-1535）之女，後嫁維廉亞羅巴（William Roper, 1496-1578）為妻。多馬士摩亞因反對顯理八世（Henry VIII，現譯「亨利八世」）廢后以及任教會領袖而被判斷首之刑，孟加拉在父親被斬首後，不顧自身安危替父親收屍安葬，丁初我認為中國的緹縈與花木蘭之孝行，和孟加拉相差無幾，故言「緹縈、木蘭，東西同軌，誰謂國無人哉！」見丁初我：〈婦人界之雙璧〉，《女子世界》第十二期（1905.4），頁19-28（頁1051-1060）。關於扶蘭斯德的部分，夏曉虹發現丁初我所寫的扶蘭斯德故事，「毫無疑問是取材於《世界古今名婦鑑》的改編之作，其原本為《社會改良運動之母》中的〈威拉德夫人〉。雖說是『改編』，如與《世界十女傑》相比，這篇題為〈黑夜之明星〉的傳記改動的幅度其實不大。減省之外，基本事實的敘述仍然遵依原作，只是文辭確自己出，故少有翻譯的痕跡。」見夏曉虹：〈《世界古今名婦鑑》與晚清外國女傑〉，頁45。

生」，女菩薩之大慈悲、大苦難，世間高貴婦女，對之感情為何如？¹⁷

丁初我以中國女性最熟悉的「菩薩」，賦予於扶蘭斯德身上，展現一種不顧自身安樂，而投身公益奉獻己力的自苦行為。相較於丁初我在十一期中批評中國女學生的「大半畏艱難耽逸樂」，「經小挫折，不敢再動；得小進益，不思再奮」，¹⁸扶蘭斯德為公眾利益而不以犧牲個人享樂為苦的生活態度，恰可為當時的中國女界樹立一個堅毅刻苦、捨私為公的典範。

除了女慈善家之外，《女子世界》的西方婦女典範中，亦有女文學家與女革命家的例子。¹⁹女文學家的部分，《女子世界》第十三期中丁初我以〈女文豪海麗愛德斐曲士傳〉一文，介紹美國女文學家海麗愛德斐曲士（**Harriet Beecher Stowe**, 1811-1896），她在晚清有一個更響亮的譯名——「批茶」。²⁰斐曲士生於牧師家庭，家境並不富裕，其母親在學校擔任女教師，斐曲士與其兄在母親的教養下，擁有完整之家庭啟蒙教育。五歲時母親過世，七歲時接受繼母之教養，漸對文學產生興趣，不喜神學著作，反而醉心於小說讀物。二十三歲時為女教員以自給，二十五歲時嫁給加蘭因·斯德威（**Calvin Ellis Stowe**, 1802-1886），夫婦兩人對於逃奴法案中黑奴情狀之可憐，深表同情常為其四處奔走。後斐曲士創作《安克爾德姆木屋》（*Uncle Tom's Cabin*, 1852）以預言的方式，讓世人了解黑奴生活之慘狀。²¹根據丁初我的介紹，此書一出版十日之內發行至一萬冊，兩個月內再

¹⁷ 初我（丁初我）：〈婦人界之雙璧·黑夜之明星〉，《女子世界》第十二期（1905.4），頁 23-24（頁 1055-1056）。

¹⁸ 丁初我：〈新罪業——亞陸女學界七大罪案（城東女學社年假演說稿）〉，《女子世界》第十一期（1905.2），頁 9-10（頁 951-952）。

¹⁹ Joan Judge 將晚清引介之西方女性典範，分為社會女英雄（**Social Heroines**）和尚武女英雄（**Martial Heroines**）兩類。社會女英雄主要強調慈善與關愛的特質，尚武女英雄則強調女性以武力進入歷史的論述當中。參見 Joan Judge, 'Expanding the Feminine / Nation Imaginary: Social and Martial Heroines in Late Qing Women's Journals'（《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5 期，2007.12），頁 7。本文不擬採用 Joan Judge 的分類，而還原《女子世界》中男性知識份子對西方女性典範所給予的封號，分為女慈善家、女文學與女革命家三類。

²⁰ 根據夏曉虹〈誤譯誤讀與正解正果——批茶女士與斯托夫人〉一文研究，美國女作家 **Harriet Beecher Stowe** 在晚清的譯名有「批茶」、「斯土活」與「海麗愛德斐曲士」，由於翻譯者通常未附上英文原名，故造成晚清作家在創作時，並不曉得此三譯名實為同一人，而造成誤解與誤讀，例如《女子世界》第十三期署名「東亞女子醉茶」所寫的〈虐婢論〉中，就將斯土活與批茶誤以為是兩個不同的人。丁初我將 **Harriet Beecher Stowe** 譯為「海麗愛德斐曲士」，文中卻不曾提及其它譯名，無法確知丁初我是否知道海麗愛德斐曲士與批茶實為同一人。見夏曉虹：《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頁 183-184。

²¹ 丁初我將 **Harriet Beecher Stowe** 之“*Uncle Tom's Cabin*”譯為「安克爾德姆木屋」，此書在晚清時期有一個更為有名的譯本，即世林紓所譯的《黑奴籲天錄》。但因為林紓將作者亦為「斯土活」，

版三十次，一年之內一共銷售了十萬部左右，又被翻譯成義大利文、西班牙文、德文和法文，風行於歐美各國之間。丁初我認為，文學家要如斐曲士一般，利用文學感染的力量，將新思想推廣出去：

性情之際，渺矣。彼情與此情之間，常有交通之一物，生理學上名為電，心理學上名為感也。情之深者，感物而發聲，聞其聲者，亦以感應，感而感，力之大者，乃能移人之性情而同化之。情之深，而轉為愛也。一燈相對，聞聲相思。古之人，國之事，能令人歌，能令人泣，聲音其通感之電郵乎！況愛國愛種，出諸女子之聲，真且摯乎！嗚呼！世界風潮，乃胎事實，勿謂空言可廢棄，愛之力，仍藉文字之緣以結合，以持續之。憂國者，其亦知所自感而感人者歟！²²

丁初我認為人之間情感的交流與影響，文字依然是重要的媒介。文學家以自身的觀察，將其所見所聞發而為文，藉由文字影響他人，而造成一種風潮影響世界，丁初我認為文學家當如是。他認為「世界一風潮之起，必由理論，而進行實行。文字者，理論代表物也；理論者，事實進行券也。」²³因為斐曲士創作《安克爾德姆木屋》小說，使黑奴的問題受到重視，進而催化美國南戰爭的爆發，使美國白人不得不正視黑奴之不平等待遇。丁初我的斐曲士傳，不僅在為中國女性樹立文學家的典範，也在為有志改造社會的男性文人建立風範。丁初我等人創辦《女子世界》的目的地，原就是想藉文字的力量，讓新理想得以散播，藉著閱讀改造舊思維，注入新理念，漸漸在社會上形成一種改良的新風氣，則社會的進步便指日可待。斐曲士讓世人知道黑奴的悲慘境遇，丁初我則想藉《女子世界》讓中國婦女體認自己處於雙重奴隸的不平等遭遇，也希望能像斐曲士所造成的影響一樣，最終能讓中國女子脫離奴隸的位置，成為具有知識且身體康健的國民母，讓中國

晚清的讀者並不能將其與「批茶」聯繫在一起，故誤將 Harriet Beecher Stowe 之生活隨筆 “The May Flower” ——《五月花》，認為是描述黑奴的作品；而將斯土活之《黑奴籲天錄》誤認為是另一人的作品。見夏曉虹：〈誤譯誤讀與正解正果——批茶女士與斯托夫人〉，收入《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頁 180-181。

²² 初我（丁初我）：〈女文豪海麗德斐曲士傳〉，《女子世界》第十三期（1905.？），頁 60（頁 1190）。

²³ 初我（丁初我）：〈女文豪海麗德斐曲士傳〉，《女子世界》第十三期（1905.？），頁 58-59（頁 871-873）。

的下一代能避免被列強奴役的命運。另一方面，藉由斐曲士的例子，也向中國女讀者顯示文學的正途與力量，鼓勵女性關懷社會國家，不再侷限於家族閨房內的事件，以女性富於慈愛關懷的秉性，以其至情至性發而為文，進一步影響家外世界，其影響力之大，可以如斐曲士一般享四方之讚譽。

在介紹西方的女革命家的部分，在《女子世界》的傳記中以法國之沙魯士格兒垵 (Marie-Anne Charlotte de Corday d'Armont, 1768-1793) 為代表。大俠在《女子世界》第十四期發表〈女刺客沙魯士格兒垵傳〉，介紹法國沙魯士格兒垵的事蹟。敘說法國大革命以後，政局動盪不安，激進派領袖馬拉 (Jean-Paul Marat, 1743-1793) 欲剷除溫和派黨人，沙魯士為免同志遭到誅殺，自願前往刺殺馬拉的故事。除了法國的沙魯士格兒垵之外，《女子世界》傳記欄中，與革命婦人相關的尚有兩篇文章：丁初我所撰寫的〈記俄女恰勒吞〉(第十期) 與大我所寫的〈革命婦人〉(第十五期)。
〈記俄女恰勒吞〉為記述日俄戰爭期間，俄國女子恰勒吞因丈夫在旅順參軍，為不想與丈夫分離而自願從軍。後丈夫因戰火重創足部，她便入紅十字會援救傷兵，在一次救援伺察中，不幸為流彈擊中身亡。²⁴大我之〈革命婦人〉則是以帝俄時期被流放至西伯利亞監獄的革命女子為對象，敘說其在監獄中以絕食抗議的方式，組成所謂的「飢餓同盟」，抗議獄方的不平等對待，而終至勝利的例子。²⁵

《女子世界》的傳記作者，介紹了不同類型的西方典範，除了強調她們捨私為公的行為之外，例如南的緝爾與扶蘭斯德的捐私產為公益，而在敘述中有時會著力介紹其幼年的家庭養成教育與獨立的人格特質。南的緝爾之母為鄉里之慈善家，南的緝爾受其身教影響，從小便對貧弱之人給予幫助；扶蘭斯德亦是「受母

²⁴ 初我(丁初我):〈記俄女恰勒吞事〉,《女子世界》第十期(1904.?),頁15-17(頁871-873)。

²⁵ 大我在〈革命婦人〉之中文言:「吾讀俄國婦人革命史,與楷拉村女丈夫得十一人,其熱烈勇猛,視獨夫如土芥,視同胞如性命,殆女英雄之尤焉!」見《女子世界》第十五期(1905.?),頁43(頁1405)。因大我未附上其原始姓名,僅以中文音譯其名,故難求索此十一人之真實身份。但巴金曾翻譯俄國女革命家薇拉·妃格念爾(Vera Figner, 1852-1942)之《獄中二十年》,其中即有一章為「同盟絕食」,提及1889年秋天因督察長多洛夫強行沒收圖書,獄中之政治犯聯合絕食抗議。只是大我〈革命婦人〉中所敘述的飢餓同盟獲得空前的勝利,但在妃格念爾的敘述中,她參與的絕食抗議基本上是失敗的,大多數的同志基本上並不支持,或者虎頭蛇尾的放棄,讓她對革命同志相當失望,獄方也並未將沒收的書籍歸還。見薇拉·妃格念爾著;巴金譯:《獄中二十年》(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1989),頁80-91。雖無法確定大我所言之「飢餓同盟」事件的發生地,是否即是妃格念爾所監禁的監獄,但妃格念爾傳記中對當時同盟絕食的紀錄,或可提供研究晚清飢餓同盟時另一面向的紀錄。

君完善自由之教育，其在家庭教育時代，已預備她日成功之種子」²⁶，丁初我等人對於女子的家庭教育非常重視，在女性典範的傳記中，亦不忘提及這些女性典範之所以會有如此不凡的成就，其幼時的啟蒙非常重要，而且母親本身的身教與言教，也會產生莫大的影響。在西方女性的人格特質方面，其經濟獨立與行動自由為其敘述的重點，這些女性典範通常都有擁有謀生的能力，不依附他人過生活，例如南的緝爾為護士，美利加阿賓他、扶蘭斯德與海麗愛德斐曲士則為女教師。經濟的獨立，連帶使得女性典範們更能夠為理念而是四處奔走，擁有自由移動的權利，南的緝爾由英國趕赴土耳其救助傷兵，美利加阿賓他曾遊歷美國與印度，扶蘭斯德則是奔走於美國各州，以演說戒酒與女權的理想。傳記作家除了歌頌女性典範的成就之外，也藉由其生平經歷展現另一種女性生活的方式與態度，讓中國女性讀其傳記而見賢思齊。

《女子世界》中除了對西方女傑加以讚揚之外，「記事」欄的「外國」部分也開始報導西方婦女生活的現況，介紹的內容包含婦女在國家中的政治權利，以及女性在社會中就業的情況，還有家庭中的地位等等。對於女性在政治權利的部份，記者們觀察到西方女性開始積極爭取參政權，使女性能夠真正行使國民的義務與權利。劉瑞容在聽聞英國女性取得選舉權後，特別投稿以祝賀之：

近聞英國下議院提議婦女當有選舉權，贊成者一百八十二人，反對者僅六十二人，此議遂可決。嗚呼！此誠女界中大可賀之事也。夫歐洲婦女之爭參政權，已二百年矣。至今日而始得之，可見凡人權利，其得之也必極難。英國婦女日事競爭，不畏難，不退縮，卒必得之而後已，世稱英國為自由祖國，豈虛語哉！自今以往，全世界脂粉叢中之婦女，必皆將與男子立於同等之地位矣。我國現雖處黑暗之世，然二十世紀民權、女權均大發達，我二萬萬女同胞，終必有參與政權之一日，諸姊妹其勉之。他日國魂復甦，女界獨立，當不忘英國婦女葦路藍縷之功也。吾於是為英國婦女賀，吾於是更為全球之婦女賀。²⁷

²⁶ 初我（丁初我）：〈婦人界之雙璧〉，《女子世界》第十二期（1905.4），頁21（頁1053）。

²⁷ 劉瑞容：〈賀英國婦女得選舉權文〉，《女子世界》第七期，頁91。

劉瑞容以她的聽聞恭賀英國女子，不過實際上，英國女子在《女子世界》出刊的時刻，尚未正式取得選舉權。²⁸不過，由劉瑞容的文章可以看出，其對英國女子的讚賞，並認為西方女子既以開此女子參政的先例，中國女子的未來亦可朝此方向努力。

知識分子不滿於中國女性的依賴性，故在報導時對於歐美國家女子的就業，也相當留意，並翻譯介紹西方女子自謀衣食的例子，以期許中國女子能像西方學習。慕廬就曾由日文翻譯了〈美國婦女之自活〉一文，引介美國女子就業的類別與情況，並說明自己翻譯的動機：

我國生齒，繁矣！夥矣！顧生齒日繁，而生計日促，求其原因，是在實業之不講。男子且無暇及，遑論女子。雖然，群二萬萬女子，咸挾其依賴男子之劣根性，而勺飲粒食寸縷，無不惟男子是取是求。則雖有注意實業之人，其如生利寡而分利多何，卒之生無可生，分無可分，斯不至道餓殍，而室懸磬者，幾希矣。夫美國者，世界之黃金國也。而其女子尚不敢以多金自逸，全國之人，無不有一定職業，而獨立自活於男子之間，斯不惟為積金致富之原因，亦即為男女平權之基礎。以視我國女子生計乏絕，志氣齷齪，而為奴隸牛馬於男子肘下者，其差別為何如。嗚呼！讀是篇之女同胞可以鑒已。²⁹

晚清在婦女問題上，關注著女子的經濟獨立的議題，並常介紹著西方女子的就業情況，讓中國女子有學習的對象。慕廬翻譯的這篇文章原由日文寫成，³⁰日文的

²⁸ 英國議會在 1870 至 1904 年，對於英國婦女參政的議題，一共進行了十四次的辯論，其中婦女參政提案僅在 1870、1886 和 1897 年通過二讀，一直到等到 1918 年英國婦女才正式取得選舉權。見王昶：《激進的女權主義：英國婦女社會政治同盟參政運動研究》（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頁，136。在英國之前獲得婦女參政權的國家，紐西蘭婦女在 1893 年即擁有選舉權，澳洲是 1902 年，芬蘭則在 1906 年，挪威在 1907 年。參見王昶：《激進的女權主義：英國婦女社會政治同盟參政運動研究》，頁 136。

²⁹ 慕廬：〈美國婦人之自活〉，《女子世界》第一期（1904.1），頁 25（頁 33）。

³⁰ 在譯文中，慕廬在「我國」二字下加註，言「日人自稱，下仿此」，即知此文乃自日文翻譯而來。但慕廬並未詳加說明出處，不過有趣的是，在 1911 年出刊的《婦女時報》第一期中，有一汪傑樑翻譯之〈美國女子之職業〉，其內容與慕廬〈美國婦人之自活〉相似，應當是翻譯自同樣的文章，不過，汪傑樑的譯文將某些女性職業刪減，僅留下「任圖書館之事務員」、「任小學校之女教師」、「為新聞記者」、「看護婦」、「速記者與活字記者」、「寫真師」、「簿記法」、「雜物商之賣子」、「為保險設之勸導員」與「裁縫師」等十項。見汪傑樑：〈美國女子之職業〉，《婦女時報》

原作者也是有鑑於日本婦人依賴成性，故希望藉由美國婦人工作以自給的現象，讓日本女性能見賢思齊。在敘述各種女性職業時，也會附帶提及每種職業的求職要求，例如擔任速記者，需要性格沉靜而反應靈敏為佳；經營旅館則需要對衛生之理，以及料理食物的方法，非常熟稔方可；新聞記者則需博學多聞等，讓女性讀者了解各種職業的特色，以及自己所需要具備的能力，方能在職場上尋得職位以溫飽。

除了記實報導之外，面對西方女性的生活，在《女子世界》中還有一種富含異國情調與想像的書寫，並冠之以「奇談」或「珍聞」之名，以誌異誌怪的方式，來介紹西方的奇人異事，例如第五期介紹了維也納的〈怪力歌女〉，介紹維也納的洋琴家美利達魯納得，以一女子之力能支持需要四人方能移動的洋琴，並且能宛轉演奏，可見其力量之大；³¹此外〈大金滿家〉介紹了西方的女富豪，³²〈婦女國〉敘說了亞馬遜女戰士國（Amazons）的傳說。這些記事與奇談，雖不像傳記欄中的女性典範般嚴肅正是，卻也反映出《女子世界》中對於西方女性生活面貌的想像與建構。

三、近追日本：扶桑奇女子

晚清知識分子對於日本的印象是有些複雜的，她既是一個中國應該學習的維新成功的例子，也是一個侵略中國的列強之一。向日本的學習，主要也是在中國受到侵略後，所產生的反省。甲午戰後，中國知識界方才驚覺，從古以來不斷向中國學習的附庸國，竟在短短的維新過後，成為侵略中國的國家，日本是如何辦到的？成為中國知識份子關切的焦點。³³

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使日本對中國發動甲午戰爭，並使中國被迫割地賠款。當時關心中國政體改革的知識份子，便對日本明治維新前後的歷史產生興

第一期，頁 38-41。

³¹ 初我（丁初我）：〈怪力歌女〉，《女子世界》第五期（1904.5），頁 51（頁 425）。

³² 初我（丁初我）：〈海外珍聞·大金滿家〉，《女子世界》第八期（1904.8），頁 41（頁 719）。

³³ 周一川認為甲午的戰敗，「使中國人開始認真思考日本是如何在短時期內強大起來的，形成了研究日本的熱潮」，也開始了留學日本的風潮。參見周一川：《近代中國女性日本留學史（1872-1945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2007），頁 4。

趣，在倒幕派的歷史事件中，發現日本女性在其中也進了不少心力。高旭就寫了一首〈詠日本奇女子六首〉，來歌頌日本十九世紀歷史中的奇異女子：

索還二妹氣知虹，十九紅顏爾許雄。汝不殺余余殺汝，厲聲叱賊劍光紅（阿龍）。壯士登場盡激昂，妙人排難不張皇。劫來故事鴻門會，放出男兒象次郎（小仲）。攘夷壯士痛難酬，忼慨高談百步樓。嫁個關公真快婿，拚將鐵血一齊流（瀧本）。逃生混跡乞兒中，地棘天荊壯士窮。多謝三條橋上女，竹苞搏飯日初紅（幾松）。滿耳驚濤不耐聽，老尼隻影吊伶仃。蛋風瘴雨窮荒島，血寫心經泣鬼靈（望東）。窮途慧眼放光明，料識山陽一代英。值得美人單鳳老，一生常作女門生（細香）。³⁴

此處所提及的六名女子，分別是坂本龍馬（1836-1867）之妻榑崎龍（お龍，1841-1906）、後藤象二郎（1836-1897）之妻小仲、関鉄之介（1824-1856）之情人瀧本いの、木戶孝允（桂小五郎，1833-1877）的妻子木戶松子（幾松，1843-1886）、野村望東尼（1806-1867）與江馬細香（1787-1861）。前四位為其丈夫或情人戮力國時都曾給予幫助，阿龍在坂本龍馬遭新選組包圍寺田屋時，及時發現，讓坂本龍馬能過逃過一劫；小仲、瀧本與幾松原都為藝妓，在倒幕志士聚會與商議時，提供良好的隱蔽場所。後小仲嫁後藤象二郎為妻，瀧本在櫻田門外之變後，遭追捕拷問致死。幾松與桂小五郎在藝妓院相遇相戀，後在桂小五郎在禁門之變後逃到京都二條橋下（詩中為「三條橋」）潛伏做乞丐，幾松則常從橋上將飯糰落於橋下以救濟。野村望東尼則為幕末時期尊王派女詩人，嫁與福岡藩士野村新三郎貞貫為妻。四十二歲時丈夫過世，她便落髮剃度出家，但仍以所居之庇護尊王志士。江馬細香為江戶時期有名的女詩人與畫家，師事賴山陽（1780-1832），終身未嫁一生仰慕賴山陽，故高旭方言「值得美人單鳳老，一生常作女門生」。高旭詠讚六名日本奇女子，除了江馬細香與野村望東尼以詩文著稱之外，其他四名女子都以己身之力，幫助了身旁的丈夫或情人，雖有的身份地位不高為藝妓之流，但沒有她們的幫助，則坂本龍馬與桂小五郎也許早就壯志為酬身先死，或許日本的維新歷史可能就此改寫。

³⁴ 天梅（高旭）：〈詠日本奇女子六首〉，《女子世界》第五期（1904.5），頁 68-69（頁 442-443）。

晚清文人在引介日本婦女典範時，常在強調日本女子的「愛國心」。《女子世界》傳記欄對於日本女性典範的文章，僅竹莊（蔣維喬）在第六期發表的〈記日本娼婦安藤夭史事〉的傳記。根據蔣維喬的記載，安藤夭史為日本長崎人，日俄戰爭前便在哈爾濱從事妓業。哈爾濱當時為俄國之軍隊駐守，安藤夭史因而得以結識俄國某將軍，並進而為其妾室。俄將軍對其不加懷疑，常在安藤夭史面前談論日俄之間的軍情，在偶然的機會下得到俄軍描繪之滿州地圖，而思盜圖報國。蔣維喬著意描寫安藤夭史內心的轉折：

吾雖命薄為娼，漂流異地，然未嘗一日忘祖國也。累世受祖國之恩，無可報乎？今敵將戀戀於私愛，以軍國大事輕許賤妾，其愚誠不可及。是天假手於我，祖國以覆俄也。以死報國，此其時矣。³⁵

此處以個人愛情與愛國心相對應，安藤夭史雖俄國將軍之家妾，但站在國家民族的大義上，她仍為一個日本人，個人的愛情在國家的利益下顯得微不足道。文末蔣維喬一面稱揚安藤夭史愛國心，一方面感嘆中國人愛國觀念之淡薄：「安藤氏者，日本之所謂醜業婦，人民之最下等者也。而猶知愛國，且其雄謀偉略，臨機應變不動聲色，而玩俄將軍於股掌之上，雖豪傑之士容或不及焉。以彼視此，而吾國二萬萬女子，其媿死矣。」³⁶中國婦女僅知愛家，不知有國的行為，深為《女子世界》知識份子所抨擊，蔣維喬藉由安藤夭史的故事，即是向中國女子顯示日本連作為一個醜業之娼妓，都曉得愛國之大義，這國家如何能不打勝戰。中國女子每日貪逸惡勞，愛惜自家財富，卻不知謀求公眾的利益，中國如何能強盛起來，只有世代淪為戰敗國的命運。

《女子世界》的記者們，為了突顯日本女子的愛國心，特別會標舉一些身分特殊的女子，來激勵或勸勉中國讀者。除了安藤夭史一類的妓女外，也出現不少描述日本老婦愛國的報導。一般認為身強體壯之人方有能力上陣殺敵，但在日本老婦身上，記者刻意著墨於年老的婦人身上，企圖凸顯一個社會如果連老婦都想上戰場報效國家，其國家的尚武之風可想而知：

³⁵ 竹莊（蔣維喬）：〈記日本娼婦安藤夭史事〉，《女子世界》第六期（1904.6），頁25（頁499）。

³⁶ 竹莊（蔣維喬）：〈記日本娼婦安藤夭史事〉，《女子世界》第六期（1904.6），頁26（頁500）。

日本大和郡山町役場，有一老婦為從軍之請願，人皆驚愕而視。老婦從容正色而言曰：「余老年固不遜於當今之年少，腕中之長刀，每年試演於武德會，而獲賞者屢矣。現正預備親斫俄兵二三首級而歸來，以飲吾之雪刀。」此婦人名安達歌，年已七十六歲，素以刀術聞，前日同一奇僧，於宗延寺為大勝利之祈禱者也，日本婦人之意氣如此。³⁷

安達歌已為七十幾歲的老婦人，卻仍想以其刀術從軍報國。《女子世界》以傳奇的筆法，寫作安達歌對於想親上戰場的表现，主要還是想呈現「日本婦人之意氣」——即愛國無分男女老幼。在《女子世界》的報導中，日俄戰爭期間的日本，幾乎人人都想上戰場殺敵，即使不能親上戰場，也會勸能上戰場者趕赴沙場。另一條題為〈老婦愛國〉的新聞，便見到日本老婦人勸誡兒子以身殉國的激烈行為：

日俄戰起，日本民間愛國之心，如病熱狂。前日，有一年輕兵士，因母老乞養歸家。其母見之，竟以刀自刎。刎後授刀於其子，曰：「爾宜用此刀，以殺爾敵。」蓋日人以不能為兵為大恥，其愛國之熱誠類如此。³⁸

相較於「日人以不能兵為大恥」，中國人的傳統觀念則是「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劉瑞莪就以日本婦人勸子從軍的例子，反觀中國人一向「畏戰怕死，只聞從軍苦，不聞從軍樂」，³⁹她期望中國女子能向日本女子學習。

《女子世界》創刊期間，正值日俄戰爭期間，知識份子便十分關注日俄戰爭期間日本女子在戰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她們對國家的貢獻。除了傳記欄中蔣維喬之〈記日本娼婦安藤天史事〉一文外，其它的欄目中也出現不少關於日本婦人的記載。日俄戰爭期間，日本有紅十字會的組織，日本女子紛紛加入紅十字會，學習護理傷兵的專業知識：

自日俄之戰勢既迫，日本各處婦人，願任赤十字會看護婦者甚多。西京有

³⁷ 〈老婦從軍〉，《女子世界》第六期（1904.6），頁 77-78（551-552）。

³⁸ 〈老婦愛國〉，《女子世界》第七期（1904.7），頁 81（頁 657）。

³⁹ 劉瑞莪：〈書虞潭母事後〉，《女子世界》第九期（1904.9），頁 82（頁 850）。

二十五歲婦人名石山者，曾在某學校卒業，一月十三日，向西京府廳呈請，願為日俄戰爭之從軍看護婦，以全婦人對於國家之天職，當蒙許可。⁴⁰

對於日本能夠有紅十字會，丁初我等人相當羨慕，慕廬也特別翻譯了日本〈赤十字社之看護婦〉一文，介紹紅十字會看護婦的規則，以及在醫院中工作的情況，丁初我在文後附言：

赤十字社之造福於世界，大矣。吾國尚在軍人胎育之時代，似不足語及此。雖然，女子者，國民之母也，又烏得一日放棄養護國民之責任，苟任放棄，即喪人格。外患深矣，亡種在即。比聞寓日女學生，有立共愛會，以從義勇隊後者，閱時既久，結果寂然。而今上海復有對俄同志女會之發起，聞其議案之發端，即為創設中國赤十字會。而後知吾中國非無愛國之女子，非無女界之軍人，以大慈悲，擴大願力，共種美因，共獲善果，此會之前途，即中國一脈生機之朕兆乎。⁴¹

日本的紅十字會對中國留日女學生產生刺激，紛紛組織共愛會與對俄女同志會，有日本女子的榜樣在前，中國女子也積極的希望能在中國成立紅十字會的組織，並開始參予暫時的護理工作，此種風氣，在對日抗戰期間，更是成為女子在戰場上愛國的方法。

戰爭期間日本婦人無法上戰場當護理人員者，便自發性的捐款以助軍餉，記者以日本女子捐款奉公的情況，批評中國女子：

記者曰：東洋愛國之風，國粹〔粹〕留存，歐化茂美矣。以視吾中國女子，競以華飾逐富貴，以柴米送生涯，趁私欲而不一顧公德者，為何如？⁴²

中國女子對於財產的吝嗇，一直為《女子世界》中男性知識分子所詬病，丁初我

⁴⁰ 〈願任看護〉，《女子世界》第二期（1904.2），頁72（頁158）。

⁴¹ 慕廬：〈赤十字會社之看護婦〉，《女子世界》第二期（1904.2），頁39（頁125）。

⁴² 〈日女奉公〉，《女子世界》第五期（1904.5），頁78（頁452）。

稱此種「金錢魔」，為中國女性之獨有。⁴³對於公共利益的追求，是晚清知識分子稱揚的價值，日本女子將財產捐獻奉公，一撇自我的利益，為謀求國家的勝利，看在《女子世界》記者的眼中，直可以為中國婦女學習的榜樣。

日俄戰爭中，日本本土的女子對於國事的熱情，不論是募捐、從軍，或者組織團體等，對留日的中國人衝擊很大，也影響了留日的女學生，對於社會與國事參予的積極性：

中國婦女，慣於幽囚之陋習，以社交為恥辱。近來住留日本之婦人，聞東洋婦人會之發達，頗熱心贊成。前日開會之際，有出席演說者，祝日俄戰捷之結果，及留學女生之前途。⁴⁴

這次開會訂下三項決議，加強了日本與中國之間的友好關係，中國婦女也得以與日本婦女團體取得連結，故記者認為中國婦女的國際社交行為當由此開展，一改過去幽居封閉的習性。

在戰時的愛國行為，受到《女子世界》記者的注意之外，日本女性平時在社會中的生活也吸引著記者們的目光。晚清知識分子關注著中國女學的發展，在觀察日本女性時，自然也注意她們的學習情況以及日後的出路。記者觀察到日本女子以當老師為榮，學習自苦的情形：

日本女子自修之能力，每以不得學校教師為恥。東京小石川區高等小學校教習某氏，每日教授生徒六時外，私室自修，非常勤勉，問何為自苦如此，則曰：「今年七月，將受文部省之試驗，及第，可升為女子高等學校，或師範學校教師。試驗落第，則依然故我，將何面目以見人？」是以勉之不懈，其專壹之念如此。⁴⁵

⁴³ 丁初我在〈說女魔〉一文中，談論中國女子的諸多缺點時，認為中國女性的拜金主義，對私產的重視，實為一「金錢魔」。參丁初我：〈說女魔〉，《女子世界》第二期（1904.2），頁5-6（頁91-92）。

⁴⁴ 〈社交先聲〉，《女子世界》第十三期（1905.？），頁83（頁1213）。

⁴⁵ 〈教習之榮〉，《女子世界》第七期（1904.7），頁82（頁658）。

記者對於日本女性對事業的專心一致，與不斷追求超越的努力深表贊同。但對女子為了事業而不婚，就採取較為保守的態度。其於報導後言：「日本女子之為學生者，大都未嫁女。即卒業各學校而為教師者，亦無夫之女居多。心志專壹，感欲遂衰，故有願為教習，而不願為人妻者。吾國女子以二十為婚期，營營女子，殫精勞神，欲其受高等之教育，盡他日國民母之責任，其效亦略可觀矣。」⁴⁶記者認為日本女教習專心一志在教育上，故多為未嫁之女，其篤志雖可佳，但並不鼓勵中國女子向其學習，那是因為中國女子受教育的目的是為了當「國民母」，必須在受教育之後進入家庭，以新知識撫育下一代，方算是完成國民母的責任。

晚清知識分子雖然肯定日本女子愛國的表現，以及在女學上的努力，但卻對日本女子的私德上的一些風氣不以為然。金松岑就曾在《女界鐘》中，提醒留學日本的中國婦女，在學習日本女性的時候要知所取捨，日本女界中亦有不值得效法之處，倒不如遊學歐洲為佳：

若夫扶桑女界，纖靡卑屈，無所取也。吾翻其女權史，而暗澹其無色也，吾聞其風俗，見男子則跪，見客則跪，入戶而嬉，共池而浴，吾中國下等社會所不忍出，而居其女界之大部分也。有東游者，但留心於學問工藝，而無使女界惡風隨元規之塵而污人也。⁴⁷

金松岑對於日本社會的一些風氣不以為然，特別是女子跪坐與共浴的習慣，而希望中國女留學生而有所揀擇。其實《女子世界》中雖也鼓勵當時的中國婦女前往日本留學，不過對於日本婦女的道德風氣卻仍有不甚贊同之處，故亦有言「東國女風非良美，我國女德且右之。嗚呼！採收其教育，不沾濡其風氣，別擇之法，是在神明而用之。」⁴⁸也是希望留學女學生致力於知識方面的學習，而不要沾染上日本婦女生活習慣上的不良習氣。

隨著時間的演進，日本女性的形象在中國的報刊中也呈現不同的升降情況。到了民國的《婦女雜誌》中，對於日本婦女的生活持續加以關注，但是對於日本女性的評價卻逐漸下降，特別是對於日本女性在社會中的地位低落。須藤瑞代以

⁴⁶ 〈教習之榮〉，《女子世界》第七期（1904.7），頁 82（頁 658）。

⁴⁷ 金天翻（金松岑）：《女界鐘》，頁 23。

⁴⁸ 初我（丁初我）：〈東渡之女學生〉，《女子世界》第十四期（1905.？），頁 92（頁 1344）。

《婦女雜誌》為觀察對象，發現因編輯人員的改變，雜誌的走向與風格也隨之改變，對於日本婦女生活內容的報導也隨之變異。在草創期（1915-1919），主要介紹日本女性的職業與生活習慣都優於中國婦女；成長期（1919.11-1925.8）因為張錫琛出任編輯，雜誌脫離賢妻良母的方針，走向前衛的風格，陸續出刊「節育問題」、「貞操問題」、「婦女運動」、「娼妓問題」、「家庭革新」等專號，並以此審視日本女性的處境，發現「同為女人」的日本女子其處境依然是十分艱困的，因而導致日本女性自殺的情況相當嚴重。⁴⁹從晚清到民初，日本婦女的現況常成為中國知識分子關注的焦點，也不斷的引介日本的經驗以為中國婦女學習與借鑑。

四、典範在夙昔：漢族女傑的系譜

面臨西方女傑傳記的大軍壓境，《女子世界》中除了介紹西方與日本女性的過去與現在的典範，另一方面也積極尋找中國傳統的女性典範的系譜，丁初我在〈女子世界頌詞〉中即言：

女子世界之範圍何似乎？吾勿表歐風，吾且揚國粹。披吾國三千年之歷史，馮嫫、木蘭、梁夫人、秦良玉之勇武轟天烈地，勝於奄奄一息束手待斃者，何如？緹縈、聶姐、龐娥、紅線之遊俠高義雲天，勝於同胞胡越翻雲覆雨者，何如？……軍人的體格，實救療脆弱病之方針；游俠之意氣，實施治恆怯病之良藥；文學美術之發育，實開通暗昧病不二之治法。合此三者去舊質鑄新魂，而後二萬萬女子乃得出入於軍人世界、遊俠世界、學術世界，包含夫萬有覆育我同胞，以再造二十世紀花團錦簇麗天漫地無量無邊光明萬古之女子世界。⁵⁰

他所列舉的中國女性典範的名單，與金天翮《女界鐘》所列舉的十分相似，以「勿表歐風，且揚國粹」的立場，丁初我一一細數中國古代的女軍人、女遊俠與女文

⁴⁹ 須藤瑞代著；張瓊方譯：〈《婦女雜誌》與日本女性：「同為女人」在近代東亞的意涵〉（《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2期，2004.12），頁234-245。

⁵⁰ 初我（丁初我）：〈女子世界頌詞〉，《女子世界》第一期（1904.1），頁6-7（頁14-15）。

學士。丁初我雖言「軍人的體格」、「遊俠的意氣」與「文學美術之發育」三者並重，但在《女子世界》的傳記欄中，可以發現關於漢族女性典範的系譜，還是側重描寫擁有武力功勳的女軍人和女遊俠，知書達禮的文學家並無單獨立傳的例子。反而是將知書達禮的文學氣質，安放進女軍人或女遊俠的愛國行為的養成過程中，讓女軍人與女遊俠擁有一種「文武兼備」的形象。

《女子世界》中漢族女英雌的傳記，主要由職公和柳亞子擔任主要撰稿人，職公在第一、二與三期中，發表了〈中國女軍人傳〉，介紹了沈雲英與秦良玉的事蹟。柳亞子則以「亞盧」、「松陵女子潘小璜」等筆名，⁵¹評述了花木蘭、紅線、聶隱娘、梁紅玉以及明末一些無名女傑的作為。⁵²在寫作方面，他們兩人都不約而同的採用了所謂「評傳式」的寫法，與傳統的史傳敘述的方式不同：

柳亞子為中國女界偉人立傳，採用了其實剛剛開始流行的評傳體。這一由梁啟超率先“仿西人傳記之體”引進中國的體式，其與傳統史傳最大的區別在於夾敘夾議，作者自由發揮的空間明顯擴大。⁵³

使用評傳體的寫作方式，使我們在閱讀傳主的事蹟時，不斷可以看見作者本身的聲音出現，作者像是一個全知的嚮導，引領讀者，或者應該說是啟蒙著讀者，去了解中國漢族女英雌的武功，企圖讓中國的讀者知道，中國古代的女英雌只是尚未浮出歷史的地表，而不是不存在，間接不讓西方與日本的女傑專美於前。

這種漢族女英雌典範缺乏的焦慮，普遍存在在職公與柳亞子的行文當中，他們常藉由中西文明的比較，對於中國女性的過去與現在進行思考。職公在〈女軍人傳〉的前言中，便感嘆現今中國女子的無人格、無氣節與無肝膽，「而脂粉中，有鐵血之氣者，未之聞也」，他對於這樣的中國女界，感到可恥。他不禁思索中國二千餘年的歷史，不可能無一具有軍人性質的女性：

⁵¹ 關於「松陵女子潘小璜」，為柳亞子的化名。見夏曉虹：《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頁 73。

⁵² 以篇數為標準的話，柳亞子是《女子世界》傳記欄中的最主要撰稿人，夏曉虹認為「作為《女子世界》重要撰稿人的柳亞子，也是該刊傳記欄名列第一的重量級作者，先後為之撰寫過五篇女性傳記，且無一例外，均選材於本國史。當年，柳亞子正就讀於金一創辦的同里自治學社，其諸篇傳記與金一、丁初我發論之間存在著明顯的呼應關係，使我們有理由將柳文視為體現《女子世界》「傳記」欄宗旨的代表作。」見夏曉虹：〈晚清女性典範的多元景觀——從中外女傑傳到女報傳記欄〉，頁 34。

⁵³ 夏曉虹：〈晚清女性典範的多元景觀——從中外女傑傳到女報傳記欄〉，頁 34-35。

吾敢為吾二萬萬女子正告曰：積雪沒脛，堅冰在鬚，豈男子獨遭之境遇乎？鎗林彈雨，蹴踏天關，豈男子獨具之能力乎？斬將奪旂，渴飲虜血，豈男子獨逢之快事乎？萬馬凱旋，父老歡迎，豈男子獨邀之榮譽乎？旁皇祖國，麥秀離離，翻二千餘年之歷史，謂吾中國女子，無不具軍人之資格者，吾所未能應也。謂吾中國女子，無一足當軍人之價值者，吾又未敢信也。

54

同樣的困惑「中國果無女英雄女豪傑乎」，也是柳亞子的撰寫女性傳記的主要動機。他不斷的懷疑，西方的貞德與瑪尼他，難道中國從古至今從來不曾產生過類似的女子：

斯巴達之執牛耳於希臘也，觀於其婦人而知之矣，「願汝攜楯而歸來，否則乘楯而歸來」。法蘭西之拒英而獨立也，貞德尸其功矣，「自今以後，當一變其怯弱之態度，而擲頭顱以抗大不列顛百萬之師」。意大利之排奧而革命也，瑪尼他為之馬前卒矣，「國也者，妾與君共之者也，君獨為君子忍置妾耶！」彼泰西女子，於軍事上之能力則如此矣。我可愛之祖國，可憐之同胞，其竟無人耶！⁵⁵

柳亞子以西方的歷史經驗，對中國歷史提出疑問，斯巴達、法國與義大利的歷史中，都有女子以一己之力拯救國家的例子，難道泱泱大國的中國，在這漫長的歷史洪流中「竟無人耶」！以這樣的焦慮作為創作動機，他開始搜索中國歷史中具有軍事能力的女子，創作了一系列記述漢族女英雄的文章。

漢族女子纏足與無智識的形象，深植在晚清男性知識分子的心中，面臨漢族女英雄的缺乏，他們開始上下求索中國歷史中適合成為晚清女性典範的例子。首先，被柳亞子標舉為「中國第一女英雄女軍人」的，即是代父從軍的花木蘭。花木蘭的故事源頭，見於北朝的民歌〈木蘭歌〉，柳亞子感於花木蘭事蹟的缺乏：

⁵⁴ 職公：〈女軍人傳〉，《女子世界》第一期（1904.1），頁15（頁23）。

⁵⁵ 亞盧（柳亞子）：〈中國第一女英雄女軍人家花木蘭傳〉，《女子世界》第三期（1904.3），頁25-26（頁199-200）。

其最不幸者，尤莫如我花木蘭。讀盡二十四姓之家譜，不聞其姓氏；繙遍二千餘年之相斫書，不見其事跡。以震天撼地之女子，若不足以當盲史家之一盼，而污歷史之紙角者，我史氏其何心也。詩詞零落，語意簡單，東雲一鱗，西雲一爪，我草此傳，我自知其唐突矣。⁵⁶

既然花木蘭的事蹟，僅見於〈木蘭歌〉，柳亞子便以補史之缺的使命感，對花木蘭的故事加以撰述。在這補苴罅漏的過程中，可以發現柳亞子對花木蘭的形象，進行了一種全新的詮釋。

〈木蘭歌〉中對於花木蘭的出身並無交代，柳亞子則將其記載成如同貞德出身於牧羊之家，瑪利儂出身於工匠之家，花木蘭的出身也是一般的中國家庭，並且從小受到腐儒們無才便是德的教導，不能受到完整的女子教育，基本上和晚清時大多數的女子一樣。雖然如此，花木蘭根性裡的俠烈義氣，是一種與生俱來的秉性，沒有消失而是伺機而動。而發動此種俠烈性情的關鍵，即為「愛國心」，當面臨匈奴的入侵，父親入伍的征召令送到家裡：

而此和平門戶之一老人，亦在簽名出發之中。夕陽西匿，燈火熒然，羽書一緘，瞥印入木蘭之腦膜。木蘭方當戶而織，沈沈以思，直投梭起曰：「執干戈，以衛社稷，國民之義務也。今日之事，其何敢辭？雖然，我父老矣，安能馳驅塞外，與強胡角逐，為同胞出死力。我弟方幼，我又無長兄，誰代我父行者？我雖女子，亦國民一份子也。我其往哉，且我聞俚俗之惡諺矣，曰：『婦人在軍中，則兵氣不揚。』咄咄妖孽，誰以腐敗之惡名，汗辱我女界者，我其誓雪此恥哉。」直請於父母，易男子妝以行。⁵⁷

〈木蘭詩〉僅僅以「從此替爺征」一語帶過，木蘭出戰的目的主要是「代父出征」。但柳亞子巧妙的將花木蘭出征的動機，由一種被動的轉為主動的，認為自己既是

⁵⁶ 亞盧（柳亞子）：〈中國第一女豪傑女軍人家花木蘭傳〉，《女子世界》第三期（1904.3），頁27（頁201）。

⁵⁷ 亞盧（柳亞子）：〈中國第一女豪傑女軍人家花木蘭傳〉，《女子世界》第三期（1904.3），頁28（頁202）。

國民一份子，當然有出征的義務，再加上父親年老，弟弟幼小，更加強她出征的責無旁貸。花木蘭的美德也巧妙的轉移了，〈木蘭詩〉中代父出征強調的是「孝」，柳亞子的撰記藉由「國民一份子」的期許，突顯的是女子的「愛國心」，孝順弱化成為愛國下的附屬品。⁵⁸之後，更藉其「功成不居」的行為，來加強其自發性的愛國心，而非對功名利祿的追求：

謂中國無民族之戰爭乎？自趙宋以前，南征北伐，以削平異種之功業，發現於世界上者，未嘗無人也。謂中國有民族之戰爭乎？彼一時良家子弟，挾弓殺賊，其最大之希望，不過曰：位上將軍，封下戶侯，取斗大金印，懸肘後而已。夫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人之所難免，而無一毫民族思想廁其間也。則彼「鑄功奇石張宏範，不是胡兒是漢兒」者，亦一反手耳，我木蘭其知此矣。夫捷書夜報，天子動容，招木蘭於前殿，論功第一，賜緡百千，將授以尚書郎之職。木蘭不屑也，直怡然對曰：「某不佞，所以居留戎馬之間一十二年者，欲犧牲一身以報我民族耳，豈以是為功名富貴之代價哉！」長揖歸田，拂衣竟去。⁵⁹

而在關於花木蘭的介紹中，可以發現柳亞子巧妙的引用陳白沙〈崖山弔古〉詩中「鑄功奇石張宏範，不是胡兒是漢兒」的句子，糝糊了一個敏感的議題，即花木蘭究竟是胡兒？還是漢兒？柳亞子將其時代，放置於一個「時則炎劉時代，皇漢民族，正當全盛之年，而匈奴不道」⁶⁰的時代，用了炎黃和漢族等字眼，讓讀者自然認為花木蘭即為漢族女子。再者，將〈木蘭詩〉裡的「可汗」一詞，以「天子」二字替換，「可汗」為鮮卑族君主的譯音，⁶¹更加模糊了花木蘭種族身分的

⁵⁸ Joan Judge 認為在晚清之前，花木蘭的故事主要強調其代父從軍之「孝順」，以及復歸女兒身的美德。至晚清之時，花木蘭的故事常被用來宣揚尚武精神、軍國民資格與民族主義。參見 Joan Judge, 'Expanding the Feminine / Nation Imaginary: Social and Martial Heroines in Late Qing Women's Journals', 頁 17。

⁵⁹ 亞盧（柳亞子）：〈中國第一女豪傑女軍人家花木蘭傳〉，《女子世界》第三期（1904.3），頁 30（頁 204）。

⁶⁰ 亞盧（柳亞子）：〈中國第一女豪傑女軍人家花木蘭傳〉，《女子世界》第三期（1904.3），頁 28（頁 202）。

⁶¹ 朱自清在介紹北朝歌謠時，言：「南北朝時，中原淪入異族，而鮮卑人統治的局面，維持得最久。在文化方面，鮮卑人雖為漢人所征服，而漢人文化中，也不免瀰入鮮卑人的氣息。北歌就在這種條件之下產生。《舊唐書·音樂志》說：『魏樂府始有北歌，即魏史所謂〈真人代歌〉是也。代都時命掖庭宮女，晨夕歌之。周隋世與西涼樂雜奏。今存者五十三章。其名且可解者六章：〈慕

界線。

《女子世界》的撰稿人大多具有排滿革命思想，以柳亞子來說，他在 1902 年以後，思想便從維新轉向革命。⁶²站在排滿的民族主義立場，便可為柳亞子刻意模糊花木蘭身分尋找一個註解。雖然他自認不以狹隘的民族主義作為指標，⁶³但在他的女性傳記中，排滿的民族主義還是占了一席之地。如果說花木蘭的出身有其曖昧之處，那麼宋代的英雌梁紅玉就沒有這種問題，故柳亞子就特別將其標舉為「中國民族主義女軍人」，將女軍人與民族主義兩種要素融合，也構成晚清漢族男性知識分子在建構女性典範時的重要條件。

梁紅玉在《宋史》中附屬於韓世忠列傳之內，其中的記載僅韓世忠與金兀朮交戰時，「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桴鼓，金兵終不得渡。」⁶⁴寥寥幾語的敘述，完全不見梁夫人的個人情性的細節描寫。柳亞子藉著「松陵女子潘小瓊」這一擬女角色，化身為「女史氏」，提出他對梁紅玉的看法。文章一開始便明言，中國已亡國二百六十年了，控訴在滿清的統治底下，大多數的中國人竟不思反抗，感嘆「國無人」矣：

而張目四顧，睡獅未醒。哀哀同胞，猶在黑甜好夢之中。遺世絕俗，不問時事者有之；謔舞河山，粉飾太平者有之；群蛆嗜糞，桀犬驕人者有之；認賊作父，為虎作倀，朝出一書，則曰：「大王明聖。」夕闢一義，則曰：

容可汗〉、〈吐谷渾〉、〈部落稽〉、〈鉅鹿公主〉、〈白淨王太子〉、〈企喻〉也，其不可解者，咸多「可汗」之詞，此即後魏世所謂簸邏迴者是也。其曲亦多「可汗」之辭。北虜之俗呼主為「可汗」，吐谷渾又慕容之別種，知此歌是燕魏之際鮮卑歌。」參見朱自清：《中國歌謠》（台北：世界書局，1974），頁 91-92。

⁶² 柳亞子在〈自傳〉中說：「一九〇二年，我考取了秀才，思想卻漸漸變化，從維新走上了革命之路。一九〇三年，到上海愛國學社讀書，認識了章太炎、鄒威丹。」見柳無忌、柳無非編：《柳亞子文集（自傳·年譜·日記）》，頁 2。1903 年柳亞子才確立反清思想，周淑媚認為「1903 年是柳亞子生命歷程轉折的關鍵年，先由陳去病等介紹加入中國教育會，後赴上海加入蔡元培所領導的愛國學社，結識章太炎、鄒容、黃宗仰等人，進一步確立反清革命思想。」參見周淑媚：〈南社盟主柳亞子研究〉（《通識教育年刊（中國醫藥學院）》2 期，2000.10），頁 16。

⁶³ 他在〈自傳〉中紀錄，他在 1909 年成立南社，便是以民族主義為旗幟。〈自傳〉中言：「一九〇九年，和陳去病、高天梅兩人發起了南社，以文學來鼓吹民族革命。同盟會是提倡三民主義的，但實際上，不消說大家對於民生主義都是莫名其妙，連民權主義也不過裝裝幌子而已。一般半新不舊的書生們，挾著趙宋、朱明的夙恨，和滿清好像不共戴天，所以最賣力的還是狹義的民族主義。南社就是把這一個狹義的民族主義最出發點的。不過我個人，在當時，一方面崇拜人權論，自稱為亞洲的盧梭了，一方面又受劉光漢《天義報》的影響，頗傾向於安那主義的剷除貧富論，已不是最狹隘的民族主義能夠範圍我的思想了。」見柳無忌、柳無非編：《柳亞子文集（自傳·年譜·日記）》，頁 2-3。

⁶⁴ 脫脫等撰：《新校本宋史並附編三種》（台北：鼎文書局，1979），頁 11361。

「胡漢一家。」舞文弄墨，思以隻手掩天下目者又有之。滔滔狂流，一往不返。哀哀蒼天，曷其有極，耗矣哀哉，國無人。⁶⁵

柳亞子在撰寫梁紅玉傳記時，則將視野放回中國國土內的「胡漢之別」，梁紅玉的歷史角色與漢人背景，用來發揚以漢族為中心的民族主義，可說是十分恰當的。在中國男子不足以企望的情況下，柳亞子便將稗官野史中「男降女不降」的話語期望女子，認為中國民族主義的起點必由此開始。

在傳述梁紅玉的事蹟前，柳亞子特別對梁紅玉出身風塵的傳說加以解釋，要讓讀者理解為何一個出身娼門的女子，可以成為中國女性的典範：

我草梁紅玉傳，我先有一問題，欲解決於同胞之前。則遺傳之說、衍種之談、天演之家，津津樂道之。而攷於我國之人物，輒格格不相能，我昔百思不得其解，今迺知其所以然矣。中國輒生狗曲，往往崇拜獨夫，附合民賊，因其私天下之劣根性所便利者。而文飾以微言大義，言論所布，織成禮法，而禮法之行，則上流社會實積垢叢污之地。故高門厚祿之家所豢養者，每多乳臭小兒，而英雄豪傑，必出於無名者之種系，女子其尤甚者矣。金閨繡閣，緩步輕輦，非不高華富貴也，而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智識閉固，思想不開。雲裡帝城，豈殊狂狷，則金屋文鴛，不如荒江野鷺多矣。彼紅玉似水華年，天涯淪落，不知者必深婉惜之。而豈知險阻艱難，正彼蒼玉成之至意耶！⁶⁶

柳亞子藉由「將相本無種」的思考，駁斥遺傳天演的必然性，反而認為出身上流家庭者，因後天的教養容易出現不肖之子，反而是出身下層社會者，不受禮法與社會的束縛，不但能自由發揮所長，亦能有一番不凡的成就。

在這樣的言說邏輯下，柳亞子賦予梁紅玉更自由的形象，因為出身風塵，梁紅玉與韓世忠的婚姻，反而能達到所謂的「自由結婚」：

⁶⁵ 松陵女子潘小瓚（柳亞子）：〈中國民族主義女軍人梁紅玉傳〉，《女子世界》第七期（1904.7），頁19（頁595）。

⁶⁶ 松陵女子潘小瓚（柳亞子）：〈中國民族主義女軍人梁紅玉傳〉，《女子世界》第七期（1904.7），頁20-21（頁596-597）。

紅玉雖棲息風塵之中，舞衫歌袖，閒殺英雄，墜溷沾茵，傷心漂泊，處世上最無聊、最薄命之一境乎！然俠腸奇氣，終耿耿不一日忘。會韓世忠方淹滯卒伍中，偶扣扉來訪，紅玉一見如故，素箏濁酒，慷慨談當世事。天涯落魄，遇同調於紅顏；湖海論交，感多情之青眼。靈犀一點，相印心心，彩鳳雙飛，歸來緩緩，而我民族主義女軍人，遂與他日驅逐異族、捍衛祖國、留榮名於歷史上之偉大人物，以婚姻自由，結偕老之盟而去。⁶⁷

妓女的身分，在這裡加強了一種不受禮教拘束，自由灑脫的形象，使梁紅玉更有一種女俠的氣質。與韓世忠一見鍾情便自由結婚，柳亞子此處的描寫，不遵循紅拂女與李靖「絲蘿非獨生，願託喬木」的模式，反倒讓男女雙方以一種惺惺相惜的知己模式，達到一種平等交往的狀態，與崔涯〈俠士詩〉中「一朝若遇有心人，出門便與妻兒別」的情況相似。

如果說與韓世忠自由結婚的梁紅玉帶有俠氣，那麼從軍後的梁紅玉則被塑造成武力之外，又具有照顧者的慈母形象：

紅玉晝則束髮，作健兒妝，編入軍隊中，同上馬殺賊；夜則篝火，持針為戰士補綴軍衣，至深宵不倦。軍士臨陣受傷者，每親護視之。一軍感泣，呼為慈母。嗚呼！貞德乎！娜丁格爾乎！英雄、英雄！非愛國熱誠，達於極點，其焉能此？⁶⁸

女扮男裝從軍的形象，是中國式木蘭從軍的俗套，梁紅玉其實不需像花木蘭一樣掩飾女性的身分，但柳亞子在撰寫上還是習慣性的用中國女子從軍的易裝來處理。此段後半的描寫，與晚清對於南丁格爾傳記的內容相似，例如在觚庵對於南丁格爾的記述中，即言：

⁶⁷ 松陵女子潘小璜（柳亞子）：〈中國民族主義女軍人梁紅玉傳〉，《女子世界》第七期（1904.7），頁 21-22（頁 597-598）。

⁶⁸ 松陵女子潘小璜（柳亞子）：〈中國民族主義女軍人梁紅玉傳〉，《女子世界》第七期（1904.7），頁 23（頁 599）。

近二千之病傷兵，設備不完全，睡在露營大幕之中，縱橫錯列，號呼之聲，慘不忍聞。令娘等長途辛苦，不暇休息，即從事於看護。或薦藥、或洗傷所、或繕衣、或洗寢具，一行三十四人，以護持此千餘之傷病者。手足忙迫，刻無暇晷，幾忘寢食。又於餘暇，設假病院，創大炊事場，建洗滌所，次序井井。又取本國郵來之材貨，慰病傷兵之無聊，造圖書館，立禮拜堂，以愉快兵士之精神身體。或代患者書家信，百方盡力，兵士等之於令娘不勝感激，親之如慈母，敬之如神明。⁶⁹

為士兵補綴衣服，照料傷勢，被呼為慈母的形象，梁紅玉的描寫竟與南丁格爾十分相似。⁷⁰這種女軍人與母親身分的疊合，正是晚清知識分子對於理想女性的追求，既能有以一身殉國剛強意志與能力，又不忘中國美德中女子溫柔的母性發揚。這一短短的形象描寫中，便可以窺見晚清女性傳記正經歷一種中西合璧的過程。

晚清男性知識分子對於中國古代婦女典範的建構，肇因於對於西方女傑的焦慮，站在民族自尊心的基礎上，企圖建立本族的女英雄系譜。在這種影響的焦慮底下，在描述中國傳統女軍人時，卻又不能避免的摻入了西方女傑書寫的影響；而同樣的中國男性知識份子，在撰寫西方女傑時，在書寫翻譯的過程中，將其優異事蹟寫入傳記，採用了文人慣用的史傳與評傳筆法，故而使得西方女傑反有些中國女性的味道；而在撰寫中國女英雄時，一樣以中文書寫習慣出之，但在敘述事蹟時又加以西方女傑的一些形象，或以西方女性比附中國女性，例如花木蘭與貞德相應，梁紅玉與南丁格爾相似。這種書寫方式容易使讀者產生一種熟悉又陌生的感覺，對中國女英雄有種「陌生化」的感覺，而對西方女傑卻反而產生一種熟悉化的錯覺，不論中國還是西方的女性，都成為一種不中不西，或者是既中既西的綜合體。

中西方女性相比附的情況，在柳亞子藉由化身潘小璜女史的身分，發表的一

⁶⁹ 觚庵(俞明震)：〈軍陣看護婦南的爾傳〉，《女子世界》第五期(1904.5)，頁22-23(頁394-395)。

⁷⁰ Joan Judge 發現晚清的作家在介紹西方女性時，特別是在社會女英雄(Social Heroines)的身上，例如南丁格爾(Florence Nightingale)與瑪莉萊昂(Mary Lyon)，常會被賦予中國傳統美德中慈母的形象。參 Joan Judge, 'Expanding the Feminine / Nation Imaginary: Social and Martial Heroines in Late Qing Women's Journals'，頁13。

段評論中便可以見到：

女史氏曰：長夜漫漫，燈光欲死時，披衣起坐，四顧無人。於斯時也，手
意大意〔利〕女傑瑪尼他傳讀之，見其以妙齡弱質之絕代女兒，憤羶腥異
族之污我國家，蹶然攘臂而起，揚旗傳檄，以報奧大利九世之仇。赤心耿
耿，生死不忘，紅粉俠之名轟傳五洲，與絕代軍人加里波的，爭光比列為
民族獨立革命之佳話。吾馨香之、吾崇拜之！及返觀祖國，吾梁紅玉之豐
功偉烈，迺正與瑪尼他合節同符，無軒輊之可言，夫孰謂吾漢種之女豪傑，
不及白哲人也？抑吾尤有感者，出師未捷，賚志重泉，我梁紅玉與瑪尼他
既同病相憐矣。而意大利光復之軍，終獲最後之勝利，劫灰未死，星火終
燃，風景不殊，山河無恙，女傑有靈亦當含笑於地下。豈如我中國，一厄
於女真，再厄於蒙古，三厄於滿州，使大地搏搏，永無自由之一日乎！然
則我中國之所以劣敗於伊〔意〕大利者，果不在於無有名之英雄，而在無
無名之英雄，我國民其愧死矣！嗟嗟！望美人於天末，魂兮不歸，瞻祖國
之山川，天胡此醉！我日日焚香縹筆，祝二萬萬女同胞，有繼梁紅玉而起，
以助我殺異種、保同種之遺志者。⁷¹

將義大利女傑瑪尼他與梁紅玉對應，其主要在解決西方焦慮下的中國典範的確
立，當知識分子提出中國亦有如西方的女傑時，而且其行為與功業並無遜色的時
候，其背後有著黃種與白種的種族的競爭話語。柳亞子辯說瑪尼他之所以成其偉
大，主要乃在於其啟蒙者國人，引起義大利全國了響應，故能保住河山不為他人
侵占。而中國獨有梁紅玉獨力難支，山河變易，在於國人的不團結，藉此文喚醒
女子以繼承梁紅玉之遺願，來「保同種、殺異種」。此處同種／異種，指的漢族
與異族；而前文的黃種／白種，指的是東方與西方，種族主義在晚清會因為針對
對象不同，而產生一種差序格局。⁷²在同心圓的架構底下，以我、漢人、中國人、

⁷¹ 松陵女子潘小璜（柳亞子）：〈中國民族主義女軍人梁紅玉傳〉，《女子世界》第七期（1904.7），頁 25-26（頁 601-602）。

⁷² 費孝通認為中國人的關係的聯繫，是一種「丟石頭形成的同心圓波紋的性質」。由個人為中心往外推，可以越推越遠，推至無窮的人情網絡。中國的人倫系統，便是藉由這樣一種「推己及人」的方式，不斷向外延伸，或向內縮減。參見費孝通：《鄉土中國》（香港：三聯書店，1991），頁 27-32。

亞洲黃種人，不斷向外產生漣漪似的圓形輻散，當面對中國之內時，漢族之外的異族，即是滿族，他們是侵略者；而當視野拉出中國之外，面對西方的白種人時，不管是滿族、漢族，甚至其他國家的黃種人，則成為被侵略者，又成為同一種的弱勢團體。

漢族女軍人系譜，除了首推花木蘭，繼之以梁紅玉之外，在《明史》中佔有一席之地之秦良玉也被標舉出來。不同梁紅玉附屬於其夫韓世忠的傳記中，秦良玉在正史中單獨立傳。《明史》中記載秦良玉於萬曆二年（1574年）出生，後嫁為石砮宣撫使馬千乘的妻子，夫妻倆人一起討伐逆賊。後因馬千乘遭奸人陷害，瘐死雲陽獄中，秦良玉代領夫職，她「為人饒膽智，善騎射，兼通詞翰，儀度嫻雅。而馭下嚴峻，每行軍發令，戎伍肅然。所部號白桿兵，為遠近所憚」。⁷³秦良玉的軍功有平定播州、北上遼河抵禦金兵入侵、逐奢崇明於成都、北上勤王、防務四川、固守石砮等，她歷經萬曆、泰昌、天啟與崇禎四位皇帝，於順治五年（1648年）辭世。職公將秦良玉納入女軍人的系譜當中，並認為相較於西方的羅蘭、貞德等輩，秦良玉實比她們更為崇高，也更具有女軍人的資格：

彼白皙人種之女豪傑，吾固知所崇拜矣。然問其有擐甲執兵，驅馳於平沙無垠者乎，無有也；有追奔逐北，腥風血雨之生涯者乎，無有也；有曉暢兵機，瞭悉地勢以堅樹國防，峻拒亂黨者乎，無有也。然則以女子而盡軍人之責任，求之於泰西尚鳳毛麟角，亘數世紀而不一覩，而何幸得之於女學不興、女權不振之中國，若前明石砮宣撫使馬千乘之妻秦良玉其人者，吾中國歷史界足以豪矣。⁷⁴

⁷³ 張廷玉等撰：《新校本明史並附編六種》（台北：鼎文書局，1975），頁 6944。其他關於秦良玉生平事蹟的研究，可參考李良品等著：〈石砮“秦良玉文化”的類型、成因與保護〉（《重慶社會科學》156期，2007.11），頁 114-118+122；段庸生：〈巴渝文存中中的秦良玉〉（《重慶工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1卷4期，2004.8），頁 119-122；段庸生：〈對秦良玉研究資料的補正〉（《重慶工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1期），頁 161；滕新才：〈秦良玉“平台賜詩”考論〉（《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1卷3期，2004.5），頁 102-106；鄭敬東、鄭微波：〈郭沫若所作秦良玉讚美詩辯〉（《當代文壇》2008.1期），頁 177-179；彭福榮：〈歷代吟詠秦良玉詩歌述論〉（《文藝爭鳴》2008.7期），頁 153-155；譚佛佑：〈明季平播抗清巾幗英雄秦良玉〉（《貴州文史叢刊》2009.3期），頁 72-75；曹毅：〈土家族歷史上著名的女強人---秦良玉〉（《民族論壇》1991.4期），頁 55-57。

⁷⁴ 職公：〈女軍人傳〉，《女子世界》第二期（1904.2），頁 19-20（頁 105-106）。

雖就實際的出身而言，秦良玉應為苗族人，而非漢族人，但其時石砮既為明朝的管轄地，秦良玉又為明朝出兵抵禦金兵，其政治立場自不用懷疑，是向明朝的皇帝效忠的。職公將秦良玉推崇至高，認為晚清時期所流行的西方女傑，與秦良玉相比尚略遜一籌。職公撰寫女軍人傳記的動機，即來自西方女傑的壓力，在上下求索的過程中，認為秦良玉的經歷與功績遠勝西方女傑，其背後則有一種民族自尊心的勝利。

漢族女英雄系譜的建構，開始於西方女傑大軍壓境後，對於漢族女英雄缺乏的焦慮，在民族主義的前提之下，排滿的革命思想融入女性傳記的寫作，使得女軍人典範在篩選上，必須符合「漢族女子」與「抵抗異族」兩個條件。⁷⁵晚清民初知識份子，對於明末與南明史事的關注，已引起不少學者的注意。⁷⁶職公與柳亞子在追尋女性典範時，也將不少的注意力放置在明末與南明的時間點上，努力爬梳搜尋著具有抗清事功的女性，這些女性通常不似秦良玉有名，或甚至是無名的女傑，他們致力描寫她們的生平，讓她們浮出歷史的地表，納入中國女軍人典範的系譜當中。

明末女英雄中，較為有名的應為沈雲英。職公的《女軍人傳》除了秦良玉之外，還撰述了沈雲英的事蹟。道光年間徐鼐（1810-1862）所撰之《小腆紀傳》中，就將沈雲英放入列女傳中。沈雲英，蕭山人，父親沈至緒為道州守備，張獻忠攻陷道州時，沈至緒不幸身亡。沈雲英聞訊，隻身深入敵營，奪回父親屍首。巡撫王聚奎向朝廷上奏表彰，沈雲英被封為游擊將軍，代替父親領兵守城。其夫賈萬策督師荊州，不幸為闖賊所破，沈雲英聞訊慟哭辭職，出入賊營，奪回丈夫屍首，並將父親與丈夫的棺槨送回故鄉安葬。在徐鼐的《小腆紀傳》中，沈雲英在明亡以後，「蠲棄服飾，隱居里門為女教授。素工書法，旁涉經史，然非本宗

⁷⁵ 金正秀分析晚清文人對於效忠清朝的女傑的標準時，提出「種族思想」與「愛國思想」兩個原則，見金正秀：《晚清女性傳記與國族想像的形成研究》（北京：北京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論文，2011），頁 125。筆者在撰寫本文之時，並未見金正秀之文章，此處「漢族女子」與「抵抗異族」之分類，乃筆者依據柳亞子與職公所撰寫之花木蘭、梁紅玉與秦良玉傳記，而自行歸納所得，故此說明。

⁷⁶ 秦燕春分別從思想與文學等不同面向，研究晚清知識份子對於晚明的文化想像。首先，由晚清對於晚明思想的論述，說明晚明三大家思想體系的被建構與重新定義；其次，由遺民思想切入，說明晚清的遺老思想的源頭；再次，由結社的風氣，敘述晚清民初結社對於晚明的模仿情況；最後，藉由文學小說、戲曲等，演譯出一條由晚清通往晚明的道路，參見秦燕春：《清末民初的晚明想像》（北京：北京大學，2008）一書。林香伶則由柳亞子對於南明史的關切，提出柳亞子不同於其他歷史學家，以一種專屬的南明書寫，建構其對南明的歷史記憶，參見林香伶：〈時代感懷與國族認同——柳亞子「南明書寫」研究〉（《政大中文學報》5期，2006.6），頁 105-138。

子弟不教也」。⁷⁷但在職公的筆下，沈雲英在明亡後，曾經投水赴死以殉國，為母親所救，方才舌耕以養母終老。⁷⁸

其他關於明末無名女英雄的部份，柳亞子在〈女雄談屑〉一文中，列舉許多在明亡之際能以身殉國的英雌們。他主要是想要藉這些無名英雌的行為，來諷刺這些身為堂堂七呎之軀卻甘心服侍異族的男子們：

神州陸沈，迄今二百六十一載矣。鬚眉男子低首偽廷者，何祇千萬，獨女界豪傑發憤民族，或身殉故國，或戮力新邦，事雖無成，抑愈於甘心奴隸者萬萬矣。編次佚事，發潛德之幽光，自今以後二萬萬女同胞，更有續男降女不降之遺緒，而同心協力，共擣黃龍者乎，中國萬歲，女界萬歲。⁷⁹

柳亞子想藉由〈女雄談屑〉一文，那些在異族入侵的時刻，比男性更加堅毅的女性致敬。文中列舉了由明末至晚清的一些女英雄，有李成棟妾、湖南女子某氏、宋蕙湘、趙雪華、趙飛飛、汪端、白蓮教齊王氏、廣西會黨魁女某氏、金建義、劉淑英、楊娥與太平天國洪王后徐氏等，都是與清朝站在敵對的立場，有的以死殉節，有的起兵抗清，這些女子都得到柳亞子的推崇。

女軍人的系譜，按照民族主義的原則，從花木蘭至明末抗清女傑，大致上是沒有問題的，她們大都兼具著驅逐韃虜的功績。只是時至有清一代，有些女性擁有軍事能力，但其為滿清異族效力，與民族主義的前提相違背，是否能成為晚清女性典範呢？在《女子世界》的十六、十七期，與後來的《續辦女子世界》中，大我節選了呂逸初所撰寫的〈女魂〉（又名〈女界免塵錄〉）中的幾篇女性傳記，可以看出當女軍人形象與民族主義有牴觸時，《女子世界》的知識份子所採取的立場與策略，以及作者與讀者之間的混聲話語。呂逸初的詩詞作品常見於「因花集」中，她的詩歌也常反映出國局的焦慮，例如其作〈憂國吟〉：

沈憂日抱杞人思，怕見江山破碎時。嘆息峨眉難用武，臨風空讀木蘭詞。
休言紅粉喜談兵，為感時艱也不平。屢欲憤提雙劍起，桃花馬上請長纓。

⁷⁷ 徐嘉：《小腆紀傳》（台北：明文書局，1986），頁 688。

⁷⁸ 職公：〈女軍人傳〉，《女子世界》第一期（1904.1），頁 11（頁 19）。

⁷⁹ 亞盧（柳亞子）：〈女雄談屑〉，《女子世界》第九期（1904.9），頁 17（頁 785）。

鳴不能平每放吟，忍看西方漸東侵。閨中尚洒傷時淚，誰說人無愛國心。
千秋女傑有秦梁，不信軍中氣不揚。我憤時艱無死所，拚教馬革裹沙場。
橫流滄海奈時何，拔劍空吟砍地歌。熱血一腔無洒處，為民我願濺強俄。

80

在〈憂國吟〉中可以看出呂逸初對於中國處境之憂心，面對西方列強的侵略，她想要提起雙劍，前往戰場殺敵拚個馬革裹屍。詩中呂逸初預設的敵人，是西方與俄國。以同心圓結構來看，她是在東方／西方對立的結構，並無見到漢／滿對立的局面。

有清一代女軍人的爭議，最容易發生在太平天國時期，呂逸初的〈女魂〉在《女子世界》第十六、十七期，一共四個女子的事蹟：李素貞、李杰妹、呂女與秦小羅。此四人是站在清朝的立場，對抗太平天國而犧牲性命的女子，以李素貞為例：

國朝咸同間，洪秀全之竄長沙也。胡文忠公時撫楚，檄唐縣李方伯孟群督師討之。方伯有妹名素貞，知書，工騎射，於天文占驗之術，靡不窮究，方伯招之入軍。女戎裝往，且代為運籌決勝，殺匪逾萬。方伯有時失利，被匪黨所圍，將士無敢往援者，女怒馬獨出於槍林礮雨中，突圍入手斬數十人，護方伯歸，甲裳均赤，洪黨萬目注視，驚為天神。後胡公攻漢陽，城堅不能下，女與兄謀，乘夜襲之。深入遇伏，血戰而死，年只二十餘耳。

81

在呂逸初的筆下，李素貞是一個知書能武的女子，以其聰慧勇敢替其兄解決危難，攻打洪秀全之太平天國亂黨，其能力讓敵人也聞之色變。呂逸初讚其「女子知兵，載籍都有，然自秦良玉後，已不數覯。況百戰捐軀，以身許國，尤為近世所僅見。」⁸²呂逸初將李素貞放置在秦良玉之女軍人系譜之下，身為讀者的大我則不以為然。大我在十五期中曾撰寫〈革命婦人〉，介紹了俄國飢餓同盟中的女

⁸⁰ 呂逸初：〈憂國吟〉，《女子世界》第七期（1904.7），頁 69-70（頁 645-646）。

⁸¹ 呂逸初：〈女魂〉，《女子世界》第十六、十七期（1906.1），頁 47（頁 1517）。

⁸² 呂逸初：〈女魂〉，《女子世界》第十六、十七期（1906.1），頁 47（頁 1517）。

傑。他作為一個讀者，對於呂逸初撰寫的李素貞與秦小羅的傳記，認為此二人站在滿清的立場，反抗漢族太平天國，在種族思想上是有所不足的，他在文後加上「讀者曰」，來表達自己的看法：

李素貞之血戰，秦小羅之斃楊，雖於種族思想，似有遺憾，然激於愛國，則不暇辨。世之女子，貧者倚賴性成，至死不變；富者窮極奢侈，予富自雄。凡此者，皆祇有一身，不知有一家；祇有一家，不知有一國。女格由是卑，國家由是弱。吾之所以節取李、秦諸事者，將以愧婦女之反對國家思想者矣。⁸³

但在《續辦女子世界》出刊時，大我又節選了呂逸初〈女魂〉中的內容，大我在文末加上「記者曰」以說明：「前期記載李、秦諸事，均於種族思想，似有遺憾。茲特節取趙、宋諸事揭之，俾世人知民族主義。」⁸⁴故他特別檢選的，在政治立場不致有種族思想之憾的例子，而介紹了趙雪華、宋蕙湘與舟妓徐某的故事。趙雪華與宋蕙湘皆生於明末，趙雪華因北寇入侵絕食而亡；宋蕙湘因不願受北將凌辱而被殺。最有趣的是，舟妓徐某的例子：

徐□□，舟妓也，賣笑珠江有年。廣西花縣一落魄書生某，幼喪父母，家無餘財，生計甚困，無以自資。……嘗與徐結偕老緣，徐輒資助其用。「忍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厥後，徐輒交洪秀全，卒歸洪，共起兵。金陵既敗，徐去隱蒙古，以起馬賊隊，人至今苦之。梁紅玉以降，徐亦奇女子矣。⁸⁵

很明顯的是，舟妓徐某的故事裡，洪秀全已成為起義之師，在漢／滿的對立下，太平天國成為反抗異族的代表。相較於在李素貞與秦小羅的敘事中，將太平天國稱為「洪黨」、「粵寇」、「匪」與「賊」，是完全不相同的立場。似可合理的懷疑，

⁸³ 大我的評論，附於呂逸初〈女魂〉文末，《女子世界》第十六、十七期（1906.1），頁50（頁1520）。

⁸⁴ 附於呂逸初〈女魂〉文末，《續辦女子世界》（1907.？），頁57（頁1669）。

⁸⁵ 呂逸初：〈女魂〉，《續辦女子世界》（1907.？），頁57（頁1669）。

這後期刊登的〈女魂〉應該經過某種程度更動的，特別是在對太平天國的立場上，畢竟前一期稱為「亂黨」到後一期則呼為「義軍」，這是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場。目前無法見到〈女魂〉的其他版本，也無從考證這立場的改變，究竟是原著者呂逸初後來做的更動，還是大我為了符合排滿思想的需求而做的刪改。目前僅能從有限的資料中，觀察到這作者政治立場混雜的情況。不過微妙的是，大我由之前的「讀者曰」到後來的「記者曰」，乃至自言「茲特節取」，可以發現大我從被動接受的讀者，移轉至能揀選本文的節選者，其後來政治立場的顛倒，也許與大我難脫干係。

女軍人的系譜，從花木蘭到明末女英雄，乃至於太平天國時期的從軍英雄，職公與柳亞子努力向《女子世界》的讀者娓娓道來。至於女遊俠的例子，《女子世界》傳記欄中，明確名為女俠者僅紅線與聶隱娘。柳亞子將紅線、聶隱娘與俄國的虛無黨相應，認為在中國唐代即有女偵探、女游俠，雖然世傳的故事中對於武術有其怪誕之處，但柳亞子仍然期許中國女子向紅線與聶隱娘學習，學習武術與體育，強健身體以為國事盡力。

在《女子世界》中女軍人與女遊俠的事蹟，在敘述時常有是交錯在一起的現象，例如沈雲英雖被職公歸納為女軍人，但在描寫其深入敵營搶回父屍時，則使用了類似紅線盜金時的情節。柳亞子雖在敘述紅線、聶隱娘為女游俠下了定義，但在〈女雄談屑〉中則沒有刻意區分女軍人與女游俠之不同，甚至連女文學家也放入其中，正因為「女英雄」或「女傑」的名號具有更大的涵括性，很多時候更為《女子世界》中的撰述人所採用。

至於女文學家的部分，《女子世界》對於明清女性作品中，能突破批風抹月的作品採取肯定的態度，並將其人與作品選錄。在種族思想的驅使下，一些哀悼明亡的黍離之作，特別容易受到《女子世界》撰稿者的讚揚。柳亞子在〈女雄談屑〉中就收錄了南明至清，具有民族思想的女性作品。永歷年間湖南女子某氏，抗至不屈，投江而死，人們在其衣裾間得一首〈絕命詩〉，詩中直言雖身為女子，但不肯身處異族所統治的地區，寧願「葬入江魚波底沒，不留青冢在單于」，柳亞子讚其「詞意慷慨激昂，彼靦顏事仇者，不羞死其亦愧死」；⁸⁶清兵南下之際，宋蕙湘、趙雪華與趙飛飛三人，都寫下詩歌來表達國亡之悲，以及對洪承疇等人

⁸⁶ 亞盧（柳亞子）：〈女雄談屑〉，《女子世界》第九期（1904.9），頁18（頁786）。

叛國之不齒；柳亞子亦讚揚汪端⁸⁷的〈弔張煌言詩〉，詩中「民族之思，溢於言表。嗚呼！我中國女子，能通文義者鮮，苟能筆墨，又無不困厄於呻花吟月之範圍以終，如汪端者，豈堪多覩耶！」⁸⁸由此可知，在女作家的評鑑上，民族之思仍是最主要的標準，能夠合於民族大義的作品，在柳亞子等人的眼中，方是女性文學之上選。

柳亞子與職公對於漢族英雌系譜建立的同時，這些女軍人與女遊俠，也進入女性的創作當中，成為女性作家心目中的典範。在許多的詩作中，可以看到這些女傑的身影，例如蔣韞玉的〈與韞華韞章二妹言志而作〉中「亞洲女傑勝歐傑，不拜羅蘭拜木蘭」⁸⁹，以花木蘭當作學習的榜樣；而歌頌梁紅玉的則有，周紅梅〈感所志〉中云「梁家紅玉世難逢，桴鼓驅胡意氣雄。眼底一般痴女子，沉沉醉死可憐蟲」；⁹⁰以及楊壽梅的〈黃天蕩歌〉：

怒濤吼起黃天蕩，氣吞三吳凌人荒。沙飛石走海為立，金焦兩點何茫茫。
憶昔蘄王開血戰，旌旗林立海中央。紅玉一鼓虜氣奪，滿軍將士喜洋洋。
如何岳戮韓亦隱，築室先摧棟與梁。金既勢衰蒙古繼，大忽必烈威名揚。
遂令大陸陷胡元，黃帝子孫罹奇殃。古來恨事已如此，那不令人摧衷腸。
回看今日神州土，漢家運命更堪傷。四鄰外族相睽睽，壓制威權千丈強。
忍把土地媚群兇，神州竟作逐鹿場。歐美環伺恣分割，華工見逐於外洋。
願我姐妹都膽壯，學梁紅玉為民倡。取彼民族驅異類，認清種族憑天良。
唱此歌者誰家女，其名曰壽其姓楊。⁹¹

⁸⁷ 汪端（1793-1838），字允莊，浙江錢塘人，汪榆之女，同知陳裴之妻。七歲時寫〈春雪詩〉，以謝道韞自擬，故又號小韞。及長善為詩，詩風「旨遠而辭文」，並收錄明代詩人作品文《明三十家詩選》初集、二集，有《自然好學齋集》傳世。關於汪端之生平簡歷，參見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頁 357。《清史稿》將汪端收入列女傳中，見趙爾巽等撰；國史館校註：《清史稿校註》（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頁 11662。

⁸⁸ 亞盧（柳亞子）：〈女雄談屑〉，《女子世界》第九期（1904.9），頁 20（頁 788）。

⁸⁹ 蔣韞玉：〈與韞華韞章二妹言志因作〉，《女子世界》第十五期（1905.？），頁 54-55（頁 1416-1417）。

⁹⁰ 周紅梅：〈寫所志〉，《女子世界》第五期（1904.5），頁 65（頁 439）。

⁹¹ 楊壽梅：〈黃天蕩歌〉，《女子世界》第十六、十七期（1906.1），頁 67-68（頁 1537-1538）。在《續辦女子世界》中卷首有其照片，在記事欄收錄了來自《復報》的傳記。楊壽梅，江蘇無錫人，原名晴瑛，壽梅為其字。入溫氏二等公學校就讀，努力向學以求進步，不料其訂婚的家庭較為保守頑固，不願女子再繼續讀書，其祖母亦逼迫其退學。楊壽梅不堪求學之事受阻，憤而吞鴉片自殺，為家人所救。但楊壽梅求學之心不輟，趁家人出門拜佛之時，逃家至上海，入天足女學堂就讀。但因經濟考量，又入教會所辦之啟明女學校就讀。傳記作者對其讚譽有佳，認為楊壽梅是當代之



梅壽楊士女

圖 5-1：楊壽梅（《續辦女子世界》）

楊壽梅將自己與梁紅玉放在相同的位置，她認為自己現今所面臨的時代，與梁紅玉是相同的，都是國家被異族入侵的存亡之秋，比宋代更嚴峻的是，除了政治上被異族統治之外，還有西方列強的環伺。楊壽梅以梁紅玉為榜樣，呼求讀此詩的女性讀者奮起，認清種族之異，以民族主義為旗幟，光復故有山河。

《女子世界》中的傳記作家，在西方女性典範盛行的壓力底下，開始求索中國歷史上的女英雄。柔弱的中國傳統女子，遭到晚清知識份子的揚棄，從花木蘭以降，在中國歷史上具有軍事才能與武力的女子，一一被柳亞子與職公蒐羅。在民族大義的基礎上，女子除了要具有特殊的功績之外，還必須是站在漢族的立場上，方能成為名正言順的女傑。

五、女界明星：中國女界的希望

在《女子世界》記事欄位，內國的部份，可以發現其編輯群對於中國女子現狀的報導。他們開始注意當時社會上，不同於傳統女子的女性們，具有獨特思想

俠女，有衝決家庭網羅的勇氣，見〈紀楊壽梅女士〉，《續辦女子世界》（1907.？），頁 103-106（頁 1715-1718）。

與行為，或者具有專業性，而且能獨立自主的女性，都成為記者們關注的對象。關於女醫生的部份，在《女子世界》中最常提及的是張竹君（1876-1964）。張竹君幼時曾因腦病導致半身麻痺，後得到美國醫療傳教士嘉約翰（Kerr John Glasgow, 1824-1901）的醫治，便跟隨其學醫十三年，並受洗成為教徒。得到醫學執照之後，先在廣州成立南福醫院，後又將南福醫院改為小女學堂，並聘請馬君武母親擔任教習。馬君武在 1902 年 3 月 18 日的《新民叢報》，曾撰文〈女士



圖 5-2：張竹君（《女子世界》第九期）

張竹君〉，對於張竹君學醫與傳教，以及致力於女權運動的努力，都有詳盡的描述。馬君武對張竹君極為推崇，認為「竹君者，誠中國之女豪傑，不可不紀錄其言論行事，以喚起中國兩億睡死腐敗婦女之柔魂也」。⁹²張竹君於 1904 年前往上海，創設手工傳習所與衛生所講習會，《女子世界》在第六期就以〈女界明星〉為標題，介紹張竹君的事蹟：

廣東張竹君女士，十餘齡即精醫學，兼通外國文字，素持博愛主義，以汎愛同胞為宗旨。在粵創設南福醫院、女學堂、女子保險會、實業學堂等，所費不下十數萬。比聞極東戰事起，欲投身日本紅十字會，隨同任理看護。於三月初旬抵上海，愛國女學校開會歡迎之，女士演說女子教育之急務，

⁹² 馬君武著；曾德珪選編：《馬君武文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頁 236。

滔滔數千言，由校長致答辭，並慰問女士駐滬數月，任愛國女校之舍監，女士欣然諾之。現并設手工傳習所、衛生所講習會於上海，每日分上、下午教授，並於午後在講習會所贈醫。如女士之博愛利物，非特女界之仁人，抑亦中國之偉傑。⁹³

記者在記事之後，加入了一段自己的評論：「女子提倡實業，熱心普渡，吾國女界大善人大救主之事業，世人可以風矣。」⁹⁴呂逸初也曾寫詩讚揚張竹君：「博愛為懷群己忘，養生有論異嵇康。從今入室諸都講，弱質何愁不自強。心原似佛術如仙，一滴楊枝灑大千。從古良醫比良相，誰知醫國有嬋娟。十字旗開萬國迎，上書慷慨賦東征。由來奇女羞依傍，獨立江天度眾生。大陸沉沉幾變更，相期世界進文明。女權此後無旁落，我為同胞酌一觥。」⁹⁵張竹君不僅擁有專業的醫學知識，能診救人於病痛之際；並且努力從事教育事業，既開設實業學堂，教授女子謀生的技藝，另一方面也於各處講演衛生的方法，使衛生觀念得以推廣，更多人知曉保健身體的要點。

女醫生的部分，除了張竹君以外，女醫張星佩也曾申請進入紅十字會服務。在《女子世界》第七期「記事·內國」中，有一條〈女醫入會〉中言：「廣東女醫張星佩，日前稟請粵督，稱在省城柔濟醫院學習西醫四年，領有文憑，願自備資斧，赴日本紅十字會，稍盡看護義務，請給護照前往。」⁹⁶還有燕斌也具有女醫的身分，在十五期〈女醫東渡〉中紀錄：「頃湖南長沙人燕斌女士東渡，同鄉會特別歡迎招待，幾於有病者不往日本醫院，而來就女士，車馬盈門，道路殆為之塞。女士現擬再入日本女子醫學院，研究數年，以加深其固有之程度云。」⁹⁷報導燕斌到日本之後，受到旅居日本的中國人的歡迎。

女教育家的部分，《女子世界》在記事欄中零星的記錄了各省辦學的女性，而女教育家杜清持在廣東女界，則占有一席之地，在馮自由的《革命逸史》「女醫士張竹君」中便順帶紀錄了杜清持的生平：

⁹³ 〈女界明星〉，《女子世界》第六期（1904.6），頁 80（頁 554）。

⁹⁴ 〈女界明星〉，《女子世界》第六期（1904.6），頁 81（頁 888）。

⁹⁵ 呂逸初：〈寄張竹君女士〉，《女子世界》第十三期（1905.？），頁 61（頁 1191）。

⁹⁶ 〈女醫入會〉，《女子世界》第七期（1904.7），頁 83（頁 659）。

⁹⁷ 〈女醫東渡〉，《女子世界》第十五期（1905.？），頁 82（頁 1444）。

壬寅廣州有女教育家名杜清持者，適志士曹駕歐，與杜露笙杜枚叔為兄弟行。時與其妹月波創設廣東女學堂於西關，汪千仞、王亦鶴、何子徒、謝英伯、莫天一等均任校董。月波與香港《中國日報》記者陳詩仲曾訂婚約，以是粵垣及香港各報時載杜氏姐妹投稿，文名頗著。⁹⁸

《女子世界》第七期附有杜清持的小影，她的演講稿也被《女子世界》編輯群放入演壇欄中，一共兩篇〈男女都一樣〉(第六期)與〈文明的奴隸〉(第九期)，〈論游歷閱報為女子立身之要務〉則收入女學文叢當中。她與其妹創辦的廣東女學堂，其女學生的作品則常見於女學文叢當中，例如張肩任、彭維點與彭維省都是廣東女學堂的學生。



杜清持女士

圖 5-3：杜清持小影（《女子世界》第七期）

不過這些奇女子雖得一些知識分子的推崇，不可忽視的是，社會上還是有些批評的聲浪，有些是以溫和建議的方式，⁹⁹有的則採取較為激進謾罵的語氣。針對這些批評，有一署名「翠微女士」者，挺身而出為張竹君與杜清持辯護：

⁹⁸ 馮自由：《革命逸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頁 220。

⁹⁹ 張竹君的育賢女工傳習所，在實踐上引起了一些弊病，署名「三自女士」者就投書《女子世界》，針對「藝課宜勤」、「學課宜兼」與「勿談宗教」三各部份，希望張竹君能接納她的意見。參見三自女士：〈致張竹君女士〉，《女子世界》第十期（1904.？），頁 79-80（頁 935-936）。

吾粵女界中有二人，曰張竹君，曰杜清持，是二人者，女子中之略具愛國心者也。乃張氏以其為教會中人，好與外國人交游，謠誣之言，遂由是而興，隨意誣讟，幾不堪入耳。雖張氏之名譽，未必因是墜地，而毀張者仍幾如口碑之載道也。杜氏今歲以游學東洋不果，逗留上洋者數月，稍與世界上有所應酬，未幾杜氏返粵，而嗤嗤之口亦從而蜂起。……吾與張杜二氏，素未謀面，其人品學問不得而知，然二氏之不避忌諱，破除積習，以提倡女學，固為吾粵女學界中錚錚佔一席位者也。且張之長於辦事，杜之長於教育，亦為世所公認也。夫今日之所謂志士者，……不獨不為揚之，反為抑之；不為之鼓舞之，反為誹謗之，誹謗之不已，又從而污讟之，污讟之不已，又從而排擊之。¹⁰⁰

翠微女士不了解中國志士為何有此種怪異之風氣，她認為對於這些勇於走在時前沿的女性，男性志士們應當有給於鼓舞與幫助。由這一段話也可以理解到，通常對於走出家庭進入社會的前衛女性，一般對於她們的批評，會針對在私德的領域——特別是與男性交往的部分。女子如要進入社會貢獻心力，則勢必不免要與男性接觸，在晚清新舊過渡的時期，女子處其間也難避免遭到一些保守人士的攻擊，也成為當時前衛女子必須面對的社會壓力。

除了個人以外，《女子世界》出刊的期間，女性因應國事之大變局，開始集結成為團體，要集合女界的力量，為國家出一份心力。女學生在日俄戰爭期間，受到日本人愛國行為的刺激，反觀這場戰爭在中國土地上發生，中國卻一味忍氣吞聲，於是組織對俄女同志會來發聲。鄭素伊在宗孟女校舉行創辦會議，並選舉議長與議員，並擬定議案。¹⁰¹第四期記事欄〈女界義俠〉記載了相關內容：

聞福建鄭素伊女士，致陳婉衍、童同雪兩女士書，謂所創對俄同志女會辦法凡九條，其中第二條為「訪求俠客，實行暗殺」。並聲明曰：「如有應募一試者，不論成敗，素伊願傾家百萬以酬之。素伊雖屬巾幗，頗知大義，如值加賦，雖一錢亦不應也。素伊久已敝屣一切，知我罪我，毫無所畏。」

¹⁰⁰ 翠微女士：〈志士之對待女子〉，《女子世界》第三期（1904.3），頁 81-82（頁 255-256）。

¹⁰¹ 〈設會對俄〉，《女子世界》第二期（1904.2），頁 71（頁 157）。

有欲與素伊為難者，素伊以一身擔任之，決不累及親友也。」¹⁰²

記者在文後讚揚鄭素伊的行為，曰：「吾國義俠之風，三千年來漸滅盡矣。不圖得見之於沉淪萬劫之女界，專制極端乃生反動。吾願同胞二萬萬，買絲日日繡羅蘭，與全國一瞻禮之。」¹⁰³鄭素伊建議將刺殺的行為加入對俄女同志的章程中，這種刺殺的風氣在後來革命運動中，成為一種常被使用的方式。

《女子世界》對於日本的經驗是十分關注的，日本女界也給予中國女界相當大的幫助。尤其是下田歌子所創辦的實踐女學校，早期留日的女學生大多入實踐女學校就讀。之後隨著自費留日的女子增加，其入學的學校也逐漸增加。¹⁰⁴《女子世界》記事欄對於留日女學生的近況相當關注，並認為這些留日女學生會成為中國女界未來的希望：

據最近調查中國女子在東京者共百人許，而其最著名者共三十人。就中長於英文者，有吳弱男女士及陳擷芬女士一流；長於漢文者，有秋瑾女士、林宗素女士一流；長於數學幾何代數者，有陳光璇女士、黃振坤女士一流，長於音樂者，有潘英女士一流。日本男教習見之，群嘖嘖嘆服，致日本女學界，亦為之相形見絀。中國將來之女權，實基於此，可為中國女界之前途賀。¹⁰⁵

這其中所提到的女性，確為後來中國女界的知名人物。吳弱男加入同盟會，曾擔任孫中山之英文秘書；秋瑾在取締事件之後回到中國，擔任女教員並創辦《中國女報》，後參與革命起義失敗身亡；林宗素為林白水之妹，1903年隨林白水赴日本留學，在日期間積極參與共愛會，以及其他拒俄運動，民國以後則積極投入女子參政權的爭取。

晚清女性面對中國女子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短短數年之間的改革，使中國女

¹⁰² 〈女界義俠〉，《女子世界》第四期（1904.4），頁70（頁344）。

¹⁰³ 〈女界義俠〉，《女子世界》第四期（1904.4），頁70（頁344）。

¹⁰⁴ 對於1906年至1911年留日女學生的統計，可參見謝長法：〈清末的留日女學生〉（《近代史研究》1995.2期），頁276-279。

¹⁰⁵ 〈女界之英〉，《女子世界》第十五期（1905.？），頁82（頁1444）。

性開始被鼓勵走出閨門，進入學堂求取知識。隨著知識的追求，社會上也出現越來越多的傑出女性，民國以後不論在各個領域，都可見到女性側身其中，女性所追求的生存價值亦更多元。

六、小結

當中國傳統《列女傳》的婦女典範，為晚清知識份子所揚棄的同時，努力尋找新時代的典範，成為男性知識份子在建構婦女時的重點。經由日文翻譯，引進西方的婦女典範，開始向中國女性讀者不同以往的生存價值。西方的女慈善家、女文學家與女革命家，所展現的一種捨私為公的行為，晚清知識份子積極讓女性讀者認識這些傑出女性，希望藉由向其他的婦女典範的學習，能夠讓中國婦女轉變成為新女性。這其中的婦女典範是經過《女子世界》中男性知識份子的篩選，針對他們所讚揚的新女德，去挑選了西方為公眾利益而自我奉獻的女性，目的自然是希望中國婦女能夠見賢思齊，也能過公眾與國家貢獻心力。

《女子世界》的發行是在中日甲午戰爭之後，日本的戰勝讓知識份子反思，日本是如何由被侵略國成為侵略國的，使日本也成為中國知識分子學習的對象。而隨著知識份子對日本的關切，在日俄戰爭期間，日本從上到下的同心愛國，團結一致期望打贏戰爭的決心，中國知識分子對於日本婦女愛國的行為十分敬佩，並希望中國女子能夠「近追日本」，學習日本女子的愛國行為。只是在私德方面，中國知識份子依然認為，日本婦女有值得商榷的部分。

在西方與日本女性典範的壓力底下，《女子世界》的男性知識份子也努力蒐羅中國歷史中的女傑，終於勾勒出由花木蘭至清代女傑的系譜。而《女子世界》中所建構之漢族女傑系譜，也成為民國以後文學作品中對於中國女傑的普遍認識。知識份子的努力，使中國女性的生活由傳統步入現代，女性有更多的學習典範，也有了更寬廣的生存空間。

第六章 結論

由晚清至今百年之間，中國女性處境的進展，卻跨越了千年的幅度。漸漸由閨門離開，進入校門，走進世界，開始了一個全然不同的新境界。女性的角色由家庭出發，以母親與妻子的角色游離在家庭與社會之間，慢慢顯現女性主體的聲音。《女子世界》中的知識份子們，在這過渡時期企圖提出一套改造舊女性為新女性的方式。

晚清的知識份子提倡女學，最主要的目地是在強國強種。在救亡圖存的迫切期待下，希望國家一半之女性能由分利者成為生利者，一切以國家利益為考量，故婦女運動成為晚清穿越政治立場的主張之一，不論是維新派還是革命派，對於提倡女學都不遺餘力。《女子世界》在「去舊質鑄新魂」的目地下，提出完整的女性改造計畫，希望透過德、智、體三育的推行下，能將傳統的中國婦女，變為新世界的「國民母」。「國民母」是《女子世界》最主要的訴求，一個能被稱為國民母的婦女，必須具有「健康的身體」、「新知識的洗禮」與「為公眾謀福利的抱負」三種內涵。

中國傳統婦女的閨訓方式，著重在「德、言、容、工」四個面向，溫柔嫻靜並且深諳女紅，是一個良好家教女性的必要條件。但至晚清以後，隨著西方知識進入中國，女性的教育方式也與傳統截然不同。一個走出閨門，進入學堂的女性，成為中國女界的希望。這群女性不再以傳統的女訓與女誡為惟一讀物，反而期許多方涉獵新的知識內容，舉凡衛生、格致、歷史、地理、電學、熱學與植物學等等，都藉由女學堂進入新女性的生活當中。女性也被期望為國家社會奉獻心力，她不能僅以一家利益為思考重點，必須具有為公眾謀福利的公德，以進一步由「家庭成員」變為「國民之一份子」。女性的身體也得到了解放，除了解放纏足以外，也漸漸獲得了行動的自由，可以進出運動場伸展筋骨，也可以進出公共場所進行消遣與娛樂，更可以進入職場，謀求經濟的獨立。

中國傳統居家知識的流傳，一般倚賴女性親友之間的世代口授相傳，關於育兒、飲食、裁縫等方面，在中國女性識字率不普遍的年代，年長女性的經驗傳承成為女性知識傳遞的重要途徑。但在《女子世界》以後，這些居家知識開始藉著

公共期刊向女性讀者灌輸新知，指導者的身分也由家族內的女性親友，變為擁有翻譯能力的期刊撰稿人。在傳遞的居家新知識中，《女子世界》作者／編者群以衛生與科學兩大原則，評斷新式家庭與傳統家庭分別。家庭改良除了要傳統女性走出閨門，更要女性運用新知讓家內的衣食住行必須符合衛生的標準，以維護一家人的健康，特別是孩童的健康。孩童被視為中國未來富強的希望，母親以衛生與科學方式來教養，則中國的下一代便可擺脫亡國滅種的命運，故其居家知識表面上雖在講日常穿衣吃飯的事，知識份子最終還是希望藉由改良居家知識，達到強國強種的終極目標。在更新居家知識的背後，其最終的目的地還是為了要富強中國。

在文學方面，當知識女性擁有走出閨門的機會，開始放眼世界，其所見所聞自會不同，也影響了知識女性書寫的內容。傳統的明清才女，生活空間還是以家內為主，有著「內言不出於閨」的規則，女性的作品大多以家內女性親友為流通的對象。但隨著晚清期刊的開放性，女性作品的對話群體突破血緣與地域的限制，得以進入更寬廣的公共交往空間。透過期刊為媒介，不論相識與否，或男女之別，都可以藉由作品來進行對話。藉著空間的移動與閱讀的影響，婦女的視野與生活空間也得以擴大，可以接收更多的訊息與刺激，婦女文學的內涵也開始有了改變。有趣的是，在《女子世界》中傷春閨怨的作品中幾乎隱去不見，取而代之的是，對國家處境的關切與寄望國家富強的激切，這自然與《女子世界》中男性知識份子對於婦女文學的主張有關，男性知識份子期望女作家們遠離閨門，進入學堂，寫作關乎民生社稷的作品。再者，隨著近代新名詞的不斷增加，女性詩詞的形式也漸受影響，歌行體詩歌的自由格律，對於容納新名詞有其適宜之處，再加上歌曲的傳唱能夠促進新思想的傳布，歌體詩便成為女作家們創作時常用的載體。

隨著對傳統女性生活與道德的揚棄，一直被奉為最高圭臬的「三從四德」與「貞節烈女」逐漸走入歷史，中國女性需要另一種的婦女典範。晚清西方女傑進入中國的言論場，知識份子從西方女性身上看到中國女子所缺乏的德行或行為準則，便起而翻譯與撰述西方女性典範的事蹟，以求讓中國女子能夠見賢思齊，了解身為女子亦可有不同生活價值與追求。而西方女性典範的進入，也引起男性知識份子努力尋求漢族女傑的企圖，在斑斑史冊中尋覓出一條漢族女傑的系譜。花

木蘭、梁紅玉、秦良玉，乃至明末的女傑們，這些具有抵抗異族功勳的女子，成為了晚清知識份子加以頌揚的對象，也成為新時代女性自我期許的典範。

在《女子世界》中藉由傳遞新知，讓中國女性面向一個全新的世界。在國族論述中，女性被期許以國民母與女國民的身分，進入社會國家貢獻心力，並接受教育，成為有知識、具公德且身體健康的新女性；在家庭中，女性居家知識不再道聽塗說，而以衛生與科學最為後盾，開始打造一個新式的家庭生活；在文學的面向上，女性文學不再以傷春閨怨為主調，女性可以寫作詩、文、小說各種文體，隨著女性生活的開拓，文學的內容也離開閨閣，進入社會時事的關懷，以及女性權利的爭取。

《女子世界》是中國婦女報刊史中，第一份以男性為編輯主體的雜誌，自不免有其拘限之處。首先，將國家利益列為優先考量，女權的振興與婦女主體性的訴求，常在國族論述中隱沒不顯，當國族的論述成為一種絕對性，對婦女而言則又成為另一種思想上的暴力；其次，婦女知識的更新，還是以家內知識為基礎，思考模式基本上還是依循「齊家一治國一平天下」的層遞關係，婦女的利益還是被放置在家國之後。

不過，丁初我等人因見中國處於危及存亡之秋，欲振興女界以解救中國，其出發點雖以國家利益為主要考量，但也不得不承認，中國婦女在此晚清知識份子的努力奔走之下，確實也獲得了接受教育與振興女權的機會。報刊在晚清做為傳播文明的三利器之一，丁初我等人企圖以《女子世界》將女界的新思想，藉由報刊文字傳播出去，也啟發後來的有志之士加入婦女報刊的編輯與發行，讓不同的女性思潮都擁有發聲的管道。

《女子世界》之後乃至於民國，中國各地的婦女報刊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亦出現不同面的訴求，有的以啟蒙女界為主的嚴肅報刊，如燕斌之《中國新女界雜誌》、秋瑾之《中國女報》等，亦有以休閒為主的婦女畫報，例如《良友》等休閒小報，亦有揉合知識、休閒與文學的綜合性婦女報刊，例如《婦女時報》（包天笑，1911）與《婦女雜誌》（王蘊章，1915）等。不同時期的婦女報刊，亦彰顯著不同時期婦女思潮的時代性意義，而不同的編輯群體，也都各自顯現出不同面向的性別主張。目前已有不少的學者投入研究，也累積不少的研究成果。但中國的婦女報刊是一個龐大的體系，資料的蒐集、出版資料的考索以及內在思想理

路地剖析，都仍有值得細細梳理與研究之處。在眾聲喧嘩的中國婦女報刊中，《女子世界》僅僅是個開始，其後出現的各個婦女報刊亦值得好好探究，仔細梳理其中的思想脈絡。

參考書目

(依作者姓氏筆劃排列)

一、中文書目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 婦女時報社：《婦女時報》，北京：線裝書局，2006。

(中國近現代女性期刊匯編) 常熟女子世界社：《女子世界》，北京：線裝書局，2006。

中央文史研究館編：《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傳略》，北京：中華書局，2001。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孔慧怡：《翻譯·文學·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

王力堅：《清代才媛文學之文化考察》，台北：文津出版社，2006。

王赳：《激進的女權主義：英國婦女社會政治同盟參政運動研究》，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8。

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台北：龍文出版社，1990。

史和、姚福申：《中國近代報刊名錄》，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

朱自清：《中國歌謠》，台北：世界書局，1974。

江蘇同鄉會：《江蘇》，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史料編輯委員會，1986。

衣若蘭：《「三姑六婆」：明代婦女與社會的探索》，台北：稻鄉出版社，2002。

何震主編：《天義》，東京：秀光社，1907。

吳沃堯、周桂笙編：《月月小說》，台北：文海出版社，1979。

吳梅：《風洞山傳奇》，上海：小說林，1906。

李又寧、張玉法主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 1842-1911》，台北：龍文出版社，1995。

李又寧、張玉法編：《中國婦女史論文集·第一輯》，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1。

李又寧、張玉法編：《中國婦女史論文集·第二輯》，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8。

李孝悌：《清末的下層社會啟蒙運動 1901-191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

- 所，1992。
- 李貞德等編：《婦女與社會》，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
- 李零主編：《中國方數概觀：房中卷》，北京：人民中國出版社，1993。
- 杜學元：《中國女子教育通史》，貴陽：貴州教育出版社，1995。
- 走向近代編輯小組：《走向近代：國史發展與區域動向》，台北：台灣東華，2004。
- 周一川：《近代中國女性日本留學史（1872-1945年）》，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 周作人：《周作人日記》，鄭州：大象出版社，1996。
- 周春燕：《女體與國族：強國強種與近代中國的婦女衛生（1895-1949）》，台北：政大歷史系，2010。
- 林明德編：《晚清小說研究》，台北：聯經文化事業，1988。
- 林逸：《清鑑湖女俠秋瑾》，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
- 邱秀香：《清末新式教育的理想與現實——以新式小學堂興辦為中心的探討》，台北：政大歷史系，2000。
- 金天翮：《女界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 柳亞子著；柳無忌、柳無非編：《柳亞子文集（自傳·年譜·日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 柳無忌、殷安如編：《南社人物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
- 秋瑾著；王燦芝編：《秋瑾女俠遺集》，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76。
- 胡文楷編著：《歷代婦女著作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胡適：《胡適文存》，台北：遠東圖書公司，1985。
- 胡曉真：《才女徹夜未眠：近代中國女性敘事文學的興起》，台北：麥田出版社，2003。
- 胡曉真主編：《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1。
- 范銘如主編：《挑撥新趨勢：第二屆中國女性書寫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臺灣學生書局，2003。

- 夏曉虹：《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 夏曉虹：《晚清文人婦女觀》，北京：作家出版社，1995。
- 夏曉虹：《晚清社會與文化》，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 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台北：地球出版社，1975。
- 孫康宜：《古典與現代的女性闡釋》，台北：聯合文學，1998。
- 徐元民：《中國近代知識份子對體育思想之傳播》，台北：師大書苑，1999。
- 徐自華著；郭延禮編校：《徐自華詩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90。
- 徐珂編：《清稗類鈔》，上海：商務印書館，1917。
- 徐娟主編：《中國歷代書畫藝術論著叢編》，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
- 徐肅：《小腆紀傳》，台北：明文書局，1986。
- 秦燕春：《清末民初的晚明想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 荒林主編：《中國女性主義·2005 春》，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 馬君武著；曾德珪編選：《馬君武文選》，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
- 康有為、梁啟超、錢單士釐：《歐洲十一國遊記二種、新大陸遊記及其他、癸卯旅行記、歸潛記（四種合刊）》，長沙：岳麓書社，1985。
- 張之洞著；苑書義等編：《張之洞全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 張仲民：《出版與文化政治：晚清的「衛生」書籍研究》，上海：上海書店，2009。
- 張妙清等編：《性別學與婦女研究——華人社會探討》，台北：稻鄉出版社，1997。
- 張廷玉等撰：《新校本明史並附編六種》，台北：鼎文書局，1975。
- 張華著，范寧校證，《博物志校證》，北京：中華書局，1980。
- 張蓮波：《中國近代婦女解放思想歷程》，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6。
- 張曉梅：《男子作閨音——中國古典文中的男扮女裝現象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梁啟超：《清議報》，台北：成文書局，1967。
-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北京：中華書局，1989。
- 梁啟超：《飲冰室詩話》，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57。
- 梁啟超著；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梁景和：《清末國民意識與參政意識研究》，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 章詒和：《最後的貴族》，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4。

- 章艷：《在規範與偏離之間：清末民初小說翻譯規範研究》，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1。
- 脫脫等撰：《新校本宋史並附編三種》，台北：鼎文書局，1979。
- 莫世祥編：《馬君武集 1900-1919》，武漢：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1991。
- 許紀霖主編：《20 世紀中國知識份子史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
- 許紀霖主編：《公共性與公共知識份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 許紀霖主編：《公共空間中的知識份子》，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
- 許義雄、徐元民：《中國近代學校體育》，台北：師大書苑，1999。
- 許義雄等著：《中國近代體育思想》，台北：啟英文化事業，1996。
- 許慧琦：《「娜拉」在中國：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變（1900s-1930s）》，台北：政大歷史系，2003。
- 郭延禮、武潤婷：《中國文學精神·近代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2003。
- 郭茂倩：《樂府詩集》，台北：里仁書局，1981。
- 陳子展：《中國近代文學之變遷；最近三十年中國文學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陳平原、米列娜主編：《近代中國的百科辭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 陳永森：《告別臣民的嘗試：清末民初的公民意識與公民行為》，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 陳玉堂：《中國近代人物名號大辭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
- 陳姪媛：《從東亞看近代中國婦女教育：知識分子對「賢妻良母」的改造》，台北：稻鄉出版社，2005。
- 陳俠：《近代中國小學課程演變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
- 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台北：文星書店，1964。
- 陳擷芬：《女學報 第二年第二期》，上海：文明書局，1903。
- 單士釐著；陳鴻祥校點：《受茲室詩稿》，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86。
- 曾寶蓀：《曾寶蓀回憶錄》，台北：龍文出版社，1989。
- 游鑑明、羅梅君、史明主編：《共和時代的中國婦女》，台北：左岸文化出版社，2007。
- 程謫凡：《中國現代女子教育史》，上海：中華書局，1934。

- 費孝通：《鄉土中國》，香港：三聯書店，1991。
- 費絲言：《由典範到規範：從明代貞節烈女的辨識與流傳看貞節觀念的嚴格化》，台北：臺灣大學出版社，1998。
- 閔杰：《近代中國社會文化變遷錄·第二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 馮自由：《革命逸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
- 黃石著，高洪興編，《黃石民俗學論集》，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
- 黃福慶：《清末留日學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2010。
- 黃遵憲著；陳錚編：《黃遵憲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5。
- 黃錦珠：《晚清小說中的新女性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2005。
- 楊念群：《再造「病人」：中西醫衝突下的空間政治 1832-1985》，北京：中國人民大學，2006。
- 楊瑞松：《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中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台北：政大出版社，2010。
- 楊聯芬：《晚清至五四：中國文學現代性的發生》，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 葉紹袁編：《午夢堂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
- 熊秉真：《幼幼：傳統中國的襁褓之道》，台北：聯經文化事業，1995。
- 熊秉真：《安恙：近世中國兒童的疾病與健康》，台北：聯經文化事業，1999。
- 熊秉真：《童年憶往：中國孩子的歷史》，台北：麥田出版社，2000。
- 熊賢君編著：《中國女子教育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
- 趙爾巽等撰；國史館校註：《清史稿校註》，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
- 劉人鵬：《近代中國女權論述——國族、翻譯與性別政治》，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0。
- 劉東主編：《中國學術》，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 劉詠聰：《女性與歷史：中國傳統觀念新探》，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
- 劉詠聰：《德·才·色·權：論中國古代女性》，台北：麥田出版社，1998。
- 劉澤華、羅宗強主編：《中國思想與社會研究·第二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 劉燕京：《晚清社會風尚研究》，台北：知書房，2004。
- 樂黛雲、陳珏編：《北美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名家十年文選》，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 社，1996。
- 鄭師渠：《國粹、國學、國魂：晚清國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
- 燕京研究院編：《燕京學報·新二十期》，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 盧燕貞：《中國近代女子教育史》，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9。
- 鮑家麟編：《中國婦女史論集 四集》，台北：稻鄉出版社，1995。
- 鮑家麟編：《中國婦女史論集五集》，台北：稻鄉出版社，2001。
- 鍾慧玲：《清代女詩人研究》，台北：里仁書局，2000。
- 羅久蓉、呂妙芬主編：《無聲之聲Ⅲ：近代中國的婦女與文化》，台北：中研院近史所，2003。
- 羅秀美：《從秋瑾到蔡珠兒——近現代知識女性的文學表現》，台灣：臺灣學生書局，2010。
- 羅蘇文：《上海傳奇：文明嬗變的側影（1553-1949）》，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 羅蘇文：《近代上海：都市社會與生活》，北京：中華書局，2006。
- 蘇青：《結婚十年》，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9。
- 蘇雪林：《浮生九四：雪林回憶錄》，台北：三民書局，1991。

二、翻譯書目

- 王冠華著；劉甜甜譯：《尋求正義：1905-1906年抵制美貨運動》，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
- 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著；葉鳳美譯：《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
-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 胡纓著；龍瑜成、彭珊珊譯：《翻譯的傳說：中國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

- 浦嘉珉 (James Reeve Pussy) 著；鍾永強譯：《中國與達爾文》，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
- 神田喜一郎著；程郁綴、高野雪譯：《日本填詞史話》，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 高彥頤 (Dorothy Ko) 著；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
- 高彥頤著 (Dorothy Ko)；苗延威譯：《纏足：「金蓮崇拜」盛極而衰的演變》，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
- 曼素恩 (Susan Mann) 著；定宜莊、顏宜葳譯：《綴珍錄：十八世紀及其前後的中國婦女》，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
- 賀蕭 (Gail B. Hershatter) 著；韓敏中、盛寧譯：《危險的愉悅：20 世紀上海的娼妓問題與現代性》，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
- 須藤瑞代著；須藤瑞代、姚毅譯：《中國「女權」概念的變遷：清末民初的人權和社會性別》，北京：社會文獻出版社，2010。
- 實藤惠秀著；譚汝謙、林啟彥譯：《中國人留學日本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3。
- 樽本照雄編；賀偉譯：《新編增補清末民初小說目錄》，濟南：齊魯書社，2002。
- 盧漢超著；段煉、吳敏、子羽譯：《霓虹燈外：20 世紀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 薇拉·妃格念爾 (Vera Figner) 著；巴金譯：《獄中二十年》，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
- 羅芙芸 (Ruth Rogaski) 著；向磊譯：《衛生的現代性：中國通商口岸衛生與疾病的含義》，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
- 顧德曼 (Bryna Goodman) 著；宋鑽友譯：《家鄉、城市和國家——上海的地緣網絡與認同，1853-193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三、外文書目

Rima D. Apple & J. Golden eds : *Mothers and Motherhood : Readings in American History* . Columbus : Ohio State University , 1997.

小野芳朗：《〈清潔〉の近代：「衛生唱歌」から「抗菌グッズ」へ》，東京：講談社，1997。

四、期刊論文

Bailey, Paul 著；古偉瀛、蔡嵐婷譯：〈「女子行為不檢」：二十世紀初中國的犯罪、踰矩與性別〉，《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25期，2008.6，頁165-214。

Judge, Joan. “Expanding the Feminine / Nation Imaginary : Social and Martial Heroines in Late Qing Women’s Journals.” 《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5期，2007.12，頁1-33。

Judge, Joan 著；孫慧敏譯：〈改造國家——晚清的教材書與國民讀本〉，《新史學》12卷2期，2001.6，頁1-40。

尹潔：〈學堂樂歌起因探析〉，《連雲港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3期，2002.9，頁87-90。

方長安、余芳：〈晚清詩界革命與日本啟蒙詩歌關係〉，《鄭陽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3卷4期，2003.8，頁57-59。

王立新：〈中國近代民族主義的興起與抵制美貨運動〉，《歷史研究》2000.1期，頁21-33。

王立新：〈試論美國對中國1905年抵制美貨運動的反應和政策〉，《世界歷史》1999.4期，頁23-31。

王冠華：〈愛國運動中的「合理」私利：1905年中抵制運動夭折的原因〉，《歷史研究》1999.1期，頁4-20。

王惠姬：〈廿世紀前期留美女生與中國家政學的發展（1910-1930s）〉，《中正歷史學刊》8期，2006，頁3-66。

王萌：〈論《婦女雜誌》中的賢母良妻主義及其影響下的文學創作〉，《銅仁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8卷4期，2006.7，頁19-21+45。

王楊：〈寓「新變」於詩句之中——略論黃遵憲詩歌的藝術特徵〉，《重慶科技學

- 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3 期，頁 114-116。
- 王寶平：〈晚清文人與日本——光緒年間寓日文人考〉，《日本學刊》1998.4 期，頁 139-151。
- 左鵬軍：〈同工異曲——黃遵憲《馮將軍歌》《聶將軍歌》對讀〉，《古典文學知識》2003.2 期，頁 26-28。
- 江勇振：〈男人是「人」、女人只是「他者」：《婦女雜誌》的性別論述〉，《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2 期，2004.12，頁 39-67。
- 池賢淑著；趙吉譯：〈《婦女雜誌》（1915-1931）中出現的有關兒童的論說——與《新女性》（日帝治下的朝鮮）比較〉，《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2 期，2004.12，頁 257-277。
- 何小蓮：〈西醫東傳：晚清醫療制度變革的人文意義〉，《史林》2002.4 期，頁 66-75。
- 余彥娟：〈女性主義對母親角色研究的影響：以美國婦女史為例〉，《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20 期，2005.12，頁 1-40。
- 余新忠：〈清代江南的衛生觀念與行為及其近代變遷初探——以環境和用水衛生為中心〉，《清史研究》2 期，2006.5，頁 12-26。
- 吳金平：〈美國華僑與 1905 年抵制美貨運動〉，《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00.1 期，頁 35-41。
- 吳鳳鳴：〈從「格致」到「科學」——淺識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性〉，《中國科技術語》2008.3 期，頁 74-77。
- 呂周聚：〈論晚清詩歌的文體建構〉，《齊魯學刊》215 期，2010.2，頁 129-133。
- 呂芳上：〈個人抉擇或國家政策：近代中國節育的反思——從 1920 年代《婦女雜誌》出版產兒限制專號說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2 期，2004.12，頁 195-230。
- 呂美頤：〈評中國近代關於賢妻良母主義的論爭〉，《天津社會科學》1995.5 期，頁 73-79。
- 宋少鵬：〈民族國家觀念的建構與女性個體國民身份確立之間的關係〉，《婦女研究論叢》68 期，2005.11，頁 48-54。
- 李仁淵：〈新式出版與知識份子：以包天笑的早期生涯為例〉，《思與言》，43 卷 3 期，2005.9，頁 53-105。
- 李利軍：〈《飲冰室詩話》之「以舊風格含新意境」芻議〉，《連雲港師範高等專科

- 《學校學報》3期，2004.9，頁45-48。
- 李良品、冉建紅、吳冬梅：〈石砮「秦良玉文化」的類型、成因與保護〉，《重慶社會科學》156期，2007.11，頁114-118+122。
- 李尚仁：〈健康的道德經濟——德貞論中國人的生活習慣和衛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6本3分，2005.9，頁467-509。
- 李細珠：〈性別衝突與民初政治民主化的限度——以民初女子參政權為例〉，《歷史研究》296期，2005.8，頁69-83。
- 李細珠：〈略論清末國民意識中的性別與權利之關係——以女子參政權為中心的考察〉，《婦女研究論叢》64期，2005.3，頁45-49。
- 李開軍：〈「詩界革命」中「新名詞」地位消長原因之分析〉，《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2期，頁7-11。
- 李開軍：〈歌謠與啟蒙——以晚清《新小說》雜誌的「雜歌謠」專欄為中心〉，《民俗研究》2005.1期，頁130-134。
- 李開軍：〈論黃遵憲的報刊思想〉，《東岳論叢》26卷2期，2005.3，頁81-83。
- 李維石：〈中國古代蒙學的閱讀策略〉，《圖書館》2007.4期，頁136-139。
- 沈松喬：〈國權與民權：晚清的「國民」論述 1895-1911〉，《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73本4分，2002.12，頁685-734。
- 沈倩：〈賢妻良母與英雄豪杰——晚清時期男女異路的女權運動〉，《浙江學刊》2003.3期，頁205-209。
- 周春燕：〈胸哺與瓶哺——近代中國哺乳觀念的變遷（1900-1949）〉，《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8期，2010.12，頁1-52。
- 周淑媚：〈南社盟主柳亞子研究〉，《通識教育年刊（中國醫藥學院）》2期，2000.10，頁11-41。
- 明言：〈為「新民」而「新學」、「新音樂」——學堂樂歌時期的音樂批評觀念〉，《音樂研究》2期，2001.6，頁27-36。
- 林仁昱：〈看見時髦女子——二十世紀俗曲（時調）對於「新女性」的描述與批評〉，《漢學研究》28卷4期，2010.12，頁233-260。
- 林香伶：〈時代感懷與國族認同——柳亞子的「南明書寫」研究〉，《政大中文學報》5期，2006.6，頁105-138。

- 林崗：〈海外經驗與新詩的興起〉，《文學評論》2004.4期，頁21-29。
- 金觀濤、劉青峰：〈從「群」到「社會」、「社會主義」——中國近代公共領域變遷的思想史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5期，2001.6，頁1-66。
- 金觀濤、劉青峰：〈中國個人觀念的起源、演變及其形態初探〉，《二十一世紀》84期，2004.8，頁52-66。
- 長谷部英一：〈中国における胎教の思想〉《技術マネジメント研究》四，2004.12，頁37-44。
- 柯玲：〈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預演」——「詩界革命」與黃遵憲之本心〉，《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5卷2期，2003.3，頁67-74。
- 柯瑞佳（Rebecca E. Karl）著；苗延威譯：〈清末中國的日常暴力〉，《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3期，2005.12，頁217-243。
- 段庸生：〈巴渝文存中的秦良玉〉，《重慶工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1卷4期，2004.8，頁119-122。
- 段庸生：〈對秦良玉研究資料的補正〉，《重慶工商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1期，頁161。
- 洪喜美：〈五四前後廢除家族制度與廢姓的討論〉，《國史館學術集刊》3期，2003.9，頁1-30。
- 胡成：〈「不衛生」的華人形象：中外間的不同論述——以上海公共衛生為中心的觀察（1860-1911）〉，《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6期，2007.6，頁1-43。
- 胡曉真：〈文苑、多羅與華鬢——王蘊章主編時期（1915-1920）《婦女雜誌》中「女性文學」的觀念與實踐〉，《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2期，2004.12，頁169-193。
- 夏曉虹：〈從男女平等到女權意識——晚清的婦女思潮〉，《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5.4期，頁97-104。
- 夏曉虹：〈晚清女性典範的多元景觀——從中外女傑傳到女報傳記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6.3期，頁17-45。
- 夏曉虹：〈《世界古今名婦鑑》與晚清外國女傑傳〉，《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6卷2期，2009.3，頁35-48。
- 孫峰茗：〈清末日本留学女子学生から見る明治良妻賢母主義教育の影——『中国新女界雑誌』を通して〉，《言葉と文化》8，2007，頁103-120。

- 孫康宜：〈性別的困惑——從傳統讀者閱讀情詩的偏見說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6期，1998.8，頁109-118。
- 孫康宜：〈西方性別理論在漢學研究中的運用和創新〉，《臺大歷史學報》28期，2001.12，頁157-174。
- 桑兵：〈拒俄運動與中等社會的自覺〉，《近代史研究》2004.4期，頁157-178。
- 高明士：〈東亞古代士人的共通教養〉，《臺大歷史學報》30期，2002.12，頁17-32。
- 高彥頤：〈「空間」與「家」——論明末清初婦女的生活空間〉，《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3期，1995.8，頁21-50。
- 高嘉謙：〈武俠：近代中國的精神史側面〉，《中極學刊》第一輯，2001.12，頁189-205。
- 張哲嘉：〈《婦女雜誌》中的「醫事衛生顧問」〉，《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2期，2004.12，頁145-168。
- 張燁：〈宋代理學家對童蒙教育理論的發展〉，《綏化學院學報》29卷6期，2009.12，頁44-46。
- 曹萬生、尹海燕：〈論晚清現代漢語詩歌音樂性之濫觴〉，《湘潭大學（哲學社會科學版）》33卷4期，2009.7，頁119-130。
- 曹毅：〈土家族歷史上著名的女強人——秦良玉〉，《民族論壇》1991.4期，頁55-57。
- 梅家玲：〈發現少年，想像中國——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的現代性、啟蒙論述與國族想像〉，《漢學研究》19卷1期，2001.6，頁249-276。
- 章清：〈省界、業界與階級：近代中國集團力量的興起及其難局〉，《中國社會科學》2003.2期，頁189-203。
- 章清：〈「國家」與「個人」之間——略論晚清中國對「自由」的闡述〉，《史林》2007.3期，頁9-29。
- 許瑞芳：〈傳統童蒙教育對兒童道德養成教育的啟示〉，《中國德育》2009.3期，頁31-33。
- 許慧綺：〈一九三〇年代「婦女回家」論戰的時代背景及其內容——兼論娜拉形象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東華人文學報》4期，2002.7，頁99-136。
- 郭長海：〈高旭年譜〉，《長春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97.1期，頁68-76+13。
- 郭長海：〈高旭詩風的轉變和詩界革命的衰微〉，《長春師範學院學報（人文社會

- 科學版)》24卷3期, 2005.5, 頁 69-73。
- 郭浩帆:〈《新小說》創辦刊行情況略述〉,《明清小說研究》2002.4期, 頁 219-228。
- 郭真義:〈黃遵憲詩學思想綜論〉,《嘉應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26卷5期, 2008.10, 頁 11-16。
- 陳乃平:〈清末民初學堂樂歌興起之原因〉,《交響——西安音樂學院學報》21卷1期, 2002.3, 頁 28-30。
- 陳平原:〈有聲的中國——「演說」與近現代中國文章變革〉,《文學評論》2007.3期, 頁 5-21。
- 陳平原:〈中國戲劇研究的三種路向〉,《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3期, 頁 1-27。
- 陳姪媛:〈簡介近代亞洲的「賢妻良母」思想——從回顧日本、韓國、中國研究成果談起〉,《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0期, 2002.12, 頁 199-219。
- 陳姪媛:〈《婦女雜誌》(1915-1931)十七年簡史——《婦女雜誌》何以名為婦女〉,《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2期, 2004.12, 頁 1-38。
- 陳室如:〈閨閣與世界的碰撞——單士釐旅行書寫的性別意識與帝國凝視〉,《彰化師大國文學誌》13期, 2006.12, 頁 257-282。
- 陳春香:〈從高旭的涉日詩歌看晚清中國人的日本觀〉,《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5卷3期, 2009, 頁 126-131。
- 陳弱水:〈公德觀念的初步探討——歷史源流與理論建構〉,《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9卷2期, 1997.6, 頁 39-72。
- 陳振江:〈清末民初婚姻家庭變革運動的趨向〉,《南開學報》1997.4期, 頁 32-36。
- 陳燕婷:〈學堂樂歌研究綜述〉,《南京藝術學院學報(音樂表演版)》2002.4期, 頁 13-16。
- 陳璐:〈從傳統童蒙讀物所得的啟示〉,《天津市教科院學報》1期, 2005.2, 頁 31-32。
- 鹿憶鹿:〈單士釐與拉奧孔——兼論晚清學者的神話觀〉,《興大中文學報》23期增刊, 2008.11, 頁 679-703。
- 彭福榮:〈歷代吟詠秦良玉詩歌述論〉,《文藝爭鳴》2008.7期, 頁 153-155。
- 曾鋒:〈清末學堂樂歌對「五四」新文學的影響〉,《山西大同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4卷3期, 2010.6, 頁 57-60。

- 游鑑明：〈千山我獨行？廿世紀前半期中國有關女性獨身的言論〉，《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9期，2001.8，頁121-187。
- 須藤瑞代著；張瓊方譯：〈《婦女雜誌》與日本與女性：「同為女人」在近代東亞的意涵〉，《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12期，2004.12，頁231-255。
- 須藤瑞代：〈近代中國的女權概念〉，《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32卷1期，2005.1，頁137-142。
- 馮志陽：〈媒體、瘟疫與清末的健康衛生觀念——以《大公報》對1902年瘟疫的報導為中心〉，《史林》2006.6期，頁96-103。
- 黃俊：〈清末至五四時期中國詩歌理論的現代轉型〉，《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1卷3期，2009.6，頁78-81。
- 黃賢強：〈海外華人與近代中國：1905年抗美運動研究的新視角〉，《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4期，2004.6，頁31-62。
- 楊四平：〈由古典至現代：晚清詩論的過渡性特徵〉，《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7.2期，頁149-160。
- 楊瑞松：〈睡獅將醒？：近代中國國族共同論述中的「睡」與「獅」意象〉，《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30期，2008.12，頁87-118。
- 楊瑞松：〈近代中國國族意識中的「野蠻情結」——以1903年日本大阪人類館事件為核心的探討〉，《新史學》21卷2期，2010.6，頁107-163。
- 楊聯芬：〈晚清與五四文學的國民性焦慮（一）：梁啟超及晚清啟蒙論者的國民性批判〉，《魯迅研究月刊》2003.10期，頁57-63。
- 楊聯芬：〈20世紀初中國的女權話語與文學中的女性想像〉，《海南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70期，2004.2，頁6-10。
- 董智穎：〈中國近代史上的兩種《女子世界》〉，《華東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8卷3期，2006.5，頁33-34。
- 雷祥麟：〈衛生為何不是保衛生命？民國時期另類的衛生、自我、與疾病〉，《台灣社會研究季刊》54期，2004.6，頁17-59。
- 熊月之：〈晚清上海：女權主義實踐與理論〉，《學術月刊》2003.11期，頁45-54。
- 熊秉真：〈幼蒙、幼慧與幼學：近世中國童年論述之轉折起伏〉，《中央大學人文學院》36期，2008.10，頁57-96。

- 趙立彬、李瑾：〈從「國民之母」到「女國民」——辛亥革命時期婦女解放思潮及其激進化〉，《亞洲研究》53期，2006，頁173-187。
- 趙統：〈試述江陰南菁書院的治學特點〉，《南菁曉莊學院學報》21卷2期，2005.3，頁111-122。
- 劉貞曄：〈論中國近代「天義派」關於婦女問題的主張〉，《婦女研究論叢》2000.2期，頁44-47。
- 劉新：〈對中國古代童蒙教育思想的點滴思考〉，《西安航空技術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5卷2期，2007.3，頁25-27。
- 滕新才：〈秦良玉「平台賜詩」考論〉，《四川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1卷3期，2004.5，頁102-106。
- 鄧偉：〈論梁啟超「詩界革命」的調適與定位〉，《北京論叢》2010.3期，頁15-17。
- 鄭永福、呂美頤：〈近代關於中國“女國民”觀念的歷史考察〉，《山西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32卷4期，2005.7，頁58-63。
- 鄭海麟：〈黃遵憲與中國的語言文體改革〉，《文史知識》2008.9期，頁16-20。
- 鄭敬東、鄭微波：〈郭沫若所作秦良玉讚美詩辯〉，《當代文壇》2008.1期，頁177-179。
- 謝長法：〈清末的留日女學生〉，《近代史研究》1995.2期，頁272-279。
- 韓賀南：〈中國婦女運動實踐對婦女理論基本概念的建構——「五·四」時期「女子解放」的含義及其理論背景〉，《婦女研究論叢》51期，2003.3，頁10-16。
- 叢小平：〈從母親到國民教師——清末民族國家建設與公立女子師範教育〉，《清史研究》1期，2003.2，頁87-97。
- 瞿駿：〈入上海居上海——論清末士人在城市私誼網路（1895-1911）〉，《史林》2007.3卷，頁100-113。
- 魏愛蓮（Ellen Widmer）著；劉裘蒂譯：〈十七世紀中國才女的書信世界〉（《中外文學》22卷6期，1993.11，頁55-81。
- 羅秀美：〈從閨閣詩人到公共啟蒙者——以近代女性報刊中的論說文為主要視域〉，《興大中文學報》22期，2007.12，頁1-46。
- 羅秀美：〈流動的風景與凝視的文本——談單士釐（1856-1943）的旅行散文以及她對女性文學的傳播與接受〉，《淡江中文學報》15期，2006.12，頁41-94。
- 譚佛佑：〈明季平播抗清巾幗英雄秦良玉〉，《貴州文史叢刊》2009.3期，頁72-75。

- 關愛和：〈黃遵憲的詩學理論〉，《東岳論叢》26卷2期，2005.3，頁72-74。
- 嚴昌洪：〈「國民」之發現——1903年上海國民公會再認識〉，《近代史研究》2001.5期，頁45-58。
- 嚴鳳、翁曉宇：〈學堂樂歌在中國近現代音樂教育中的作用及意義〉，《福建論壇（社教科學版）》2004.9期，頁66-70。
- 龔喜平：〈秋瑾的「歌體詩」創作與中國近代詩體變革〉，《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37卷2期，2000.3，頁21-25。
- 龔喜平：〈融入異邦之新聲、汲取民間之營養——黃遵憲對中國詩歌近代化的兩大貢獻〉，《中州學刊》120期，2000.11，頁127-131。
- 龔喜平：〈南社詩人與中國詩歌近代化〉，《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0卷2期，2002，頁29-36。
- 龔喜平：〈新詩自覺：晚清「新學詩」的詩史意義〉，《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1卷2期，2003.3，頁32-36。
- 樂委評選注：〈蔣維喬日記中的小說林社史料〉，《清末小說》29號，2006.12，頁135-145。

五、學位論文

- Cully, Eavan , *Nationalism, Feminism, and Martial Valor : Rewriting Biographies of Women in Nüzi shijie (1903-1907)* . M.A , Montreal : McGill University, 2008 .
- 安碧蓮：《明代婦女貞節觀的強化與實踐》，台北：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
- 周婷：《辛亥革命時期婦女報刊《女子世界》中女性體育研究》，上海：上海體育學院體育賽事運作與新聞碩士論文，2009。
- 林俊宏：《晚清革命思潮與民間文學傳播之研究——以陳天華、秋瑾為探討中心》，花蓮：花蓮教育大學民間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 邱俊明：《「家有賢母，室有良妻」：《婦女時報》（1911-1917）家庭教育討論初探》，台北：臺灣大學歷史系碩士論文，2010。

- 金正秀：《晚清女性傳記與國族想像的形成研究》，北京：北京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論文，2011。
- 柯小菁：《塑造新母親：近代中國育兒知識的建構（1903-1937）》，新竹：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
- 柯惠鈴：《性別與政治：近代中國革命運動中的婦女 1900s-1920s》，台北：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4。
- 紀俊龍：《晚清「四大小說雜誌」研究》，台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9。
- 張孟珠：《清代貞節的實踐及其困境》，嘉義：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
- 陳湘涵：《尋覓良伴：近代中國的徵婚廣告（1912-1949）》，新竹：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 董瑋：《近代女子海外遊研究》，上海：上海師範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碩士論文，2005。
- 趙立軍：《20世紀初女性報刊——《女子世界》研究》，吉林：東北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碩士論文，2010。
- 龍美雯：《秋瑾詩詞研究》，中壢：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6。
- 顏麗珠：《單士釐及其旅遊文學——兼論女性遊歷書寫》，中壢：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